

曼達安教・雅茲迪教・祆教・德魯茲派・撒馬利亞人・科普特人・卡拉什人・東方教會

Heirs to Forgotten Kingdoms

Journeys Into the Disappearing Religions of the Middle East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智慧的旅程

被隱藏的眾神

Independent Best Books of 2014

Religion

Economist's Intelligent Life

Four Books of the Moment

傑拉德・羅素

著 葉品岑

譯

Gerard Russell

敬拜日月星辰、流動的水，向火獻祭，
在廣袤的中東大地、強勢伊斯蘭的遮蔽下，
他們默默守護人類三千年歷史的璀璨與滄桑。

精通多國語言的英國外交官，踏跡祆教聖殿、與曼達安大祭司對話，
揭開八個少數宗教的神秘面紗。

專文導讀
各界推薦

蔡源林 |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陳建仁 | 前副總統、趙錫麟 | 台北清真寺教長、林婉美 | 世界遺產旅行作家、

初雅士 | 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阿潑 |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劉柏君 | 《靈界的譯者》作者

美國總統柯林頓

「這是三年來我讀過
最有趣的一本書。」



曼達安教・雅茲迪教・祆教・德魯茲派・撒馬利亞人・科普特人・卡拉什人・東方教會

Heirs to Forgotten Kingdoms
Journeys Into the Disappearing Religions of the Middle East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智慧的旅程

被隱藏的眾神

傑拉德・羅素
著
葉品岑
譯

Independent Best Books of 2014
Religion
Economist's Intelligent Life
Four Books of the Moment

Gerard Russell

敬拜日月星辰、流動的水、向火獻祭，
在廣袤的中東大地、強勢伊斯蘭的遮蔽下，
他們默默守護人類三千年歷史的璀璨與滄桑。

精通多國語言的英國外交官，踏跡祆教聖殿、與曼達安大祭司對話，
揭開八個少數宗教的神秘面紗。

專文導讀——蔡源林 |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各界推薦——陳建仁 | 前副總統、趙錫麟 | 台北清真寺教長、林婉美 | 世界遺產旅行作家、
初雅士 | 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阿潑 |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劉柏君 | 《靈界的譯者》作者

「這是三年來我讀過最有趣的一本書。」
美國總統柯林頓

Heirs to Forgotten

Journeys Into the Disappearing Religions of the Middle East

Gerard Russell
傑拉德·羅素
著
葉品亨
譯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智慧的旅程

被隱藏的眾神

目錄

各界推薦

推薦序 另眼看文明衝突，中東的少數宗教能教我們什麼？ 蔡源林

年表

中東少數宗教簡介

前言

緒論

第一章 曼達安教：倖存的巴比倫人

第二章 雅茲迪教：孔雀天使的信徒

第三章 祆教：拜火之人

第四章 德魯茲派：永生之族

第五章 撒馬利亞人：失落的以色列民族

第六章 科普特人：信奉基督的古埃及人

第七章 卡拉什人：谷地裡的異教徒

後記 在底特律

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

各界推薦

「精通波斯文與阿拉伯文的英國外交官傑拉德．羅素，利用他在中東地區的十四年時間，尋訪八個古老宗教群體的領袖與信徒，介紹他們如何守護信仰傳統，讓讀者理解人類信仰的豐富內涵。在自由多元的社會，我們應該採取開放的態度來進行宗教對談，尊重彼此的信仰，懇切傳揚仁愛的福音！正如同方濟各教宗託付給教友們的祈禱意向：『願天主賜予我們恩寵，能與其他宗教的弟兄姊妹如手足般相處，向全人類開放並為彼此祈禱。』」

——陳建仁（中研院院士 / 中華民國第14任副總統）

「歷代的文明興衰，都受到當時人們的宗教信仰與政治互動影響。從本書敘述幾乎跨越七千年的一些信仰，可以清楚地發現，在文明興盛的時代和地區，不同的人種與宗教信仰都能夠寬容共存，甚至彼此影響。而在一些信仰遭受迫害的時代和地區，經常也會發生政治混亂，民不聊生，甚至導致文明衰退。《被隱藏的眾神》作者羅素在他的緒論和後記裡面，清晰地說明了政治和宗教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提醒我們：生活在安定開放與包容的社會裡，要珍惜我們擁有的一切。」

——趙錫麟（台北清真寺教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這是一堂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課題。對於促進現今人類的和諧，立基於尊重與欣賞不同宗教習俗的態度，《被隱藏的眾神》提供了千年對話與省思。二十一世紀的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正在沿著文化界線進行重組，經由宗教、種族或語言來界定身分的認同，造成人類有史以來的巨大衝突與困境。作者羅素重回文明發源地，有溫度地報導，開展了一條人類未來的和諧之旅。」

——林婉美（世界遺產旅行作家）

推薦序

另眼看文明衝突，中東的少數宗教能教我們什麼？

蔡源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中東地區擁有人類最古老的兩河流域文明，也是世界宗教的主要發源地，但經歷了近百年世界史的變局、民族疆域的重劃、國際強權的角力，世人對中東的印象經常是充斥了族群衝突與宗教暴力的場域，以及無止境的政治陰謀與權力競逐的舞台。這種當代史觀掩蓋了中東地區曾孕育過的輝煌文明，各色人種和平共存、各大宗教相互包容，乃至不分彼我、相互融合的數千年黃金歲月。《被隱藏的眾神》的立意所在，便是徹底翻轉世人對中東的偏頗印象，並從該地區相對弱勢或瀕臨絕跡的古老宗教社群，挖掘出那段奇幻又寫實的宗教交融歷史，以及人類追求超凡絕俗境界所踐履的靈性足跡。

本書作者傑拉德·羅素是英國派駐中東國家長達十四年的外交官，也是好學不倦的古文明專家。如本書英文版撰序者所言，這兩種專業的結合，令人聯想起昔日英國的東方學家兼殖民官員之日不落帝國傳統。當然，作者不再以帝國之眼觀看異文化，而是立足於後殖民時代的批判觀點，意圖翻轉當前流行於全球政經界、傳媒界與學術界的「文明衝突」論，提出或可稱為「後文明衝突」的新論述，重新解讀當前中東衝突的前因後果。

筆者猶記一九九〇年代在美留學期間，正值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衝突」論解釋後冷戰全球秩序之際，當時已

有另一批自由派學者提出反制的論述，主張人文學與宗教研究應該多多發掘與探索「文明融合」或「宗教包容」的理論與實踐，以避免落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導致「文明衝突」論成為自我實現的末世預言。不幸的是，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恐攻事件造成「文明衝突」論的聲量遠遠蓋過「文明融合」論或「宗教對話」論。

但追求「後文明衝突」新典範的思潮仍細水長流，西方世界不少自由派文人與學者以此為己任，堅信化解「文明衝突」與各種形式的偏狹世界觀與價值觀，乃是當代人文主義的新使命。傑拉德·羅素屬於此一陣營，不但立意顛覆觀看中東的「文明衝突」框架，甚至直擊西方世界「伊斯蘭恐懼症」的要害。他在不違西方文明的自由人權等主流價值的前提之下，刻意透過中東現存的非主流宗教社群的視角，反證主導中東文明秩序超過千年之久的伊斯蘭教，遠比現代西方人所想像的更加包容與寬待異端與異教。此外，他也時時提醒讀者，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宗教寬容歷史遠比伊斯蘭文明短少了許多，而今日中東的諸多所謂「宗教衝突」，背後都有政治黑手在操縱，西方強權也都難辭其咎。

伊斯蘭文明宗教寬容的原則與底線，由《古蘭經》所設定，其中數節經文將猶太教徒、基督徒、拜火教徒（或稱祆教徒）與「拜星教徒」並列為擁有正信經典的宗教（見2: 62、5: 69、22: 17等條），應為穆斯林宗教寬容的對象。其中，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皆以亞伯拉罕先知為共祖，三教的同源關係被《古蘭經》反覆確認。祆教則為古波斯帝國的官方宗教，對長期與波斯人共同生活於兩河地區的阿拉伯人而言並不陌生，被接受為天啟宗教，符合當時的歷史脈絡。其實，當伊斯蘭文明往南亞地區擴張之後，穆斯林統治者亦將印

度教、佛教納入天啟宗教之列而予以寬容；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之後，這份天啟宗教的名單又加入了儒教與道教。歷代的穆斯林學者以自由開放的解經學方法，配合穆斯林統治階層對宗教的實用主義態度，開創了同時期其他文明所沒有的宗教寬容政策。

《古蘭經》所提到應予包容的異教之中，最令人費解的是「拜星教徒」。該詞指涉何種宗教，宗教學者之間並無定論，但最有可能的是淵源於古代巴比倫文明的星座信仰與占星術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教派。古巴比倫文明的七重天宇宙論和以星辰作為神人媒介的特殊教義，深深影響了所有源出中東的宗教傳統，包括祆教與三大一神教。不過許多不屬於前述的中東主流宗教，卻可能更原汁原味地保留古巴比倫信仰與儀式的非主流教派，仍流傳於兩河流域及其周邊區域。本書首章所探討的曼達安教派，便是迄今尚存的「拜星教徒」支派，該教派的天堂觀、一週七天且以其中一天為宗教修行日、以水淨身的洗禮、善惡二元論、救世主於末日降臨人間等教義與儀式，皆已成為世人耳熟能詳的一神教基本觀念與重要儀式。

曼達安教派在公元三世紀啟發了一位偉大的宗教先知摩尼，開創了被宗教史家喻為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宗教」的摩尼教。摩尼教在創教主摩尼過世後三百年之內，已從其兩河流域的發源地往西傳遍歐洲與北非各地，往東則傳入中亞與中國。但同一時期，猶太教與基督宗教都還只侷限於中東、歐洲與北非地區，而佛教也還只傳布於亞洲的東半部，摩尼教卻已是跨越亞、非、歐三洲的「世界宗教」。此時伊斯蘭教甚至尚未誕生。很不幸的是，羅馬帝國確立基督教會為正統之後，摩尼教立即成為被打壓的頭號異教。此外，摩尼教在宣稱宗教寬容的中國歷朝政權的保護之下，雖延續了數百年之久，不巧的是，唐

朝中葉發生了中國歷史最著名的宗教迫害事件：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滅佛」，儘管佛教是被迫害的主要對象，所有其他外來宗教因不符合當道的儒家與道教主流而遭全面禁絕，摩尼教也劫數難逃。中國的摩尼教徒從此就改頭換面為類佛教的民間教派，但仍被往後的朝代視為「食菜事魔」而貼上左道異端的標籤。值得注意的是，與唐武宗滅教同一時期，只有中東的穆斯林政權仍然包容摩尼教，使其傳承在中東發源地又維持了數百年之久。

羅素在探索了與伊斯蘭文明有淵源關係的「拜星教徒」曼達安派之後，繼續以文獻考證結合深入該教社群的實地調查之模式，在接下來數章依序探討被三大一神教正統視為異端或異教的各種中東非主流教派。雅茲迪教派，傳承自巴比倫與亞述帝國時期某種獨特的一神教，既相信獨一真神創造宇宙，也相信真神透過七位天使管理宇宙萬物。其中最受崇敬的一位天使化身為孔雀，以至於雅茲迪教徒常被一神教正統指控為孔雀崇拜，或魔鬼崇拜。但更特別的是，雅茲迪教徒相信在中東宗教中相當罕見的輪迴轉世觀念；中世紀時期，受到伊斯蘭蘇非主義所影響，雅茲迪教徒發展出類似師徒傳承的靈修團體，也使其異端特質更加了一筆。

祆教，則以善惡二元神論著稱。羅素在書中特別點出其末世的正邪大戰、救世主的降臨、善人進入類似天堂的「光明世界」等教義，祆教因此可被視為古巴比倫宗教與猶太教、基督宗教的承先啟後者，並持續在伊斯蘭教興起後為伊朗民族所延續，並以不同模式與伊斯蘭教交涉。特別是什葉派與蘇非主義的某些流派，被認為融入了祆教的教義與修行。此外，祆教徒過世後，將其大體暴露於荒郊野外任由鳥獸啄食的獨特葬儀，也令人聯想到西藏佛教的天葬儀式。

德魯茲派，乃是什葉派旁支伊斯瑪儀派的分支，可謂異端中的異端，幾已不被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視為同教，主要分布於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三國的地中海沿岸山海交錯地帶。德魯茲派將古希臘哲學家也視為先知，從而發展出哲學化的一神觀，並採取諾斯底教派的菁英式、密傳式信仰模式。但這導致大部分該派平信徒對其信仰為何，竟不知其所以然，僅鬆散地維繫該宗教的身分認同，而該派的入道者又拒絕對外人透露其信仰內容，形成該派莫測高深的遺世獨立狀態。德魯茲派另一獨特教義，則與雅茲迪派一樣，相信輪迴轉世，在中東宗教中實屬少見。

撒馬利亞派，屬於猶太教的非主流教派，但比當前主導猶太教正統的拉比猶太傳統更為古老，可上溯至古代猶太王國分裂為兩國時期，淵源於北方以色列王國所遵循的祭司傳統。其教眾在耶穌時代，以「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被載於《新約聖經》而名垂千古，但其信仰傳統僅見於今以色列北部的古撒馬利亞城周邊地區。根據以色列官方統計，該派人數已不滿千人，可謂瀕臨絕跡的古猶太民族活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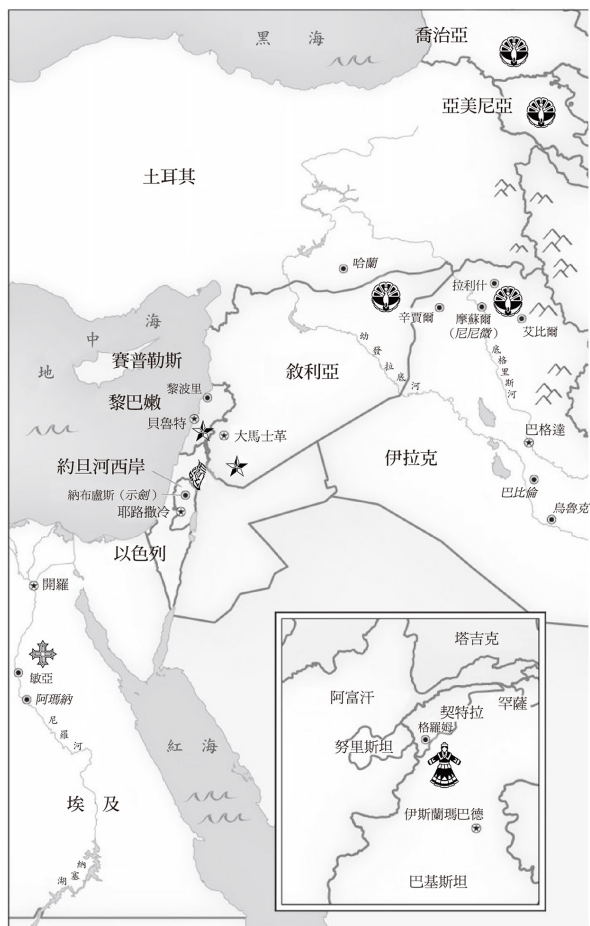
科普特派，為埃及主要的基督教派，因堅持不接受三位一體的正統神學，而被排除於東正教、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三大傳統之外。該派也被冠為「一性論」教會，因其堅持耶穌僅有神性而反對正統教會的神、人兩性論。正因為科普特派與羅馬帝國的官方教會長期不合，導致七世紀阿拉伯穆斯林大軍攻入埃及時，科普特基督徒將這群敵人的敵人視為盟友，羅馬帝國的北非領土遂門戶大開，從此納入伊斯蘭文明圈。羅素不認為古埃及文明已遭基督徒、穆斯林滅絕，只剩金字塔、神廟、木乃伊等供人憑弔。他企圖在科普特基督徒身上尋覓古埃及文明的遺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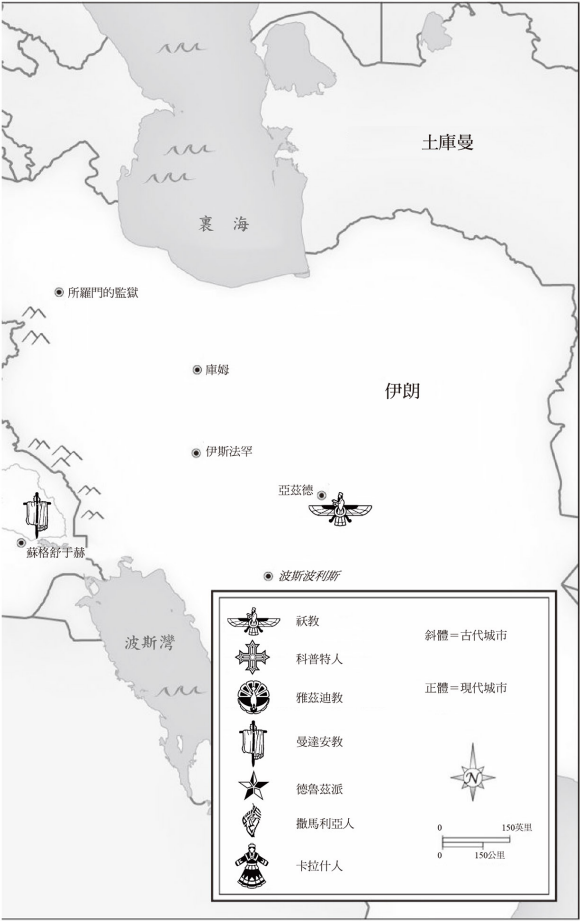
最後，羅素利用派駐阿富汗期間，深入當年亞歷山大大帝遠征軍視為世界極東邊界的興都庫什山，探訪僅有少數西方探險家曾接觸過的山區異教部落——卡拉什族。由於聚居於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界的崇山峻嶺之間，卡拉什族一直維持部落的原生信仰，也有學者認為其傳統祭儀保留了印度教最古老的吠陀時期宗教儀式，後者今日早已不見於印度本土。直到十九世紀末期，卡拉什族才被阿富汗蘇丹所征服而與伊斯蘭文明接觸，但其與世隔絕的環境與部落的凝聚力，使其一直未為伊斯蘭文明所同化，並與居住於更低海拔的周邊穆斯林社群維持友善的互動關係。隨著近三十年塔利班等激進伊斯蘭聖戰組織在該地區崛起，卡拉什部落信仰亦處於危殆之中。

羅素於後記述及前面章節所探索的各教派在歐美國家的移民社群。這些中東古老宗教的傳人，同樣面臨了所有移民社群共同的兩難困境：究竟是要堅守自己的宗教文化傳統而致與主流社會疏離、甚至付出被歧視的代價？抑或是擁抱主流文化，以便融入在地社會，但卻失去自己的傳統文化與原生認同？雖然，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提供他們比家鄉更安定富裕的生活，但對其中東身分與非主流宗教文化的偏見與誤解，仍使其難以真正融入西方社會。當今西方國家大多提倡符合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的多元文化政策，所以羅素在書中論列的這些少數教派的有志之士，企圖找出一條既維繫傳統又融入在地的折衷路線，既透過設立各自的宗教社團組織來傳承其信仰文化，也打開大門歡迎主流社會大眾來認識其宗教文化。但部分人士對此種雙贏策略的成效不抱樂觀期待。畢竟維繫傳統所需資源與人力，並非尚未擁有足夠社經基礎的移民社群所能長期負擔。羅素也提到，這些中東少數宗教的移民社群，若比較堅持其傳統者，經常會選擇以最早有離散經驗

的猶太社群為榜樣，並比鄰而居，反而意外地與猶太人形成不容易在中東原鄉見到的友好關係，相互扶持。

《被隱藏的眾神》既可當作世界宗教史的中東外傳來鑽研，驗證晚近宗教學研究所得的重要定律（即所謂「正統／異端」之辨，不純然只是宗教真理的分判，更常是政治權力運作的結果），也可作為後殖民時代的離散社群民族誌來品味，以深入瞭解這些遠走他鄉的移民社群，如何透過一套獨特的宗教文化傳承制度，維繫其群體認同而不被在地主流社會所同化的奧秘所在。羅素所述及的宗教或許對台灣讀者既陌生且遙遠，但這些少數教派置身於周邊強權的夾縫中，其追求獨立自主的艱困處境，以及面對危機時刻必須採取選邊站的求生策略，台灣讀者應該可以感同身受。





年表

約基督前 2560 年	埃及大金字塔建成。
約基督前 1900 年	印歐民族來到印度，當中可能包括卡拉什人的祖先。
基督前 1842 年	巴比倫成為獨立城邦。
約基督前 1000 年	祔教聖典《阿維斯塔》寫成。
基督前 740／722 年	亞述人進攻以色列，囚禁十支派。
基督前 597 年	尼布甲尼撒擄掠耶路撒冷，將猶太人領袖們驅逐至巴比倫。
基督前 331 年	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不久後，他通過興都庫什山。
基督後 70 年	羅馬人擄掠耶路撒冷並摧毀第二聖殿。
基督後 274 年	摩尼教創立者摩尼過世；曼德安人已生活在伊拉克沼澤。
基督後 313 年	君士坦丁頒布〈米蘭詔書〉，承認基督教為合法宗教。
基督後 529 年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關閉柏拉圖的學院。
基督後 634－654 年	阿拉伯穆斯林征服自摩洛哥到伊朗的所有土地。
基督後 635 年	第一支基督教傳教團從中東抵達中國。
基督後 1017 年	德魯茲派初次在開羅公開傳教。
基督後 1095 年	教宗烏爾巴諾二世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基督後 1160 年	伊拉克北部雅茲迪教的重要人物謝赫阿笛過世。
基督後 1258 年	成吉思汗擄掠巴格達。
基督後 1263 年	德魯茲派及其他非正統穆斯林的保守派批評者伊本·泰米葉出生。
基督後 1501 年	伊朗伊斯瑪儀一世的統治開始，他將伊朗改宗什葉伊斯蘭。

中東少數宗教簡介

曼達安教	
人口與地理	約6萬人。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前主要分布於伊拉克（2019年僅剩約3000人），其後則多分布於伊朗，另有近數千人移民至澳洲及瑞典。
起源地／聖地	今天的伊拉克。
重要神祇	女性惡靈盧哈、光之天使希比爾·齊瓦。
重要先知	施洗者約翰為最重要的先知，也敬重亞當、舍特及挪亞。
重要經典	《大寶藏》、《約翰之書》。
重要節慶與儀式	白日節（每年4月）、浸洗禮。
重要神廟與陵墓	禮拜堂「曼迪」，通常位於水邊。
歷史	• 始於基督後3世紀左右。 • 接受《舊約聖經》中的部分先知；保存了巴比倫人對星象的看法；11世紀時，被伊斯蘭認定為拜星教。
當地困境	• 1970年代，海珊曾強迫曼達安教徒向世人公開其聖典《大寶藏》的內容。在不斷遭受迫害的狀況下，大量曼達安教徒移居海外。 • 2003年美軍進入伊拉克後，國內的動盪不安促使伊斯蘭極端團體迫害曼達安教徒。2014年，曼達安人也因伊斯蘭國入侵而遭受新一波的迫害。截至2018年，僅剩400個曼達安家庭還居住在伊拉克。 • 信仰的延續在大量教徒移居海外後變得更為不易。在缺乏曼迪及祭司的狀況下，近年來該教權威人士開始授權建造儀式用的水池，以代替河水。

雅茲迪教	
人口與地理	約150萬人。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前主要分布於伊拉克，至今有半數出走，其中多數人移居歐洲及北美，其中約有20萬人生活在德國。
起源地／聖地	今天的伊拉克。聖地拉利什位於今伊拉克北部。
重要神祇	孔雀天使梅拉克·陶烏斯。
重要先知	崇敬創教者謝赫阿笛，也敬重亞伯拉罕及穆罕默德。
重要經典	《黑色之書》。
重要節慶與儀式	紅色星期三（每年4月）、齋節（每年12月）。
重要神廟與陵墓	拉利什神廟。
歷史	- 起源時代難以考證，目前最早可追溯至8世紀的伊斯蘭伍麥亞王朝。 - 孔雀天使拒向亞當跪拜一事使人將其與撒旦產生聯想，進而使基督徒及穆斯林視雅茲迪教為異端。 - 歷史上經歷72次迫害。1261年受蒙古人西征波及而死傷慘重。16世紀時也曾捲入波斯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戰爭。到了19世紀，因其不再被鄂圖曼當局視為有經人而遭受進一步的迫害。
當地困境	2014年，伊斯蘭國入侵伊拉克，許多雅茲迪人被俘或殺害，其中包含婦女及孩童，更有500人遭處決。截至2020年，約有30萬雅茲迪人居住在伊拉克庫德自治區的營區和庇護所中。納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曾在《倖存的女孩》一書中講述她的經歷。 - 如今，伊斯蘭國下的雅茲迪倖存者面臨重回社群、重建生活與未來等問題。此外，正義如何落實、責任歸屬與協尋失蹤人口等工作仍在進行。

祆教	
人口與地理	約11萬人。其中約6萬人居住於印度、2萬人居住於伊朗，亦有2萬人居住於北美。
起源地／聖地	伊朗的亞茲德。
重要神祇	善神阿胡拉·馬茲達、惡神安格拉·曼紐。
重要先知	瑠羅亞斯德。
重要經典	《阿維斯塔》。
重要節慶與儀式	諾魯茲節（每年3月）。
重要神廟與陵墓	亞茲德火神廟、答赫馬（皆位於伊朗）。
歷史	- 起源於基督前6世紀。 - 善惡對立的世界觀及天堂與地獄的觀點對亞伯拉罕諸教影響深遠。基督教中的「東方三賢士」曾被描繪為波斯的祆教徒。 - 直至基督後5世紀仍為伊朗地區的主流宗教。7世紀阿拉伯人入侵後逐漸因社會與經濟壓力而伊斯蘭化。
當地困境	1970年代，祆教曾被巴拉維王朝視為伊朗的民族象徵，不再是被壓迫的少數。1906年伊朗憲法改革，祆教徒獲得議會席次。 - 然而，近年來由於外婚增加及低出生率，伊朗的祆教人口減少。

德魯茲派	
人口與地理	約200萬人。其中約60萬人居住於敘利亞，25萬人居住於黎巴嫩。
起源地／聖地	埃及開羅。
重要神祇	宇宙意識。
重要先知	畢達哥拉斯。但認為耶穌、穆罕默德等所有先知都是同一靈魂轉世。
重要經典	《智慧之書》。
重要節慶與儀式	注重心靈修養勝過外在儀式。
重要神廟與陵墓	巴雅達聖祠（位於黎巴嫩）、德魯茲山區（位於敘利亞）、葉忒羅之墓（位於以色列）。
歷史	- 起源於基督後10世紀。與基督教同屬一神信仰，因此相處和諧，直至1860年黎巴嫩內戰。部分信徒認為德魯茲派源自伊斯蘭的伊斯瑪儀派，但不自認為穆斯林。 - 基督後11世紀，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哈基姆被德魯茲派神化，但哈基姆離奇失蹤後，德魯茲派遭受打壓而流亡。
當地困境	1980年以色列宣示對戈蘭高地的主權，該地約1萬8千名德魯茲人拒絕接受以色列國籍。 2018年7月，以色列通過《國家民族法》，宣示以色列是猶太民族歷史上的祖國，引發國內德魯茲派反彈，憂心其公民地位遭打壓。 - 與外族通婚人口增加，再加上信仰內容僅有少數神職人員才悉知，導致傳承困難。

撒馬利亞人	
人口與地理	約800人。居住於以色列及基利心山。
起源地／聖地	基利心山。
重要神祇	上帝。
重要先知	亞伯拉罕、摩西等先知。
重要經典	撒馬利亞版的《妥拉》。
重要節慶與儀式	逾越節（每年4月或5月）、住棚節（每年9月或10月）。
重要神廟與陵墓	曾有座聖殿位於基利心山上，其歷史被認為比猶太教更早。
歷史	- 誕生於基督前8世紀。和猶太教有共同起源、習俗極度相似，但十誡的內容不同。出現在《新約聖經》中的好撒馬利亞人故事。基督後1世紀，羅馬軍隊將猶太人趕出以色列後，撒馬利亞人蓬勃發展。 - 基督後6世紀時，查士丁尼大帝毀壞撒馬利亞人的會堂，並頒布多項限制自由的禁令。7世紀阿拉伯人入侵時，撒馬利亞人再次獲得宗教自由，但人數隨著政治、經濟因素及改宗而逐漸下降。 1952年時，曾一度僅存146人。
當地困境	1990年洛茲的撒馬利亞人獲以色列承認為公民，使得該地居民同時擁有以巴國籍。 - 由於族群人數稀少，族內通婚導致隱形遺傳疾病發生的風險上升。外婚不易及改宗問題也導致族群人口進一步縮減。

科普特人	
人口與地理	約4百萬至1千2百萬，但官方與民間的統計數字差異極大。大多數居住於埃及，海外較大社群則位於北美。
起源地／聖地	埃及亞歷山大港。
重要神祇	上帝。
重要先知	聖馬可。
重要經典	跟基督教相同，但用科普特語寫成。
重要節慶與儀式	聖週五（每年4月）、四旬期齋戒（每年2月至3月）。
重要神廟與陵墓	科普特正教會聖馬可主教座堂（位於埃及）。
歷史	5世紀時，基督教會內部在基督的本質問題上出現分歧，相信基督只有神性的科普特人發展出獨特的科普特正教會。 - 阿拉伯人在7世紀入侵後，向非穆斯林人口徵稅，導致雙方關係惡化，到14世紀來到高峰。鄂圖曼帝國控制後，埃及逐漸伊斯蘭化，科普特人被課徵重稅、其教堂被毀，更被強迫改宗。 19世紀時，科普特人的處境在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統治下大為改善。
當地困境	- 埃及的宗教自由受到政府政策影響至深。1952年埃及政府推動泛阿拉伯政策，規定科普特人必須獲得政府批准才得修建教堂。2005年，該批准權下放給州長。 2013年8月，多達45座科普特教堂遭遜尼派穆斯林攻擊。 - 由於權利遭受打壓，以及政治動盪帶來一系列的暴力衝突，科普特人至今仍處境艱困。宗教衝突、經濟因素、嚴禁離婚導致科普特人改宗伊斯蘭。此外，埃及教育並未充分提供伊斯蘭以外的宗教知識也成為隱憂。

卡拉什人	
人口與地理	約4千人。居住於巴基斯坦。
起源地／聖地	巴勒斯坦的契特拉地區。
重要神祇	泛靈信仰，神祇包含造物神德札奧、家庭女神潔思塔。
重要先知	未知。
重要經典	未知。
重要節慶與儀式	春天的希拉姆·喬希慶典（每年5月）、夏天的烏喬慶典（每年8月）、冬天的丘謨思慶典（每年12月）。
重要神廟與陵墓	潔思塔罕神廟。
歷史	- 誕生於基督前2世紀。14世紀帖木兒入侵後，伊斯蘭勢力首度對卡拉什人造成衝擊。17世紀，契特拉地區隸屬於英國。19世紀，鄰近區域努里斯坦遭阿富汗君王拉曼汗入侵並改宗伊斯蘭時，卡拉什人未受影響。 1969年被巴基斯坦併吞。隨著周遭區域穆斯林漸增、部分極端分子的壓迫、國家對伊斯蘭的提倡，卡拉什人走上改宗之路。 - 到1951年僅剩8000人。
當地困境	2017年，瓦茲·薩達（Wazir Zada）成為首位進入巴基斯坦地方省議會的卡拉什議員。 - 族內的階級問題、經濟因素、對信仰內容的不熟悉，導致越來越多卡拉什人改宗。

*由於本書對「東方教會」的討論聚焦在其位於美國的移民社群，並涵蓋不同支派，因此在此不特以表格列出。

獻給我的父母

還有琳達·若爾格羅夫（Linda
Norgrove）、

瓦丁·拿薩洛夫（Vadim
Nazarov），

以及曾陪伴我，但如今已讀不到這
本書的人們。

前言

羅瑞·史都華（Rory Stewart），英國前國際開發大臣

穆斯林統治者在西元八世紀初時，控制了介於阿富汗與北非邊緣之間的多數土地。但事實證明，當時歐洲人眼中兇狠排外的伊斯蘭國家，對其他宗教終究比西方基督宗教更為寬容。「異教徒」在歐洲被消滅得迅速又徹底，以至於有些地方在前基督教時代的信仰細節幾乎難以尋回，不列顛島就是一例。然而，徹底「異教徒的」信仰在穆斯林世界卻有生存空間，能完好無損地流傳到二十一世紀，使得我們至今仍有機會採訪這些宗教的信徒。

譬如伊拉克北部的雅茲迪人（Yazidis），他們的神殿裡有孔雀雕像，和惡魔有某種關聯。或是生活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界的卡拉什人（Kalasha），他們的信仰元素包含英勇先民的木雕像。從黎巴嫩到伊朗，許多宗教信仰得以倖存——有的和火有特殊關係，有的重視浸水，還有的以日月為重心。這些信仰中有的早在基督誕生之前就有悠久歷史。

這是個很棒的主題。這些族群不只是今已凋零的宗教感受性與可能性的象徵，他們還有助於我們認識世界主要宗教的起源與發展。此外，他們也為現代世界的形成帶來挑戰：地域性的身分認同錯綜複雜，它以歷史與地貌為本，但也建立在隨時間流逝而產生劇烈變化的信仰體系之上，並在吸納了競爭宗教的內涵之後，被傳播到新的土地上。

然而，這個主題幾乎不可能研究。接觸、理解乃至描述這些宗教難如登天。他們得以存活下來，有部分是因為他們隱身在中東最偏遠危險的山區。有些信徒說著鮮為人知的古語。關於這些信仰的檔案和學術研究令人望而生畏。部分宗教屬於密傳宗教：記載、討論或透露他們的信仰都是禁忌。部分宗教則受到迫害，於是信徒被迫學會隱藏信仰的實際內容，以免性命不保。他們很少有機會或有意願和外人交談。基於上述種種，我們難以想像有人能勝任談論這個主題的工作。

傑拉德·羅素是少數有能力撰寫這類書籍的人。一九七三年出生在美國，父母是英國人，羅素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修習古典語文與哲學，而後加入英國外交部並被派到開羅學習阿拉伯語。他流利的阿拉伯語使他成為阿拉伯新聞頻道的英國官方發言人。他在美軍入侵伊拉克後被派駐至當地，成為吉達（Jeddah）的領事，然後又前往喀布爾（Kabul）擔任大使館的政治參事。許多外交官外派時和當地民眾毫無接觸，但他和領事館外的阿拉伯人與阿富汗人培養出濃厚情誼，再加上他有語言學方面的才能，於是成為了那些他生活過的國家及其人民的頭號專家。二〇〇九年，羅素加入哈佛甘迺迪學院卡爾人權政策研究中心（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的阿富汗專家小組。

他這個人虛懷若谷，使我們很容易忘記寫出這樣一本書有多麼困難。他老是把自己講得好像不過是一名充滿困惑的觀光客，乘坐啞啞作響的鄉間巴士四處跑。但他其實是個富有耐心且才思敏捷的博學之人。他綜論及呈現複雜難懂資訊的能力超群。他贏得受訪者信任的技巧一流。他在伊朗或黎巴嫩採訪時，用的是流利的阿拉伯語或波斯語。他追溯雅茲迪人和曼達安人（Mandaeans）的變遷時，也展現了對

伊斯蘭歷史和基督教教義的深厚認識。他撰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轟炸與攻擊時，提供的是親身經歷那些叛亂事件的政治與暴力的過來人角度。他賴以穿越危險地區或接觸宗教領袖的朋友網絡是日積月累的成果。本書是他的第一本專著，集二十年的經驗與省思之大成。

書中提到的宗教，每一個都受十數個其他宗教的影響；它們出現，與時變化，而後消失。神學是一門微妙又困難的學科。實際上，神學的「微小」分歧會造成重大且往往致命的後果，經常引發不同宗派之間的殺戮。很多關於這些信仰的基本事實都還是人們激烈辯論的話題，有些辯論是受到新的數據資料所驅使，有些只是受到人類學或世界宗教的新學術政治與流行所驅使。數以千計的專著與文章仍有待詳閱。以古語寫成的未出版手抄本仍有待查看。關於這些信仰最出色的記載，有些是一個世紀前的作品，需要小心剔除其中的作者偏見。儘管使用起來並不容易，這些資訊絕大部分還是正確且值得參考的。

「現代性」、衝突，以及「西方世界」使一切黯然失色。今天，這些信仰的宗教故土很多都位在衝突仍頻繁發生的地區——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的邊境——受到由美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和卡達支持或推翻的政權的命運左右。「異教徒」家庭經歷了占領、代理人戰爭、榮譽處決、綁架，以及巨型卡車炸彈的侵擾。今天，這些「異教徒」是鬍子剃得乾淨俐落、西裝筆挺的男性及年輕的職業女性。過去三十年以來，離開鄉村地區的人數創下新高。這些人失去了和原生地及延伸大家庭的連結，而且開始和不同信仰的人通婚，忘記了自己的古老宗教。此外，如今多數信徒大概都已經以難民身分逃到西方。因此，若要寫實地勾勒這些信仰當代樣貌，不僅得介紹一間有三千年歷史的神殿及其古代祭司，還得描述一間被變更用途

的倫敦電影院，或是一間位於底特律的社區中心，而它們全都被當代西方文化的幻想與壓力籠罩。

羅素帶領讀者穿越上述這一切，書寫出近乎渾然天成的敘事，以至於他二十年的奉獻、研究、想像與關懷，基本上都被化為舞台上的陪襯。我們有時會忍不住想要讀到更加油添醋的敘述，更聚焦在他個人的情感流露，更清楚地窺視他本身的信仰或是他對神的觀點。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把異教視為另一種能量或可能性的那種迷戀，若在書中出現並不突兀：

——偉大的神吶！我寧願做個
異教徒，吮食過時的信仰；
我是否可以，站在這片舒適宜人的開闊草地，
偶得幾眼讓我感到不那麼孤苦無依的風景；
目睹海洋老人普羅透斯（Proteus）從海裡起身；
或聆聽海之信使老崔萊頓（Triton）吹響他的螺旋號角。

但羅素拒絕這麼做，就像他抗拒誘惑不去誇耀自己的各種發現，也不輕易將這些宗教衰頹、遭迫害、四散飄搖的故事變成一首喋喋不休的輓歌。

歸根究底來看，他交出的成果可能更有價值，而且更歷久不衰：一份審慎的紀事。他忠實記錄自己和這些宗教在二十一世紀的相遇。他詳細介紹他的受訪者，幫助我們瞭解他們的環境背景，也針對他們既有的偏見做出提醒。他從不害怕承認無知、疑惑或自相矛盾。他暗示了一個深層的問題，關乎其中一些宗教就算曾擁有一套神學，如今

也已喪失的問題。有些信徒儘管沒有明確的罪愆或救贖教義，儘管對於字義或神殿裡的物件與符號不明就裡，儘管已經記不得關於他們的神的故事，還是繼續從事著他們的儀式。他把自己所有的發現都與當代時空做連接。

在過去，集語言專長、深刻文化理解、勇氣、古典學術訓練，以及對外國文化的熱愛於一身的人，曾經隨處可見。羅素繼承的是孟斯圖亞·艾芬史東（Mountstuart Elphinstone）、湯瑪斯·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乃至T·E·勞倫斯（T. E. Lawrence）一脈相傳的英國學者／殖民帝國官員傳統。不過，這種人才今天十分罕見。羅素現在已離開英國外交部和哈佛大學並非偶然，學術圈似乎沉溺於益發錯綜複雜的內部辯論，使得具備本書這般志向與規模的研究課題幾乎沒有存在的空間或執行的可能。外交部門和政策制訂者現在要的是「管理職能」（management competency），也就是嫻熟又清晰明確的計畫，而不是呈現細微差異、豐富知識，並把事情變得複雜。

羅素發揮了比較古老且不那麼學院的優點。本書是對鉅型理論（grand theories）和抽象研究有耐心又細膩的挑戰。他對文化與歷史的細節一絲不苟。他揭露並協助保存了在「寰宇世界」的表面底下的多樣性及令人困惑的認同與承諾。他展示了異文化的自主、尊嚴和才智對西方世界的虛榮與先入之見的挑戰。最重要的是，他有辦法將所愛及所學與生動的風景及人物結合。這是教人獲益匪淺的一本書。

緒論

想像希臘女神阿芙蘿黛蒂（Aphrodite）的信仰還存在一座偏遠的希臘島嶼，想像沃坦（Wotan，譯按：北歐神話主神奧丁〔Odin〕）和索爾（Thor）的信徒才剛停止在斯堪地那維亞沿海造維京長船，或是想像密特拉斯（Mithras）^[1]的追隨者還在地底下的羅馬小禮拜堂按儀式規定和彼此握手。相較於歐洲，和上述信仰同樣古老的宗教，往往在中東地區的沼澤、荒野、山區，以及其他偏遠或難以深入之處存活下來，或是藏身於嚴格的保密規範之下。

倘若歷史發展稍有不同，這些宗教本來可能支配現代世界。厲行素食主義的傳道者摩尼（Mani）有一名信徒差點就成了羅馬皇帝。倘若如此，羅馬帝國傳播到歐洲各地的宗教或許會是摩尼的學說，而不是基督教；歐洲朝聖者或許會前往伊拉克沼澤，也就是摩尼最初傳道之處，而不是前往伯利恆（Bethlehem，譯按：耶穌的出生地）。然而，摩尼教的信徒在歷史中絕跡，不過與他們關係最近的曼達安人還生活在伊拉克。要不是被蒙古人和帖木兒（Tamerlane）入侵，巴格達（Baghdad）可能仍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心，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以伊拉克為基地的東方教會（Church of the East），其主教和修道院最遠甚至向東分布到了北京。

在說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十四年外交官生涯中，我因為在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工作與旅行，認識了過去聽都沒聽過的宗教信仰：不可穿藍色的禁忌、蓄鬍的義務，以及對孔雀的敬意。我結識了相信

超自然生物會化身為人類的民族，相信行星和星星能引導人間事務的民族，還有相信轉世說的民族。這些宗教乃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基督教時代文明的殘跡，但亦汲取經波斯帝國傳到中東的印度傳統，以及希臘哲學傳統。他們也保存了許多古文明的習俗，是這些文明如風中殘燭的最後繼承者。他們是本書將介紹的一部分族群——只是一部分而已。

認識這些不同的宗教族群時，我被他們信仰的恆久不變鼓舞，對此讚嘆不已。他們維持同樣的習俗和傳統已超過一千年——有些甚至保存了好幾千年。不過，這些族群如今大多比以往更加脆弱，因此本書致力於賦予他們聲音。他們之所以值得被傾聽還有種種原因：他們將當下與過去銜接起來，讓我們可以觸及逝去已久的文化。他們藉由顯示中東與歐洲文化其實有相同的起源，將兩者連結起來。他們信奉宗教的方式和歐美人不同——譬如科普特人（Copts）在禱告和禁食方面的嚴格程度，甚至超越西方修道士；德魯茲派（Druze）除了規定不可與其他宗教通婚，對信徒完全沒有要求。因此本書介紹的族群，在我看來，觸及了我在中東期間感到困擾的三件事：人類對自身歷史的集體無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日漸疏遠，以及宗教辯論日漸淪為心智狹隘的無神論者和經律主義者的私人禁地。

* * *

和我們有相同知識血緣的人可能住在我們料想不到的地方。舉例來說，希臘哲學並不侷限在歐洲發展，而是擴及整個地中海，而且它對中東的影響和對歐洲的影響不相上下。再舉一個例子，當亞歷山大

大帝跋山涉水穿越今日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時，他覺得當地文化與自己所屬的文化有種共鳴——他是對的，因為歐洲和北印度享有共通的印歐遺產。這樣的連結也能在更東邊的民族身上看到。一千年前的伊拉克基督徒和蒙古人在同一個教會裡；他們有一個中國宗主教和一個西藏主教，形塑了現代的蒙古與西藏字母系統。在世界各地，最起碼在舊世界（Old World，譯按：指歐洲、亞洲和非洲，對比地理大發現後才被納入世界史的新世界）各地，明顯的差異總是掩蓋了出乎意料的連結與共通性。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總是很高興看到儘管有些人想把人們趕進不同的文化與文明圍欄，然後讓他們彼此交戰，這些連結與共通性推翻了他們所持的理論與看法。

我也喜歡看到差異：和我個人觀念相左的種種觀念，挑戰我反思自己的看法及其成因。黎巴嫩裔法國作家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在《論身分認同》（*On Identity*）一書中，呼籲「為價值的普世性」而戰，同時對抗「愚昧的墨守成規……對抗會促成單調幼稚世界的一切」。我同意他的主張——不過，對於是否該不計代價地珍藏文化多樣性，我可能永遠拿不定主意。當一個群體變得富裕，然後拋棄了它的習俗，抑或當一個宗教信念在辯論中被駁倒，我們是否該為此感傷？我不會假裝我有答案：我只是相信，我們應該慶幸這些宗教到今天還存在，慶幸這些被無數代人誠心信奉的宗教，在今天仍能夠讓我們檢視彼此的觀念並從中學習。

這些宗教怎麼能在穆斯林的統治下存活這麼久？伊斯蘭教很常被呈現得像個不寬容的宗教，而且令人遺憾地，某些伊斯蘭信徒就想要這樣的宗教形象。本書介紹的少數宗教的存在證實了伊斯蘭教的不寬容形象沒有事實根據，畢竟在伊斯蘭政權的統治下，它們還是流傳到

了今天，可是類似的古老信仰在基督教歐洲世界卻已消失殆盡。不過，這背後的原因錯綜複雜。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會試著概述這些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要追溯到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出現之前。中東有很多比歐洲前基督教時代的宗教發展更成熟的宗教，而且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有共通的根源。因此，相較基督徒毫不猶豫地終結北歐或凱爾特（Celtic）的宗教，而且頗為迅速地達成了目標，部分中東的異教徒，反而頑強地存活了更久——他們精通希臘哲學和巴比倫天文學，而且擁有一套複雜的神學。

此外，雖然先知穆罕默德很想終結阿拉伯人的傳統宗教習俗，其中包括多神崇拜，《古蘭經》對持一神論且擁有宗教文本的信仰，諸如猶太教、基督教和祆教，其態度相較之下顯得和善許多。這些群體被稱作「有經人」（people of the book）。本書探討的很多族群之所以能存活至今，是因為他們各自設法取得了這樣的稱號。

在伊斯蘭剛建教的最初三、四百年，當時的穆斯林在中東很多地方還是少數，對公然的異教崇拜並沒有系統性地加以鎮壓。當穆斯林傳道者開始更積極地尋求皈依者，他們有些人已做好容忍各式各樣的信仰與習慣的打算，願意忽略伊斯蘭所欲取代的古老宗教和伊斯蘭之間的差別。一群才剛改宗伊斯蘭的穆斯林可能會說，他們敬拜星星的儀式完全符合伊斯蘭教規，因為星星是天使——於是他們至少得以保存一部分因改信伊斯蘭所放棄的古老異教的文化遺產。

但前述一切不意味少數族群的信仰受到善待。在這個時代，不同意統治者的神學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其統治權威的挑戰。我們知道在拜占庭帝國與阿拉伯帝國，拒絕統治者的宗教會對自己不利。

此外，「有經人」的法律地位比穆斯林低，而且要繳交額外賦稅。若反對賦稅徵收，就像九世紀的科普特人，國家可能會開始將他們的宗教看作顛覆勢力，然後採取措施破壞其宗教根基。

隨著伊斯蘭教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變成主流信仰，「有經人」以外的族群開始承受較大壓力。十世紀時，摩尼教遭到大規模迫害，幾乎徹底滅絕。十一世紀，自巴比倫時代就存在於哈蘭（Harran，[譯按：位於今土耳其東南部的古城](#)）的太陽神沙瑪什（Shamash）神殿被摧毀，而且學者嘎札里（al-Ghazali）^[2]要求穆斯林不再著迷前伊斯蘭時代的哲學家。可是，即便在當時，諸如比魯尼（Biruni）^[3]和伊本·納迪姆（Ibn Nadim）^[4]等學者在書寫伊斯蘭以外的宗教時所展現的客觀態度，至今仍讓現代讀者印象深刻。

由於阿拉伯人開始尋找內部的敵人，穆斯林和其他信仰追隨者，譬如西方的十字軍或東方的蒙古入侵者，雙方之間的衝突進一步破壞了其宗教寬容。到了十三世紀，原教旨主義的宗教領袖伊本·泰米葉（Ibn Taymiyyah）極盡能事地對德魯茲和阿拉維（Alawites）等教派口出惡言，並鼓勵信徒對他們暴力相向。不過，此時中東的一些少數宗教已躲到權力當局鞭長莫及之處，譬如山區和沼澤。中東地區的中央政府沒有變得像歐洲那樣強勢，而且軍隊通常是被用來打擊叛亂分子，或抵禦外族征服，而不是拿來鎮壓國內的宗教分歧。一直要到十九世紀，這些偏遠地帶的宗教群體才面臨來自國家在各方面的干涉；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中東的政府開始改變對待少數族群的方式，給予他們類似乎權的保障（有時是受到西方的施壓，有時是受到進步的理想啟發）。鄂圖曼帝國在十九世紀逐步賦予其非穆斯林子民近乎平等的權利。埃及科普特人的地位在一八六〇至一九一〇的五十年間出現

了革命性的改變。一九〇六年的伊朗革命使祆教徒在議會得到一個席次。上述種種指出中東的穆斯林完全有能力重視多樣性。事實上，有時候不重視多樣性的反而是歐洲人。當日耳曼皇帝被黎巴嫩基督徒詢問他的國家能怎麼幫助他們時，他答覆：「你們是生活在三百萬穆斯林之中的三十萬基督徒，何不改變當穆斯林？」

為什麼今天中東的少數族群逐步走向消亡？為什麼在埃及或巴格達對基督教會的攻擊，抑或對伊拉克北部雅茲迪人的攻擊，比起一百五十年前更為普遍？（別忘了伊斯蘭內部也有少數族群——即便是最大的伊斯蘭團體遜尼派，在伊朗和伊拉克都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弱勢族群，與此同時，對什葉派穆斯林的大屠殺在巴基斯坦亦不乏見。）促成這情況的因素有好幾個。

因素之一在於，中東的多樣性一部分是因為過去這裡的政府太弱，沒有強加宗教於人民的能力所促成。今天各國政府權力增強，一旦選擇要驅逐某宗教少數族群或強制推行正統信仰，他們能比以往更有效率地達成目標。一九一五至一七年間，當鄂圖曼帝國察覺亞美尼亞人和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便策劃了對帝國境內一百多萬名亞美尼亞子民的屠殺行動——「這是給一整個民族頒發死亡令。」駐鄂圖曼帝國美國大使事後表示。內戰也可能蔓延至那些或許只想保持中立的宗教族群的地盤——誠如伊拉克北部雅茲迪人在二〇〇七年的情況，他們成了世上最致命的一次恐怖攻擊的受害者。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中東宗教群體的內部有很高的凝聚力。和外人通婚一般是不被接受的。群體成員可能偏好雇用和自己屬於同一群體的其他成員。皈依其他宗教不是一種知識上的選擇，而是影響更深遠的一個改變，因為

這通常意味著拋棄自己的社群，加入另一個社群。某些宗教群體（舉例來說，像是雅茲迪人和亞述人）享有高度自治長達數百年，不受政府的控制。他們其中有少部分群體至今仍說著自己的語言。然而，這份內部團結意味著外人傾向把個別信徒的行為視為這類群體的集體責任。這解釋了過去對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的攻擊，以及當前對什葉派和基督徒的攻擊。這情況本身不是什麼前所未聞的事。不過，在現代中東複雜且不斷變動的政治環境中，人們很容易忠於錯誤的族群。住在約旦河西岸地區（West Bank）某座山上的撒馬利亞人

（Samaritans）盡其所能地避免疏遠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任何一方；伊拉克北部的雅茲迪人被逼著在阿拉伯人和庫德人之間選邊站；埃及的科普特教會不得不決定他們究竟要支持軍隊還是伊斯蘭政權。每個選擇都為整個群體、不光是其領袖，樹立無數敵人。

儘管各國政府實力已變強，有能力粉碎棘手的少數族群，部分政府不太願意為了保護規模較小的團體不受攻擊而付出政治資本，招來更多反對勢力。在埃及南部，倘若一個科普特人家和一個穆斯林部落有衝突，前者可說是毫無勝算——無論糾紛是關於金錢、土地或「榮譽」（誠如第六章談到的，戀愛是尤其常見的衝突起因）。有些科普特社群夠強硬，有辦法扭轉頹勢，那些不夠強硬的社群只能仰賴警察和法庭的保護——但即便是這些機構都可能因為害怕好鬥的部落，寧可不將他們治罪。這不僅僅是個宗教問題。弱勢族裔往往面臨同樣的處境。宗教少數族群在二十世紀的中東去部落化、都市化，並晉升為中產階級，雖代表他們如今能受益於社會安定與經濟成長，但也代表他們通常無法使所有人團結一致，以保護自己的族群，因此在衝突發生時變得特別脆弱。

最後，過去幾十年，在面對其他宗教及對立的伊斯蘭教詮釋時，有些中東穆斯林的行為起了變化。在埃及，科普特人在過去五十年遭受的暴力攻擊，遠比上一個五十年更多。在巴基斯坦這個由什葉派穆斯林創立的國家，針對什葉派的暴力已變得很普遍。在一九五〇年代的伊拉克，曾有出身什葉與遜尼聯姻家庭的統治者，但今天國家卻為社群暴力肆虐所苦。弱勢和脆弱會造成封閉思想，封閉思想進而妨礙社會進步。對外人的憤怒與仇恨會強化一個群體的集體身分認同，也許滿足人類面對外部威脅時對同伴的某種原始渴望，因此可以被群體的領袖利用，強化群體認同感和忠誠度。鎖定邪惡又強大但能被擊敗的共同敵人，是建立群體認同感最快的方法——當個擊敗哥利亞巨人的大衛。^[5]在中東，這樣的憤怒與仇恨也是特定情況下的產物，有時候失控演變成暴力衝突，其他時候則暗中悶燒，透過惡意宣傳不斷延續。伊斯蘭教在二十世紀的世俗競爭者，也就是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其勢力皆已衰頹。但在全盛期，這些意識形態似乎提供中東人民重拾自己應得的尊嚴與力量的機會，因為他們覺得剝奪了這份尊嚴與力量的是歐洲殖民主義、美國的支配、以色列的軍事力量，還有阿拉伯政府的孱弱與腐敗。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及其外部資金隨著蘇聯垮台戛然而止；民族主義自二十世紀早期反殖民鬥爭結束後，受歡迎的程度已下降。兩個運動都提供少數族群和穆斯林站在一起的理念。後殖民族主義運動衰退後，宗教分歧變得比較容易受利用。對某些穆斯林而言，不論是伊拉克還是埃及，都是各自所有公民的國家的這一觀念，逐漸被較為古老的觀念取代——他們認為自然的社會是以宗教為基礎。蘇哈·拉珊（Suha Rassam）在《伊拉克的基督教》

(*Christianity in Iraq*) 中寫道：「所有少數族群……在欠缺一個統一的伊拉克認同的情況下，變得很容易受到攻擊。」

世俗的基督教西方世界從外部干預中東的舉動強化了這份宗教對立——特別是當西方的干預明顯不符合中東人民的利益時。「我們甚至不打算試圖瞭解該地區目前居民的心願。」關於英國計畫在當時的巴勒斯坦成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時任外交大臣的亞瑟·貝爾福

(Arthur Balfour) 在一九一九年如此寫道。這個態度今天並沒有太大改變，二〇〇三年在戰後伊拉克成立考慮欠周的聯盟駐伊拉克臨時管理當局（包括未能保護該國珍貴的考古文化遺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國家機構也不總是擁有無須動武就能壓倒極端主義者的道德權威。受國家支持的宗教機構和神職人員在某些穆斯林的眼中是可疑的，因為他們認定這些機構與人員，以服從政府來換得升遷與金錢。激進分子可藉著表現得像膽大無畏、不那麼腐敗的非傳統人士而受益。政府面對比他們更受民眾歡迎的宗教激進分子，往往傾向收買這些人，而不是正面對決。

最常用來收買宗教極端主義者的交換條件，是提供他們透過教育制度使未來世代思想激進化的機會。伊斯蘭主義者在一九七〇年代成功實施激進教育，當時他們被（以色列和西方世界）看作反制共產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的重要手段；在那之後，他們因龐大石油與天然氣財富而獲益，這些天然資源也使中東社會最保守的一群人致富。在埃及，他們於過去四十年間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使國家法律更明確地符合伊斯蘭教規。這創造出使少數族群感到不受歡迎的環境。有一名埃及的基督徒告訴我：「如果憲法將伊斯蘭教法變成唯一的立法之源，

我會覺得被邊緣化了。」有些伊斯蘭教團體也訴諸暴力——通常是出於政治動機，而不純粹是為了鼓勵皈依。基督徒在一九八〇年代被埃及的伊斯蘭主義者當作攻擊目標，這麼做不光是為了強迫基督徒皈依並排除實現宗教同質性的阻礙，也是為了對政府施加壓力。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政府於二〇一三年失勢後，成群結黨的激進年輕人出於報復，放火燒了數十座教堂。^[6]

然而，不過分誇大也同樣重要。在埃及，穆斯林保護基督徒的個案也很多，而在塗炭生靈的內戰結束才不過約二十年的黎巴嫩，當地的民意調查顯示，其宗教寬容比很多歐洲國家還高。二十世紀為中東地區的宗教平等帶來的進展並未被徹底抵銷：就連阿亞圖拉何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譯按：阿亞圖拉為資深什葉神職人員的稱號）也沒恢復十九世紀伊朗壓迫非穆斯林的古老刑法。^[7]不過少數族群覺得自己越來越不討喜。同時，對少數族群來說，從中東移居外國變得空前容易，因為他們利用過去一百年左右的時間，教育自己，充實財富，普遍覺得移居到澳洲、加拿大、美國或歐洲不太困難。因此，這些宗教中有幾個有很高的機率將式微、乃至從故土徹底消失。如此一來，損失最大的絕對會是中東的穆斯林。我希望他們會因而擁抱本書的出版，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本書嘗試紀念他們的先人帶給世界的各種宗教信仰。

關於信仰，還有一點有待說明。長期以來，本書談論的族群拒絕透過拋棄其信仰與習慣以獲得任何好處，而且往往為了堅守信仰與習慣，忍受侮辱或暴力相向。有時候那些宗教習慣本身非常嚴苛，譬如科普特人一年中絕大多數時候都在禁食，而穆斯林每年都要在齋月

（Ramadan）期間進行齋戒。倘若中東的人民為其信仰，爭鬥得比歐洲

人和美國人更兇，有一部分是因為那些信仰對他們非常寶貴。儘管鬥爭應該停止，導致鬥爭背後的宗教精神也許有它對社會有益的一面。因此本書各個章節也許會給人一個想法：誠如西方想傳授給中東民族種種教誨，我們是不是也能向他們學習些什麼？

* * *

我在書中選擇使用中東的現代國名，即便指的是久遠的過去。因此，當我說某事發生在一千多年前的「黎巴嫩」——當這國家還不存在的時候——我的意思是，事情發生在今日黎巴嫩的國土範圍內。這純粹是為了方便起見。我選擇使用基督後（AD）和基督前（BC），而不是公元（CE）和公元前（BCE），是因為在不同社群都有各自的曆法的地區，像「公元」（Common Era）這樣的東西尚不存在。舉個例子，若今年是基督後二〇一四年，那麼根據撒馬利亞人的曆法，從以色列民族進到應許地那天算起，今年是三六五二年。若根據穆斯林曆法，從穆罕默德遷徙到麥地那算起，今年則是一四三五年。換作祆教曆法的話，自最後一位祆教國王被加冕算起，今年就是一三八三年。有鑒於計算年份的系統多到不勝枚舉，說二〇一四是歐洲基督教系統承認的年份，似乎比較踏實。

再來我想說明，本書是一系列非正式且出於個人興趣的調查，必定主觀且經過篩選，受到我自己興趣的影響，也受到我選擇描述的遭遇和事件的影響。我是從一個能說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英美羅馬天主教徒的角度在看事情。就像書中描繪的隸屬於其他宗教的成員，我也來自一個仍不斷轉變的文化，這個文化較為古老的習俗和傳統也逐漸

被人們拋棄。看待這些群體還有其他的角度，還有其他故事或許會讓人對他們有不同認識，而且他們的歷史還有其他不同的詮釋。想要更仔細審視這些群體的讀者，應該閱讀我在本書的〈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中列出的某些書籍。以短短四年的研究和十年的中東旅行經驗為基礎嘗試撰寫此書，使我對E·S·卓爾（E. S. Drower）用一生研究曼達安教的奉獻精神充滿敬畏。她的學識，我一輩子望塵莫及，同樣使我望塵莫及的還有其他好心幫助我撰寫此書的許多專家。我在〈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中向他們一一致謝。

出於對卓爾的尊敬，以及對比魯尼及其同時代人的敬意，我想起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8]獲得的讚美。「賜福和事佬，」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安德遜（James Anderson）表示，「他們苦心研究，揭開長久以來搗亂人類，使人類無法看清彼此的面紗。」我不能說自己有如此重大的貢獻——但起碼本書能讓人們想起那些有重大貢獻的研究。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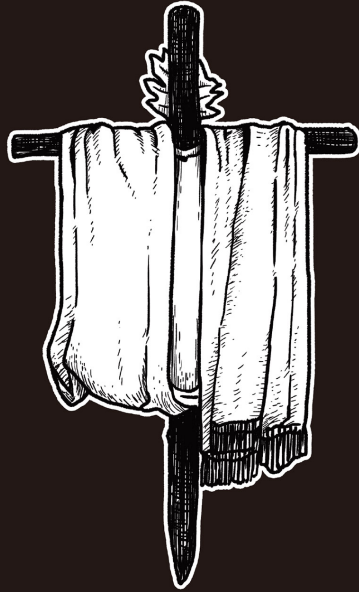
回到我用來展開這篇緒論的推測：倘若（我們假設）君士坦丁大帝沒有在三一二年變成基督徒（這是使君士坦丁後來將基督教立為國教的事件），世界會有什麼不同？毫無疑問，世上還是會有很多基督徒，不過人數可能會因迫害而減少。猶太教會是世界的主要宗教，以伊拉克為基地，時不時和撒馬利亞人（人數將有數百萬，統治著今日的以色列，可能還有敘利亞南部）發生摩擦。希臘哲學家將不僅僅以著作聞名於世，還會被某些人當作崇拜的對象。至於我們其他人則可

能信奉某個神祕宗教，其宗教真理掌握在少數長老手裡。這類宗教提供的不太是人和神在個人層面的關係，這是少數嚴肅且虔誠的長老才能享有的權力，他們是真正能與神交流的人，並能從中獲益。這些宗教當中有很多是基督教的早期競爭對手，包括摩尼教。下一章會讓讀者大致瞭解信奉這樣的宗教是什麼感覺。

-
- [1] （譯注）密特拉教（Mithraism）源自波斯，約在基督前一世紀傳入羅馬，並在三世紀時達到鼎盛，一度是基督教最大的競爭者。該宗教以山洞為聖所，通常在洞穴或建築物的地下室舉辦祭典。
- [2] （譯注）嘎札里（一〇五八至一一〇〇年）是波斯裔神學家，對伊斯蘭知識在蘇非主義及伊斯蘭教法的整合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 [3] （譯注）比魯尼（九七三至一〇四八年）是波斯裔天文學家，比十五世紀的哥白尼更早提出地球自轉的假說。
- [4] （譯注）納迪姆是活躍於十世紀巴格達的阿拉伯書商及書目學學者，其著作《群書目錄》（*Fihrist*）提供了當時各學術著作的流通情況。
- [5] （譯注）大衛與巨人歌利亞之戰出自《舊約聖經》的〈撒母耳記〉，講述少年大衛在外人看來強弱懸殊一面倒的情況下，以一塊石頭擊倒哥利亞，並用哥利亞的刀砍下了他的頭，進而勝出的故事。
- [6] （譯注）穆斯林兄弟會創立於一九二八年，本是一個以伊斯蘭遜尼派為主的宗教團體，但在一九三六年後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而轉型成政治團體。該組織自認為支持民主、譴責暴力，在二〇一一年二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usni Mubarak）倒台後，經選舉取得國會多數席次及總統職位，開啟憲法改革。但穆斯林兄弟會的執政引發政治與社會的兩極對立，導致軍方在反對團體的支持下發動政變。穆斯林兄弟會被迫下台，也進一步引發其支持者示威抗議，與軍方爆發嚴重衝突，終使軍方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穆斯林兄弟會為「恐怖組織」。埃及的民主轉型之路依舊漫長。
- [7] （譯注）阿亞圖拉何梅尼在一九七〇年代透過一系列演講傳播「法基赫的監護」的概念，也就是「教法學家的治理」，促成政府最高領袖必須由伊斯蘭教法學家擔任的

憲法規定。

[8] 〔譯注〕威廉·瓊斯爵士（一七四六至一七九四年）為十八世紀英國駐印度殖民地法官，也是語言學家，倡導歐洲與印度語言系出同源的觀念。



第一章

曼達安教

Mandaeans

倖存的巴比倫人

我們曼達安教是世上最古老的宗教，可以上溯到亞當。

——薩塔謝赫 (Sheikh Sattar Jabbar al-Helou)，曼達安教大祭司

在巴格達拉席德飯店（al-Rashid Hotel）昏暗的餐廳裡，曼達安教大祭司和他的兄弟及表親全都眼巴巴地望著我，想要我幫忙。他們不知道，和他們見面令我感到多麼榮幸。在這裡，坐在我面前的，是世上最神祕宗教之一的代表們。因為他們崇拜唯一真神，行受洗禮，把星期日視為聖日，且尊敬一位名為約翰的先知，十六世紀的歐洲傳教士誤以為曼達安教不過是該地區眾多互異的基督教流派之一。事實上，他們的宗教完全不同於基督教。他們相信有天堂，但稱之為「光之世界」（Light-World）；相信有惡靈，但不同於撒旦，這個惡靈是女性，稱作盧哈（Ruha）。他們相信受洗是進入「光之世界」的必要條件，不過對他們而言，受洗的水一定要是流動的水，而還未受洗就死亡的嬰孩將從果實如母親乳房的樹木獲得永遠的慰藉。他們的約翰是施洗者約翰（John the Baptist），不是福音布道者，而且儘管施洗者約翰在基督教文獻被當作基督的追隨者，他在曼達安人的眼中是一位大先知。十九世紀一名改宗基督教的曼達安人在聽到基督教福音中，施洗者約翰說他就連給耶穌解鞋帶也不配後，感到義憤填膺。

「爾撒（Isa）和葉哈雅（Iahia）（耶穌和約翰的阿拉伯名字）是表親，所以應該地位平等不是嗎？」他在儀式結束後對牧師說。「他們難道不是都在『光之世界』裡嗎？」

曼達安人自稱是亞當之子舍特（Seth）的後裔，而且得到了亞當從伊甸園習得的祕密學說。當曼達安教祭司在信徒初次受洗的那天，於信徒耳邊低語，告知他／她神聖的教名，也就是信徒永遠不能向最親密的家族成員以外的人揭露的名字，他使用的是古巴比倫的語言。當祭司從書櫃取出一本神聖書籍，他讀的是曼達安人轉述超過十五個

世紀的內容，書裡蘊藏著許多祕密的傳說和對話，好幾世紀以來完全沒有文字記載。當祭司吃下一頓神聖餐食，以明確順序執行儀式，以求靈魂獲得救贖，他做的是他祖先代代相傳的儀式。這些儀式聯繫起今日與遙遠的前基督教時代，密特拉斯信徒及埃及人的葬禮盛宴，還有摩尼教的學說。摩尼教今日已不復存在，其全盛時期的信徒最遠來自中國，而且和基督教競奪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支持。

我在當地局勢相當不樂觀的情況下，認識了這個非凡的宗教。二〇〇六年，我在巴格達塵土飛揚的酷熱中坐立不安，折磨我的不是恐懼，而是挫折。我的世界被鐵絲網包圍——綠區（Green Zone），一個占地十二平方公里的二十一世紀反烏托邦，充斥水泥護牆和鐵絲網，高速公路的橋梁被炸斷，隧道被封堵以便將不速之客阻擋在外。這裡過去曾是專為前獨裁者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及其親信建造的郊區。如今，這地方的游泳池被盡職地填補起來，俗豔的宮殿被分割，還有一座私人動物園被撤除，以騰出空間給不斷擴張的西方官僚軍團；他們在電腦螢幕前工作一天精疲力竭後，偶爾會大啖從美國空運來的龍蝦，或是到不對伊拉克人開放的酒吧喝酒，給自己提振精神。幾乎清一色為男性的顧客在酒吧搖擺身軀，每當有女人進門便引起一陣騷動。

我起碼享有在全是伊拉克籍職員的辦公室工作的樂趣。齋月期間，當他們在日間不吃不喝，我有時會偷偷溜進廚房，一邊擔心失禮冒犯，但又需要含糖飲料來抵禦瞌睡蟲。其他時候，我盡量融入他們——除了沒像他們一樣離開安全的綠區。齋月的晚上，我們一起吃開齋飯（iftar），如果成功空腹度過白天，椰棗和簡單湯品便能使我加倍感到滿足。我嘗試模仿母音誇張、難懂的巴格達口音，學會在連結

各政府部門的破敗走廊上來去自如，並決心不受每天從辦公室外的世界傳來的可怕消息影響。在外頭，遜尼和什葉穆斯林的幫派爭奪著控制權。每天都有新的悲劇：被砍下的女孩頭顱遭植入炸藥，變成讓她家人試圖取回屍首時的詭雷；被綁架的男人們在繳交贖金後獲釋，但他們的眼睛被挖出、手腳被砍斷。

這一切發生在七千多年前人類文明誕生之地。在文字歷史的地景之中，伊拉克就是聖母峰：一如聖母峰使其他山脈顯得渺小，伊拉克讓古代史顯得有如近代史。挪亞方舟？古伊拉克傳說有大洪水，還有個靠一艘大船活過洪水的男人叫烏特納比西丁（Utnapishtim，[譯按：出自蘇美文明的《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這是個有事實依據的傳說，影響了《聖經》中對挪亞的描述。過去，伊拉克低窪地區的城市遭受致命水患之苦。考古學家李奧納·伍黎（Leonard Woolley）發現了其中一場洪水的證據；該團隊在一九二〇年代挖掘烏爾（Ur）遺址時，發現厚約二點五公尺的乾淨土壤夾在含有陶器與燧石工具的兩個土層之間。他枯燥地記載道：「我太太過來看……然後轉身一派輕鬆地表示：『嗯，肯定是大洪水』。」實際上，那可能只說明了過去曾有洪水發生。不過《聖經》故事的根據地毫無疑問是伊拉克，其文明也因而比大洪水更古老。

金字塔？和早在基督前五三〇〇年誕生於伊拉克中南部的諸多城市相比，簡直是活力充沛的年輕小伙子——古夫法老（Pharaoh Cheops）的大金字塔還要三千年才建成。伊拉克諸城對古夫而言，就像圖坦卡門之於我們那樣古老。伊拉克用泥磚蓋房子的習慣，導致其偉大的歷史遺跡倒塌，而不像更乾燥的埃及那樣被保存下來。

荷馬（Homer）的《奧德賽》（*Odyssey*）？在荷馬生活的時代，伊拉克的黃金時代已經來到尾聲。伊拉克流傳至今的史詩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基督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其中之一是關於名叫吉爾伽美什的英雄，關於他和男子恩基杜（Enkidu）的關係，以及他們聯手殺死怪獸胡姆巴巴（Humbaba）的故事。史詩觸及許多亙古不變的主題：友誼、性、死亡。其中的故事甚至有喜劇成分。譬如，有個針對某妓女的淫穢詛咒如下：「願野狗到妳閨房暫住……願醉漢吐得妳滿身……願惱怒的妻子對妳提告！」奧德修斯（Odysseus）本人也許都聽過《吉爾伽美什史詩》，而且能從中看到一些和他的旅行的相似之處——不過即便在他的時代，《吉爾伽美什史詩》也已很古老了。

在所有古伊拉克城市中，最名聞遐邇而且也許堪稱最偉大城市的當屬巴比倫。但這座曾經宏偉的城市，如今是幼發拉底河旁毫不起眼的大片泥地，位於巴格達南邊八十公里處，只剩矮牆和大門的地基。這些遺跡曾是高聳得令人們以為直達天堂的神殿的一部分。人類的語言大概就是在這座不起眼的廢墟之中被發明的。「因為神在那裡擾亂天下人的言語，」《聖經》說，「所以那城名叫巴別（Babel）。」

在巴比倫人的宗教遊行儀式中，他們扛著獅子雕像，亦即太陽神沙瑪什的動物化身，以及代表月亮神辛（Sin）的龍。鴿子象徵愛神伊絲塔（Ishtar，她的名字流傳至今演變為伊絲特〔Esther〕）。一座規模幾乎和倫敦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相當的神殿，祭祀的是城市的主神馬爾杜克（Marduk）；神殿的門以龍、半羊半魚的神祕生物，以及狗的圖案做裝飾。巴比倫城據說擁有古代世界七大奇景「空中花園」（Hanging Gardens）。在這裡，猶大王國的青年但以理（Daniel）及其同伴們從灼熱的火爐逃脫，^[1]伯沙撒

(Belshazzar) 被秤在上帝的天平裡顯出虧欠，^[2]亞歷山大大帝在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的宮殿死去，征服世界壯志未酬。

今天距離巴比倫建城已過了四千年，而離它被廢棄、受雨淋、水淹和後世的劫掠也有兩千多年了。亞歷山大於基督前三二三年過世後，他龐大的帝國被爭吵不休的副手們分割。他們之間的內戰重創巴比倫的經濟，導致城市進入衰退期。除了零星獻祭，我們不再聽聞關於其偉大神殿的消息。巴比倫的「空中花園」消失，在今天找不到半點殘跡，但古城的遺跡中現在矗立著一座雄偉建築——不過它是新蓋的，而非古蹟。那是古城眾多宮殿其中一座的重建。磚頭上刻有銘文：「在海珊總統的時代，整個巴比倫分三階段重建。從尼布甲尼撒到薩達姆·海珊，巴比倫正東山再起。」

環顧四周，風化泥磚散落一地。巴比倫的王者就像奧茲曼迪亞斯 (Ozymandias, 按：拉美西斯二世的希臘名字)，即便偉大，也未能將其功業完整地留在世上。^[3]海珊重建的巴比倫是模仿之作，受嚴肅的考古學家嘲笑與譴責。真正的巴比倫殘骸，大多在很久以前就被拿去當興建巴格達城的建材，或被外國考古學家劫掠與賤價收購，然後運到倫敦、柏林和巴黎的博物館。不過，海珊的新宮殿不是為取悅考古學家而建。海珊透過修建宮殿，宣稱對伊拉克上古歷史的所有權。這樣的手段可以幫助他合理化伊拉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以及他本人對伊拉克的統治。他可以把壓迫人民的警察國家，以巴比倫和亞述帝國的繼承者之姿呈現給世人，而不是一戰結束後，從鄂圖曼統治者手裡奪來的一些土耳其省分，其中宗教、語言，乃至族裔皆不統一。恰巧，在過去那段光榮歷史中，統治者不是海珊痛恨且懼怕的穆斯林神職人員，而是反覆無常又殘暴的專制君主——就像海珊本人。

二〇〇六年時，海珊受到美國看管，伊拉克國內一片混亂。她作為世界文明之都的歲月，早已成了遙遠的過去。伊拉克的基督教宗主教們，曾在書信末尾簽下「寫於我在伊甸園河流的小房間」，因為他們相信，這裡就是曾住著亞當與夏娃的原始天堂。如今同樣的那條河流，載著死者的屍體流向海洋，經過阿布努瓦斯街（Abu Nawas Street），那是巴格達人在和平的日子裡，經常坐著吃魚和抽水菸的地方。現在，多數的伊拉克人只想保全性命：他們下班後盡速回家，然後就待在室內。如果他們想試著過戰爭爆發前的生活，到城裡的咖啡館坐坐，他們得訓練自己變得更冷酷。有個女人告訴我，她和一名友人曾在用伊拉克人稱為「伊斯提坎納杯」（istikhanas，杯緣廣，但杯身窄，類似的杯子自十五世紀流傳至今）的優雅玻璃杯喝茶時，聽見街尾傳來一名男子把自己炸翻的聲響。他倆左右張望了一下，發現沒有立即危險後，回頭拿起伊斯提坎納杯，繼續啜飲他們的茶。人肉炸彈是很日常的風景。

我在巴格達擔任外交官的那幾個月，每次乘坐裝甲汽車飛馳在城裡的高速公路上，或從兩側配有機關槍、疾速飛越伊拉克農地的直升機向外看時，我看不到一絲一毫這個國家的歷史。她的古老宮殿、清真寺、教堂，在多次戰爭、入侵，以及規劃不周的重建計畫中被摧毀。泥磚房屋在幾世紀雨水的澆淋下瓦解。戰爭、疏於照管、腐朽，以及石油促成的二十世紀興建潮，全都促使巴格達走向現代化。今天的巴格達被滿是兩層樓的小屋配迷你庭院的廣大郊區包圍。

有一本出版於二〇〇三年戰爭前後，為極少數可能有意造訪的觀光客而寫的旅遊書，推薦了這個《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筆下的城市中僅存的幾間清真寺和一座宮殿，而它正是哈

倫·拉希德（Haroun al-Rashid）哈里發與忠實僕人賈法，在入夜後四處穿梭的那個城市。《天方夜譚》是虛構故事，不過真實的巴格達城已足夠教人驚嘆：由波斯人設計，阿拉伯哈里發曼蘇爾（al-Mansur）於基督後七三四年興建，而且一度聘請了猶太特使團從印度帶來的印度教天文學家。這個文化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如今被水泥掩埋，大概在火車總站地底的某處。伊拉克一直以來並未善待自己的歷史。

* * *

不過，曼達安人是活歷史。他們的宗教文本至少可追溯至基督後第三世紀，而他們更保存遠比其宗教文本更古老的習俗和傳統——可能始於巴比倫時代。這是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出乎意料地並未全面壓制伊拉克境內較為古老的宗教。穆斯林征服後，異教徒在伊拉克的人數依舊勝過一神教信仰者。有本約寫於基督後九〇四年的書《納巴泰農業》（*Nabatean Agriculture*），出自生於伊拉克的農業學家伊本·瓦西亞（Ibn Wahshiyyah）之手，將十世紀的文化描述得和上古時代沒有太大出入，以至於有段時間，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以為本書的成書年代可追溯至古巴比倫時代，因而是史上最老的文字記載。書中描述了瓦西亞和日月神殿崇拜者的相遇；受神力加持而能夠說話的水果、蔬菜和樹木；因人類的惡行而誕生的昆蟲；占卜預言家的存在；希臘科學中用中國陶土製成的魔像；全心奉獻古老神祇的苦行團，但看起來像基督教修士或蘇非神祕主義者，留著以指甲花染色的頭髮和長鬍子；還有關於世界起源的哲學推論。巴比倫文化在這樣的

背景下，很容易存活——的確，穆斯林作家馬蘇第（al-Mas'udi）在基督後十世紀寫道，「倖存的巴比倫人」仍活在伊拉克沼澤區。這片沼澤曾覆蓋伊拉克南部一萬八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積。

統治伊拉克超過兩百年的穆斯林，為什麼沒有壓制非伊斯蘭教的文化？有個原因是，第一代阿拉伯征服者儘管在基督後六三二年之後的幾十年內擊敗了拜占庭勢力，並粉碎波斯帝國，卻未竭力將伊斯蘭教強加於新子民，因為他們覺得伊斯蘭基本上是個阿拉伯的宗教。據說，哈里發歐瑪爾（Omar）得知其非阿拉伯子民紛紛改信伊斯蘭時潸然淚下。從務實的觀點來看，非穆斯林得繳交較多的稅，因此子民皈依伊斯蘭會使國家稅收減少。

即便阿拉伯人想強迫新子民皈依，他們也沒能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其所征服的每吋土地上。他們起初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在伊拉克至多占百分之二十。地理也對他們不利。譬如在一九九〇年代，海珊得先築堤，擋住流入沼澤的河川，然後才能鎮壓躲藏在那裡的反叛團體。對過去的統治者而言，如此大費周章的鎮壓並不值得。

此外，伊斯蘭教素有寬容的傳統。儘管《古蘭經》譴責偶像崇拜者，它讚揚信奉一神而且擁有聖典的「有經人」。有經人顯然涵括了基督徒和猶太人。在《古蘭經》裡被點名褒獎的其他宗教則有祆教和「拜星教」（Sabians），但在伊斯蘭建教後幾百年，這類人沒有共同的身分特質，反而提供了一個漏洞，幫助許多中東宗教躲過迫害——包括曼達安教。偉大的十一世紀穆斯林人類學家比魯尼在他的一百四十二本著作當中，將曼達安教認作拜星教。順帶一提，比魯尼對同時代的其他宗教展現的寬容態度，正是穆斯林知識分子的表率；二十世紀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因為比魯尼的開明，形

容他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另一個範例是馬蘇第，就是他認出巴比倫人還生活在伊拉克沼澤——他研究的民族包括俄羅斯人和法國人，既包羅萬象，又無遠弗屆。儘管這些知識分子在宗教上屬於保守派，他們很願意向不同信仰者學習，親身實踐一句阿拉伯格言：「知識是信徒走失的駱駝：知識能幫助他，不管他在哪裡牽起駱駝。」儘管這份寬容精神在隨後幾世紀逐漸衰退，而且曼達安人頻繁受到騷擾，有時也遭到迫害，穆斯林統治當局並未費盡心思強迫其子民改宗。直至二十世紀之前，曼達安人有伊拉克沼澤的保護。

巴比倫人長期以來生活在伊拉克沼澤區，曼達安人亦然。他們是否有關聯呢？我自小就愛讀關於巴比倫的書，想像曼達安人是巴比倫文明最後的倖存者，令人內心沸騰。因此，當曼達安教大祭司打電話來要求會面，那感覺就像被一名圓桌騎士召見，或發現在英國某偏鄉的小村莊還有團體在崇拜奧丁，然後邀請我去喝茶。於是我一口答應：我將和大祭司見面。

綠區只有一個地方是一般巴格達人能隨意進出的。在拉席德飯店的全盛期，曾有一百名竊聽者，坐在這棟一九七〇年代興建、十八層樓高的水泥大樓的地下室，飯店每間客房裡的一言一行都被和地下室連結的監視監聽網記錄下來。在二〇〇三年戰爭後，相機與麥克風被全數拆除，飯店內有著老布希肖像的拼貼地墊也被覆蓋。這間飯店仍是個古怪的地方。這裡的咖啡廳侍者戴假領結、穿背心，專注地聆聽我們說話，而且站得太過靠近桌子，停留得也比實際需要更久一點。這就是我和大祭司見面的地方，人們稱他為薩塔謝赫（Sheikh Sattar，「謝赫」是阿拉伯語的榮譽稱呼，在中東的宗教與部落被廣

泛地用來表示尊敬）。我後來得知，和他同坐的兩個男人分別是他的兄弟和祕書。

「我們曼達安教是世上最古老的宗教，」薩塔謝赫說，「可以上溯到亞當。」他追溯宗教歷史到巴比倫，但說曼達安教可能和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有些關聯。他說，曼達安人相信亞當的存在，相信他是降生於世的第一人，而且他們接受《舊約聖經》裡出現的一些其他先知，像是舍特和挪亞。最重要的是，他們敬重施洗者約翰。不過，他們不接受亞伯拉罕（Abraham），而且他們有屬於自己的神聖經典，和《聖經》或《古蘭經》非常不一樣。謝赫遞給我其中一本聖書，它以阿拉伯文寫成，封面是白色的。

那本書叫《大寶藏》（*Ginza Rabba*），意為「至寶」。我由右至左翻閱書本，然後發現，它也可以被上下顛倒，然後從尾讀到頭。兩個版本猶如一體兩面，其格式都像《古蘭經》，被整齊地分成節與章。《古蘭經》在每章開頭都有「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這句話，《大寶藏》則是宣告：「奉至高生命之名！」書裡的每一頁都有個看似十字架的東西，上頭是一根覆蓋白絲巾的桃金娘枝。薩塔謝赫對我澄清，這個圖案不是十字架，而是達非胥（darfesh），象徵人被浸入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也就是曼達安教的「受洗」，該宗教最神聖的儀式之一。它的四臂分別代表世界的四個方向。它是人間對曼達安天堂的驚鴻一瞥，善良的靈魂在天堂享有永福。它在光之天使希比爾·齊瓦（Hibil Ziwa）為約翰施洗的那天被帶到人間——然後約翰成了施洗者約翰，並施展許多被記載在曼達安教聖書《約翰之書》（*Drasa da Yehia*）的奇蹟。《約翰之書》說，施洗者約翰是比耶穌更厲害的奇蹟締造者。

曼達安教特別注重受洗。「我們不像基督教徒一生只受洗一次，」謝赫說，「而是在所有重大場合前都要受洗。譬如新娘與新郎在婚禮前都得受洗。」受洗不僅僅是個滌淨的過程。它被視為能賦予能量和精神上的滿足，以及淨化原罪與治癒身體。薩塔謝赫補充，曼達安人偏好穿白衣，逐水而居，因為受洗儀式必須在乾淨、流動的水裡進行。他們也是和平主義者。「就算遭受攻擊，我們也不贊成打鬥。」他堅稱。我們以阿拉伯語交談，但我得知曼達安人有他們自己的語言，在今天僅用於命名和施行儀式。曼達安這名稱來自該語言的「智慧」（manda）一詞。他們相信唯一真神，即「至高生命」（manda da hiya）。他們稱天堂為「光之世界」（malka da nhura）。

這群人不是為了向我介紹他們的宗教而來的。他們對我有個請求。「我的家族是黃金商人，」祕書告訴我，因此他們受到攻擊不僅是因為信仰，也是因為其財富。他接著說，他的家族所有的男性成員都已遭殺害。「拜託，」大祭司說，「我們在伊拉克只剩下區區幾百人了。我們都想離開。我們想要貴國給我們所有人庇護。」英國過去沒有如他們所盼望的那樣，把他們當作一個群體提供庇護，不過我知道，無論是在英國或其他地方，他們若想個別申請庇護應該不會太困難，然後他們就會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伊拉克。我遇見了認識伊拉克古老文化的橋梁，而我正目睹它消失在這世上。

* * *

誠如我所見，曼達安教的確保存巴比倫習俗，但他們的宗教和古巴比倫人的並不相同：譬如，他們不崇拜巴比倫的守護神巴力

（Bel），或生育女神阿塔加蒂斯（Atargatis）。據史學家喬倫·巴克利（Jorunn Buckley）表示，他們流傳至今最早的宗教文獻，可追溯到基督後二世紀晚期或三世紀早期。這代表他們起源於中東知識空前爭鳴的時代，當時新興信仰與哲學橫掃中東，帶來了全新的神祇、觀念和傳說，取代傳統的神祇、觀念與傳說。這場知識革命為什麼在那個特定時代發生？主要是因為政治和帝國。拜波斯、亞歷山大和羅馬所賜，東方和西方的關係從不曾如此親密。波斯的東部邊界接壤印度，西邊有希臘；羅馬東鄰印度，西鄰不列顛。於是從前互不相干的文化得以相遇。甚至在更早的時代，印度禁慾主義的故事已傳到早期希臘哲人耳裡，形塑了犬儒學派（Cynics）的種種習慣——他們相信通往真正幸福的唯一道路，是拋棄全數財產，過清貧的生活。在後來幾世紀（尤其是航海旅行變得更容易之後），這類接觸更是越來越普遍。都市化也把不同宗教扔進一鍋大熔爐裡。對任何民族而言，僅堅守他們信奉千年的神祇，不足以應對時代的變化：他們需要新的神祇及新的哲學，來合理化他們的崇拜。

隨之而來的，是形塑現代世界的一段宗教狂熱和知識激辯的時代，而現代世界的五大宗教，如今都有超過一千年以上的歷史，相較之下顯得穩定。印度教和佛教進入波斯帝國。中東的信仰傳入羅馬，像是密特拉斯神的宗派信仰，和埃及的伊西絲（Isis）女神崇拜（後者惡名昭著，因為入教儀式據說包含儀式性性交）。有個來自敘利亞城市霍姆斯（Homs）的男人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在基督後三世紀成為皇帝，以黎凡特的太陽神崇拜，取代古老的朱庇特

（Jupiter）信仰，然後把來自他家鄉的一顆黑色隕石，安置到羅馬最大神殿裡最為醒目的地方。希臘哲人的信仰則朝另一個方向，擴散至中東。另一個由西向東移的宗教是猶太教。也許有些猶太人在基督前第六世紀被流放至巴比倫後，仍留在巴比倫的水域邊；基督後一世紀初期，伊拉克無疑已有一個著名的猶太社會，北部省分阿迪亞波納（Adiabene）的國王、王后及王太后，都逐一地皈依猶太教。基督後七〇年，伊拉克的猶太人和其他民族一同向東，以逃離擄掠耶路撒冷和破壞其聖殿的羅馬大軍。巴比倫尼亞（Babylonia，巴比倫王國曾經屹立的地方，仍保留其名，但巴比倫城在此時已被破壞）變成猶太人宗教的中心。伊拉克的猶太人口在基督後五〇〇年，估計最高可達兩百萬人——大概為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現存最古老的曼達安教聖典，是以非常接近編纂巴比倫版的《塔木德》（*Talmud*）的猶太學者所使用的語言寫成。《塔木德》是重要的猶太律法典籍，於基督後第三至第五世紀之間成冊。曼達安教的典籍展現出對猶太教的興趣，以及對猶太習俗的熟悉，不過也透露許多敵意。曼達安人認同施洗者約翰，但不喜歡亞伯拉罕。他們完全不能接受割禮——即便在流亡巴比倫期間，此舉讓猶太人絕不會被誤認為巴比倫人。曼達安人以星期日作為安息日，而不是星期六。馬利亞（Miriai）的傳說講述的是一名猶太女人為了嫁給一名曼達安男人，離開了她所屬的社會。猶太人和曼達安人知道彼此，不過是競爭關係。

受猶太教深刻影響的不只有曼達安教，許多基督教流派也是如此。其中有些流派嘗試在追隨耶穌的同時，保留猶太律法，但也有些流派則對猶太教抱持敵意。舉例來說，有個另立門戶的基督教團體馬

吉安派（Marcionites），於基督後一四四年創立於今日的土耳其北部；他們相信《希伯來聖經》（基督徒稱之為《舊約聖經》）裡描述的事件是真實的，不過對某些事件感到非常不滿。譬如，上帝為什麼要禁止亞當吃伊甸園知識之樹的果實？上帝為什麼要亞伯拉罕殺死他自己的兒子？因此他們相信《希伯來聖經》裡描述的上帝，事實上是個低等神祇，不值得崇拜。他們也相信，這個低等神祇創造的有形世界，是人們應該掙脫的世界，包括人類的身體及其慾望，因此馬吉安派的上層階級不結婚、不生子。馬吉安派的經文僅包括《路加福音》（*Gospel of Luke*）和《保羅書信》（*Epistles of Paul*），而且就連它們都被稍加修改過了。舉例來說，亞伯拉罕的名字幾乎被全數刪去，因為亞伯拉罕不但願意殺子，還和他的侍婢發生關係，並且讓法老和他自己的妻子共枕。

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裡，當時猶太人為數眾多，基督教群體大量增加，而古老宗教被新興思想體系取代，有個名叫拔第克（Patik）的男人，準備在今天巴格達南邊的某個城市的神殿，向世上最古老的神之一獻祭。那本該是個血腥的儀式，也許會宰殺一頭山羊或綿羊，而且在獻祭後，他可能有機會分食一部分羊肉。但他突然間聽見一個不屬於人世間的聲音，要他再也別吃肉、不再做愛，也不再喝酒。那年約是基督後二一五年。

禁慾主義是中東新興宗教的共同點。這可能一部分反映了印度的影響，抑或是對古老宗教自我放縱的回應（敘利亞的異教徒神殿曾經供奉神聖妓女，但這個國家也曾有位基督教聖人住在一根柱子上長達三十年，期間從沒走下來過）。這份克己的背後也有它的哲學。人類社會在科技上有了進展：基督後二世紀，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畫出將被使用超過一千年的世界地圖，蓋倫 (Galen) 寫下將被捧讀直至十九世紀的醫學教科書。但人們仍然必須徒手清理糞坑，傷寒等疾病仍然普遍，而且外傷可能輕易地併發成壞疽。身體的虛弱與骯髒，和智力的驚人成就，形成古怪對比。由於在這個時候，一般人不瞭解智力和大腦有任何關聯（蓋倫意識到兩者有關聯，不過亞里斯多德以為大腦的存在，只是為了釋放身體產生的熱），人們很容易相信心智，或稱靈魂，沒有麻煩的身體也能存在。

教導信徒懲罰或控制身體，好讓心智能夠自由的宗教，通常被稱為「靈知的」(Gnostic) 宗教。^[4]當時就有幾個這類宗教。拔第克曾發現伊拉克沼澤出現了幾個清苦簡樸的社群。曼達安人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們的規矩對拔第克而言可能還不夠嚴厲。（儘管曼達安人在其歷史上可能一度是素食者，他們從未青睞禁慾獨身的生活。）鄰近的另一個社群更貼近那聲音給拔第克的指示。他們不僅從不吃肉，不性交，不飲用酒精飲料，他們還避免和藝術與音樂為伍。此外，他們嘗試同時密切遵守猶太律法與基督教福音。每戶人家似乎都有一塊地，讓他們種植蔬果自用。後世典籍稱他們為「穆格塔希拉」

(Mughtasila)，阿拉伯語意為「洗者」，因為他們在沼澤的河流裡進行受洗禮。拔第克和他身懷六甲的妻子加入了穆格塔希拉，不久後，他們的獨子誕生。他們給他取名摩尼。

摩尼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一段叛逆期。他的叛逆無關性或酒。他惱火的是藝術禁令。他是個才華洋溢的藝術家，渴望透過圖像及聖歌表達他的想法。沼澤鄰居曼達安人給了他啟發：儘管他們不承認摩尼仰慕的耶穌，摩尼欣賞他們的音樂，並借用了他們的其中一首聖歌。然而，在其他方面，他覺得自己所屬的社會的規矩太過寬鬆。他說，

放棄吃肉還不夠。切食蔬菜是對植物的殘忍暴行，他甚至聽見無花果樹為被從枝頭摘走的果實哭泣。他說，水泉抱怨穆格塔希拉用它們的水洗澡，因為那些人汙染了水。（多年後，他的追隨者顯然寧願改用個人的尿液清洗自己。）摩尼最終宣稱獲得了新的啟示——關於一場光明對戰黑暗的宇宙戰役。

聖奧古斯丁表示，他在成為基督徒之前，曾遵循了摩尼的學說一陣子。摩尼主張宇宙含有「兩大敵對主體，兩者都是無限的」——一個為善，另一個為惡。「惡是某種……物質，是一個沒有固定形體、令人厭惡的主體……是一種滲透被稱作人世的物質的邪惡心智。」惡是宇宙一切黑暗之源，包括日蝕和月蝕，以及日夜的更迭。對摩尼而言，夜以繼日，日以繼夜，是顯示光明與黑暗持續交戰的徵兆。直到今天，當我們說起「摩尼教世界觀」，指的是一個把世界分成善惡兩股勢力的世界觀。（摩尼的追隨者過去會以阿拉姆語（Aramaic）高喊 Mani chai，意思是「摩尼在世」。於是摩尼教徒被稱作 Manichees 或 Manicheans。）

對在宗教上開悟的摩尼教徒而言，終極使命是將精神從物的枷鎖解放。對信仰堅定者，也就是被稱作「長老」（elders，和指稱曼達安祭司的阿語「謝赫」是同一個字）的人而言，這意味著絕不生子，只吃水果，而且為摘取水果贖罪。浪費水是罪。殺害動物更是難以想像的。嚴格的摩尼教徒連隻蒼蠅都不會殺。「讓血氣方剛的（國家）變成一個人人吃蔬菜的地方。」一名摩尼教徒如此禱告。然而，這宗教也給想追隨摩尼但不遵守全部教規之人獲得救贖的機會：畢竟，總得有人犯給長老們摘水果吃的罪。長老藉由按照嚴格的儀式消化他們吃下的食物，赦免追隨者摘取水果的罪。儀式的用意在於釋放被困在

食物裡的光之碎片。這種長老與追隨者的結構強調的是，這個宗教有人作為清苦生活的典範，有能力代表整個團體和神說情，讓他們的追隨者得以過自己選擇的生活，只要他們供養並尊重長老們。我們將在後續章節看到，這樣的結構至今仍舊存在於某些中東的宗教信仰之中。

大約在二四〇年前後，摩尼離開了出生成長的沼澤和社會，東遊至安息帝國（Parthian Empire）的首都。^[5]他穿彩色外套、條紋長褲和長靴，與眾不同。受助於家庭的貴族人脈，以及薩珊帝國面對宗教的自由放任態度，他差點就讓皇帝皈依摩尼教，卻也因此被處以死刑。不過，他的宗教繼續被散布。當他的信徒從伊朗向東傳教，他們藉佛教圖像解釋摩尼教想傳達的訊息。摩尼被當作「光佛」呈現。中亞的回鶻人成立了一個摩尼王國。後來摩尼教徒在中國人數越來越多，並以拒絕吃肉出名。統治者在一一四一年頒布的詔書中，形容他們是「吃菜事魔」。官方的迫害剷除了他們的勢力，不過他們可能在華南地區倖存直到二十世紀之交。確實，儘管是意外使然，今天中國仍有一個地方供奉摩尼：在華東的一間廟，有尊長髮蓄鬚的佛像，歷史可追溯至摩尼教徒興建此廟宇的時代——而且它原本可能是尊摩尼像。

在西方，摩尼教倡導尊敬耶穌，而且是早期基督教的強大競爭對手。摩尼教徒薩巴斯提阿努斯（Sebastianus）差點就在四世紀中葉當上羅馬皇帝：倘若他成了皇帝，世界史將有相當不一樣的面貌。不過，隨著基督教成為國教，摩尼教在羅馬帝國的土地上大抵消失，而且羅馬當局也開始打擊敵對信仰。它在穆斯林之間存活得比較久，摩尼教徒甚至在政府核心單位工作——直到八世紀的哈里發馬赫迪（al-

Mahdi) 認定其擁護者已變得太過強大，於是將大批摩尼教徒釘到十字架上處死。十世紀時，穆斯林學者伊本·納迪姆（留下前述介紹賴以為基礎的摩尼生平記載）認識幾名在巴格達的摩尼教徒，不過他們在伊斯蘭的統治下，似乎也只存活到了十世紀而已。

儘管如此，摩尼教還是在歐洲文明裡留下了深遠影響。有些證據顯示，基督徒覺得必須模仿摩尼教聖潔的善男信女展現出的超凡簡樸。摩尼教的信仰認為物質中瀰漫著惡，而且是靈魂之牢籠，受此啟發的摩尼教徒因此試圖抗拒一切身體的衝動——基督教的隱士亦跟著做，不讓自己睡覺，只吃青草和水果，有時候還自我閹割。在埃及，基督教修道主義的傳統尤其強大，那裡早已有許多摩尼修道院。虔信原罪且提倡貞潔的聖奧古斯丁曾是摩尼教徒，而他也承認必須刻意抗拒摩尼教對他的吸引力。簡言之，現代的基督教禁慾主義和修道主義，也許還欠摩尼一份人情債。

曼達安人既不是摩尼教徒，也不是穆格塔希拉。他們不同於這兩個團體，不認同耶穌，而且相信結婚生子是道德義務。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和摩尼教徒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拒斥亞伯拉罕，而且相信身體是靈魂的牢籠。他們相信光之天使希比爾·齊瓦，祂總是在與黑暗搏鬥。曼達安人相信他們是從宇宙光脫離出來的火花，然後被困在一個有形的家園。當死亡把他們從身體的牢籠解放時，這些光之火花將回升至初始的強光之中。因此，曼達安祭司在葬禮上會如此對逝者的靈魂喊話：「你已脫離腐敗和你棲居的臭皮囊，那是邪惡的住所，全是罪的地方，是黑暗世界，是充滿仇恨、嫉妒和衝突的世界，是各個星球棲居之處，也是帶來悲傷與疾病的住所。」而且曼達安人相信，祭司在死去信徒葬禮上吃聖餐的方式，可能影響死者在來世的命

運。這一切都是另一個伊拉克宗教的信徒，亦即摩尼教徒，會覺得熟悉的觀念與習俗。曼達安人因此不僅是認識中東古代史的橋梁，也是認識基督教史的橋梁。

* * *

全世界的曼達安人口大概不到十萬，而且直到二〇〇三年之前，多數都住在伊拉克。我在第二次遇到曼達安人時發現，他們不是全都信教——這回是二〇〇九年，在曼哈頓的一間咖啡館。納迪雅·嘉坦（Nadia Gattan）當時從提供她庇護的英國來訪美國。儘管她已離開伊拉克，她總說自己始終是「鐵桿的伊拉克人」。她說：「我們是就事論事的民族，對亮麗包裝不感興趣。我善感熱情，和歐洲人不一樣。」生長在巴格達郊區的左翼家庭，納迪雅認為自己首先是伊拉克人，其次才是曼達安人。她的朋友們來自不同宗教背景，而且她的雙親並不是特別虔誠。「沒有人教我任何關於宗教的事，」她接著說，「只教了道德規矩：不說謊，不偷竊，永遠不要忘記我是個女人。」

納迪雅沒辦法讀曼達安人的神聖典籍，因為那些典籍由祭司保管在稱作「曼迪」（mandi）的禮拜堂。她的家人不禱告。她向我形容，在他們巴格達的家中，唯有觀察銳利之人才看得出使他們不同於其他世俗的伊拉克中產家庭之處。眼睛最先發現的是缺席，而不是存在。牆壁上沒有裝飾《古蘭經》經文，沒有麥加卡巴天房（Ka'aba）被數千名白衣朝聖者圍繞的照片，也沒有（什葉派穆斯林通常會掛的）胡笙伊瑪目（Imam Hussein，譯按：穆罕默德的孫子及其女婿阿里（Ali bn abi Talib）之子，也是什葉派第三位伊瑪目）肖像。更進一步觀

察，有幸的訪客可能會看到更多曼達安教的蛛絲馬跡。譬如，客廳牆上掛著一幅低調的達非胥圖。家族的白色洗禮袍和腰帶，是浸沒到底格里斯河時使用的神聖服裝，被存放在櫥櫃裡免受一切汙染，隨時為難得需要穿戴它們的場合準備就緒。

納迪雅在巴格達長大，不過她的家人一九七〇年代才搬到這裡。在那之前，他們住在伊拉克南方小鎮蘇格舒于赫（Suq ash-Shuyukh，字面意思為「長老們的市集」）。納迪雅的父親曾在那裡教書，還兼營小金子店當副業。^[6]納迪雅在家人為了曼達安慶典回到那裡的時候，才會真的充分地感受她的宗教，和她虔誠的祖父母相處。在納迪雅給我看的一張舊照中，我看見她的祖父：一名留長鬍子、戴紅白格紋頭巾（keffiyeh）的老翁，被穿西式服裝的一票孩子團團圍繞。他吃的肉一定得是沒被玷汙的雄性動物，在面朝北時被宰殺，然後放血，而且烹煮的人只能是他的妻子。照片中的她陪在他身旁：一名同樣虔誠的女人，一身黑衣，頭髮上罩著頭巾。他是個鐵匠，她則從事傳統醫療，治療當地農夫在收成稻穀期間會得的眼疾。納迪雅拜訪祖父母時，被告知要是她正值生理期，必須坐到另一張桌子。他們嚴格執行這個古巴比倫人和猶太人共同的規定（在巴比倫，男人碰觸了正值生理期的女人，會被汙染六天）。但這教規在納迪雅身上終止。她拒不照做，最終祖父母不再抱怨她違反教規。

這對夫妻在一九四九年來到蘇格舒于赫。在那之前，他們住在伊拉克的沼澤，那是由眾多小島、蘆原及淺溪組成的一座迷宮，東邊鄰接蘇格舒于赫鎮。此地人口大致上是眾多獨立的穆斯林部落組成。英國旅人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一九五〇年代在此居住，形容這是個「自成一格的世界」，來自外界的干擾少之又少。他

為這些部落著迷，並從這些人身上看到古怪的寬容（譬如接受和其他女人同床共枕的陽剛女人）與死板（管理潔淨的律法嚴苛到，一個男人因為懼怕變得不潔，可能會看著自己的兒子失血致死，而不去碰他）同時存在。

塞西格僅簡短提到在沼澤裡和穆斯林一同生活的曼達安人。他評論他們的長鬍子、紅白格紋頭巾、銀製品和養鴨習慣。鴨子在當地穆斯林眼中是不潔的動物。天曉得——塞西格也許曾見過納迪雅的外祖父，後者為許多部落領袖修理狩獵時使用的武器。「他可以拆解一把槍，再將它重新組起來。」納迪雅告訴我。她的祖父則會製作當地人用於交通的簡易小船，因為在沼澤移動，經水路比陸路容易得多。這些船被稱做「巴輪」（belem，這個字源於蘇美語）。

曼達安教有個慶典叫做「白日節」（White Days），是為紀念曼達安人認為被用來創造世界的五天。在納迪雅的孩提時期，這個慶典在四月舉辦（曼達安宗教曆沒有閏月，因此慶典在每個陽曆年的時間出入不大）；她的爸媽會帶她和弟弟回到家鄉，和其他家族親戚一起慶祝。納迪雅對我描述鎮裡的小房子，有些房子和田地及河川一樣是棕色的，還有些房子是用蘆葦做的。鎮裡的曼達安人全住在同一區。孩童在路上玩耍，然後挨家挨戶地去討食物或甜食吃。幸運的話，他們可能會討到曼達安特色菜：填塞肉桂、小豆蔻、洋蔥塊、堅果和葡萄乾的野生綠頭鴨，與萊姆乾和薑黃一起滾煮。為讓孩子們乖乖聽話，大人們警告說，如果他們搗亂，沙漠的瘋狂騎手會把他們抓走。

白日節是歡樂的慶典，曼達安新年則是有比較可怕一面的宗教節日。據說惡將化作名叫盧哈的女靈，出現在人間三十六個小時。本著傳統，納迪雅的爸媽試圖在這段時間把她留在室內，但他們失敗了。

「我不把那當一回事，」她告訴我，「但有人告訴我，盧哈可能會化為一隻胡蜂、一隻蜜蜂，或是一隻鳥，然後可能試圖傷害我。又或者，我可能被車撞。新年出門在外比較可能遭遇不測。」即便在她的世俗家庭，這個禁忌仍有某種力量。

除了快樂的和可怕的慶典，曼達安人也有一個慶典是悲傷的。什葉穆斯林展開阿舒拉節（Ashura，哀悼先知的孫子胡笙之死，以及信徒自己未能前去相助）的同一天，曼達安人也哀悼，並會準備一道特別的洋蔥仁湯「阿布哈里斯」（abul harith）。有時他們甚至加入什葉派的遊行隊伍。他們對於為什麼要紀念那一天有各式各樣的說法——納迪雅只知道「是為了紀念一段非常緊張的過去」——但有些曼達安人相信，這個日子紀念的是在紅海溺死的法老的士兵。儘管猶太人把這事件當作大肆慶祝的理由，曼達安人卻對埃及人表示同情，即便他們也不清楚原因為何。（這樣的哀悼節日在中東各地曾經很常見。巴比倫人過去每年都會為了他們棄一名異教徒先知的軀體於不顧而自我斥責，他們認為此舉導致了大洪水的發生。）

納迪雅一家也與其他族人一起出席，給予試圖成為祭司的曼達安男人道德支持。入門儀式的過程很艱苦。有志者必須花七天不眠不食地住在一間蘆葦小屋。這就是他需要族人支持的時候：有些族人站在小屋外敲鼓念誦，確保他保持清醒，女人則是以號叫幫忙加油打氣。等同於曼達安主教的「甘齊布拉」（ganzibra）和有志成為祭司者同在，並在小屋的泥地上以他的橄欖木牧杖劃寫二十一字力量箴言：它們是不可以被大聲說出的祕密，而且一經傳授，甘齊布拉便將塵土掃平，確保沒有其他人看見這些箴言。完成入門儀式之前，有志者必須

遵從一套繁複且明確的指令，並且吃上一頓儀式餐。自此之後，他必須蓄鬍，謹守嚴格的規定保持潔淨。

不過，曼達安教中還有一種更高層次的神聖性與知識，唯有被任命為甘齊布拉的人，像是薩塔謝赫，才能接觸。在曼達安傳統中，甘齊布拉是沒有任何活人能授予的一份職位。必須有一名信使被派到來世，尋求任命許可。因此，想要成為甘齊布拉的人要找個氣數將盡的人，然後把一瓶聖油放進所有瀕死的曼達安人都必須穿上的、以金銀作裝飾的衣服口袋裡。「我已把它交給了你，」祭司得這麼說，「你把它交給阿巴圖爾（Abatur）。」在信使過世，靈魂見到逝者判官阿巴圖爾後，儀式便完成。阿巴圖爾會把申請甘齊布拉任命的批准交給信使。

只有男人能成為曼達安祭司，而且只有男人能和外族結婚，同時仍將其宗教信仰傳給孩子。與外族通婚的女人被禁止再行受洗禮，而且她的孩子也不能受洗。納迪雅認為性別不平等不是曼達安教最初的精神。她回顧曼達安文獻尋找證據：不同於《創世紀》說夏娃是用亞當的肋骨所造，曼達安教傳述的版本說，兩人一起被創造出來。「我確信曾經有段時間，」她告訴我，「曼達安女人也能當祭司，不是只有男人。」她說得沒錯——《約翰之書》曾提到，有個猶太女人改宗曼達安教，而且成為了一名祭司。（同樣地，女人在古巴比倫能夠從事祭司工作。而且女人在古代中東偶爾會取得世俗權力。古波斯海軍在基督前五世紀，曾有一名女性上將阿提密西亞（Artemisia），而帕爾米拉王國〔Palmyra〕^[7]在基督後三世紀，曾有呼風喚雨的皇后潔諾比亞〔Zenobia〕。）

受洗禮是曼達安教最重要的儀式。有個觀點認為曼達安人的受洗禮，是從為躲避羅馬迫害向東逃的施洗者約翰的猶太追隨者那裡學來。另一個觀點認為，將身體浸沒至底格里斯河水是發源於伊拉克境內的古老習俗，就像埃及也有類似的習俗。和儀式有關的傳統無疑有曼達安特色。誠如祭司在前基督教時代為伊拉克孩童所做的，一名祭司看了納迪雅出生時的星象，然後給了她一個星座。等納迪雅到十七歲時，另一名在巴格達的祭司，用那個星座為她選了個祕密的名字叫「密爾瓦夏」（milwasha）。當時她腰間穿戴著一條腰帶，手指套著一只桃金孃葉環，頭和身體都被白色衣服包覆。她蹲伏在底格里斯河中，祭司將她浸沒到水裡三次，用河水在她的額頭上劃三下，讓她吞下河水三次，為她戴上桃金孃冠，為她禱告，然後說出她的名字。

「這將是我的教名，」她告訴我，「這一生和來世都是。」

基督前一千年的巴比倫人，應該對儀式中的四個面向相當熟悉。首先是儀式進行時使用的語言。我去查看收藏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曼達安教聖書時，有幸看到了這個語言。由於這些典籍已相當脆弱，我花了點功夫才說服工作人員讓我翻閱其中一本。檢索書頁之際，我心想，那位在十七世紀慎重其事謄寫的曼達安抄寫員，完美控制行距字距，嘔心瀝血地雕琢一筆一劃，若是看到我在讀這本書，肯定會大為震驚。這些文本應當只能給成為祭司的曼達安人看。

另一方面，有著百合印花的皮質書封大概會讓抄寫員更加驚恐。那是法國皇家圖書館員在此書成為法王路易十六典藏後所做的裝訂。但是曼達安祭司從不使用皮革等動物製品裝訂他們的書——有些學者

說，這是源自該宗教過去徹底禁止肉類的一項遺俗。他們用白棉布作為裝訂材料，或把書頁鑲嵌到木頭裡，甚至用酸蝕將文字刻在鉛塊上。以黑墨由右向左寫在粗纖維紙張上的銳利文字，看起來有些古怪：在我這外行人的眼裡，它和阿拉伯文類似，不過多了些額外的字母，少了些阿拉伯字母特有的點點。這是阿拉姆語裡的曼達安方言，也是伊拉克在採用阿拉伯文以前所流通的語言。

早期的穆斯林作家知道阿拉姆語比他們使用的阿拉伯語的歷史更悠久，便假定阿拉姆語是世上最古老的語言，並認為亞當在墮落後說的就是這語言。事實上，巴比倫在四千年前出現時，其官方語言是蘇美語，後來逐漸被一個叫做阿卡德語（Akkadian）的語言取代——我們可以看出，阿卡德語有段時間被視為某種俚語。因為有一本傳世四千年的喜劇詩，抱怨詩人本人還是小男孩時，在學校說阿卡德語（還有違反所有其他規定）被逮的遭遇：「守門的值日生說：『你為什麼沒徵得我的同意就走出門？』他打我。守壺的值日生說：『你為什麼沒徵得我的同意就拿水？』他打我。守蘇美語的值日生說：『你說阿卡德語！』他打我。」直到巴比倫存在的最後幾百年，阿拉姆語才變成城裡的日常語言。伊朗的曼達安人則說另一種阿拉姆語，此外還有一個關係親近的語言，書寫使用的文字乍看之下不同但類似，今天仍為伊拉克北部的基督徒所用。

* * *

納迪雅的教名是祭司鑽研星象後才給她取的——這是曼達安人從著迷天文學的巴比倫人繼承而來的第二項遺產。最早將天空分成黃道

十二宮的就是巴比倫人。之所以分成十二宮，是為了配合每年的月亮盈缺次數。這些勤勞的天空觀察者很早（至少在基督前一五〇〇年）就看到，有些星星和其他星星不太一樣。它們更明亮，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在天上移動。觀星者將它們稱之為lu-bat，意思是「漂泊的羊」。這個用語被翻譯成希臘文aster planetes，意思是「漂泊之星」，這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行星一詞的由來。

巴比倫天文學家辨識出了五個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沒有天王星和海王星，因為肉眼看不到它們）。他們把太陽和月亮也放入這個群組——加起來一共七個——然後以神的名字為每顆行星命名，像是馬爾杜克、伊絲塔和尼布（Nebu）。接著他們發明以七天為一星期，每個行星神都分到一天。（相當巧妙地，每一月亮週期的四分之一也是七天。）我們繼承了巴比倫人將行星與星期以神祇命名的習慣：水星、金星、冥王星，而Saturday（星期六）來自Saturn（土星神「薩頓」），Thursday（星期四）來自Thor（雷神「索爾」），Sunday（星期日）和Monday（星期一）則分別來自太陽及月亮。對巴比倫人而言，七天中有一天是邪惡的日子，應該避免從事活動——這可能就是猶太教安息日的由來。

因為行星是神，他們的行為便暗示了神的意圖。星星也是神聖的存在。被稱為「烏曼奴」（umannu）的老練占星家，有點像曼達安祭司，他們為國王解釋從夜空看到的徵兆，以及如何解除星象預示的惡兆。他們在觀星前，先向星星禱告（「喔，偉大的夜的眾神……昴宿星、獵戶座和龍啊」）。巴比倫人最終根據一個人出生時星神的位置分布，預言其人生。舉例來說，一個現存的陶土板描述了男孩亞里斯托克拉提斯（Aristokrates）在基督前二三五年的誕生：「是日：月

亮在獅子，太陽在雙子的十二度三十分，木星在人馬十八度。木星的位置代表他會有正常的一生，他會致富，他會長壽，他在人世的日子多不勝數。」這傳統已流傳了數千年：今天在歐洲和美國新聞報紙的最末版，都有古巴比倫占星家可能看得懂的預測。

除此之外，曼達安祭司和甘齊布拉為決定各式活動的良辰吉日，有從事占星測量的類似習慣。當一對曼達安情侶結為連理，他們必須等到甘齊布拉事先靠觀星決定的對的時辰到來才能洞房。在那之後，他們被認為是不潔的——誠如五世紀希臘史家希羅多德所言，巴比倫夫婦總是在「破曉時一同沐浴。沐浴前，他們不會碰觸任何家裡的器皿」。（對曼達安人而言，沐浴指的是受洗禮的儀式。對巴比倫人而言，這大概也意味著在河裡沐浴。）

數字七和十二在西方文化裡至今仍有特殊意義：七重天（seventh heaven，譯按：即極樂世界）、幸運數字七、十二使徒、圓桌十二騎士、奧林帕斯山（Mount Olympus）的希臘十二神。不過，對曼達安人而言，「七」和「十二」帶有原始的巴比倫含義，特指作為半神聖超自然存在的星星和行星。曼達安教的《約翰之書》有以下這句話：

「七傳達他們對他的歡迎，十二向他鞠躬。」曼達安教學者卓爾寫道，曼達安人仍相信「行星是神的工具，而且每個行星裡都有靈」。卓爾在一九三〇年代結識曼達安人赫爾梅茲·巴·安哈（Hermez bar Anhar），後者告訴卓爾：「我崇拜所有的枚爾奇（melki，也就是天神），不過我最崇拜的是太陽神。」赫爾梅茲似乎把太陽視為某種天使。當人們用「崇拜」一詞，通常暗示對象是某種神祇，可是曼達安人不認為自己是多神信仰者，而且堅決反對任何指稱他們是「拜星者」的說法。曼達安人和巴比倫人不一樣，沒有供奉太陽和月亮的神

殿。儘管如此，他們顯然保存了許多有關星星和行星的巴比倫習俗與信仰。

* * *

在納迪雅的洗禮儀式上，祭司在她置身底格底斯河水中時告訴她，她的名字應該被一生保密，而這是連結她所屬社會與古巴比倫的第三個面向。保密一直是曼達安人及孕育他們的文化的指導原則。當瓦西亞在基督後九世紀編纂《納巴泰農業》，把前伊斯蘭時代居民的農業知識記錄成冊，他的研究遭遇許多阻礙，因為納巴泰人有相當嚴格的保密規定。「你想要推翻我們長老和祖先做事的方法，」他被問道，「還有他們要我們保守宗教與習俗祕密的告誡？」於是他只好妥協：他會把一部分的納巴泰「科學」告訴讀者，但絕不會談到他們的宗教。作者告訴我們，為了嚴加確保祕密不會被洩露，他在事實裡摻雜了謊言，以混淆俗人讀者之視聽。他舉了一個被他加密的例子：

「茄子將消失三千年」這句話，原來是在說一年當中有三個月是不該食用茄子的時期。

卓爾是曼達安社群的好朋友（有位曼達安祭司稱她是「虔信的親愛姊妹」）。但就連她也是在請求了九年之後，才得以一窺他們的神聖文獻。據她所述，當群體裡的祭司領袖們發現她已成功解密聖典的部分內容，他們的反應是「憤慨和怒氣沖沖。他們說，這些卷軸裡記載的是只在授聖職儀式上傳給祭司的『祕密』知識，從來不曾傳授給平信徒或外人」。閱讀手抄本時，她發現頭幾頁甚至題寫著對揭露內容給未經入門者之人的詛咒。

卓爾拜讀的典籍，今天被收藏在牛津大學波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地窖書庫。我從那些書，以及曼達安人在一九三〇年代告訴卓爾的口述傳說抄本裡，對他們大破大立的精彩神話，還有不可思議的神話人物，有了更多的認識。譬如聽起來有些類似《星際大戰》赫特人賈霸（Jabba the Hutt）的「肉山」克倫（Krun），卓倫寫道：「整個肉眼可見的世界都在這暗黑王身上，而他的形狀好像一隻巨型頭蝨。」還有失敗的曼達安人亞伯拉罕，在邪靈的引誘下離開，卻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又譬如肚子是火做的烏爾龍（dragon Ur），鎮守著一片可引燃的油海。此外還有普塔希爾（Ptahil），他「將靈魂帶去秤重，並派手下神靈從這些靈魂的身體軀殼裡取出靈魂」。我的最愛則是惡魔迪那努卡（Dinanukht），他半人半書，「坐在不同世界之間的水邊，閱讀自己」。

納迪雅說，曼達安人堅持保密的原因和他們深信魔法密不可分。「有些人認為，如果透露自己的姓名，有可能被拿去做黑魔法。但我信任你。而且，」她咯咯發笑，「你沒有取得巫術書籍的管道。」魔法是現代曼達安人和古代巴比倫人之間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連結。《納巴泰農業》在農業技術表上羅列出了大量的魔咒。（舉幾個例子：將烏龜龜甲朝下放在田中央防止冰雹，或是利用經血的辟邪力量——找三個正值生理期的女人，向進逼的雹暴裸露外陰，便能使雹暴改道。）

七世紀的基督教作家約翰·巴爾·潘卡耶（Yohannan bar Penkaye，住在今日土耳其—伊拉克邊界附近）說，巫術在他的鎮裡比在古巴比倫時代更為普遍。一九三〇年代時，卓爾對於伊拉克社會仍有魔法存在一說感到不可置信。來自不同宗教的巫師，為人們預知未

來，還製作戀愛符咒。她寫下一個完全像是出自《納巴泰農業》的現代咒語：「治療巴格達毒瘡的方法是，拿一隻烏鴉，殺了牠，用牠的身體塗抹，讓溫熱鮮血碰到瘡口。然後把烏鴉掛起來。隨著牠的身體風乾，毒瘡也會跟著變得乾燥，進而消失。」

卓爾表示，猶太人與曼達安人的咒語相當出名。他們多數時候是發放護身符和開運符，不過偶爾也使用黑魔法。卓爾被收藏在波德利圖書館的文集包括一本「黑魔法」之書。她為使用黑魔法一詞辯解。她說，即便在曼達安人的語言中，這本書也被形容是「邪惡的」，因為它含有破壞婚姻、加諸疾病，以及施加詛咒的咒語。我翻閱此書，看到人體示意圖、數祕術表（譯按：指將物象化成數字的占卜）、奇怪符號，還有難以辨識的字母被反覆抄寫，全都沾到了墨跡（可能代表抄寫員的技巧拙劣；或書頁曾因儀式需要被弄濕，因為在中東的某些魔法儀式裡，觸碰過聖書墨水的水會被儀式性地喝下肚）。它描述了以戴勝鳥和狂狼的血題字的蝙蝠翅膀所製成的辟邪物；還說若有人在星期日（曼達安聖日）被惡魔附體，應該拿以馬的唾液、猴子和鴿子血、薄荷和馬齒莧汁，還有橄欖和芝麻油做成的膏藥，填塞到受害者的鼻子裡。

有些咒語明顯是從巴比倫時代開始代代流傳至今。卓爾發現一份求售的曼達安巫術卷軸，當初可能是洪水時被埋在墳墓旁，用來避免疾病肆虐。卷軸開頭寫著「以眾神和眾男子的情婦利巴特（Libat）之名」，是用來向巴比倫愛神利巴特（也就是伊絲塔）禱告的禱詞。卓爾當時聽曼達安人說，人們向利巴特請示神諭，以及祈求戀愛符咒。她還找到一個被用來拆散戀人的曼達安護身符，上頭宣稱：「讓巴力

和巴比倫分離，讓尼布和波爾西帕（Borsippa）分離。」尼布甲尼撒國王就是以尼布神的名字為名，而波爾西帕淪為廢墟已超過兩千年。

曼達安人今天最常用的護身符是「斯坎杜拉」（skanduleh），納迪雅家中廚房的牆壁就掛著一個。她告訴我，他們會把這種護身符放在年紀還小的孩子的枕頭或床墊下，大婚日當天，也會把它放在新娘的一籃衣服裡。（在歐洲傳統中，掃除惡魔眼的解方也是在相同的情境下使用，此外也有一首傳統英詩要新娘在婚禮當天穿「借來的東西」和「藍色的東西」。）斯坎杜拉是帶有四個動物圖樣的圓盤，分別是獅、蛇、蠍和胡蜂。牠們代表各種黑暗力量，功能是將惡靈嚇跑。在伊拉克南部的烏魯克（Uruk），德國考古學家發現一個基督前十三世紀的蠍子護身符。巴比倫城伊絲塔門之所以裝飾著有貓科前腳的蛇狀生物的馬賽克拼貼，大概也是因為牠能同時召喚獅和蛇的邪惡力量。

納迪雅告訴我，她的阿姨在巴格達靠施咒養家。阿姨家的牆壁單薄，納迪雅小時候和表兄弟姊妹玩耍時，能聽見隔壁房間形形色色的顧客和阿姨諮詢的內容。人們來找她時，都絕望地想要某個能改善他們生活的東西。很多人想讓女兒嫁給多金男，希望求個能幫上忙的護身符。有一次，阿姨甚至找納迪雅來幫忙。她叫這女孩想到什麼就塗鴉到紙上，然後把一片片碎紙拿走，遞給客人當魔法護身符。納迪雅的阿姨相信這些玩意兒的作用，因為客人真的常在事後覺得生活有所改善。

納迪雅的阿姨是個溫柔可愛的人，說明了顧客為什麼能對她卸下心防。正因如此，她對伊拉克社會的各階層觀察鞭辟入裡——深入到就連祕密警察都盯上了她。「他們來查我，」納迪雅的阿姨說，「他

們派臥底女孩來看我到底在做什麼。他們告訴我，我並不危險，因為我做的都是檯面上的事。」也許他們想知道納迪雅的阿姨是否有從事顛覆活動，因為占卜人士可能負責招募密謀者。又或者他們在找使用黑巫術的證據（也就是下詛咒；護身符和算命被認為是無傷大雅的白巫術），那也很可能會被懲罰。

納迪雅的阿姨直到九〇年代還在施咒，那時納迪雅在巴格達大學（Baghdad University）念語言，一邊在影印店打工付大學學費。九〇年代的時局艱困：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聯合國的制裁摧毀了伊拉克的經濟。人均收入衰退百分之八十五。巧克力變得極為罕見；納迪雅有個朋友慶祝大學畢業的方式，是給每個朋友發一小塊巧克力。納迪雅把分到的巧克力帶回家，和她的姊姊（或妹妹）分食。大學的老師得兼差開半天的計程車，其中一位老師還載自己的學生去上課——他需要車資補貼微薄薪水。孩子被送去找工作，而不是去上學。這一切發生在曾經擁有三百五十億外匯存底的國家，其中產階級在一九九〇年超過總人口的半數，而且已將四十五歲以下的不識字率降至百分之十內。

有天，納迪雅的阿姨在結束諮詢後一臉困惑。納迪雅和她的表兄弟姊妹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喔，剛離開的那位客人，」她說，「她想幫女兒求個護身符。她才十五歲，但那個媽媽想要能幫女兒嫁給有錢男人的護身符。她家裡有生病的祖父，可是男丁都失業。婦人拿護身符的時候告訴我，她幫女兒化妝打扮，派她去敲上帝的門。我在想她那話是什麼意思。」「敲上帝的門」是做體力活的人用來表示和其

他工人一起排隊等待被雇用的一種說法。「我意識到，她一定是派她女兒去出賣肉體。」納迪雅的阿姨說。

不只窮苦絕望的人家想要符咒。納迪雅說，薩達姆·海珊也不例外。海珊的阿拉伯復興黨（Ba' ath party）在掌政之初殘暴地鎮壓政敵，包括伊拉克最負盛名的曼達安人阿布杜一賈霸·阿布杜拉

（Abdul-Jabbar Abdullah）。阿布杜拉在一九一一年出生於伊拉克南部的小村子，長大後負笈美國，就讀麻省理工學院。他還曾替愛因斯坦工作，而且愛因斯坦因為對他的才華印象深刻，把自己的派克鋼筆送給了他。阿布杜拉是氣象學家（非常適合曼達安人的一門科學，因為曼達安人繼承了巴比倫人對星空的迷戀）。左翼民族主義者阿布杜一卡林·卡塞姆（Abdul-Karim Qassem）推翻伊拉克君主國，然後在一九五八年上位時，阿布杜拉成為了巴格達大學的首任校長。不過，阿布杜拉是個共產主義者——這樣的人在當時伊拉克的少數族群當中很普遍，他們把共產黨的世俗意識形態視為對抗宗教偏執的方法。因此，當反共的阿拉伯復興黨在一九六三年掌權後，便派人去逮捕阿布杜拉。他們闖進他在大學的校長辦公室，宣布撤除其職務，然後將他逮捕。但直到他們沒收了愛因斯坦的鋼筆，並在阿布杜拉面前將筆折斷，他才潛然淚下。阿布杜拉後來獲釋，逃往美國，客死異鄉。

不過，海珊並非所有曼達安人的敵人：他雇用了一位曼達安詩人，而且因為覺得到處都有人想密謀推翻他，對超自然及俗世的敵人都感到害怕，他也向當時的曼達安大祭司祈求保護安全的符咒。或許是因為這名祭司的符咒——加上謠傳曼達安人的詛咒強大——海珊看顧著曼達安人。他還曾讚揚他們是伊拉克民族性的象徵。就像他在巴比倫遺址上修建的一座座宮殿，曼達安人的存在有助於強化伊拉克是

擁有輝煌歷史的民族國家的觀念，而不僅僅是從鄂圖曼帝國瓜分而來的一個省分。他們沒有構成真正的政治威脅，而且也沒富裕到值得政府為了錢攻擊他們。他們被當作「有經人」，一如猶太人和基督徒：曼達安教被當成《古蘭經》提及的「拜星教」，應該受到特別寬容的對待（相較之下，多神信仰的異教徒是鬥爭和殺戮的對象）。曼達安人甚至在二〇〇一年特別出版了他們一本聖典的古阿拉伯文譯本，期待獲得穆斯林讀者的接納。曼達安人深知他們需要位居要津的朋友。他們在歷史上不斷遭遇不義的統治者。儘管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承諾平等，伊拉克猶太人口的命運顯示，如今空前強大的政府可使少數族群處於史無前例的不利地位。

* * *

一九四〇年代的伊拉克還有超過十萬名猶太人。二〇〇三年，我初訪巴格達時，看到了碩果僅存的猶太殘跡。在巴格達某個老社區的一條街上，有間空蕩蕩的塵封老宅。當我敲敲門，對面人家猛地拉了一下窗簾。這裡過去是巴格達的猶太社區中心。根據現場看起來的樣子，人們當初應該是倉促地離開了。我在樓上的一間房裡，看到堆在地板上的希伯來文教科書，一本帳簿就在教科書堆旁，夾在老打字機之間。最後一筆帳目的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伊拉克的古老猶太社會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到了二〇〇三年，除了滿是灰塵的教科書什麼都不剩？我在倫敦一間舒適的公寓裡，請教摩西和伊馮娜·卡德奧里（Moshe and Yvonne Khadhour）這個問題。一九四〇年，伊拉克還是個君主國的時候，摩西和伊馮娜都住在巴格達。在他

們的記憶中，那是個對猶太人很友善的城市。「星期六，巴格達的銀行會因安息日休息，」伊馮納說，「因為全市的銀行只有一間不是猶太人開的。做紡織生意的全是猶太人。我們占了巴格達居民的三分之一。」他們都親身經歷了一九四一年六月的可怕事件，當時君主政體被短暫推翻，接著有三天的時間，一群被納粹支持的反猶政治宣傳所煽動的暴徒，四處攻擊城裡的猶太人。該事件被稱作「巴格達猶太人大屠殺」（farhud）。

「穆斯林不是壞人，」摩西說，「納粹來到了巴格達。以色列給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造成許多問題。若不是因為政治立場——」

「問題出在宗教，」伊馮娜插話，「而且只有一些人是好人。」

不過，他倆都相信，有超過七百名猶太人在「巴格達猶太人大屠殺」期間被殺。儘管英軍進城，強行復辟君主國，而後一切恢復正常，情況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以及君主政體在一九五八年徹底垮台後惡化。緊接著的幾年，很多猶太人被告發，有些還被送上了絞刑台——一九六九年一月，也就是猶太社區中心被遺棄的幾個月前，九名猶太人被絞死。很多人丟了政府公職，然後眼睜睜看著財產被充公。摩西一直待到一九六〇年代，伊馮娜則是留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他比她更想念伊拉克。「我女兒想尋根，」他說，「但根早已被拔除。墓園被夷平。我的所有文化遺產都在那裡，但我們的社群已失落了。我想愛國。不是在以色列。不是在英國。我是伊拉克人。我覺得我被搶劫了。」

二〇〇三年的時候，曼達安人還未落得像猶太人的下場。然而，在接下來十年裡，他們的命運將改變。納迪雅聽了一名猶太裔伊拉克流亡人士，以不同的安息日順序，比較兩個族群命運，提出了不樂觀

的結論：「我們的安息日是星期六，你們的則是星期日。所以，現在輪到你們了。」

* * *

二〇〇三年初的巴格達，滿城疑懼。示威者（大家都知道是政府花錢雇用的）時不時上街遊行，高喊他們對海珊的支持。某次，激動的群眾覺得看見一名美國大兵躲在流經巴格達的底格里斯河邊的濃密蘆葦叢，於是用棍棒對蘆葦叢一陣亂打，試圖追捕這名不速之客。納迪雅對支持或反對海珊的宣傳活動毫無興趣。她只想保護弟弟的安全。他剛接獲伊拉克軍隊的徵召令，將進到負責抵抗由美國率領的入侵行動的部隊。她擔心倘若他應召入伍，可能會戰死。倘若他不應召，將冒受酷刑懲罰的風險：割掉一只耳朵。因此，兩人在他們家位於巴格達南部的小屋裡，為了他是否參軍爭辯起來。她覺得不應該。她是姊姊，而且完全不顧溫順女性的傳統觀念。她知道，若要說服弟弟，她得比海珊更嚇人。「如果你不接受徵召，我會幫你付所有必要的賄賂，」她說，「如果你應召入伍，我就把你手臂打斷。」他於是退讓。

納迪雅告訴我，她幾乎不曾被伊拉克穆斯林歧視。在學校，她曾遇過一個同學拒絕吃她的食物，並稱她是「內嘎斯」（nejas，伊斯蘭詞彙，意為「不潔的」）。除此之外，真要說的話，她覺得身為曼達安人，意味著別人對待她多了一分尊重。（這是在巴格達的中產階級之間的情況，在鄉下地區則可能有所不同。即便在今天的蘇格舒于

赫，還有很多小吃店和咖啡館拒絕服務曼達安人，因為據信，他們會污染用來進食的器皿。)

納迪雅也向我娓娓道來，伊拉克國內的教育水準在遭制裁期間下降，使整體社會變得越來越粗野——但直到美國在二〇〇三年率領多國軍隊入侵，她才開始感覺到危險。她在工作時被捲入許多爭辯。

「海珊就像我們頭上的皇冠，然後入侵者是一群喀菲爾（kuffar）。」她的同事說；kuffar就是kafir的複數，這個字把針對無信仰者的暴力攻擊合理化。^[8]

「我認為他像一雙拖鞋。你想把他放在頭上，隨你便！」納迪雅回道。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她發現自己越來越難維持這份自信。衝突給了宗教偏執各種惡化的機會。「我們開始聽說有人被綁架、被挾持、被殺害。」納迪雅告訴我。她自己工作的紅十字會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炸。四個月後，暴力發生在更靠近她家的地方。二〇〇四年一月十八日，她在前往協助於巴格達舉辦的國際慈善活動途中聽見爆炸聲。不僅聽見，她的身體還感受到了——她乘坐的車子隨著爆炸的力道搖晃。「那是個陰天，」她回憶道，「爆炸後，我有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我認識的某人在爆炸現場。於是我打給哈蒂兒

（Hadeel）。」納迪雅和哈蒂兒因為九〇年代在巴格達的影印店一起工作而結識。哈蒂兒是基督徒。二〇〇三年，哈蒂兒得到一份在美國大使館的工作，而且也找到了理想丈夫——在丹麥工作的伊拉克牙醫。納迪雅和哈蒂兒的其他友人們合資買了一只訂婚戒送她。哈蒂兒將那只訂婚戒，和她未婚夫給她的戒指，戴在同一根手指上。

「我打到哈蒂兒家；她的小弟說她去上班了。我打她的手機，還有會和她一起去上班的一個朋友的手機。沒人接。我打給她的同事，對方說她一直還沒到大使館。回家後，我打給她的家人。他們說，她人間蒸發了。哈蒂兒的母親稍晚撥電話給我——她知道我替紅十字會工作——她說：『我要妳告訴我關於我女兒的好消息。』」消息來了，但不是好消息。在哈蒂兒坐的車裡，駕駛座的下方被裝了一枚炸彈。炸彈遭引爆，司機遇害。車裡另有兩名女人受傷，但就是沒有哈蒂兒的消息。納迪雅請了一天假，到各家醫院找她。她什麼也沒找到。直到稍晚，她才接獲消息。院方表示，屍體難以辨識。因為屍體嚴重燒傷。唯一沒化為焦炭的，是指頭上的兩枚戒指。

哈蒂兒的家人仍舊辦了婚禮派對，高唱傳統的慶祝歌謠與號哭樂。但在此之前，他們先埋葬了新娘。「他們說：『這不是我們本來想要的婚禮。』我承受不了再見到他們。生命毫無意義地被浪費掉了。我認為人們在開戰前應該先聽過這些故事。」朋友的死折磨納迪雅的心智，使她萌生離意。「我心想，我不想像我的朋友一樣遇害。我不想讓我的爸媽心碎。」

納迪雅不曾以她的宗教界定自己。「我首先自視為人類，其次是個伊拉克人，然後才是個曼達安人。」她告訴我。但在戰後的伊拉克，人文主義和愛國主義對她並無幫助，越來越多原始的忠誠變得更加重要。宗教不是唯一令她身陷險境的東西：還有她的英語能力，以及她不穿戴頭巾的行為，或不屬於某個部落這點。「我意識到部落的力量，」她說，「而我們曼達安人沒有部落。」過去，曼達安人使用歷史悠久、代代相傳的策略，依附於他族的部落，當從屬的「附庸」，而不是部落成員。那些部落同意保護他們，不過由於他們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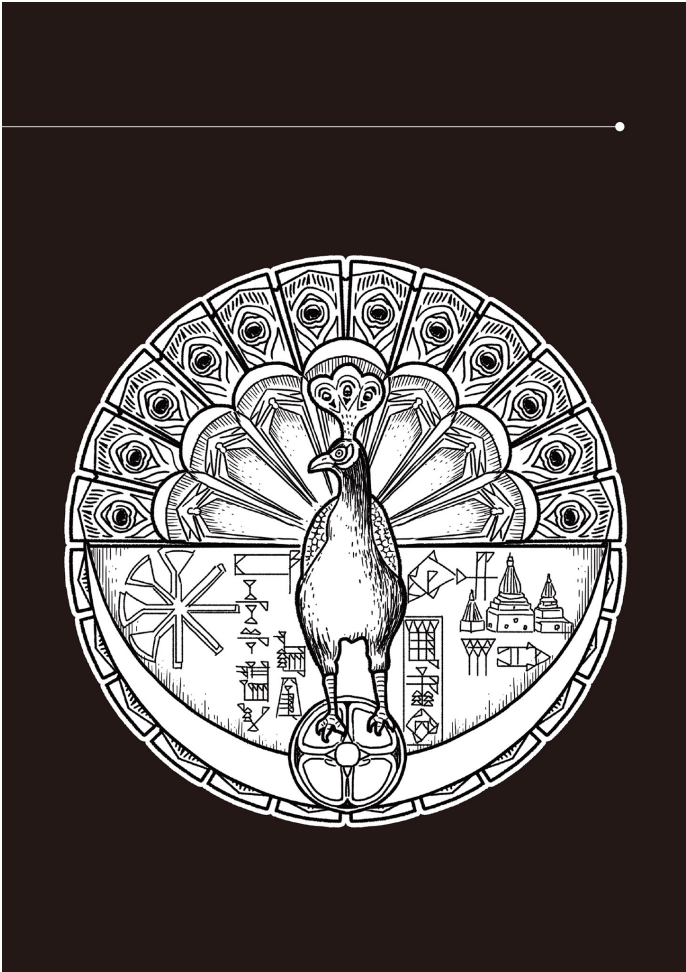
處於部落本體之外，所以不用皈依其宗教。在伊拉克二〇〇三年後的可怕亂局中，納迪雅一家接受某部落的保護，不過誠如她所言：「他們給予附庸的保護，不比自己人。」曼達安人遭綁架、強迫皈依和謀殺。在二〇〇三到二〇一一年之間，曼達安教人權團體（Mandaean Human Rights Group）登記了一百七十五件謀殺案，以及兩百七十一件綁架案。該團體報導，二〇〇四年有三十五個住在費盧傑（Fallujah）的曼達安家庭被強迫皈依伊斯蘭。

納迪雅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日搭機離開巴格達。她的證件——她過去沒有護照，而且不曾搭過飛機——第一次被蓋印。雙親替她擔心：如果她獨自在國外生活，之後就沒有男人願意娶她了，而他們為此發愁。她發現倫敦的物價非常高，以至於她得典當珠寶來付房租。她被「平淡許多的文化」衝擊。她想念伊拉克，而且滿懷鄉愁地尋找橙花的香氣。和朋友去看伊拉克的演唱會時，她被早她四十年離開巴格達的伊拉克猶太人追問，想聽聽關於他們最愛去的地方的最新消息。

儘管思鄉意濃，她放棄了回家的念頭。「我愛那裡，」她說，「但我不能住在那裡。」她並非最後離開的曼達安人。在她離開的兩年後，大祭司薩塔謝赫逃往澳洲。在筆者寫作的此時，伊拉克超過九成的曼達安人口已移居國外，或遭殺害。唯有到伊朗南部才能找到他們保存完整的社區。納迪雅相信曼達安人的離開是伊拉克的損失。

「我們是天平的支點——保持伊拉克社會的完整。當曼達安人及其他少數族群離開，天平就壞了。」根據我們從曼達安歷史回顧看到的點點滴滴，納迪雅和我都同意：隨著他們的離開，巴比倫確實滅亡了。

- [1] （譯注）出自《舊約聖經》的〈但以理書〉（Book of Daniel），講述基督前七世紀但以理與三名猶太青年被擄至巴比倫，服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傳說，尼布甲尼撒打造了一座金像，要求全國聽見號角聲時必須向金像敬拜，違命者將被丟入火爐中。但以理的三個同伴抗命，使尼布甲尼撒大為不悅，於是命人將三人丟入火爐，沒想到三人卻毫髮無傷。
- [2] （譯注）出自《舊約聖經》的〈但以理書〉。伯沙撒為新巴比倫王國最後一名攝政王。傳說在一場筵席上，有一隻手憑空出現，在牆上寫下了難解的文字，但以理因此被召來，解讀出文字暗指巴比倫的覆滅。當夜，伯沙撒遭殺害身亡。
- [3] （譯注）十八世紀英國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曾在一八一七年的詩作〈奧茲曼迪亞斯〉（Ozymandias），寫下他想像一名旅行者在沙漠中發現奧茲曼迪亞斯半身像的殘骸的見聞。詩裡寫道：「我名為奧茲曼迪亞斯，王中之王 / 看看我的功績，強人們，誰能與我相提！ / 沒有任何事物保留下來。環繞那 / 巨大殘像的殘骸的，是無邊無際的 / 一路蔓延至遠方的茫茫沙礫。」
- [4] （譯注）或音譯為「諾斯底」宗教。希臘語Gnosis意為「知識」，諾斯底主義者有不同的宗教定位，像是波斯先知摩尼的追隨者，以及在伊拉克和伊朗的曼達安教。
- [5] （譯注）此處原文應有誤。摩尼所在的時代，安息帝國已滅亡，取而代之的是薩珊帝國（Sasanian Empire）。
- [6] （譯注）在戰亂之前，伊拉克南方的曼達安人掌握了當地的金銀業，這是他們得以留存的重要因素。
- [7] （譯注）從羅馬帝國分裂出去的小國家，首都位於今敘利亞。
- [8] （譯注）喀菲爾在阿拉伯語中為貶義，指「異教徒」、「無信仰者」。



第二章

雅茲迪教

Yazidis

孔雀天使的信徒

在我們的禱告中，我們先為他人祈福，然後才為我們自己。

受害的是人們的作為，而不是他們的信仰。

——雅茲迪人的世俗領袖「密爾」

在加拿大某城市的某條街上，隨便一天只要在清晨時分抬頭望向某公寓大樓，一定有扇亮著的窗：那是米爾薩·依斯邁（Mirza Ismail）在禱告，他在正午和日落之時也會禱告。由於沒有外人能看他禱告，他的族人又都不住在附近，他總是獨自禱告。每次禱告前，他都仔細地做事前準備。他清洗雙手和臉，然後把名為「皮什提克」（pishtik）的特別腰帶，環住他總是穿著的白衫。接著，他朝太陽俯拜，開始以庫爾曼吉語（Kurmanji，他們族人的語言）向一位不可知的神祈禱。「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禱文如此宣稱，「太陽是真主之光。」他祈禱真主能賜和平於人世。

米爾薩是個說話輕聲細語的伊拉克人，留著花白、修剪整齊的八字鬍。因為他白天每隔一段時間就禱告，同事和點頭之交往往把他誤認為穆斯林。但他其實是個雅茲迪人，一個密傳宗教的信徒。雅茲迪教表面上看似伊斯蘭教，但其實和伊斯蘭教大相逕庭。儘管他的族人常被認為是庫德人（Kurds），而且和他們的庫德族鄰居說一樣的語言（庫爾曼吉語），他堅稱，他們和庫德族是各自獨立的不同民族。他們有時被稱作雅茲迪人，在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喬治亞、亞美尼亞部分地區以及伊朗西北部有數十萬人口。雅茲迪人相信轉世，獻祭公牛，尊敬化為孔雀的天使。他們在傳統上禁止族人吃萵苣，也不准穿戴藍色的衣物。男人必須留八字鬍，但有少數人也留落腮鬍。他們是一則古老誹謗的受害者，被指控崇拜惡魔，而且是史上第二大恐怖攻擊的受害者。

米爾薩出生在伊拉克西北部辛賈爾（Sinjar）地區的一座村莊（從曼達安人居住的伊拉克沼澤再往北還有好一段距離；兩族知道彼

此的存在，但幾乎沒有接觸），坐落在降水豐富的橡樹林山丘上。這一帶很久以前是亞述帝國的一部分，在文化上與巴比倫人有許多共通之處——不過此後這片土地多次易主，曾被巴比倫人、波斯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征服，最後落入突厥人手裡。在米爾薩還是個小男孩時，他的家人被海珊政府重遷到名為卡塔尼亞（Qahtaniyah）的住宅開發區。海珊當時試圖加強控制躁動不安的北部省分，以便粉碎那裡日益茁壯、欲創建獨立政府的庫德族分離主義者的叛亂。儘管雅茲迪人並非全都自視為庫德人，海珊不願冒任何風險。在卡塔尼亞，雅茲迪人可以輕易地被控制，特別是失去了土地後，他們得仰賴政府發放的糧食救濟。

米爾薩因此在卡塔尼亞某間陽春的泥磚平房裡長大。罕見的冬季暴風雨來襲時，水會從天花板滴漏而下。這裡的街道是泥土路，沒有汙水系統，不過學校還不錯。村裡只有一間診所，但起碼看診不用錢。最近的城市還有一間醫院，儘管路途遙遠，路況通常還在可掌握的範圍內。每戶人家的房子前都有庭園，他們用來種菜——蘿蔔、番茄、茄子和種子可食用的向日葵。庭園的存在提醒這些家庭，他們曾經住在自己的山丘村莊，種植著結實纍纍的無花果和橄欖。米爾薩偶爾會回到祖居地，在有著圓錐狀屋頂的雅茲迪聖祠裡禱告，有時也去欣賞過去數百年保護無數雅茲迪家族逃過迫害的神聖洞穴。

雅茲迪人把過去曾經遭遇過的七十二次迫害列成了一張表。特別是十九世紀，鄂圖曼當局曾多次將他們當作異端獵捕——而且因為他們躲避軍隊徵兵，又沒繳納任何賦稅，可說是特別惱人的異端。不過，鄂圖曼人發現這項任務並不容易。即便選最好走的路，在由馬達驅動的車輛發明之前，從最近的城市走到辛賈爾也要一天的時間。雅

茲迪人通常和鄂圖曼人實力相當——他們利用對當地山丘與洞穴的知識擊退入侵者，並搶劫路過的商隊。即便被迫皈依伊斯蘭，他們也能在外來者離開後，立即回歸自己的宗教。身為自給自足的農夫，他們不需要太多來自外界的幫助，也能活得好好的。

另一方面，雅茲迪人和基督徒毗鄰而居了好幾個世紀，而且在過去幾百年間共同對抗穆斯林領主們。兩個宗教各有信徒皈依對方的宗教；一名雅茲迪人甚至相信，自己在前一世是個基督教神職人員。

（不久前，德國一名基督徒男子打電話給一名雅茲迪女子，聲稱自己上輩子是她的父親。雅茲迪人這邊不太相信此事為真。）雅茲迪人沒有具體地反對在基督教的聖祠從事禱告，而且他們有時候還會佩戴十字架——不過是把它當抵禦惡靈的辟邪物，而不是信仰的象徵。

四、五歲的時候，米爾薩被帶到村莊東邊好幾公里外的拉利什（Lalish）。拉利什位在巴格達北邊將近四百八十二公里的一處樹林谷地，有許多古老的石屋。雅茲迪人堅稱這裡是地球的中心，是天地萬物誕生之地。在拉利什其中一幢建物的地底下，有著一處禁止非雅茲迪人進入的空間，一位穿白袍的謝赫（雅茲迪人、曼達安人及穆斯林都用同一單字指稱其神職階層的成員），曾在這裡將米爾薩浸到名為滲滲（Zemzem，譯按：伊斯蘭聖地麥加也有一座井叫滲滲泉）的神聖清泉裡——這是一生一次的儀式，和基督教的受洗一樣。

米爾薩出生在謝赫階層。「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他告訴我，「就開始學著如何做一名謝赫。謝赫在社會上備受尊敬。只要謝赫出現，相互爭鬥的人就得彼此和好。」謝赫是雅茲迪人尊敬的宗教領袖，此外他們也尊敬禁慾的法基爾（faqirs）、背誦宗教聖曲的夸瓦（kawwals）、守護拉利什聖祠的寇切克（kocheks），以及位階比謝

赫低的神職階層皮爾（pirs）。傳統上，族人向謝赫尋求奇蹟及心靈指引。有個謝赫家族以唾液和祖墳的塵土治癒了眼疾；還有個謝赫家族有控制蛇的魔力。所有謝赫皆不勞動，全靠他人施捨供養。雅茲迪社會傳統上反對閱讀與書寫（我們知道古波斯人也是如此），因此一個世紀前，米爾薩家族因識字而有別於其他謝赫。

米爾薩的家族潛心祀奉梅拉克·謝赫哈桑（Melek Sheikh Hassan）；雅茲迪人相信祂是個超自然生物，以及眾天使的副攝政，其意志控制著行星與星星。雅茲迪人也相信，祂曾以謝赫哈桑為名化為人類，而且祂的墳塚就在拉利什。我注意到，米爾薩總是將哈桑的第一個音節嚥進喉頭，於是祂的名字聽起來像「謝赫一桑」或「謝赫一辛」。謝赫的意思是「長老」，或是「大人」，而在巴比倫和亞述時代，住在辛賈爾或附近的民眾就崇拜名為「辛大人」（Lord Sin）的月亮神。雅茲迪人也有類似的文化淵源；他們敬重謝赫閃什

（Shams），名字很像亞述人的太陽神「沙瑪什」。不過名字不是兩者唯一的相似之處，因為謝赫閃什的墓，是數千年前進行榮耀沙瑪什儀式「公牛大獻」的場地。

他們獻祭的目的是為冬季祈雨，以及祈禱來春饒沃。一頭剛滿一歲左右的小公牛，被帶進拉利什的聖所，然後驅趕到謝赫閃什的聖祠。負責驅趕的是男人；在部落族人的記憶裡，男人長久以來肩負這項榮譽。他們有些人手持細棍趕公牛，有些人則帶著機關槍，對空鳴槍作為慶祝。公牛以被俘虜之姿帶至謝赫閃什的聖祠，這時會由一名謝赫在旁邊朝公牛的耳朵低語，然後劃破牠的喉嚨。這活動幾乎可以用有四千年歷史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一句話來描述：「殺了公牛後，他們掏出牠的心臟，然後把心臟放在太陽神沙瑪什面前 / 他們

往後退一步，崇敬地倒伏在沙瑪什面前。」這不是雅茲迪人唯一與太陽相關的宗教節日。他們在十二月齋戒三天，然後在齋節宴（Eid al-Sawm）享用盛宴。很久很久以前，當太陽不見蹤影，雅茲迪人靠著三天的禱告與齋戒，讓神將太陽歸回原位；這活動就是用來紀念那個特別的時刻。

一如曼達安人的信仰，雅茲迪人的信仰也很神祕。雅茲迪神職人員一點也不渴望傳播信仰的內涵，說服別人信教，反而想將信仰內容保密。由於出身謝赫階層，米爾薩享有學習宗教內涵的資格——不過，學習這份知識的權利並非不勞而獲。若他承諾永遠只穿純白色的衣服，而且每年進行兩次為期四十天的齋戒，在白天放棄進食並留在室內不外出，他將獲得預見未來的能力，然後遵守上述規定的前輩，將把雅茲迪教未形諸文字的聖典傳授給他。米爾薩告訴我，這些聖典一度被以文字記錄下來，不過西方學者將手稿偷走了。如今只剩一份以金字書寫的皮革卷軸，他相信這份書卷能告訴他雅茲迪人的歷史。

（事實上，西方學者曾以為是雅茲迪聖典的手稿，已經被判定是作假，事實證明，真正的聖典僅以口傳。雅茲迪教的祕密被藏得極好，即便它自己的信徒都不知道。）

米爾薩知道的是，對雅茲迪人來說，第一位先知是亞伯拉罕，最後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不過四大元素比起任何先知來得更重要。四大元素中最重要的是火，太陽則是人類和不可知的神之間的主要媒介。

「雅茲迪人和亞述人都崇拜太陽。」他指出。他還知道，雅茲迪人認為人死後會轉世——轉世成人類，也有可能是動物。（米爾薩對這點沒有把握一事讓我感到很奇怪，不過很多雅茲迪人似乎對來世不感好奇，這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對信仰內容守口如瓶。）他們把希臘哲學家

視為先知。而我在造訪拉利什時發現，他們宗教裡的一個關鍵角色是孔雀天使。

* * *

自從住在巴格達時耳聞拉利什的盛名之後，我就一直想去那裡看看。真正去到的那年已是二〇一一——我從伊斯坦堡不起眼的郊區搭上公車，展開總長一千六百公里、為時三十小時的第一段旅程到達伊拉克。在接下來的這一天，我們從土耳其西北角往東南方移動，然後由此進入伊拉克。我看著沿途的景色隨之變化。我的啟程地伊斯坦堡是土耳其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土耳其沿海地區的土地肥沃，屬溫帶地中海型氣候。對照之下，該國的東南地區，炎熱、貧窮且人口稀疏。尚勒烏爾法（Sanliurfa）就位在此地，是一處被半沙漠

（semidesert）環繞的偌大綠州。昔日名為埃德薩（Edessa）的尚勒烏爾法，在基督後四世紀迎來基督教朝聖者；他們很想看看據說是耶穌在世時寫給埃德薩國王阿布甲（Abgar）的一封信。在眾多朝聖者中，有個人名為伊姬利亞（Egeria），我們從她的個人日記得知，當時的埃德薩還住有異教徒。這些人把當地河川裡的魚看作是神聖的，因而拒絕捕殺。身為基督徒的伊姬利亞特意去吃這裡的河魚（「非常美味。」她評論道）。

今日的尚勒烏爾法是個穆斯林城市，城市的心臟是一座華麗的清真寺。入夜後，氣溫稍涼，家庭和情侶會在清真寺周圍的公園散步。抵達城市，入住當地民宿後，我加入了散步的民眾，邊走邊回想這座城市的歷史。數千年來，這裡一直都有聚落定居——譬如從基督前二

〇〇〇年到基督前六〇〇年之間的亞述帝國時代。傳奇的亞述國王寧錄（Nimrod）被記載在《聖經》之中，而帝國首都尼尼微（Nineveh）就在今日摩蘇爾（Mosul）。今天我們看到的城市是由亞歷山大的其中一位副手所建，而後多次易主，羅馬人、波斯人和拜占庭人——晚期還有阿拉伯人、十字軍和突厥人——為爭奪它而大打出手。在清真寺的屋脊上，有一根高聳柱子，上面寫有以幾近絕跡的敘利亞語（Syriac）所寫的銘文，至今依然屹立，提醒著人們這段歷史。

公園裡還有另一個歷史遺跡：伊姬利亞當時嚐到的美味鮮魚。有一條小溪流過公園，我注意到裡面滿是鯉魚——數千條的鯉魚，密集得彷彿已被捕在一張網裡。牠們激烈地拍打身軀，擠來擠去，甚至經常有三、四條魚同時交疊在一起。有名男子走來和我並肩而立，他的頭包裹著黑白格紋的頭巾。每隔一會兒，在路過公園裡的人裡面，總會有一位疾走到他的跟前，呈半跪姿，將男子的手拾起，碰觸自己的嘴唇和額頭，然後簡短地嘟囔幾句庫爾曼吉語。每次有人上前這麼做，男子便佯裝成一副惱火的樣子，怒視對方，或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把手抽走。但他沒拒絕任何一位懇求者。

男子後來終於開口對我說話。「你是不是納悶這裡怎會有這麼多的魚？」他問。「這裡沒有人會殺牠們或吃牠們。邪惡的寧錄王要懲罰先知易卜拉欣（Ibrahim）時，下令將易卜拉欣放在燃燒的煤炭上活活燒死。但真主把火變成了水，煤炭變成了魚。這就是我們認為這些魚很神聖的原因。」易卜拉欣即亞伯拉罕，穆斯林和猶太人都稱他為先知。不過，尚勒烏爾法的聖魚傳統比伊斯蘭歷史更悠久，可追溯到至少伊姬利亞的時代，或許還更早。站在池塘邊的人曾經說的是阿拉

姆語，接著變成希臘語，然後是阿拉伯語，而今則是庫爾曼吉語。基督教來了又走，但魚始終在這。

「我叫做馬哈木（Mahmoud）。」男子說。他是個穆斯林，而且和住在尚勒烏爾法的許多人一樣是庫德族。他解釋說，他在當地是個小有地位的人。談話間，他向我介紹了位於尚勒烏爾法南方的一座廢墟城市哈蘭。當晚，我讀起關於這座城市的書發現，儘管哈蘭如今被遺棄，它曾在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哈蘭據說是亞伯拉罕在信靠雅威（Yahweh，譯按：自十三世紀起，這個詞的通行用法已拉丁化為Jehovah〔耶和華〕）為其真主之前的居住地。（如今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聖經》確實記載他曾在名為哈蘭的城市居住過，不過那有可能是更南邊的另一座同名城鎮。）不過我們可以很肯定地指出，哈蘭正是羅馬人遭遇其最著名敗仗之一的地點。基督前五三年，羅馬富豪統治者克拉蘇（Crassus）發動對安息帝國（居魯士〔Cyrus〕的波斯帝國的繼承者）的戰爭，期望這能是一場有利可圖的軍事行動。他覬覦安息帝國的黃金，以及其對中國商品進入西方的壟斷。然而，受到替安息帝國做雙面間諜的一名當地阿拉伯人欺騙，克拉蘇及其羅馬軍團被人數遠遠不及他們的安息軍隊殲滅。那是史上最漫長戰爭的開端。羅馬和波斯每隔一段時間會休兵，但戰爭不曾停止，如此長達近七百年。

如今，我們早已遺忘了這場戰爭，因為交戰的雙方都已逝去，可是它形塑了他們以及我們的世界。當羅馬眾皇帝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移居拜占庭，波斯人在拜占庭帝國裡的猶太社會找到了盟友。在此同時，拜占庭人雇用阿拉伯人（其中有些是基督徒）和波斯作戰。戰爭消息甚至傳到遠方的麥加，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使阿拉伯人改宗新興

宗教伊斯蘭的地方。基督後六一三年，波斯在安條克（Antioch）戰勝後，有一度，拜占庭帝國似乎瀕臨全面潰敗。波斯皇帝致函拜占庭對手並寫道：「就算你躲進深海裡，我也會拉長了手將你擒拿。」與此同時，拜占庭則是發行了銘刻「上帝拯救羅馬人」字樣的硬幣。先知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們感到不安，因為信基督教的羅馬人理當有真主相伴才對。《古蘭經》的一個小節提供了慰藉。「拜占庭人已在鄰近的土地被擊敗，」《古蘭經》說道，「但敗戰後，他們將捲土重來……那天，信眾將歡欣鼓舞。」拜占庭確實恢復了元氣，給波斯帝國致命一擊——然後削減給阿拉伯傭兵的款項，把他們當作「走狗」打發。阿拉伯穆斯林改變了對拜占庭帝國的看法，於是向北開拔，奪下其南部領土，最終把波斯帝國也征服了。兵戎相向七百年使兩大帝國財殫力竭；若不是因為這場戰爭，伊斯蘭可能不會變成今天這樣的世界宗教，而且以伊斯坦堡為首都的基督教西方，可能面對以祆教為主流信仰的東方敵人。

在那場戰爭的過程中，發生了一次有趣的文化交流。土耳其南部在基督後一世紀首次落入羅馬人的控制。派駐該地區的古羅馬兵團遇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宗教。他們似乎受到這個宗教的吸引，回到羅馬時，也將該宗教的某種變化版帶回了家。這個宗教就是密特拉斯神崇拜，它和雅茲迪教有些相似之處。今天，在哈蘭東方一百九十三公里遠處，就有雅茲迪人的聚落。羅馬帝國境內各地建有大量供奉密特拉斯的地下禮拜堂——圍繞泉水或溪流而造，就像米爾薩受洗的拉利什地下洞穴。這個信仰的入教儀式被刻意設計得很困難，而且唯有完成入教儀式者才能學習信仰的口傳知識（事實上，這些知識被保密到家，我們今天對其內容所知甚少）。雅茲迪人和密特拉斯信徒之間的

相似處不止於此。兩個宗教皆要求信徒每天祈禱三次，崇敬太陽，穿戴腰帶，以及獻祭公牛。此外，密特拉斯信徒自稱是「因握手而團結在一起的人」。現代人聽了一定覺得很平凡：這麼普通的一個姿勢有什麼特別的？但握手在當時還沒演變成如今西方世界的標準問候方式。看來握手之所以變成打招呼的標準動作，正是拜密特拉斯信徒所賜——握手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建立情誼的儀式，對雅茲迪人亦然。密特拉斯信仰最終在基督教席捲羅馬帝國後消失，但這個姿勢倖免於難，流傳至今。今天，握手不再具有神祕意義，而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友誼之舉。

沒有學者知道完整的雅茲迪歷史。他們生活在偏僻地區，加上保密規範，皆讓他們不受外界干擾，也使他們在多數史籍中不見蹤影。但不同於生活在與外界相對隔絕的伊拉克沼澤的曼達安人，雅茲迪人在過去兩千年來，和很多不同的宗教與文化接觸並受影響。若只因有共同的文化特徵，就以為他們和其他古代宗教「一樣」，就犯下大錯了。雅茲迪人和密特拉斯信徒之間的差異如下：譬如，雅茲迪人有三個主要的階層，密特拉斯信徒則有七個；住在尚勒烏爾法的人們在羅馬時代不說庫爾曼吉語；然後就族裔而言，現代雅茲迪人可能不是尚勒烏爾法居民的嫡系後裔。我們的宗教經驗受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亞伯拉罕諸教）的限制之深，以致我們忘記了在中東曾有一個全然獨立的宗教家族，而且至今都還存在。籠統來說，雅茲迪教就是屬於該家族。儘管使握手蔚然成風的羅馬士兵並未見過雅茲迪人，他們顯然遭遇了來自同一家族的某個宗教。

在前往哈蘭的路上，沿途總有一側是沙漠，馬哈木也一根接著一根菸地吞雲吐霧。我們抵達這座廢墟城市後，發現這地方相當有特色。幾世紀前從伊拉克來此的阿拉伯移民蓋的現代聚落，由一群蜂窩狀的小屋組成，其圓錐狀的屋頂被排煙熏黑，建在荒廢的石造堡壘四周。附近山坡散落一地的蒼白石頭是一座中古世紀清真寺的遺跡。然而，數千多年以前，當哈蘭還是該地區龐大且知名的聚落，同一批白色石頭曾經被用於建造供奉月亮神辛的神殿。巴比倫國王那波尼德（Nabonidus）在基督前六世紀重建神殿，對石頭的顏色相當引以為傲，並聲稱他使哈蘭「皎潔如月光」。他寫於兩千五百年前的銘文在一九五〇年代重見天日，一名考古學家把荒廢清真寺的一級台階翻面，發現清真寺修築者沒有開採新石材，而是把那波尼德的石頭回收再利用。

在羅馬帝國改信基督教很長一段時間之後，甚至在他們的城市變成穆斯林阿拉伯帝國的一部分之後，哈蘭人仍頑固地繼續崇拜七大行星（他們忠於巴比倫傳統，將太陽與月亮視為行星，而且知道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存在），並給每顆行星各分配一個聖日。他們的古老習俗結合了淵博的哲學與科學知識。舉例來說，獻給行星的神殿是以行星和地球的距離為順序安排。而且對各大行星的崇拜有詳盡的神學闡述作為依據。哈蘭人同意希臘哲學家的看法，認為宇宙存在的原因可歸於一個至高無上的神，但祂的存在遠非人類智慧能夠掌握。既然神是無可用言語描述的，凡人只能期待看到神投射在有形宇宙裡的形象，並崇敬這個形象。

誠如十一世紀穆斯林神學家沙利斯坦尼（Shahrīstānī）解釋哈蘭人的信仰時所言，真主「在人的面前化作多個不同的分身，這些肉身或個體是支配世界的七大行星」。因此，巴比倫和亞述的宗教習慣，得以在一個新思想體系的支持下存續：行星可以被合理地當作神的形象投射來崇拜。沙利斯坦尼繼續解釋，有些人類也可以是崇拜的對象：一個人可能「承接了神的精髓」，「或承接了祂一部分的精髓，端看那個人準備到了什麼程度」。當這個精髓以最完整的形式傳承下去，它可能使一個人變成神在世間的某種投射。沙利斯坦尼記載哈蘭人相信轉世，意味著這些神的投射會死亡，然後重生，不間斷地在各個時代回到人世。

基督後六三八年，穆斯林軍隊從拜占庭帝國手裡奪走哈蘭，但不知道該拿哈蘭人如何是好。根據《古蘭經》，「有經人」——包括基督徒、猶太人和「拜星教」——應該特別從寬對待。另一方面，多神信仰者通常若不改宗就得受死。他們搞不清楚哈蘭人究竟屬於哪個分類。因此，當阿拉伯人看到一間供奉月亮神的神殿時，他們有些人想立刻將它摧毀——特別是在信奉伊斯蘭之前曾是猶太人或基督徒的那些人。不過，另一群阿拉伯人有親戚實踐類似哈蘭人信仰的宗教。這群人為哈蘭人依照舊習敬神的權利辯護。他們的觀點獲勝，於是神殿又多存活了兩百多年。

直到某天，當時的哈里發碰巧經過哈蘭。當地民眾為此驚惶不已。哈里發可以將他們譴責為異端，剝奪他們的法律權利，甚至下令將他們處死。但他們發現了《古蘭經》裡提到的「拜星教」，於是緊抓不放：他們宣稱自己是拜星教，如此又掙得了三百年的風平浪靜。

（但真知灼見的比魯尼指出，真正的拜星教是住在伊拉克南部沼澤的

曼達安人。）哈蘭人也因為掌握希臘科學的知識而受保護，這些知識使他們對穆斯林統治者有實際幫助。哈蘭人塔比特·伊本·奎拉（Thabit ibn Qurra）受雇於巴格達赫赫有名的「智慧宮」（House of Wisdom），它是由穆斯林哈里發成立的機構，用以貯藏世界上的科學知識。奎拉計算一年長度的誤差值只有兩秒鐘，而且證明畢達哥拉斯的三角形定理有更廣泛的應用可能，不限於過去已知的用途。他雄辯滔滔地捍衛他的文化：「難道定居在這世界和孕育大小城市的人，不是傑出的異教百姓與國王？若沒有來自異教的禮物，世間必定空洞匱乏，被強大的絕望籠罩。」

所以哈蘭一直到十一世紀才失去幸運之神的眷顧，有一群暴民拆毀聖祠，導致石材在山坡上散落一地，「皎潔如月光」。又過了一百年後，蒙古人摧毀了這座城市及其居民，徹底抹除了此地流傳兩千年的歷史。但哈蘭人的觀念還是可以在這座廢墟的南方一帶看到，從伊朗的亞塞拜然山區省分向西延伸至地中海。舉例來說，在敘利亞沿海處，有個阿拉維派社區實踐一種很不尋常的伊斯蘭教長達好幾世紀，他們的伊斯蘭教充斥著哈蘭人會覺得熟悉的習俗與觀念。儘管嚴格來說屬於什葉，阿拉維派和正統什葉派的共通之處，就和一神普救派（Unitarians）和新教福音派的關係一樣，幾乎沒什麼共通點。在伊斯蘭教發展的頭兩百年，阿拉維派擁護率領什葉派的十二位伊瑪目當中的十一位，而後他們的想法開始變得越來越激進。

我在二〇一二年動身前往黎巴嫩北部拜訪一位阿拉維派的謝赫，希望他能和我談談他的宗教。我沒有抱持太多期待。畢竟就連阿拉維派的信徒都沒資格知道他所保守的祕密，而我只是個外人，而且同時代表了兩個不受歡迎國家（英國和美國）。阿拉維派在我訪問之際特

別備受爭議，因為敘利亞政府及其信奉阿拉維派的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譯按：其父親為掌權三十年、人稱「老阿薩德」的獨裁者前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涉及殘酷壓迫與大規模殺戮的事件。因此，我根本不確定會不會順利和他們聯繫上，更別說讓他們願意和我談話。不過，我備妥了廉價行動電話，幾個聯絡號碼，來自貝魯特（Beirut）南部郊區、頭髮花白的計程車司機，以及一輛風光不再的汽車。我無論如何都要試一試。

遜尼派穆斯林城市黎波里（Tripoli）位在黎巴嫩最北邊，而阿拉維派就住在這裡的一處郊區（最初是個山丘小村落，如今已被城市吞沒）。我可以清楚地察覺到我已進入阿拉維派的居住地：每根路燈都掛著阿薩德的巨幅肖像。我透過一名地方強人安排會面；他被指控組織民兵團，率領當地阿拉維派勢力和遜尼派穆斯林鄰居作戰。駐足街頭的男人們盤問帶我前來的計程車司機，直到發現他是什葉派才停止刁難。在他們眼中，那代表他是個盟友——難得的盟友。

經過全身搜查，確保沒有藏匿武器後，我被領進一名頭戴紅白紋頭巾的阿拉維派謝赫的書房。「我們的信仰全都攤在陽光下，」他向我保證，「有少數一些東西是私密的，但就那樣而已——像是先民流傳的習俗等等。」這些祖傳習俗包括禁止吃駱駝或兔子，以及禁止吃任何和自己不同性別的動物。女人只能吃雌性動物的肉，男人只能吃雄性動物的肉。他們是否如英國大使告訴我的，認為樹叢有神聖意義？不。他們是否認為阿里（Ali，譯按：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是神聖的？不，他們認為阿里只是立法者和先知的繼承者。至於敘利亞，他聲稱，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是恐怖分子為以色列效勞的結果。在我離開之際，謝赫主動分享了他對自己信仰的最後一項評

論。「地獄裡沒有阿拉維派，」他得意地笑說，「下地獄的只有恐怖分子，他們受盡折磨。」

一位要求不具名的阿拉維派信徒表示，謝赫並沒有對我坦誠相待。阿拉維派最祕密的儀式會飲用祝聖酒，很明顯地展現出基督教的影響——他們將儀式稱為彌撒（Mass），而且他們的典籍中也提到了耶穌——不過這項儀式也汲取來自伊朗的傳統：儀式的核心沿襲自祆教，葡萄酒被祆教徒視為用來與神交流的媒介。另一方面，阿拉維派也認為人可能轉世成為植物或動物；也許這是某類樹木擁有神聖意義的原因，雖然謝赫否認了這點。阿拉維派的聖書（雖然凡未入教者皆不可閱讀，但曾被西方學者出版）傳授許多受早期穆斯林哲學家辯護的觀點，不過這些觀點也延續了哈蘭的傳統觀念。這些聖書把許多歷史人物稱為神在世間的天國僕人：不只有家喻戶曉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人物，像是穆罕默德與耶穌，還有其他出自古典傳統的人物，像是柏拉圖與亞歷山大大帝。在阿拉維傳統裡，這些天國僕人中最偉大的就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他是神的驚鴻一瞥，或者說是人類以有限心智所能掌握的、最接近神的東西。說阿里是神，藉此讚揚阿里，沒有什麼不對。但說神是阿里，進而侷限了神，卻是錯誤之舉。（阿拉維派會說「這是神的形象，但神不是那個形象」，這說法類似聶斯脫里基督徒〔Nestorian Christians〕在基督後五五〇年某文本中所說：「彌賽亞是神，但神不是彌賽亞。」）

阿拉維派也和雅茲迪人與哈蘭人一樣崇敬行星。他們有一個部落便以太陽為名，還有一個以月亮為名。敬愛太陽與月亮被看作一種美德，至少某些阿拉維派信徒如此認為。「他們不愛月亮。」某個阿拉維派部落的成員們在和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山謬·賴德（Samuel

Lyde) 聊天時，如此抱怨另一個部落。賴德後來將他和這群人的實際相處寫成書。他們也告訴他，人世間最接近神的阿里，把自己藏在太陽之眼裡，那就是他們之所以禱告時要面向太陽的理論依據。(信徒對密特拉斯神也曾有類似觀念；阿里很可能在歷史上某個時間點取代了密特拉斯，無論是因為偽裝或刻意的宗教融合，總之兩者之間最初的關聯漸漸地被遺忘了。)

尼爾·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登月一事，在阿拉維派學者之間引發一場神學危機。一如哈蘭人，他們相信月亮是天堂階層體系裡，扮演神與人之間中介者的某個靈體的有形載體——可是如果月亮是一塊岩石，而且甚至不是宇宙中唯一、而是之一的月亮，這假設怎麼能成立？於是，阿拉維派謝赫艾哈邁德·莫哈馬德·海達爾(Ahmad Mohammad Haidar)寫了《登月之後》(*After the Moon*)，嘗試解釋這個問題。起碼我的匿名消息來源是這麼說的。雖然經我查證，這本書確實有出版，而且我找到一篇書評可證實書中探討了星星和行星的本質，書籍本身卻神祕地不見蹤影，一本也找不到，因此我永遠無法瞭解謝赫提出的解決之道。這徹底的保密精神符合十三世紀阿克里

(Acre) 十字軍主教雅各·維特里阿科(Jacob de Vitriaco)對阿拉維派祕密學說的評論，他稱那是他們的律法：「如果為人子者透露此律法給母親知道，他將被毫不留情地滅口。」阿拉維派至今仍堅定地守口如瓶。事實上，因為他們的政治力量，以及和具爭議性的阿薩德政權的關聯，他們比以往更加遮遮掩掩。我沒對阿拉維派的信仰探問得太深。

因為沒權沒勢，雅茲迪人顯得比較大方。米爾薩告訴我，謝赫閃什「負責」太陽。但他也是個天使，降落凡間，化為人類，以便傳播

神的智慧。哈蘭人、阿拉維派信徒和雅茲迪人之間，還有其他相似點。三個信仰都相信轉世，而且敬畏火。（十九世紀的英國傳教士波西·拜桀〔Percy Badger〕表示雅茲迪人「從不對火吐口水，而且經常將手伸進火裡，然後做出彷彿要親吻火焰並以火焰洗臉的動作」。）雅茲迪人和阿拉維派每天面向太陽禱告三次；比魯尼則告訴我們，哈蘭人每天面向南方禱告三次，而正午時分的太陽確實在南方。有些雅茲迪人守著殺魚的禁忌，他們認為魚因為住在水裡，所以是神聖的。（米爾薩的友人什哈波告訴我，有個雅茲迪的聖人在「一千三百五十年前」於大馬士革〔Damascus〕搭帳篷，那時魚兒自願離開河水以作為他的營釘。自此之後，雅茲迪人就不再殺魚。他補充說，大馬士革的居民曾信仰雅茲迪教。也的確，比魯尼在一千年前記載，哈蘭人在大馬士革有座聖祠。）

* * *

從尚勒烏爾法向東走，會來到仍住著雅茲迪人的地方。我們越走越能察覺所經之處的貧窮，即便從我們停留用餐的餐廳都不難看出。我看到我們路過的最後一間餐廳只是個沒屋頂的廚房，幾名表情沮喪的男人在空空的大湯盅前排隊，揮手趕蒼蠅。這裡和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度假聖地給人的感覺，其落差超乎想像，不過有個元素起碼對我而言比較熟悉：這裡的人說的語言，令我想起曾去過的其他地方。

「Panj dakk。」司機停車時說。我聽懂了，那是「五分鐘」的意思，和我在伊朗及阿富汗聽到的一樣。「Choni？」一名男子問另一名男子，意思是「你好嗎？」男子回道：「Bashi。」意思是我很好。

這是庫爾曼吉語，庫德族的語言，遭受土耳其政府的打壓長達一百年。當魅力十足的「土耳其人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在一戰後，試圖將如風中殘燭的鄂圖曼帝國打造成現代國家土耳其，他察覺到這個新國家的族群多樣性會使國家孱弱而分歧。他企圖壓抑各式各樣的在地與區域身分認同，也在某些案例中有所斬獲——不過在庫德族這邊碰了一鼻子灰。他和他的繼任者禁止學生在學校說庫爾曼吉語，但它還是撐過了挑戰（而且如今禁令已解除）。土耳其的庫德族被教導自認為土耳其人，但他們牢牢抓住自己的庫德族身分。他們組織強大的分離主義勢力，以他們在語言和族裔上皆不同於西邊土耳其人和南邊阿拉伯人的民族為由，強烈要求另立獨立的庫德族政府。

這個夢想在伊拉克已經很接近開花結果。當我們來到土伊邊界，我幾乎無法確定蘆葦叢、狹窄河流和國界鐵絲網柵欄的對面是伊拉克。邊界的另一端掛著一面偌大旗幟，尾端幾乎是垂在土耳其國界這邊，可是那不是伊拉克的國旗。紅、白、綠橫紋，中央一顆黃太陽，這是庫德斯坦的旗子。數十年來，這面旗子被禁，象徵著庫德族渴望獨立的願望。直到一九九一年過後，也唯有在伊拉克，庫德族才有足夠實力，敢掛起他們的旗子。西方勢力在這時期於伊拉克北部設立了禁飛區域，使庫德族能有恃無恐地反抗海珊。自從海珊在二〇〇三年垮台以來，庫德族在如今被他們稱為伊拉克庫德斯坦（Iraqi Kurdistan）的三個省分，依據憲法保障之權利，升起他們的旗子。

可是，只要我還踏在土耳其的國土上，「庫德斯坦」就是個不可說的禁忌單字，暗示著分離主義以及分裂土耳其境內的民族。一名同車乘客在我的電腦螢幕上看見這個單字後，對我頻搖指頭直到我將它

刪除。然而，一跨過邊界之後，我聽到的頭一句話就是：「歡迎來到庫德斯坦！」某個地方的異端邪說，在其他地方卻是正統信仰。進到伊拉克後，我發現人們不放過任何能說「庫德斯坦」這個單字的機會。伊拉克的庫德族說起「庫德斯坦」，語氣斷然又堅定，彷彿這個單字有某種神奇魔力，彷彿使用這個單字就是他們的自由與經濟繁榮的泉源。

伊拉克庫德族的團結並非來自內部的統一。他們可細分成數十個部落，說三種不同的語言，還有兩個曾為內戰彼此敵對、而且至今仍對共事有所遲疑的政黨。但他們的合作卓有成效，贏得了高度自治權，將外界對庫德斯坦的恐怖攻擊減至最少，而且獲得百分之十八的伊拉克石油收入，也就是每年數十億美元的金額。^[1]庫德族過去從不曾享有這般財富。他們的民族歷史悠久：三千年前就有文字記載提到那些生活在山坡上的「古堤人」（Kurti），有些學者將他們的起源追溯得更早。可是他們從來不富裕，也沒留下太多文化痕跡——大概因為他們耕作的山脈和丘陵並不豐饒，即便這些地形本身提供了躲避敵人的絕佳庇護。在馬可波羅的時代，他們是攔路搶劫的強盜，如果我們能相信這位大膽但可能不太老實的旅人的話。「庫德族是孔武有力的戰士，目無法紀的草寇，」他牢騷道，「他們很喜歡搶劫商人。」

相比之下，外國人今日在庫德語通行的地方活動最為安全。我在拜訪期間看到一張地圖，以紅點標記去年的每一次暴力攻擊，庫德斯坦的區域內一片空白。庫德斯坦的邊緣四周則紅點斑斑，特別是在它西部邊界一塊叫做尼尼微平原（Plain of Nineveh）的狹長土地。越靠近《聖經》記載的尼尼微遺址（位於今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蘇爾的範

圍內），紅點就越加密集。曾被某報封為「世上最危險城市」的摩蘇爾本身，則是一大顆血紅汗點。

我以前曾以選舉觀察員的身分去摩蘇爾，乘坐的是全裝甲車輛，只能從錄影螢幕看到外頭的樣子。即便如此，我們實際上還是差點被路邊的炸彈擊中。「我沒料到你們會出現，」在我們抵達城市邊境的哨站時，基地指揮官對我們一行人這麼說。「我接到通報說我們有輛車被擊中，我以為是你們的車。」隔天，我們在城裡被當地居民冷冷地、默不吭聲地盯著看。不，我並不想再回到摩蘇爾。不過，從伊斯坦堡出發的巴士似乎是朝那裡去：車子現在毫無疑問地沿著海珊時代寫著「摩蘇爾」的路標疾馳前進，經過已收成完畢的田地和光禿禿的貧脊山坡。

我現在知道（雖然似乎太遲了），我對地理知識的掌握將高度影響我的安全。我先前一時衝動搭上這輛巴士，除了添購一份伊拉克北部的地圖，幾乎沒做其他計畫。這份地圖應當是市面上最好的版本，可是它給我的資訊量少到令我擔憂。我的目的地是庫德斯坦首都艾比爾（Erbil），而地圖上顯示前往艾比爾的主要道路要穿越摩蘇爾。我的心跳加速，伸手緊抓窗框。我試著問同車乘客這是否就是我們即將要走的路線，但他們是庫德族和土耳其的商人，聽不懂我說的阿拉伯語或波斯語。

我開始焦慮地盯著窗外，滿心希望巴士會切往某條支道，走捷徑穿越田野。我脫下眼鏡，思考著如何換衣服，躲避視線，或把我的英國護照藏起來。然後彷彿是在最後的一刻，巴士終於向左轉，離開主要高速公路，開上一條我的地圖上沒有標示出來的新修小路。原來庫

德人和我一樣想避開摩蘇爾，於是蓋了全新的公路網，以繞過摩蘇爾。的確，我後來發現，多年的戰事已重塑了道路乃至區域景觀。

巴士沿著這條新開闢的捷徑疾馳，一路上有好多魯莽的司機和至少一輛被撞爛的車。過程中，我又學到了一堂關於地緣政治危機的課。原來車上有一名男子有足夠的阿語能力能聽懂我的話。他叫哈季·阿巴斯（Hajji Abbas），住在庫德斯坦外的基爾庫克

（Kirkuk）。我從他那兒得知，有一場公投即將決定他的城市及一大片鄰接庫德斯坦的狹長土地（即所謂的「爭議領土」，米爾薩的出生地辛賈爾也包含在內）是交由在艾比爾的庫德斯坦自治政府管理，還是交給在巴格達的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此同時，基爾庫克已成了宗教與種族暴力頻仍、半廢棄的死寂城市。「別忘記伊拉克的土庫曼人

（Turkmen）」，這是阿巴斯臨別前對我說的話。我想他一定就是個土庫曼人，來自中亞大草原的征服大軍的後裔。土庫曼人幾百年來保存他們的突厥語言，而今成了伊拉克內部獨特的族群。接下來幾天，我還聽到更多類似的懇求，都來自處境同樣脆弱的其他族群：在儀式上喝葡萄酒然後告解其罪的穆斯林沙巴克人（Shabak）；東方教會的最後信徒亞述人，這個基督教派最遠曾傳播到中國；還有像雅茲迪人但又拒絕雅茲迪階層體系的卡凱人（Kakais），他們不追隨謝赫阿笛

（Sheikh Adi），而是追隨素檀沙哈喀（Sultan Sahak）。^[2]「爭議領土」是伊拉克大部分處境困頓的少數族群的家，他們全都對未來感到惶惶不安。

* * *

巴士把我載到了庫德斯坦的首都艾比爾，下車處是販售各種電器產品的購物中心。我喝了一杯難喝的卡布奇諾，但慶幸能躲避熱辣辣的豔陽，思考下一步。艾比爾在短短幾年內迅速地擴張，我視線所及之處全是住宅開發建地和新修道路。我有個朋友就住在城裡，透過電話聯繫上之後，他幫我安排了一位司機名叫塔哈（Taha）。塔哈是粗獷的前庫德民兵組織戰士，他把車子維持得無可挑剔，車內座椅還被皺皺的塑膠膜包覆著。他用不太流利的阿語告訴我，他不曾去過巴格達。他一直留在庫德斯坦境內。不過，他很願意載我去拉利什，和其他雅茲迪人居住的地方——可是，不去在庫德斯坦境外的辛賈爾。他說那裡不那麼安全。

拉利什埋葬著雅茲迪信仰的兩大創教者的其中一位。他的名字是謝赫阿笛·本·穆薩菲爾（Sheikh Adi bin Musafir），一名蘇非主義的傳道者。雅茲迪人非常推崇這位聖人和他的苦行作風。傳統上，他被看作雅茲迪教的改革者；這個宗教是由被稱作素檀雅茲迪

（Sultan Yazid）神祕人物所創立的。米爾薩告訴我，「雅茲迪」只是神的另一個別稱。還有個更具爭議的說法認為，雅茲迪就是伊斯蘭早期的遜尼派統治者哈里發雅季德（caliph Yezid）。由於哈里發雅季德受什葉派穆斯林鄙視，在以什葉派人口為主的伊拉克，雅茲迪人費盡苦心地否認這說法。

關於謝赫阿笛的爭議則比較少。他是出現在許多非雅茲迪文獻的歷史人物，大約在一〇七五年出生於一度為伊斯蘭統治者的伍麥亞家族（Umayyad）。他的出生地靠近黎巴嫩貝卡谷地（Beqaa Valley）的巴勒貝克（Baalbek）——彼時哈蘭人可能在那裡還有據點。因此，當他從那偏遠的村落跋涉數百公里到巴格達學習神祕學時，可能已對雅

茲迪人的種種習慣稍有認識。後來，他沒有選擇留在帝都享受安逸的學者生活，而是到庫德族生活的地區當傳教士；當時庫德族所在的地區還未開發，危險重重，而且排斥伊斯蘭。他成立了名為阿達威耶

（Adawiyyah）的蘇非教團（克己苦修的神祕傳道者，類似中古歐洲周遊各地的托鉢僧，可能也啟發了那些托鉢僧，而他們之所以叫做蘇非是因為他們穿羊毛，而羊毛的阿拉伯文是suf）。在伊斯蘭邊疆，宣導民眾改宗的蘇非傳道者通常會有彈性地接受皈依者原來信仰的種種習俗，有時他們會把伊斯蘭名稱嫁接到這些習俗上，然後重新調整，好讓它們能和穆斯林習俗並存。他們的盤算是，皈依者終有一天會自視為穆斯林。不過，有時新的教義未能穩固扎根；某些伊斯蘭的習俗獲得採納，但只是流於形式，皈依者內心深處從未覺得自己是個穆斯林，而是謹記著他們過去的身分。類似的心路歷程可能發生在謝赫阿笛的皈依者身上，他們最終不再偽裝成穆斯林。

在同時代的穆斯林眼中，謝赫阿笛抱持著一些略微古怪的觀點。有一首詩被十九世紀的雅茲迪人認定由謝赫阿笛所寫，內容聽起來確實相當另類。「吾知得物之理，不曾與惡同在。」詩的開頭看似單純無害，不過詩人接著大發豪語：「萬物盡受控於吾人……但凡一切創造皆從吾所命。指引眾庶崇拜吾之偉大者，余也……盈滿極樂天堂者，余也。」部分雅茲迪人似乎也把他當神一般尊敬。「誰是善的泉源？」拉利什聖祠的助手在十九世紀對英國傳教士拜桀說，「神，或謝赫阿笛。」

不過，當雅茲迪人被問及他們的宗教內涵時，謝赫阿笛不是多數人會引用的人物。他們家裡的牆上掛的也不是阿笛的照片。他充其量是世界真正的統治者孔雀天使「梅拉克·陶烏斯」（Melek Taoos）在

凡間的化身，而孔雀天使則是神在可知宇宙的副手，也是人類有限心智所能理解的、最接近神的角色。由於雅茲迪人對神的理解非常模糊（他們說，除了神是存在的，關於祂的一切說法都不必然正確），孔雀天使成了他們信仰的焦點。過往幾百年裡，有七座孔雀天使的青銅像（又稱作桑賈克〔sanjak〕，譯按：以青銅或黃銅鑄成）輾轉於許多雅茲迪村莊，供人敬拜。傳教士拜桀對桑賈克的形容如下：「這是某種鳥的銅像，在所有鳥禽類裡跟公雞最為相似……它被固定在一個蠟燭台上，燭台被上下兩盞燈圍繞，各有七個燈頭，上方那盞比下方的稍大。」七個桑賈克中，有五個已佚失，兩個傳世。雅茲迪人也相信，孔雀天使會在每年被稱作「紅色星期三」（Charsema Sor）的日子，下凡到塵世，為世界開啟新的一年。這個節日的特色習俗是彩繪蛋殼，就像基督教的復活節一樣。雅茲迪人認為，蛋象徵世界的創生：在他們的創世神話裡，世界曾是液體，而後（像顆煮過的蛋）凝固起來；它始終沒有色彩，直到孔雀天使用祂的羽毛覆蓋世界，把羽毛上的藍色和綠色，賜給了海洋與森林。

更具爭議地，雅茲迪人認為孔雀天使等同阿薩賽勒（Azazael）或伊布利斯（Iblis），祂們在穆斯林傳統中（還有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是最重要的大天使，因反抗神而被貶入地獄——簡言之，是惡魔。孔雀也讓人有類似的聯想。黎巴嫩的德魯茲派相信，伊甸園的誘惑者是孔雀，而非蛇。有些在伊朗的祆教徒則相信，孔雀是惡魔製造的唯一善物，用以展示如果祂有意如此的話，祂其實有能力做好事。

然而，雅茲迪人絕不會稱孔雀天使為撒旦（Satan，阿拉伯文為塞旦〔Sheitan〕），因為這個字和他們最不可動搖的嚴厲禁忌相關，因而被禁止使用。十九世紀時，雅茲迪人寫了一封信給鄂圖曼當局，述

說當他們聽到撒旦之名時必須採取的可怕行徑：殺死說出那個字的人，然後聽到了那個字的自己也得自我了斷。伊拉克戰爭結束後，伊拉克議會唯一的雅茲迪議員並沒有在首相於演講開頭詛咒撒旦時，做出如此驚世行徑。不過，當他起身反對他人講出撒旦的名，或者更準確地說，當他對其他議員在每次有人如此咒罵，就對他投以譴責眼神一事表示抗議，他確實引起了騷動。那些議員之所以這麼看他，是因為他們認為他是個惡魔崇拜者。

我的計程車司機塔哈也這麼認為，他在載我北上多霍克（Dohuk）時告訴我。我要到那裡和雅茲迪學者兼庫德族官員凱里·布杉尼（Khairi Buzani）見面。「你會發現，我不會吃他們的任何食物，」塔哈邊開車邊警告我，「人們說穆斯林以前還會吃雅茲迪人的食物。那是過去的事了。他們崇拜的那個梅拉克·陶烏斯——那就是惡魔。」後來，有位年輕的雅茲迪人告訴我，越來越多庫德穆斯林拒絕和他們一起用餐。早期的歐洲訪客也因為孔雀天使而對雅茲迪人心存疑懼。考古學家奧斯丁·亨利·萊亞德（Austen Henry Layard）在一八四〇年於伊拉克北部旅行時，發現雅茲迪人比他們的鄰居更為彬彬有禮。他特別注意到他們「安靜且不具攻擊性的性情，以及他們村莊的整潔與秩序」。即便如此，他還是對受邀參加一名雅茲迪兒童的取名儀式有所顧慮。「雖然我尊敬雅茲迪人，也對雅茲迪人有不錯的評價……我仍急著查明給崇拜惡魔的小嬰兒當教父的話，可能攬上身的責任。」

* * *

雅茲迪人真正的孔雀天使信仰，遠比惡魔崇拜更引人入勝且發人省思。在基督後九世紀的時候，穆斯林、基督徒、祆教徒和其他信仰者，全都在穆斯林統治的阿拔斯帝國（Abbasid Empire）內彼此爭搶信徒。伊斯蘭神學在當時還沒變得像日後那麼強硬，蘇非行者尤其專注於開發創新大膽的宗教詮釋。其中一位蘇非行者是胡笙·伊本·曼蘇爾·哈拉智（Hussein ibn Mansour al-Hallaj）。哈拉智的祖父是祆教徒，信仰二元論，相信宇宙乃善惡對抗的戰場，但他的孫子所持的觀點與他相反。有一天，哈拉智敲了敲友人的家門。當友人問來者何人時，哈拉智回覆：「Ana al-Haqq——意思是，我是真主。」還有一次他曾如此答覆：「這披風底下覆蓋的無不是真主。」

哈拉智的回覆為他贏得不少仰慕者。詩人魯米（Rumi，譯按：十三世紀伊斯蘭蘇非派重要詩人）曾說，比起自稱「真主的僕人」，哈拉智展現了更謙遜的精神，因為哈拉智的話語中傳達出對自我的全然拒絕，進而展現了一份被真主徹底吸收的意願。「當你摧毀自己的心，」哈拉智寫道，「（真主）就會進入，然後揭露祂的神聖啟示。」有些基督徒抱持類似的觀念。譬如，從前有位異教祭司孟他努（Montanus）另立了自己的基督教流派，他聲稱被神附體，然後宣告：「我乃聖父、聖子和聖靈。」此外，九世紀的基督教祭司優素夫·布斯納雅（Yusuf Busnaya）在描述個人的神祕經驗時也曾說，一個人的「靈變成了基督……變成了神，而神不再是神」。不過哈拉智提出的是更普遍的哲學觀點。他告訴我們，一切皆為真主。「我在萬物中看到的都是祢。」他在一首詩裡如此寫道。這是終極的一神論，認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一切皆由真主實際構成。

作為徹頭徹尾的一神論者，哈拉智極力對抗人們對撒旦的理解。在一個由真主構成的世界裡，惡魔顯得格格不入。惡魔在正統伊斯蘭傳統中是純粹的惡，猶太人和基督徒也所見略同——惡魔是神的反抗者，永不知懺悔，也永不知聽從。這難道不是意味著，造物主若非不公正，就是不如宗教上所宣稱的那樣全能嗎？祆教徒也發現了同一個問題。他們挑戰基督教鄰人，詰問如果神是全能的，為何祂任憑惡魔在世間作惡？為何祂不救贖撒旦，一如祂救贖人類？有一名基督徒想到了答案。他是尼尼微的以撒（Isaac of Nineveh），而他認為在世界末日，萬物的確都會得到救贖，就連惡魔也能進入天堂。地獄將會消失。「惡魔不會永遠是惡魔，罪人亦然。」

哈拉智對祆教徒提出了他自己的回應。就像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聖典，《古蘭經》說撒旦曾經是大天使長；他拒絕跪拜於亞當面前，並且背叛真主，因此被打入地獄。但哈拉智給故事安插了一個驚人的轉折。他說，撒旦之所以拒絕對亞當鞠躬是出於嫉妒，以及對神堅定不移的愛。因此，撒旦可以說是專注地凝視真主而不被任何人分心的所有蘇非行者與其他信徒的原型。不過，哈拉智也說，撒旦更像是誤入歧途，而非本性邪惡。今天，多數穆斯林都認為哈拉智的觀點是非常不正統的。但在伊斯蘭剛創立的頭幾個世紀，還有其他穆斯林神祕主義者也很努力地想解決撒旦的人間地位問題。其中一位神祕主義者巴斯拉的拉比雅（Rabi' a of Basrah）嚇壞了她的聽眾；她不僅拒絕說她憎恨撒旦，而且威脅要澆滅地獄之火，燒毀天堂之賜，因為對懲罰的恐懼或對福報的祈望，阻礙了人們對真主懷抱真正的敬愛。

雅茲迪人的孔雀天使觀與這些前人的觀點相契合。他們稱孔雀天使為伊布利斯或阿薩賽勒，代表他們把他當成墮落天使，而不是黑暗

王子。他們為此辯解說，不光是惡魔在末日來臨時將變成天使，而且這件事早就已經發生了。布杉尼在他位於多霍克的辦公室裡這麼告訴我。他的辦公室被塗有淺色油漆的房子圍繞，每一棟房子都有鐵柱從屋頂突出，準備等下一代蓋新的一層樓。「阿薩賽勒在反抗之後，」布杉尼向我解釋，而我注意到他謹慎地避開禁忌之名。「祂受到懲罰，悔不當初。」在長達七千年的流放裡，阿薩賽勒以祂的眼淚澆熄了地獄之火，因此重新獲得寵愛，成為天使長。這給雅茲迪人一個不同的宇宙觀，在其中，地獄並不存在。布杉尼繼續說：「關於唯一真主，我們有個觀念是其他相信天堂的宗教都沒有的，也就是善惡都來自神。世界並不存在兩股力量，為了主宰宇宙而彼此鬥爭。」雅茲迪人絕非崇拜惡魔，而是相信世上沒有惡魔。

他們有可能是受哈拉智信徒的直接影響。這名激進的傳道者最終慘死：他因為支持伊拉克南部的奴隸叛亂，被阿拔斯哈里發的軍隊逮捕後遭到大卸八塊。他的虔誠信徒逃向北方，躲進山區，和謝赫阿笛後來傳道及雅茲迪人如今生活的地方距離不遠。他們的觀念可能在謝赫阿笛的時代，甚至更早之前，慢慢傳給了雅茲迪人的祖先，成為他們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和殘餘的更古老傳統與信仰共同存在。

在伊拉克，使帶有惡意的神祇息怒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我在前一章提過的《納巴泰農業》記載了一個基督後九世紀流行於伊拉克的禱詞，乍看似乎有伊斯蘭影響的痕跡，但很明顯是源自和伊斯蘭差異頗大的傳統：「安拉是唯一的神，祂沒有任何同伴……所有力量、威嚴和偉大都屬於祂……祢是有福的，天堂與萬事萬物的主……我們以生命請求祢的寬待。阿門……做這個禱告時，燒點舊獸皮、油脂、皮革條和蝙蝠屍體，獻祭給祂的像。為祂燒十四隻蝙蝠，和等數量的

鼠，然後把灰燼撒在地上，伏倒在祂的像面前。」這份禱詞的對象是農神「薩頓」（Saturn），是「邪惡、罪行、淫穢、汙垢和困乏的主」，禱告的目的則是為說服祂放過向祂哀求之人。

薩頓的角色在古亞述帝國是由奈伽爾神（Nergal）扮演；祂被當作正午烈日、瘟疫和亡者的神，由一隻獅首巨獸鎮守著祂的神殿。值得一提的是，祂的化身是一隻小公雞，和桑賈克有點類似。在後來的幾個世紀，密特拉斯教徒樹立起被標示為「阿里曼尼歐神（Deo Arimanio）」的獅首雕像——指祆教的惡神安格拉·曼紐（Angra Mainyu），祂是密特拉斯崇拜者欲安撫的神靈。根據基督後一世紀希臘史家普魯塔克（Plutarch）的記載，安撫惡魔的儀式在他那個時代的伊朗出現，儀式包括獻上獻祭的野狼之血與神聖植物豪麻（haoma）的萃取物混合而成的藥水，然後人們會到一個黑暗的洞穴裡把它倒出來。七世紀基督教作家潘卡耶來自土敘邊界，靠近至今還有部分雅茲迪人居住的地方，他說該地區的居民崇拜太陽、星星，以及巴爾夏明（Baalshamin）與別西卜（Baalzebub）——前者是古代天空之神，後者則是撒旦（Lucifer）。

無論起源為何，我在塔哈載我到拉利什的一路上，不繼看見梅拉克·陶烏斯：在我進到距離拉利什不遠的雅茲迪小鎮艾因錫夫尼（Ain Sifni）後，處處可見孔雀像被繪在大門和出入口。鳥頭甚至被刻在一排公寓的頂樓外牆上。拉利什文化中心（Lalish Cultural Center）在鎮上設了一間分館，館內有間不錯的圖書館和小博物館。我在圖書館認識了阿雅德（Ayad），他那時正在翻閱雜誌。阿雅德是雅茲迪人的新世代，他能讀寫四種語言，擁有政治學學位。誠如我攀談過的很多雅茲迪知識分子，他著迷於自家信仰的歷史。我漸漸習慣了每個雅

茲迪人給我的說法都稍有出入，考量到他們沒有教理書或公諸於世的宗教文獻，這點並不令人意外。儘管每個人的雅茲迪故事稍有不同，不同版本之間還是有一些共通的主題。

阿雅德對族人的理論如下：「我們是眾多太陽民族之一。生活在敘利亞、俄羅斯、亞美尼亞、伊朗和土耳其的民族都曾把太陽看作神。那就是我們宗教在發展上的第一階段，也就是自然崇拜，然後它變成了一神教，然後謝赫阿笛的學說出現。」阿雅德告訴我，雅茲迪人已不再崇拜太陽。但他們確實還是會在禱告時對太陽鞠躬。當第一位雅茲迪議員進到伊拉克的新議會，他不是按著《古蘭經》或《聖經》做就職宣示，而是庫德斯坦的國旗——更確切地說，是按著旗子正中央的太陽。阿雅德認為那不是巧合。「我們是最初的庫德人。」他說。有些雅茲迪人懼怕被庫德人同化會威脅到雅茲迪認同，但阿雅德覺得最安全、最確實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族人置於庫德認同的核心。

* * *

有一本一九四〇年代的旅遊書寫道，從艾因錫夫尼到拉利什的路程可能會使車軸被震壞，教人苦不堪言。不過情況已經有所改善：現在，有一條平坦的道路蜿蜒穿越森林覆蓋的谷地，通往神殿。我借道此路的那天，整條路上停滿了車輛，我也聽見庫德流行樂和青少年的笑聲。塔哈和我朝聖祠前進之際，經過了一座太陽的石雕。我們抵達後發現聖祠是個貌似古老修道院（中古時代有基督教祭司宣稱，拉利什其實曾是個基督教會）的石頭建築，隱身在樹木生長繁茂的谷地。

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伊斯蘭的週末，有很多家庭來到拉利什，在有桑椹樹和無花果樹遮蔭的鋪石庭園裡野餐。雅茲迪人的聖日是星期三，那天他們不下田、不旅行、不沐浴，也不洗衣服。不過，很少人還遵循這個大約能追溯至前基督教時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古老禁忌。穆斯林舉辦主麻日禮拜的星期五，如今成為比星期三更普遍的週休日。^[3]

塔哈留在車上——他說他之後會和我們會合——阿雅德和我加入一個來此地野餐的家庭，在樹蔭下席地而坐。我們之間擺著一盤切好的西瓜。這家人既不說英語，也不說阿拉伯語。父親戴著紅白紋的頭巾，友善地露出微笑，而我嘗試以庫爾曼吉語吐出了一兩句話，但成效不彰。兒子們和父親坐在一起，妻子和女兒們則在幾步以外的地方自己野餐，在螺旋圓錐尖頂小屋的石牆下躲避太陽的酷曬。那種尖頂是雅茲迪聖祠的標準特色。（尖頂的旋轉線條從圓錐頂端向下放射延伸至底部，也許是象徵太陽光線的設計。）阿雅德主動帶我去看建築群正中央的神殿。我們沿著一條沒有屋頂的通道前進，可以看到一座陽台上有個穿白衣的女子正安靜地看著我們。二十世紀中葉的英國旅人卓爾曾在停留伊拉克期間造訪拉利什，她提到有群「穿白衣、宛如修女般的聖祠侍奉者」，終生未婚且畢生都在紡織羊毛和照料聖祠及四周的花園。我心想，這女子一定就是那些侍奉者之一。巴比倫時代也有擔任聖職的女人，她們一輩子不曾離開神殿，不停地轉動紡錘。

我們穿過掛著野山羊頭像的拱門後，來到了陽光普照的神殿庭園。神殿門旁的石牆浮雕是一隻大黑蛇，蛇頭引頸向上，有將凶惡阻擋在外的辟邪功能。這道門有一道很寬的門檻。阿雅德作勢要我把鞋子脫掉，並像雅茲迪人一樣跨過門檻，不要踩踏到，因為有些信徒認

為門檻是神聖的，所以會親吻門檻。我們於是走進了地上鋪有石板的暗室，裡頭散發灰塵和一種古老的氣味，光線從幾扇小窗穿透入內，而室內唯一的裝飾是幾卷懸掛在室內中央支柱上的黃色、紅色、淺藍色的鮮豔絲綢。走過的人可以在絲綢上打個結，或解開既有的結，以換取好運。有一些家庭旅客在裡頭走來走去，面容雀躍但安靜不作聲。

我們走下一段樓梯，然後我又遇到了梅拉克·陶烏斯：被簾子遮住的壁龕內擺著七尊裡面倖存下來的其中一尊桑賈克，是孔雀天使的黃銅製像。來到下面這層樓時，我們聞到室內散發著從牆邊成堆罐子滲出的臭油味。少男少女紛紛扔擲絲綢捆，看是否能打中牆上的某個石頭，給自己添些好運。我起先以為那顆石頭可能是被歲月磨平、特徵已無法辨識的雕像。（後來有位雅茲迪人告訴我，這是一顆奇蹟似地懸在半空中的石頭。「可是，」他們說，看得出來仍舊對他們即將吐露的愚行感到震驚。「幾年前，那些信仰不虔誠的人堅持在它後面築一道牆。」）我從房裡離開時，看到一具覆蓋著綠布的石棺。雅茲迪人繞著它兜圈子，左手輕輕捎過墓碑。蘇非行者常穿的黑色羊毛披風莊重地被擺在一旁。唯有非常虔誠的雅茲迪人能夠穿上它。有人告訴我，謝赫阿笛就穿這樣的披風。他生前是個穆斯林嗎？我問道。一群雅茲迪人聽聞，異口同聲地回答：「不！」

阿雅德說我很幸運。因為那天恰巧有個叫做「精神議會」（Spiritual Council）的組織在神殿裡開會，組織成員包括一些相當有影響力的平信徒和高層神職人員。我得從神殿走到附近一棟建築的凹室，請求和他們會面。我按照規定在進門前脫鞋。房內沒有女人在。一群年輕男性坐在沿凹室牆壁擺放的石凳上。凹室前方有一處庭

園，通往「精神議會」開會的房間。我能聽見石凳上男人談話的片段內容，他們（以英語）熱烈討論著庫德民族主義的歷史。攀談後，我發現他們很多人曾有外國護照，大多是德國或瑞典。他們都是謝赫，地位是雅茲迪階層體系的最頂層。根據傳統，謝赫應該在他們所屬的階層內通婚。我問他們其中一人，這對住在歐洲和美洲的雅茲迪人豈不是很困難？「我遵循這個習俗，」他回答，「也順利找到同是謝赫的太太。但等我女兒二十歲以後，她想怎麼做，我就管不著了！」

我看見會議成員漸漸聚集在庭園裡，顯然會議已結束了。會議成員中有些人穿西裝，但有五個人留著長長的灰鬍子，穿傳統服裝，行為舉止特別莊重。他們頭戴以黑環固定的白頭巾，像極了阿拉伯部落酋長，其中有幾個還穿著阿拉伯語中稱為「畢希」（bisht）的超薄披風，顯示地位崇高。他們之中有一人是雅茲迪人的世俗領袖「密爾」（the Mir）。還有一人則穿得有些不同，頭戴神職人員的紅白紋頭巾，穿奶油色袍子。這位是巴巴謝赫（Baba Sheikh），嚴格來說，是雅茲迪人的頭號精神領袖（不過，起碼我在的時候，他把講話的工作都留給密爾）。庭園裡的這些男人們就是雅茲迪信仰的領導階層。我問他們是否能撥一點時間見我，於是他們要求我把問題寫下來，然後要我先離開，等待他們的決定。我到樓上鋪有石板的房間裡坐了一陣子才被召回。他們認為和我聊天並不會帶來什麼危險。

密爾的回答很平淡。他告訴我，雅茲迪人想和所有宗教和平共存，同時保存他們獨特的傳統。他們和穆斯林與基督教神職人員的關係和睦，每逢宗教節日時會訪問彼此。不過，雅茲迪人拒絕傳教工作，也永遠不會試圖讓他人改宗。「在我們的禱告中，」他說，「我們先為他人祈福，然後才為我們自己。受審的是人們的作為，而不是

他們的信仰。神賦予亞當的精神傳承給了全人類。那份精神在不正當的人身上被壓抑，在最好的人身上則光彩奪目。」他語畢，五位鬍鬚斑白的長老站起身，抖抖他們的袍子，走出去休息抽菸。有人送來烤雞和米飯。阿雅德和司機塔哈加入我們。那裡沒有椅子。密爾用肢體示意要我站到他旁邊。他安靜地吃著，每次放下刀叉，雙手便環抱在肚臍前。我看見塔哈站著，什麼都不吃，就像他早先跟我保證的那樣。

我帶著很多未解答的疑問離開拉利什。雅茲迪教引發我無限的好奇。舉例來說，為什麼他們禁止信徒穿戴藍色，或禁止吃萵苣？當我問雅茲迪人這些問題時，他們答得很模糊，多數都認為這些是昔日雅茲迪領袖因為死對頭突厥人穿戴藍色，或單純因為他們討厭萵苣，而訂下的無意義規定。米爾薩則把反對萵苣的規定，相當明確地追溯至一六六一年。我傾向相信這些傳統有古老的根源，可以從同地區的其他宗教看到相似處。對曼達安人而言，藍色是和惡魔盧哈有關的顏色。在德魯茲派的社會裡，最受敬重的謝赫穿的就是藍袍。德魯茲派也有類似禁忌，他們的長老們有時會避吃一種叫埃及國王菜

（molokhiya）的蔬菜。哈蘭人則避吃豆子。但我不懂這些傳統誕生的箇中原因。無論我多麼努力，雅茲迪教仍舊守護著一部分的祕密。

* * *

在現代世界，雅茲迪人不再能期盼外界放任他們自生自滅。隨著政府官僚的治理範圍拓展以及現代科技崛起，能讓一整支民族藏身的地方越來越少。有時候，新的公民觀念和官僚主義與科技一同發展，

使少數族群在被認為不構成威脅時，得到寬宏大度的對待。但當他們被視為威脅，或當古老的偏見戰勝一切，總是帶來腥風血雨的惡果。

二〇〇七年的某個夏夜，在米爾薩的家鄉卡塔尼亞，身穿米白棉袍、頭戴黑白頭巾的一票男人，因看見一輛卡車駛進鎮上而聚集。他們希望那輛卡車是來發送糧食的。沒想到，卡車造成一起嚴重的爆炸事件。房舍被震垮，街頭的人被炸飛，留下衣不蔽體的屍體。光是陳述事實就已經令人髮指：有四輛卡車爆炸，炸彈大概藏在門裡，造成約八百人死亡，以及大概一千五百間房屋受損或全毀。不只如此，由於進入卡塔尼亞的路程被認為太過危險，救護車和挖土機不曾現身救援。當地人把衣服掛在棍子上，紀念那些屍體始終未被尋獲的孩子們。這是僅次於九一一雙子星大廈事件，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恐怖攻擊。這起炸彈攻擊的近因是雅茲迪婦人杜雅·卡莉兒·阿斯瓦德

（Du' a Khalil Aswad）的遇害：她因為想嫁給穆斯林男人而被親戚謀殺。有項謠傳指出，她在被殺害之前已經皈依伊斯蘭，因此被各個團體推舉為穆斯林殉道者，也使這些團體展開對雅茲迪人的報復。

不過，衝突背後有它的歷史脈絡。長期以來，該地區所有族裔團體之間的怨恨受到海珊政府的刻意煽動，後者試圖透過煽動阿拉伯人對抗雅茲迪人，雅茲迪人對抗庫德人，維持對國內群眾的控制。睿智的雅茲迪長者達克西爾（Dakheel）表示，二〇〇三年以來的這些年，各種不寬容又暴力的伊斯蘭信仰四處擴散。我們坐在艾比爾喜來登飯店的全新大廳裡談話時，他哀傷地對我說，卡塔尼亞攻擊的背後是

「宗教仇恨」。「那是全然的宗教仇恨。」他說，在阿拉伯復興黨於五〇年代晚期掌權後，宗教分歧加深，不過若和宗教寬容在二〇〇三年之後的衰退程度相比則是微不足道。薩拉菲穆斯林（Salafi

Muslims) 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們是想盡可能地模仿史上第一批穆斯林行為的原教旨主義派，特別仇視諸如雅茲迪人等非正統派。達克西爾對未來感到沮喪。他認為，雅茲迪人總有一天會消失，因為他們和曼達安人與德魯茲派相比，組織比較沒那麼緊密。他們散居在伊拉克。多數的雅茲迪人住在艾比爾西邊的辛賈爾，不在庫德自治政府的管轄範圍內。傳統上，這裡是他們勢力最強大的地區，也是他們成功抵禦鄂圖曼人好幾百年的地方。此外，大約有百分之十五的雅茲迪人住在艾比爾北邊的拉利什一帶。剩餘的雅茲迪人則住在更北邊的多霍克一帶。

不過，達克西爾較為樂觀地補充，雅茲迪人的教育水準越來越好。一戰前，某英國作家曾表示只有一個雅茲迪家庭有讀寫能力。一九四〇年代時，達克西爾的叔叔是首位成為學校老師的雅茲迪人。一九七三年，首位雅茲迪醫生學成畢業。「現在，醫學院裡有很多雅茲迪醫學生。大學裡有超過三千名雅茲迪人。學習是我們唯一的生存之道。」達克西爾告訴我。自從區域情勢穩定下來並吸引國內其他地方的人們移居至庫德族聚居的地區後，這裡的生活花費越漲越高。不過，在國內各地宗教熱忱普遍提升之際，雅茲迪人反而變得不那麼熱切。「十或十五年前在辛賈爾，剃掉鬍子是會被處死的，」達克西爾補充道，並提醒我，蓄鬍對雅茲迪男人而言是一項宗教義務。「現在不是這樣了。人們到拉利什朝聖時，不再穿上特別服裝。」

後來，我在回到艾比爾後，造訪了城市最初所在的多石高原——如今那裡被打造成文化遺址。我在高原邊緣朝下方新翻修的廣場鳥瞰，看見廣場裡坐著庫德族年輕人，在噴泉四周閒聊。然後我抬頭往前看，望向塵土飛揚的西方地平線。辛賈爾就在那裡。它的西邊是住

著庫德人、阿拉伯人和雅茲迪人的許多敘利亞村莊。哈蘭及其南邊的土地在比這更遠的地方，再過去則是敘利亞沿岸的林地山坡。上述每個地區，在歷史上長期以來庇護著形形色色的弱勢族群——他們之中有的是成功與伊斯蘭教和平共處的古老宗教信徒，有非正統的穆斯林，也有混合古老民俗傳統與伊斯蘭習慣而生的迷人信仰的信徒。

這些地區如今鄰接著二〇一四年由一個殘暴且不寬容的恐怖分子團體片面宣布成立的伊斯蘭哈里發國（Islamic caliphate，[譯按：即伊斯蘭國（ISIS）](#)）。這一事實只是使雅茲迪人面對的窘境更加艱困：他們的地盤如今不再和鄰居保持遙遠的距離。他們還面臨傳承密教的挑戰，雅茲迪信仰的真理僅在神職階層中流傳，而它的信徒今天卻和其他宗教的信徒一起生活在城市裡，而不是住在偏僻的村莊——這意味著，別人會提出對雅茲迪信仰的疑問，而雅茲迪人通常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回答。對那些移居國外的人而言，要讓孩子繼續和信徒或同階層的人通婚，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事。

米爾薩正面臨這些挑戰，因為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就離開伊拉克。當時波斯灣戰爭剛開打，被徵召入伍成為注定落敗一方的威脅隨之而生。米爾薩加入了一群人的行列，而他的朋友阿布·什哈波（Abu Shihab）也是其中一員。什哈波打算帶全家人一起逃跑。他們從辛賈爾西方不遠處跨越伊朗與敘利亞的邊境。那是個夏夜，白日的酷熱正逐漸消散。軍隊因為戰爭被轉調到他處，伊敘邊境的部署因此變得單薄。一旦進到敘利亞，這群人將朝友善的雅茲迪村莊邁進——不過，兩國邊境之間相距好幾公里，而且跨越時他們得留心腳下的地雷，以及接獲格殺勿論令的守衛。

米爾薩開始前進。必要時，他會把頭壓低、躡手躡腳地移動。路程過了一半後，他聽見槍聲。他猜想是不到兩公里外，嘗試帶著妻小跨過邊界的什哈波遇上麻煩了。他猜對了——什哈波一家被邊防守衛看見。守衛們高聲示警，然後便開始射擊。子彈近在咫尺，什哈波的一個兒子頸部中彈。但那時他們已跨過邊界，沒有人前來追趕。他們還來不及感到慶幸，就發現家中兩個最小的孩子沒跟上來。這兩個孩子年紀太小、無法徒步，一直都騎在一頭驢子上，但他們在急忙越過邊境的過程中，沒有人注意到驢子沒跟上來。兩個孩子被政府抓住，並交還給他們的祖父——條件是祖父要以生命擔保他們不會逃走。什哈波有整整十七年沒再見過他們。

米爾薩、什哈波，還有什哈波剩下的家人，全都移民北美——什哈波到美國，米爾薩去了加拿大。他們保持密切聯絡。也許因為在邊境的共同經驗，什哈波請米爾薩當他的「來世的兄弟」，也就是心靈導師。這在前一個世代是近乎封建的一種關係，其中平信徒會絕對服從謝赫。這種關係的締結方式是要拿拉利什的土壤，將之揉成球狀，代表世界，然後將拉利什的神聖「白泉」（Kaniya Spi）混入土球之中。接下來，兩個心靈兄弟掌心夾著濕潤泥土，緊握彼此的手。這個結拜的儀式，不僅拉近雅茲迪人之間的關係，它也提醒人們，在過去，不同的文明會向彼此學習，採納彼此的習慣。這是雅茲迪人對西方生活的獨特貢獻——因為拜密特拉斯信仰所賜，這個習俗後來轉變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握手。

[1] （譯注）聯合國安理會在一九九五年通過第九八六號決議（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986），其中規定伊拉克政府應將石油收入的百分

之十三保留給庫德自治區。但在二〇一七年庫德族獨立公投過後，中央政府凍結了本應給予庫德自治政府的分配款，使自治區經濟遭受嚴重打擊。

[2] （譯注）沙哈喀是庫德族宗教領袖，在十四世紀創立了雅賽尼派（Yarsanism），是一種伊斯蘭神祕主義的教派。卡凱人就是伊拉克境內的雅賽尼派人。

[3] （譯注）「主麻」為阿拉伯語「聚禮」的音譯，其儀式包括禮拜、聽念「呼圖白」（教義演說詞）和聽講「窩爾茲」（勸善講演）等宗教儀式。



第三章

祆教

Zoroastrians

拜火之人

昨夜我把麻煩攤在老馬吉面前。

他能快速審視幫我解決問題。

我看到他快樂地笑，手裡拿著一杯葡萄酒。

——哈菲茲(Hafez, 1315-1390)，伊朗詩人

拉雅·夏爾維尼（Laal Shahrvin）在一九二〇年代生於亞茲德（Yazd）。這座綠洲城市位於伊朗正中心，四周環繞著貧脊的矮丘。今天，亞茲德整個舊城都是聯合國世界遺產。泥磚牆切割出整齊的街道巷弄，車輛禁行。一座座高聳的風塔巍然矗立。風塔的形狀有如巨型煙囪，是古早時候的天然冷氣，用以捕捉夏季微風，傳到下方酷熱難耐的屋舍。從一道神祕的階梯向下走，可以通往人們曾用來避暑的蓄水池——這個地區夏天的氣溫可達約攝氏四十五度。^[1]主廣場擺著一個比人還大的、以柳條編織而成的大轎，是胡笙的棺木的複製品；這裡的穆斯林每年將它扛在肩上遊城，表示懺悔。^[2]

拉雅不曾去參觀伊斯蘭充滿熱情的儀式，或前往有青綠色彩瓷圓頂與宣禮高塔的清真寺禱告。她不是穆斯林：她屬於一個更小、更古老的宗教族群。她的族人有自己的節日和紀念日，像是在冬至，他們會守夜度過一年最長的夜晚，把西瓜和石榴從儲藏室中拿出來，邊吃邊說故事，直到破曉。對他們而言，一年當中最重要節日是白晝終於長過黑夜的春分。純淨對他們的生活很重要：為達純淨，拉雅會進行需要九個晚上都保持清醒、不睡覺的儀式，而過程中，祭司會把公牛尿液灑在她身上，並給她幾滴牛尿，要她喝下肚。她聲稱自己加入「行善的兄弟姐妹」的行列是出於自由意志。

不同於亞茲德的穆斯林鄙視狗，她的家人把每晚餵狗的任務交給她，而且是在她和家人用餐之前。不同於到清真寺禱告，她的家人在附近一間神殿的聖火前，獻上禱文，然後焚燒檀香木。每天晚上，她擔任祭司的父親會爬上磚房的屋頂；她看到他站在那裡，手持六分儀和星盤，測量天空中的星星。他們家在禱告時，使用的語言是阿維斯

陀語（Avestan）；這個語言在鐵器時代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現則不然。在家裡，他們說著被外人貶稱為「嘎布里」（Gabri）的專屬語言：只有和他們持相同信仰的人才會說或聽得懂這個語言。

在伊斯蘭教傳入之前，多數伊朗人實踐著和拉雅家相同的傳統。當帕爾斯省（Pars province）的騎兵在基督前六世紀，向北、向東、向西征服鄰人，建立起當時前所未見的龐大帝國，並稱之為帕爾斯或波斯，這些騎兵所奉行的宗教就是拉雅家的信仰。它從中亞傳來，大概於基督前一〇〇〇年，由先知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譯按：更常見的譯名為希臘文的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創立。他的信徒在西方被稱為祆教徒（Zoroastrians）。阿拉伯人稱他們為「馬朱斯」（Majoos），以他們的祭司「馬吉」（Magi，也叫做「摩貝得」（mobeds））命名。在印度，他們名為帕西人（Parsees），是在被伊斯蘭征服不久後，以難民身分從波斯前來而得到的名稱。早期基督徒通常把造訪耶穌的「東方三賢士」，描繪成波斯的祆教徒：不過這點不曾被記載於《馬太福音》中，這樣的選擇可說是個巧合。波斯軍隊在基督後六一四年征服伯利恆時，據稱他們之所以放過了主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而不是像到訪其他城鎮時大肆破壞，是因為他們看到教堂入口處的三賢士畫。

祆教曾是伊朗的主流宗教，到拉雅的時代已沒落：她出生成長的社區只有八十五個家庭，集中居住在城裡的一區，是幾百年摧殘下碩果僅存的最後幾個社區之一，而且規模小到拉雅認識所有的人。今天，祆教徒在全世界的人數總計不超過十萬人。但他們對世界宗教的貢獻，包括我們的宗教，使他們的重要性大過這數字所暗指的意義。根據尼采的說法，查拉圖斯特拉發明了道德（morality）。我們能更

肯定地說的則是，查拉圖斯特拉告訴我們，世界是由善惡永不停歇的鬥爭形塑而成。他在《伽薩》（*Gathas*，祆教最古老且最重要經文《阿維斯塔》（*Avesta*）中的詩歌）裡宣稱：「讓賢者在這兩者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崇拜假神祇之人曾選擇了惡，但他的追隨者拋棄了那些神祇，轉而崇拜智慧之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並以祂的名行善。

接下來幾世紀，這個神學理論發展出一種解釋世界的缺陷的觀點。為什麼世上有夜晚、冬天、疾病和害蟲呢？祆教徒把它們解釋為宿敵安格拉·曼紐的作品。安格拉·曼紐派遣邪惡的動物來到人間傷害阿胡拉·馬茲達所創造的善良動物。阿胡拉·馬茲達創造光，安格拉·曼紐則發明黑暗來汙染光。阿胡拉·馬茲達創造生命，安格拉·曼紐則藉由引進病痛，悄悄地毀掉生命。阿胡拉·馬茲達象徵富饒，安格拉·曼紐則帶來荒涼。阿胡拉·馬茲達的王國是永恆喜悅的王國，安格拉·曼紐的王國則滿是痛苦。儘管祆教徒期待善最終戰勝惡的那天到來，他們必須幫忙實現這個目標。

善良動物包括馬、牛和狗。另一方面，安格拉·曼紐在動物王國的僕人統稱為「卡拉夫斯特拉斯」（*khrafstras*），包括蒼蠅、螞蟻、蛇、蟾蜍和貓。信奉祆教的波斯皇帝沙普爾（Shapur），因基督徒把「蛇和爬行生物說成是善神的創造」而懲罰他們。他認為，這種生物只可能出自另一個心懷惡意的造物主。偉大的波斯民族史詩《列王記》（*Shahnamah*）開頭便描述由精靈和動物組成的大軍選擇忽略惡，站在善的一方，準備對抗安格拉·曼紐。（如果這聽起來像是C·S·路易斯〔C. S. Lewis〕所著的小說《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那是因為他是《列王記》的頭號粉絲——他還稱祆教是他最愛的「異教」信仰。)

善惡之戰是人類只要有意願也能參與的一場戰役。自由選擇在祆教中是特別重要的觀念；它的信徒主張，就連安格拉·曼紐的惡也是出於選擇。（所以才有故事聲稱安格拉·曼紐創造孔雀，只是為了展示若他願意，也能創造美麗而不是醜惡的事物。）說實話之類的高尚舉動，旨在打敗安格拉·曼紐（在《阿維斯塔》裡，黑暗的力量名為「謊言」），而在基督前五世紀研究波斯文明的希臘史家希羅多德也告訴我們，波斯人從小學習「騎馬、射箭，以及說實話」。此外，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還得投入對抗安格拉·曼紐僕人的戰役。希羅多德告訴我們：「祆教僧侶親手剷除狗和人類以外的所有生物，他們甚至把這當作偉大的目標追求，殺死螞蟻和蛇，以及所有其他飛禽走獸。」即便在一九六〇年代，伊朗祆教徒一年當中仍有一天會對「卡拉夫斯特拉斯」大開殺戒，特別是螞蟻。

同時，愛狗是一項義務。在《阿維斯塔》中，靈魂想進天堂必須能安然無恙地走過的裁判之橋（Chinvat），那兒據說有兩頭狗負責看守。祆教徒認為，如果有隻狗專注地凝視著不遠處，便是看見了人類肉眼看不到的惡靈，因此他們通常會安排一隻狗坐在將死之人的病床邊。如學者瑪麗·博以斯（Mary Boyce）在她對一九六〇年代傳統祆教生活的觀察中所描述，換作是這種狗死去時，人們按照規定必須為牠舉辦特別的喪禮。狗死去時，他們會如此宣告：「靈魂正上路。」這隻狗會被打扮成一名祆教徒——穿庫須提腰帶（kushti）和塞德拉麥斯林紗汗衫（sedreh），這是祆教信徒一貫的裝扮（腰帶繫腰間，汗衫披過肩）。此外，牠的屍體將被當作過世的祆教男女般對待：放

在曠野給鳥吃。在狗死後，人們也將連續三天擺出牠最喜歡的食物，讓牠的靈享用。

《阿維斯塔》明文禁止虐狗。「前往冥界時，（曾打狗之人的靈魂）將比在參天樹林中遇上遊蕩狼群的綿羊哭號、奔逃得更加淒厲悲傷。」《阿維斯塔》要求殺狗者施行十八項自我懲罰。其中一項補償方式是殺死一萬隻貓。由於穆斯林愛貓勝過狗，且認為狗是不潔的，在待狗之道上引發的爭吵經常導致祆教徒和穆斯林大打出手。

西方世界的貓狗大戰不曾如此激烈。不過，祆教對人世間動物的區分以另一種方式進到了歐洲文化。「魔法」（magic）一字來自祆教祭司「馬吉」；黑白魔法的區分（一惡，一善）類似安格拉·曼紐和阿胡拉·馬茲達的關係；和黑魔法術士同行的動物，像是蛇、蟾蜍，當然還有貓，全都是受安格拉·曼紐支配的生物。

祆教徒還給了我們一個影響更廣泛的遺產。他們相信曾經為善而戰的人，可以期待死後進到「歌聲殿堂」（House of Song），他們也將之稱為「光舍」（Abode of Light）。埃及壁畫描繪美好來世，不過這專屬於法老，也許還有他的僕人們。在特洛伊圍城中作戰的希臘人，除了希望流芳百世，對死後沒有任何期待：他們的亡靈可能作為影子留在冥界，但那頂多只是存在於幽暗之中。查拉圖斯特拉表示，任何遵守人間特定行為守則的人都能生生不息，而且靈魂很重要，此外他還主張有一位善神控制著世界。相反地，侍奉安格拉·曼紐的人，將受悲慘與黑暗的懲罰。這些善與惡、天堂與地獄的觀念，日後變得很有影響力。

舉例來說，早期猶太聖典（通稱《摩西五經》〔Pentateuch〕的《妥拉》〔Torah〕）完全沒有提到撒旦。惡是由花園裡的蛇作為代

表。死後，所有靈魂，不做區分，統統去往一個稱作陰府（Sheol）的地方。天堂與地獄並不存在。當猶太人在基督前五三九年被波斯王居魯士從巴比倫釋放，這點就改變了。在可能成書於那時的《約伯記》裡，撒旦是個強大的生物，能夠干預世界，讓無罪之人染上疫病——這和祆教信仰中安格拉·曼紐的行為如出一轍。天堂與地獄在基督前二世紀的〈但以理書〉中出現：「睡在塵土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幾世紀後，耶穌對撒旦的描述令人想起安格拉·曼紐；他說有位善神播種小麥，但神的敵人讓雜草在麥田滋生，只有到了末日，雜草才會與小麥分開，然後被燒毀。無獨有偶，直到希臘人遇到波斯人後，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才主張靈魂在死後受到賞罰，端看他們在世時做了什麼。宗教被根本地改變了。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尼采在回顧這些事件時，評斷「查拉圖斯特拉創造了世上影響最深遠的錯誤觀念——道德」。（因此，他寫了一本書，描述查拉圖斯特拉退還並廢除道德律法。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深受此書影響，更以此書名為一首交響詩命名：查拉圖斯特拉的名字便以此迂迴方式，繼續存在世界各地的演奏廳。）

拉雅和她的祆教同胞知道他們的群體小而脆弱。他們不時會遇到來自鄰居的貶低與敵意：拉雅的兄弟曾被一群男人丟石頭攻擊，咆哮罵他是「嘎掰」（gabr，對祆教徒的貶稱）。但值得安慰的是，他們知道是自己信仰中的觀念，形塑了那些惡鄰居的思維方式。

他們也能親睹一些祆教徒在很久以前留下且非常具體的成就。白色大理石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位於亞茲德西南方約三百二十公里處，城市的中心有座皇家宮殿於基督前六世紀完成——當時，波

斯帝國的版圖從土耳其西岸一路延伸至哈薩克的沙漠。據說，薛西斯（Xerxes）皇帝就是在此宮殿下令揮軍希臘，而亞歷山大大帝在基督前三三〇年征服波斯帝國，爛醉如泥之際，在亢奮的心情與報復心理的加持之下，毀壞了波斯波利斯。如今，大理石樓梯四周盡是散落的柱子遺跡、半毀的牆，偶有幾尊精美雕像（因當時被放在儲藏室而沒毀於大火）。某中世紀造訪者在其中一根柱子上題字發問：「有多少矗立地平線之間的城市 / 在夜裡破敗不堪地躺著，而其居民已入住亡舍？」直到今天，亞歷山大未曾獲得原諒。希坎達（Sekandar）這名字在喀什米爾（Kashmir）的穆斯林之間很常見，而在阿拉伯世界，亞歷山大被當作《古蘭經》提到的英雄人物雙角王（Dhu al-Qarnayn）。但在伊朗可就不同了，祆教徒仍稱他是「可憎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Accursed）。

作為紀念從前強大的波斯帝國的歷史遺跡，現在的波斯波利斯即便殘破，還是能教人留下深刻印象。根據西西里史家狄奧多羅斯（Diodorus）表示，它曾是「太陽底下最富裕的城市」。遺跡中到處都可以見到祆教的符號和象徵，尤其是鳥人「法拉瓦哈」

（fravahar）的圖騰。「我們建造的一切賞心悅目，」薛西斯在梯面上鏤刻的銘文中宣稱，「這都是憑藉阿胡拉·馬茲達的恩寵。」二〇〇六年帶我參觀這座宮殿的嚮導，是個頭戴希賈布頭巾（hejab）的年輕伊朗女子，而這些祆教符號並未阻止她以建造此宮殿的帝國為傲。她對於能向我解釋這道華麗階梯的含義感到特別榮幸；這個雕刻傑作有二十三個嵌板，每個嵌板分別代表帝國內的各個屬民。「二十三個民族，」她說，「看，這個代表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斯基泰人（Scythians）……」每個代表團都有獨一無二的特徵：阿拉伯人帶

來駱駝，亞美尼亞人帶來葡萄酒，斯基泰人帶來馬。所有民族都向波斯波利斯進貢，象徵他們接受波斯的霸權。在製作這些嵌板之前的幾十年間，波斯軍隊征服了已知世界的許多偉大王國——巴比倫、呂底亞（Lydia）、埃及。

主掌二十世紀伊朗的第二任、也是最後的巴勒維沙王（Pahlavi shah）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ed Reza Shah），在一九七一年於波斯波利斯舉辦了一場奢華的慶祝活動，紀念伊朗文明誕生兩千五百週年。出席的各國國王與總統，還有一位皇帝，享受兩千五百瓶葡萄酒、九十二隻孔雀，和古裝士兵遊行表演的款待，此外賓客們睡在特別為此活動而製作的五十二頂附設空調的絲綢帳篷裡，內部還配有大理石浴室。這場慶典的意圖在於激發伊朗民族自豪感，以取代宗教情感，因為沙王的伊斯蘭對手，譬如阿亞圖拉何梅尼，就是以宗教情感作為吸引支持者的基礎。這場慶典也提醒伊朗人，在伊朗人最了不起的時代，他們是受君主統治的子民。然而，慶典的鋪張浪費引起大眾反感，也導致沙王在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垮台。不過，即便在歷任阿亞圖拉的治理下，伊朗不曾忘記她的昔日帝國。當華納兄弟出品的電影《三百壯士》（*300*）歌頌希臘人在基督前四八〇年於溫泉關（Thermopylae）反抗波斯帝國軍隊，伊朗人勃然震怒。「三百槓上七千萬！」當時一家伊朗報紙頭條如此宣告——意思是七千萬的伊朗公民（幾乎全是穆斯林），因有人侮辱他們的祆教徒先民，在民族主義怒火之下齊心團結。

* * *

我在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的戰火平息後，被派到伊拉克南部的巴斯拉（Basrah）。沿巴斯拉南邊的海岸公路，傍著阿拉伯河（Shatt al-Arab，伊拉克河川在流入波斯灣前匯聚的大河口）行駛，我發現路上擺了一百尊人像，全伸出手指著水岸對面的伊朗，像是在提出指控。針對河口的領土爭議使兩伊在一九七〇年代處於幾近交戰的狀態，而後當伊朗世俗統治者沙王被推翻，阿亞圖拉何梅尼上位，爭議爆發成一場葬送百萬生命的戰爭。這些人像是海珊在戰後立起的，鼓勵民眾把伊朗、而不是自己的政府，視為敵人。每尊人像都是以戰死的伊拉克士兵為原型。

我知道造訪河口的另一邊絕非易事。就好像當波斯人還是祆教徒時，會儀式性地咒罵一切惡的超自然創造者安格拉·曼紐，伊朗的伊斯蘭政府組織示威遊行時，會讓抗議者誦念：「美國去死！英國去死！」對在一九七九年推翻西方撐腰的君主政體的伊朗革命分子而言，美國是「大撒旦」，英國則是「小撒旦」。不過，英國作為惡魔比美國、也比以色列更有歷史。有一本廣受喜愛的伊朗書籍《我的舅舅拿破崙》（*My Uncle Napoleon*），以認為英國陰謀無所不在的古怪老士兵為主角。該書背景設在四〇年代，老士兵的妄想症則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之初發生的事件，當時俄羅斯和英國在伊朗建立勢力範圍，並支配其經濟。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到來，何梅尼責怪英國在背後扶植他的政敵沙王——儘管沙王已經先斥責英國幫何梅尼撐腰。

（「如果你掀起一位毛拉（mullah，譯按：伊斯蘭教的宗教導師）的鬍子，」伊朗沙王曾說，「你會看到他的下巴蓋著『英國製造』的戳章。」）

二〇〇六年在巴格達工作時，我以為我可能有機會了。我在伊拉克總統舉辦的一次招待會上遇到伊朗大使，以相當破的波斯語自我介紹，然後唐突地轉換成阿拉伯語。他以為我是伊拉克人，於是友善地和我對話。他接著問我在哪裡工作——當我告訴他，我在英國大使館工作，他的臉部一陣扭曲，彷彿我有什麼傳染性疾病。他不再和我說話了；有人可能會看到他和我交談，而將此事回報給德黑蘭，毀了他的外交生涯。我猜想這不是請他簽發簽證給我的好時機。後來，我轉而透過倫敦的伊朗大使館申請（當時的倫敦還有伊朗大使館），接受了一次頗嚴峻的面試，然後出乎意料地拿到了簽證。英伊關係的短暫融冰肯定有幫助：在總統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領導下，改革派理論上依然當權。儘管如此，我還是預期在造訪伊朗時到哪都會被煩人的伊朗情報探員，以及惡名昭彰的「伊斯蘭武裝力量動員隊」（Basij）跟蹤。

兩伊邊界沿著阿拉伯河河口向北，穿越伊拉克沼澤，然後順著札格羅斯山脈（Zagros Mountains）的西部山脊一路延伸。因為邊界和這些自然屏障齊行，素來將兩大文化劃分開來：邊界以東，至少有三千年的時間，大多住著印歐民族；邊界以西則從過去到現在主要是閃族的居住地。伊朗人至今仍說波斯語，伊拉克人的語言則是阿拉伯語。「阿渣米」（Ajami），意為「波斯人」，在部分伊拉克地區仍是個貶低他人的用語，而在伊朗也不難遇到鄙視其阿拉伯鄰人的伊朗人。雙方在八〇年代打了一場使百萬人喪命的可怕戰爭，無疑讓關係更雪上加霜。

祆教傳統認為，人類歷史是循環的——某時代發生的事件，會在下個時代，以某種形式再次發生。毫無疑問，兩伊邊界早在八〇年代

之前，就一直是衝突的中心。基督前六世紀，波斯人在居魯士的率領下翻越邊界，一路向西，出征粉碎巴比倫和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王國，建立起當時在規模上前所未見的帝國。曾在溫泉關和希臘人作戰的大軍，在居魯士之孫薛西斯的指揮下，也跨越了邊界。不過，歷史上只有兩支軍隊跨越邊界向東前來占領伊朗。第一支是基督前三三一年由亞歷山大大帝率領的軍隊；第二支是穆斯林哈里發歐瑪爾在基督後六四二年派出的軍隊，而這支穆斯林大軍最終徹底征服波斯，並為波斯皈依伊斯蘭教奠定了基礎。（這兩群人碰巧都被今天的伊朗人罵得狗血淋頭；一名伊朗穆斯林被取名為居魯士〔Kouroush〕的機會大過歐瑪爾。）不管是羅馬人在與波斯人展開為時七百年的戰爭期間，抑或是曾和波斯人打了三百年仗的突厥人，兩方都沒能成功奪取現代伊朗領土的任何一部分。突厥人曾劫掠某伊朗城市一次，然後便撤退，而羅馬人曾抵達的最東邊，是個靠近巴斯拉的港口。圖拉真（Trajan）皇帝在那裡傷感地看著滿載印度香料的船隻靠港，希冀自己能搭乘其中一艘船，揚帆向東，走海路到印度，因為他已知道穿越波斯的陸路是條死路。邊界向來不單單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已。

我不想只是飛越這條具有歷史意義的國界，於是我前往土耳其東部，準備徒步跨境進入伊朗。就在正式跨境之前，我把美元換成伊朗里亞爾（rial）。國際制裁意味著在伊朗境內，我無法使用我的銀行帳號，我的信用卡也毫無用武之地，因此我得把可能需要的現金全帶在身上。他們能換給我的伊朗鈔票，其最大面額價值一美元，導致我最後得到滿滿一塑膠袋的紙鈔。我背著帆布背包，手拎這袋現金，朝伊朗邊境走過去。邊境掛著一個偌大的橫幅布條，展示滿臉怒容的何梅尼及其繼任者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瞪視行走在下方的民

眾，彷彿在對從自由的土耳其入境的那些人說：「在這裡，你必須拋開世俗主義。」

「歡迎！」在我踏上伊朗領土之際，有個聲音對我這麼說。它來自一名坐在椅子上的老人，似乎是部署在此的唯一邊界警力。他很高興看到一小群當地人之中有個外國人。我心想，他可知道，我來自

「小撒旦」？我緊張地用手指撥弄我的英國護照，一邊朝海關隊伍前進。我確定這裡的工作人員，看了我的護照後，會把祕密警察招來，然後祕密警察就會明目張膽地尾隨我到任何地方。但海關警察揮揮手讓我通過，另一頭也沒有邪惡的護送人員。事實上，我來到一處空蕩蕩的停車場，這裡沒有能讓我繼續上路的交通工具。看來我還沒達到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關注的等級。

我從機場航廈出來沿著路走。一名司機經過並對我大喊：「十個伊瑪目！」我聞言大惑。伊瑪目是對阿亞圖拉何梅尼的一個稱呼。不過男子接著停下車，從皮夾掏出一張一萬里亞爾的鈔票。紙鈔上印有何梅尼的照片。「十張這個，」他說，「載你進城。」我請他不要進城，而是載我到附近的一間老房子。它現在是間博物館，曾經屬於一位庫德貴族，他的接待廳以最經典的伊朗二十世紀早期風格作裝飾，有寶藍色百葉窗，以及貼滿閃爍的鏡面玻璃的牆壁。它建於一九一二年。當時的伊朗正經歷迅速的社會變遷，餐廳天花板上的兩幅畫說明了這點。在一幅畫中，包頭巾的族長用手從碗裡抓食物，而身旁留八字鬍、落腮鬍，戴黑色氈帽的一票男人也用手吃飯，或喝著茶。而在另一幅畫中，一名鬍子剃得乾淨溜溜的男人，身穿晚宴外套，舉起一杯葡萄酒，坐在他旁邊的妻子亦高舉酒杯。他們的賓客有男有女，做

時髦的歐洲時裝打扮。其中一名女人從肩頭瞅向另一幅畫中那些戴著氈帽的人。

這兩幅畫的創作發想是為了慶祝除舊布新的改變。事後想想，我們其實也可做不同解讀：那些看向傳統派的西化菁英頗有見地，因為包頭巾的族長最終將成功復仇。一九七九年一月，伊朗世俗統治者穆罕默德·禮薩沙王向革命分子的要求妥協，然後自主流亡。次月，長期批評沙王的何梅尼結束流亡，重返德黑蘭，而且迅速地奪取執政權。身為阿亞圖拉，他宣稱自己成立的新政府擁有神聖權威。他宣告：「執政的法學家的命令，就像真主的命令。」言下之意就是將他自己的命令等同於真主的。巴勒維王朝的兩任沙王曾大力幫助祆教徒，但在阿亞圖拉的統治下，執政當局越來越敵視非穆斯林，法律也被修改得對他們更為不利。

抵達最近的城鎮後，我去了烤肉店吃東西，隔壁桌的兩位伊朗穆斯林決定作我的嚮導。他們是兄弟檔。「來我們的村子。」他們說。於是我說好，希望能看看伊朗的家庭生活。我們開車穿越烏魯米耶湖（Lake Orumiyeh）附近的櫻桃園，車內音響播放著極度悲傷的伊朗音樂，我在路程中得知這對兄弟是亞塞拜然人。這個突厥民族在過去七百年間被伊朗同化。伊朗的這一帶還住著庫德人、亞述基督徒和亞美尼亞人，而儘管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語言，絕大多數人都說亞塞拜然語。到了村子，我的新東道主請我躲在座位下，以免被看見，因為他們不被允許款待外國人。「因為我是武裝力量動員隊的成員。」他們其中一人告訴我。我這才知道，我人在伊斯蘭武裝力量動員隊的手裡——好在不是以我所害怕的那種方式。兄弟檔供應我晚餐和一張床位過夜。我見到了他們的太太和年幼孩子們。我們全都一同用餐。

次日清晨，我坐在客廳鋪著的紅色羊毛地毯的地板上研究著地圖，發現自己離一處祆教景點不遠。於是，在兄弟檔偷偷把我載到一處公車站後（「繼續壓低身體！」他們在車子經過街上他們熟識的人時喊道），我搭上一輛公車，坐了一小段路才離開了城鎮，接著途經白雪皚皚的山巔，來到一座四面都是塵土顏色的陡峭錐狀丘陵。在爬至山頂的蜿蜒路徑上，有好幾對伊朗夫婦、一些年輕男孩，以及一位年長的男人。我跟著他們走。抵達最高處後，我們不約而同地向下凝視著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他們告訴我，這是「所羅門的監獄」（Zendan-e-Soleyman）。

* * *

猶太國王所羅門在《古蘭經》中的角色很搶眼，經文提到他能控制穆斯林稱為「鎮尼」（djinn）的隱藏自然靈。^[3]在《天方夜譚》的一則寓言中，有個漁夫打開了瓶塞上有所羅門的印記的罐子，一名「鎮尼」因此被釋放出來，向他訴說所羅門的作為：「為了懲罰我……（所羅門）要來了這個罐子，把我關在裡面，用鉛製瓶塞封住，然後在鉛塞蓋上至大聖名。」當地傳統顯然認為所羅門在「所羅門的監獄」也做了類似的事，將叛逆的靈監禁在萬丈深淵的峻峭火山口之中。

此地的自然靈很可能曾反抗過所羅門。伊斯蘭到來之前，這座火山是祆教最偉大且最重要的聖地。這可能是祆教徒獻祭的地點：希羅多德告訴我們，當波斯人想獻祭給阿胡拉·馬茲達時，他們會爬到高山上。他補充，他們還會「對太陽、月亮、土、火、水，以及風」獻

祭。我想像他們爬著我剛走過的同一條山路，因為攜帶獻祭用的羔羊或山羊一路登頂而筋疲力竭。四大元素中，有三個在此還隨處可見：風依然掃蕩平原，即便在春天，也帶來幾分寒意；土就在那裡，棕色而貧瘠；然後附近的一座湖泊依然湛藍美麗。不過火已消失。

希羅多德補充，波斯人排斥把神描繪成人形並供奉在神殿的常見做法：「他們沒有神的肖像，沒有神殿或祭壇，而且認為使用神殿或祭壇是愚蠢的。」不過，後來祆教徒倒是蓋起了神殿，或許是受巴比倫人和其他被他們征服的民族的影響，但他們的神殿不供奉神像，只放永生火焰。我從火山口邊緣向下望時，看見了史上最偉大的祆教神殿之一的遺跡。它建於近兩千年前，供奉著肯定令人們覺得十分神奇的火——火焰在火山底持續滲出的天然氣維持下永久燃燒。祆教徒稱這火為古什那斯普（Gushnasp），視之為波斯三大最神聖的火之一。

[4]

古什那斯普火又稱戰士的火，祆教傳統認為這火和世界一樣古老。波斯國王會在出征攻打羅馬人、以及後來的拜占庭人之前，前來參拜與獻祭。基督後七世紀時，波斯帝國已因連年戰事而國力空虛。波斯人某次西征直至埃及的成功行動，可說是波斯帝國的最後一搏。古什那斯普火在基督後六二七年，迎來最後一次的皇家參拜。此人名叫霍斯洛（Khosrow，譯按：即薩珊波斯帝國的霍斯洛二世〔Khosrow II〕），他出於絕望而前來參拜。他和他的軍隊被進逼的拜占庭人打得節節敗退，因為後者雇用當地的阿拉伯部落為傭兵。拜占庭人是對聖火不敬、惡名在外的基督徒，與其讓聖火落入他們手裡，霍斯洛選擇將聖火從聖祠中移走，隨身攜帶。十五年後，他的帝國陷落——不是落入拜占庭人之手，而是被伊斯蘭教整合成一體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不想和波斯軍隊正面衝突，他們怕後者在軍事交手中勢在必得。不過當阿拉伯人終於捲入和波斯軍隊的戰役，他們成功將對手擊退至尼哈旺德（Nihavand）。波斯人決定在此負隅頑抗。在偉大的波斯史詩《列王記》中，有對此場景的描述：一名衣衫襤褸的阿拉伯特使前來遞交最後通牒給波斯騎士們，他們個個穿戴華麗的黃金鎧甲，彰顯了他們的光榮與墮落。波斯國王之子魯斯坦（Rustam）觀測星象，預見了未來：「星象裁判我們的敗逃。／我們的名字將在四百年的時間／被遺忘然後變得默默無名。」落敗後，皇帝和宮廷殘餘勢力的確帶著宗教向東遁入中亞。祆教在中亞作為主要信仰，又多活了將近一個世代左右。但自尼哈旺德之役以降，伊斯蘭成為伊朗的國教。古什那斯普火再也不曾重燃。

關於伊朗人最早在何時拋棄祆教，眾說紛紜，但有些皇室成員似乎很早就成了穆斯林。皈依者會覺得，這個新宗教有些面向和祆教習俗頗為契合。譬如，兩個宗教都要求信徒每天祈禱多次（祆教徒三次，穆斯林五次），推崇潔淨，而且都以一套聖典為依據。不過，伊斯蘭提供祆教徒逃離祆教階層體系的出口。祭司和戰士位居該階層體系的頂端。較低階層的祆教徒由於無法接觸太多宗教知識，通常更快拋棄原來的信仰，而這也是祆教現今的信徒當中有很高比例的祭司家庭的原因所在。但特別的是，皈依者可以兼顧兩個宗教的傳統，採納穆斯林習慣，同時維持某些最主要的祆教傳統，像是過新年（諾魯茲節〔Nowruz〕）。諾魯茲節在伊朗至今仍是為期兩週的重大節日。我在造訪伊朗期間，看到很多伊朗家庭坐在戶外野餐，慶祝諾魯茲節的最後一天「擺脫十三」（Sizdah Bedar）。^[5]

無論伊朗人或快或慢採信伊斯蘭教，他們顯然不太能接受被阿拉伯人統治。在更西邊的許多國家，阿拉伯人的入侵徹底改變了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很多民族最後都開始自稱「阿拉伯人」，忘記了他們昔日的認同和語言。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是閃族人這點可能也加速了改變，他們的語言和阿拉伯語類似，更別說他們早已是拜占庭帝國的子民——對他們而言，阿拉伯人的征服不過是換來另一批統治者。

但對波斯而言就不同了。一支帝國民族如今淪為從屬。阿拉伯詩人賈迪（al-Ja' di）對波斯命運的不變提供了酸楚的描繪：「喔，波斯已被摧毀，波斯的居民顏面掃地：他們已成為替你牧羊的奴隸，彷彿他們的王國是南柯一夢。」祆教祭司對拋棄祆教皈依伊斯蘭之人的最惡毒侮辱，是罵他或她已「不再是個伊朗人」。阿拉伯人後來也開始對祆教起疑，經常譴責它為拜火迷信，猶豫是否要把對待基督徒與猶太人的寬容，沿用到祆教徒身上。

某位早期阿拉伯總督在征服伊朗不久後，對其穆斯林同胞警告說：「屠殺阿拉伯人——這是波斯人的信仰。」儘管阿拉伯人曾在布哈拉（Bukhara）嘗試藉由發錢給來禱告的人，以及強行安排自己人和當地居民一同居住，以傳播伊斯蘭教。即便如此，布哈拉還是一再造反，也出現一度皈依伊斯蘭教的人棄教的問題。征服伊朗時，時任伊斯蘭哈里發的歐瑪爾·伊本·哈塔卜（Omar ibn al-Khattab）被一名伊朗奴隸暗殺。即便在往後幾世紀，叛亂的精神持續不歇，特別是在叛亂團體於伊朗山區找到的避風港。譬如，在阿拉伯征服的兩百年後，有個名叫胡拉米亞（Khorramiyah）的團體及其領袖巴巴克

（Babak）在馬庫（Maku）以北活動，提倡重新分配財產和自由戀愛，而且對政府宣戰。此外，在十二世紀，有個自稱先知穆罕默德後裔所

建立的王朝，據守在一偏僻谷地中巍峨巨岩頂端的阿拉穆特（Alamut）要塞。他們從山區堡壘派出追隨者，又稱「阿薩辛」（Assassins，譯按：中古時期的穆斯林異端教派，以祕密的暗殺組織聞名，英文中的刺客便是由該教派之名而來）」，去殺害彼時統治伊朗的政府要員。該王朝的某人宣布廢除所有宗教律法：「過去禁止的，現在合法了，」他說，「過去合法的，現在被禁止。」

伊朗在那時候以遜尼派為主，而非什葉派，直到十六世紀才變成以什葉派為主。然而，這個倒下的帝國最後信奉了根深蒂固認為世界什麼都不對（萬物的真實秩序已被顛覆）的一種伊斯蘭版本，似乎不僅僅是巧合。什葉伊斯蘭相信十二伊瑪目，他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全都是穆罕默德家族的後裔；什葉派堅持的其中一個觀點是，伊斯蘭統治者必須來自先知的家族）。這些什葉伊瑪目中，唯有第一位伊瑪目（譯按：即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被多數穆斯林接受，而他們當中很多人的死亡都被信徒指控為謀殺。這使什葉派打心底蔑視世俗政府，並由衷盼望十二伊瑪目的最後一位有天會以麥赫迪（Mehdi，等同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彌賽亞）的姿態歸來，迎接世界末日。伊朗中世紀的統治者，總是在馬廐為麥赫迪備好一匹馬，好讓他回來時能騎乘。

在思考什葉派這個信仰的時候，我忍不住把它拿來和小調音樂做比較，就像當天稍早我從汽車音響聽到的難忘伊朗歌謠。第十二伊瑪目的輓歌的旋律，對任何祆教徒而言，可能都似曾相識——那是渴望恢復舊秩序的樂音。根據傳說，麥赫迪將為古代波斯皇的後代。尚未皈依伊斯蘭的獨立波斯王國（譯按：即薩珊王朝），其末代皇帝之女舍赫爾巴努（Shahrbanu），據說嫁給了先知穆罕默德之孫胡笙：倘若

此事為真，在這之後的所有伊瑪目將不只是先知的後裔，還是波斯王族的後裔。也許這故事有助於爭取渴望舊秩序的伊朗人對伊斯蘭的支持。

《阿維斯塔》也預言一位彌賽亞——蘇什揚特（Saoshyant）——將在最後戰役率領善的軍隊。最後戰役結束後，世界末日降臨，死者將復活。這個祆教概念貼切地符合祆教徒認為世界乃善惡勢力之戰場的信仰，其形成年代似乎比猶太人的彌賽亞信仰或穆斯林的麥赫迪信仰還要早。有些學者認為，猶太教和伊斯蘭受祆教的救主信仰啟發，但其實歷史人物死後復生拯救同胞的觀念，可能吸引認為昔日榮光比今日來得更為閃耀的任何社會。在後來的傳說中，伊朗東南部一座大湖據傳藏有查拉圖斯特拉的種子，能為世界再帶來七位像他一樣的先知，每一位都為世界帶來更高的智慧。這概念被一些穆斯林團體採用，他們有時暗示穆罕默德就是第七位先知。從伊斯蘭脫離另立門戶的團體則宣稱，穆罕默德僅是第五或第六位先知，他們的創立者才是第七位。

阿拉伯阿拔斯帝國對伊朗的控制，在九世紀和十世紀日漸鬆動，地方王朝掌控了國家部分地區。而贊助伊朗民族史詩《列王記》書寫的正是其中一個地方王朝，名為薩曼（Samanids）。史詩作者費爾多西（Ferdowsi）理論上來說是穆斯林，可是詩裡飽藏諸多祆教觀念。舉例來說，它訴說的伊朗民族歷史，以對抗安格拉·曼紐的戰役作為開場。詩人可能也因為使用波斯語，促進了波斯語的保存。伊朗從不曾採用阿拉伯語作日常交談用的語言，而且持續自豪地浸淫在獨特的波斯文學中，尤其是豐富的詩歌全集。

我從「所羅門的監獄」出發前往伊朗最有什葉派伊斯蘭特色的城市。庫姆（Qom）有伊朗最重要的聖祠和神學院，穆斯林神職人員在此受訓。城裡的聖祠繞著第八伊瑪目妹妹的法蒂瑪聖陵（Fatimah al-Maasoumah）建造。庫姆的重要性不如伊拉克的納傑夫（Najaf）和卡爾巴拉，這兩個城市分別葬有先知的女婿阿里和孫子胡笙。然而，對伊朗朝聖者而言，前往庫姆的旅程相較沒那麼費力，於是庫姆變得相當受歡迎。聖祠的綠光照亮我們停車的停車場，我看見有虔誠的朝聖者在停車場的空位搭帳篷，只為盡可能地靠近聖祠。今晚我希望能下榻一間能鳥瞰廣場的飯店，不過飯店接待人員帶我看過房間後，叫我別住下來。「這裡太貴了，」他私下跟我說，「你應該去住我朋友加罕吉爾先生（Mr. Jehangir）那邊。他超愛接待客人！」他撥了通電話，確認這位神祕的加罕吉爾先生能供我住宿一晚，然後告訴我如何與這人碰面。我走過一連串的小路和巷弄，才找到了加罕吉爾先生的地下公寓。

原來加罕吉爾先生是剛取得資格的什葉神職人員，不過他並未穿著神職服裝。他帶我進到家裡後，把我介紹給坐在地板上的三個朋友（他的太太戴著白色面紗，端莊地坐在後方，但他剛開始學步的幼女就沒那麼克制了）。他們就讀庫姆的一間神學院，分別位於不同的神職學習階段：他是他們當中最資深的，自豪地把他包著謝赫白頭巾的照片給我看；謝赫是給達到一定宗教學習等級、但沒有黑頭巾賽義德（sayyid，指先知的後裔）榮譽的人的頭銜。這些神職人員問了我好幾小時關於英國的問題——不過比較是關於社會，還有如何取得簽

證，多過政治。我們的談話直到約凌晨一點才結束。然後，當我躺在附近一張床墊試圖入睡之際，他們繼續在筆電上又敲敲打打了大概一個小時。早上五點，他們起床禱告。我和他們一起起床——睡眠惺忪，但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準備讓這些在校生帶我去參觀、認識伊朗頂尖的神學院。

他們首先帶我遊覽聖祠。金色圓頂和閃閃發光的新鋪藍瓷瓦片說明了聖祠廣受支持且資金充足。非穆斯林不得入內，但我的同伴們要我進去。他們去禱告，我則站在一旁等他們，並看著信徒成群湧入聖祠。禱告回來後，他們說還要帶我參觀另一個地方。我們排隊離開清真寺，沿著一條林木夾道的街走到一間很大的神學院。這間神學院很特別：它是阿亞圖拉何梅尼曾經求學的地方。兩層樓的拱廊環繞著神學院寬闊且蓊鬱的庭園，建築上方有何梅尼的照片坐鎮著。我的新朋友们帶我到曾是何梅尼小臥房兼書房的房間，然後他們像西方人聽到國歌播放般立正站好，尊敬地凝視簡樸的傢俱和牆上的何梅尼照片。我不明所以地感到坐立難安。何梅尼以專斷統治者的姿態抗拒財富和權力的誘惑，展現出了不起的剛毅。然而，他絕非伊朗祆教徒之友，他們曾在何梅尼推翻的世俗君主政體下欣欣向榮。

我們在神學院庭園坐了良久，一名包著黑頭巾的賽義德和一隻黑貓緩緩走過，彷彿走在一場莊重的遊行隊伍中。加罕吉爾先生的友人之一告訴我，他曾期待能到這間神學院就讀。首先他得通過入學考，而他受測的核心科目之一會是柏拉圖的哲學。在神學院，他將研讀亞里斯多德，參加透過和其他同學辯論來學習的輔導課（這個技巧本身類似於希臘哲學家的技巧）。距離我自己念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已經過了好多年，我真沒料到它們對阿亞圖拉何梅尼的後輩學人

會是有用的入門知識，因為我的朋友們後來就是成了他的後輩。這當中帶有一點歷史諷刺：啟發歐洲啟蒙運動的古典哲學家，受到伊朗反動神職人員的追捧？雅典學院的柏拉圖和亞歷山大大帝的導師亞里斯多德在波斯廣受歡迎——但波斯可是雅典和亞歷山大著名的敵人啊！

不過這是我的無知。我後來得知，惹人厭的亞歷山大大帝確實給波斯人留下了愛好希臘文化的遺產。伊朗在基督前一世紀的安息帝國統治者對希臘戲劇著迷不已。（不幸的羅馬將軍克拉蘇在哈蘭遇害後，他的頭被獻給皇帝，當作歐里庇得斯（Euripides，譯按：希臘悲劇三大家之一）的《酒神的女信徒》（*Bacchae*）的舞台道具。）此外，希臘科學在波斯備受尊崇，即便在西方世界採納更新的觀念後，波斯人還是繼續追隨希臘人。直到十九世紀，波斯醫生仍會按照二世紀希臘醫生蓋倫的診療方法，分析病人的體液。（如今在伊朗已不再有人行使提補—優納尼（Tibb Unani，在阿拉伯語中意指「希臘醫學」），不過它仍存在於印度。）伊朗神職人員在二十世紀初學習的天文學，還是二世紀希臘科學家托勒密的天文學。有個名叫艾哈邁德·卡斯拉維（Ahmad Kasravi）的男人曾想從事神職而就讀神學院，結果成為現代伊朗重要的反教權主義作家——他對什葉派伊斯蘭教的幻滅，不是因為《古蘭經》，而是他從托勒密天文學中看到的錯誤。

因著這份對希臘知識的愛好，當柏拉圖學院（Plato's Academy，這裡首先教導學生柏拉圖的哲學，然後是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的最後異教成員於基督後六世紀被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

（Justinian）驅逐，波斯人提供他們庇護。這些人被安置到貢德夏普爾（Gundeshapur），加入同樣遭拜占庭帝國驅逐的宗教弱勢團體的學者們；波斯人後來又帶了中國和印度的學者加入他們。貢德夏普爾變

成一所了不起的大學，課程包括希臘文、梵文和漢文文本。大學的附設醫院是該區域最棒的醫學中心，醫生甚至在那裡為人做體檢（在當時是驚人的創新之舉）。拜占庭的不寬容，給波斯帶來收穫。

何梅尼在神學院一定讀過柏拉圖。事實上，他認為伊朗應該由「學問最淵博的神職人員」治理的想法，不僅和傳統什葉派認為政府本質為惡的觀點有顯著的不同，而且在《古蘭經》中也是找不到的。他對國家的想法可能是人世間最接近柏拉圖理想的觀念，也就是後者在《共和國》所描述，一個由「最有智慧的哲人」治理的國家。何梅尼總是否認他的想法和柏拉圖的關聯，不過他贊同柏拉圖，而且曾說他覺得柏拉圖「不錯」。

* * *

我從庫姆出發，經過了美麗且充滿驚奇的伊斯法罕（Esfahan）。這座城市的中央廣場可兼作馬球場，有座以藍色彩瓷為外觀的清真寺更是世上最美建築之一，而藝術家在市集裡細心地彩繪有戀愛場景和詩人圖像的瓷器盒。我還去了伊斯法罕南邊的設拉子（Shiraz）；一八四〇年代這裡出了個保守的穆斯林賽義德阿里·設拉齊（Ali Shirazi），他在被當局以酷刑處死之前，曾因自稱麥赫迪而贏得了十萬追隨者。當局視他為褻瀆者。他的追隨者，包括祆教徒在內，宣稱他也是蘇什揚特。他們叫自己「巴比」（the Babis），因為設拉齊是「巴孛」（Bab），意為通往真主的神祕大門。英國學者艾德華·布朗（Edward Browne）在一八八〇年代晚期訪問伊朗，後來成為最偉大的伊朗西方專家之一（至今仍是唯一一位在現代德黑蘭有街道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英國人）。他深入伊朗社會，成為破解伊朗人暗碼的能手——像是伊朗男人抽水菸吞雲吐霧時用的密碼，每一連串的吐煙都代表一個字母。儘管身懷絕技，又渴望會見「巴比」，以詢問他們有關信仰的問題，他卻突破不了他們用以包裹自己、躲藏起來的保密原則。他每次找上可能與他談話的對象，對方都宣稱自己是個正統穆斯林。

「巴比」顯然在這段時間持續觀察他，因為他們最終決定他是可以信任的。「『朋友』無所不在，」一名巴比在向他揭露自身的宗教傾向後對他說，「儘管迄今為止，你總是沒有成功找到他們，而最後終於有機會遇到他們時，一切似乎純屬意外，如今你已有了頭緒，你之後不管到哪裡都會見到他們。」他得知他們的習俗，其中某些習俗顯示出鮮明的祆教特色：巴比男人只娶一妻；巴比女人不戴面紗；巴比採用新的禁食方式取代齋月，並在諾魯茲節準備期間就展開。保密情有可原：伊朗的十九世紀政府屠殺了數千名巴比，然後役使他們的妻子為奴。巴比的宗教最終蛻變成巴哈伊教（Baha'ism）。近年來，巴哈伊領袖們淪為階下囚，信徒受系統性恐嚇騷擾，不得進入政府公職，有時更會被以背叛伊斯蘭為由逮捕。自伊斯蘭革命起，已有兩百名巴哈伊教徒被殺害。

設拉子是伊朗詩歌經常讚頌的城市，特別是在十四世紀的哈菲茲（Hafez，伊朗國民詩人，不過他的作品精髓經常在翻譯中流失）的詩歌裡。「當北風吹起，來設拉子吧！／那裡保存著加百列天使的和平／他是設拉子至寶之主／埃及珍寶的光環將褪色，再無人知曉／因吾國山川勝景的氣息教它無地自容。」哈菲茲的《詩頌集》（*Diwan*）是每個傳統伊朗家庭都有的兩本書之一，另一本當然是《古蘭經》。

他在設拉子的墓是個朝聖地。我曾看見一名年輕男子跪在墓前，安靜地禱告，停留良久，與此同時還有好幾名女人站在附近，低頭鞠躬。也許他們致敬的、思念的不僅是哈菲茲，還包括他所宣揚的那個充滿活力且開明的文化：「萬歲，蘇非行者！葡萄酒愛好者，萬萬歲！葡萄酒據告可解世界的渴。」

哈菲茲的詩歌很常談及葡萄酒。虔信者對此感到難堪，因為伊斯蘭禁止葡萄酒，而哈菲茲又是伊朗穆斯林最喜歡的詩人。於是他們把葡萄酒的詩句詮釋為心靈愉悅的隱喻。以此詮釋為基礎，就連何梅尼都寫了一首詩宣告：「打開酒館的門吧，讓我們日日夜夜上酒館。」不過，經營哈菲茲酒館的是祆教祭司馬吉。誠如哈菲茲在其中一首詩中所言：「昨夜我把麻煩攤在老馬吉面前， / 他能快速審視幫我解決問題。 / 我看到他快樂地笑，手裡拿著一杯葡萄酒。」哈菲茲詩中的葡萄酒，顯然意指祆教藉飲用葡萄酒與神溝通的信仰。葡萄酒在祆教禱告儀式上，是擺在祭司（有時也稱作馬古斯〔Magus，譯按：複數名詞「馬吉」的單數型態〕）面前的創世七果實之一。在祆教的傳說故事中，查拉圖斯特拉給聖王維緒塔斯帕（Vishtaspa）喝葡萄酒，酒力使他迷幻出神。在出神狀態下，維緒塔斯帕登上天堂，一瞥了神的榮耀。希羅多德說，波斯人做任何決定前都要考慮兩次——一次在清醒時，另一次則在喝醉時。因此若他們在清醒時做了一個決定，他們接著會喝醉，看看那是否仍然是個好主意。如果仍是，就放手執行。第一次讀到這個說法時，我把它當作笑話——但其實滿有道理的。如果葡萄酒能賦予特別的神祕洞察，那麼做決定前先喝醉似乎是個好主意。而且幾次不好的經驗，也應該會讓人學到在清醒時就先把該做的決定想清楚。

前文引用的詩句，只是哈菲茲寫作中祆教思想滿盈的例子之一。難怪有一名叫做霍斯洛的祆教徒會想向哈菲茲致敬。當他看到獻給詩人的早期紀念碑變得破敗，便試著在詩人的墳墓周圍建一座新的。那是一八九九年的事。後來有位當地穆斯林神職人員率暴民，破壞這座由祆教徒興建的紀念碑，終使這份心血化為烏有。詩人的穆斯林仰慕者後來又重建了一座華麗的墓碑。我站在新墓碑的石柱旁心想：哈菲茲的馬吉如今在何處？就在我納悶的同時，一位衣衫襤褸的托鉢僧走過我身旁，開始繞行紀念碑七圈。這是個古老的祆教習俗。但這位尊者除了棕袍和高圓帽，還穿著一件綠肩衣。綠色是伊斯蘭的顏色。他是個穆斯林，而不是祆教徒。伊朗深受蘇非主義的影響，有些蘇非行者以繞行墓碑表示對死去聖人的問候。當然，在墓碑前禱告或坐在墓碑旁咖啡館的年輕男女，他們當中可能有些人是祆教徒。但我不那麼認為。哈菲茲的馬吉，老早就關閉他們的酒館了。

我有信心能在一個地方找到祆教徒：亞茲德，也是拉雅的出生地。不過我得先穿越一百六十公里的沙漠，經過凹凸不平的岩石山脊和大片沙塵地，然後才會抵達亞茲德綠洲。迎接我的到來的，是名為塔克謁（tekyeh）的偌大磚瓦尖拱建築，它高達幾層樓、以淡藍色和奶油色的伊朗釉陶作裝飾。一旁還可以看到以柳條編織而成的大轎納哈爾（nakh1）。紀念阿里之子胡笙之死的什葉派受難劇，每年在此上演；胡笙在什葉派眼中是第三位伊瑪目，在與遜尼派穆斯林對手的戰役中殞落。

布朗來到亞茲德，並描述了他的欣喜之情：他「經過好長一段時間，才成功使自己脫離英國同胞與同信仰之人」，而且被誤認為是個祆教徒。他陳述祆教族群「如今不像過去那樣容易被外人騷擾」，但

他們「往往被較狂熱的（穆斯林）欺壓與侮辱，這些人把他們當作異教徒」。他補充，如果在位的地方行政長官不是好人，或者根本沒人負責主管地方，他們的遭遇會更慘。

布朗遇見祆教徒的時候，他們的命運正逐漸好轉。儘管祆教的觀念所帶來的影響無所不在，他們在整個中古時代和中古之後的處境都相當艱苦。一八五四年造訪伊朗的曼納克吉·林姆吉·哈塔里亞

（Maneckji Limji Hataria，譯按：十九世紀印度裔祆教學者，終生為伊朗的祆教事業奮鬥）寫道：「我看到的祆教徒筋疲力盡、遭人踐踏，這世上沒有任何民族比他們更悲慘。」祆教團體當時得繳交強加於所有非穆斯林的吉茲亞人頭稅（jizya tax）。祆教徒也沒有在法官面前提供對穆斯林不利證詞的權利，導致遇到土地或貿易糾紛時，處境相當不利。除此之外，他們深受所謂「祆教徒最後一次被強迫大規模改宗伊斯蘭」的事件衝擊——一八五〇年代，一群暴民攻擊某座村莊，威脅其居民若不皈依就會被處死。哈塔里亞來自帕西人家庭，是一千年前離開伊朗前往印度北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祆教難民後裔。帕西族群起初指望從伊朗得到宗教領導，但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它越來越壯大富裕，所以哈塔里亞來到伊朗是為了有所貢獻而非接受協助。他和他的帕西同胞送錢給伊朗境內最窮苦的祆教徒，成立現代學校，並在一八八二年幫忙說服伊朗政府廢除吉茲亞人頭稅。

亞茲德祆教徒的處境很快就有了更多的改善；一九〇六年後，當憲法改革迫使君主政體接受一套自由化的措施，包括成立議會在內，一名祆教徒獲選進入新機構。君主政體不久後重申權威，但最終被禮薩汗（Reza Khan）的獨裁統治取代。禮薩汗採用了沙王的頭銜，創立巴勒維王朝。儘管經歷這些政治變遷，祆教族群在接下來的七十年持

續茁壯。祆教徒進入政府機關，而且同胞法恆·梅爾（Farhang Mehr）甚至成為了副總理。他們經商特別成功，導致越來越少人成為祭司。畢竟祭司的薪水微薄，還得花大把時間學習以古阿維斯陀語（可能要好幾年才能學會的古語）書寫的文獻。拉雅的父親——那位站在自家屋頂觀察星象的祭司——告訴她的兄弟們，若想脫離貧困生活就去當醫生，不要當祭司。其他祆教徒顯然感同身受。一九三〇年代的亞茲德有兩百位祭司，但到了一九六四年時，只剩下不到十位祭司。

拉雅的父親以巡迴傳道者和小販工作勉強掙得微薄收入，而他不僅是祭司，還是詩人和思想家，相當熱衷當時在伊朗傳布的新觀念。禮薩汗在一九三〇年代下令禁止伊朗人戴頭巾，拉雅的母親於是想阻止她去上學——因為儘管她們不是穆斯林，她對一個女孩在公共場合的穿著仍有自己一板一眼的看法。不過拉雅的父親堅持她應該繼續上學。當拉雅選擇將來要當個助產士，他支持她，儘管這份職業會頻繁接觸人血——這在重視儀式上的潔淨的宗教裡是禁忌——在她的兄弟介紹她認識沙赫里亞爾（Shahriar），而她決定嫁給對方時，他也支持。

這種追求方式很傳統：在和未來丈夫初次見面時，拉雅在母親與姊妹的陪同下出席，而且沒有直視他的臉。她得問姊妹對方長得什麼樣子。後來，她終於在第三次約會看電影坐在一起時，偷瞄了他一眼。她希望對方會因專心看電影而沒有注意到她從旁偷看。她對他的樣子很滿意，於是同意嫁給他。拉雅一家那時已經搬到德黑蘭，但拉雅和沙赫里亞爾婚後偶爾會回亞茲德，去他們家在山上的一間小屋；他們把房子的地出租給當地農夫，換取一年份的杏仁和水果。在巴勒

維王朝兩任沙王開放伊朗社會之際，很多祆教徒都像拉雅家一樣，跟隨趨勢搬到德黑蘭。拉雅的兄弟再也沒聽到別人罵他「嘎掰」——他後來在伊朗空軍當軍醫。沙赫里亞爾是一名軍官，後來獲頒英勇勳章。自尼哈旺德一役之後，祆教徒終於能為伊朗而戰。

我在二〇〇六年沒看到任何一戶亞茲德人家屋頂上有祭司站在上面。起初，我連一點祆教的蹤跡都覓不著。大街小巷的燈柱上都貼著訃聞，逝者照片上方有個代表阿拉伯穆斯林標語「畢斯米拉」

（bismillah，奉真主之名）。不過在某個街角，我發現一張有著不同標語的啟事。它以波斯文宣告：「奉阿胡拉·馬茲達之名（Ba nam-e-Ahura Mazda）。」下方則是鳥人符號——一個人戴波斯帽，左右兩側和下方長著翅膀。我在波斯波利斯看過同樣的符號。原來祆教徒在這裡。街邊一家雜貨店以幾張圖片作為裝飾。如同中東基督徒把聖喬治或聖母馬利亞變成壁畫，穆斯林展示麥加聖祠或（在伊朗展示）胡笙的照片，這間雜貨店以查拉圖斯特拉和法拉瓦哈的照片作為布置。他們被貼在櫃檯玻璃、收銀機，還有店面的牆壁上。此外，在這條街的盡頭，甚至有間賣祆教紀念品的商店。我思索著要不要添購一面有祆教格言的時鐘，它以波斯文寫著「善思、善言、善行」。

商店對面有一間火廟，藏身在一座小花園後。我獲准入內，進到乾淨的小房間：在一面玻璃窗後，我可以看到一盞微小火焰正在燃燒。房間牆上有張查拉圖斯特拉的照片，照片旁則是幾段祆教聖典的節錄經文——提醒訪客，祆教徒們也有一本聖經，而一本聖經，搭配一神信仰，便是傳統上足以獲得伊斯蘭政府寬待的先決條件。《古蘭經》對有經人的評價很高，在伊朗，祆教徒也被當作有經人。不過，伊朗政權嘲笑祆教徒對火廟裡的聖火懷抱敬意，聲稱他們「崇拜

火」。祆教徒否定這項指控，表示他們不認為火是神，而是透過火來崇拜神。我問聖殿的管理者，亞茲德還住著多少祆教家庭。非常少，他回道。生活艱難：經濟差，政府不友善。我後來得知，伊朗全國上下的祆教徒人數，自伊斯蘭革命後，從三萬三千人減少到一萬人（這些是約略數字，因為準確的統計數字並不存在）。

參觀完火廟後，我的下個約會對象是往生者，或許還滿順理成章的。在城的另外一邊，有些廢墟高塔居於兩座黃塵滾滾的小丘上。這些遊客口中的「寂靜塔」，在祆教徒之間稱作「答赫馬」

（dakhmas）。在通往山丘的路上，有位年輕人駕著一輛越野型沙灘車疾駛狂飆。這條路在過去是祆教奔喪隊伍所走的路線。往生者的身體將躺在家屋三天，讓狗在附近嚇止惡靈。然後大體被放到鐵床上，由特別為此任務受過訓練的男人抬著，沿此路登頂進入「答赫馬」。停屍架的護送者將在此對死者說話：「莫懼怕，莫顫抖！這是你的先人的地，是吾等父母的地，這裡純潔而良善，千秋萬歲。」

「接下來，」希羅多德在描述此儀式的段落中寫道，「關於他們死者的傳聞說法，是不為人知的謎團，不易理解。也就是，波斯人的屍體必須在被鳥或狗撕裂後才能下葬。」事實上，屍體被暴露在野外，直到被鳥或狗吃乾淨為止。鳥類通常是烏鴉或禿鷹，能在幾分鐘內把屍體吃得乾乾淨淨。這個習俗幾十年前在伊朗已被拋棄，而且人們顯然出於自願。不過印度的帕西人仍實踐此習俗。這個做法的歷史可能比祆教徒早上好幾百年。在土耳其的加泰土丘（Catalhuyuk）有個活躍於基督前八千年的人類聚落被發掘，其中有一些考古證據顯示，死者的屍體在下葬前可能受風吹雨淋。

我爬上最靠近路邊的「答赫馬」，從它的牆俯瞰，發現下方正在進行一場祆教葬禮。由於「答赫馬」今天已不再為人所使用，送葬隊伍的目的地是附近一處墓園。在這裡，屍體被封進石頭和水泥裡，以免污染土壤。葬禮結束後，參與者會回家用公牛尿液洗淨自己。（公牛尿液的氨含量使它成為不錯的消毒劑，而且儲藏多年之後，氣味已明顯散去——這樣正好，因為祆教徒有時候得飲用它，譬如在成年儀式上，不過容易作嘔的人如今用石榴果汁取代尿液。希臘史家普魯塔克在基督後一世紀提過這儀式，因此它肯定相當古老。）

我嘗試想像人若在日常生活中看見宇宙力量的碰撞，會是什麼感覺。我認為所有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區分純潔和污染。很少人會自在地買下一間有人慘死在內的房子。我們之中也沒有人會喜歡搭機時旁邊坐著一具屍體。科學家發現當人遇到不道德之事，會引發像是實際作嘔的身體反應。確實，罪和不道德經常被以不潔的術語來描述

（「無原罪」〔immaculate〕字面意義是「未被玷污的」）。祆教徒相信，世界上的污染是被一個活躍的、帶有惡意的超自然力量所創造的，因此潔淨有一種道德力量，而墓地的不潔必須嚴肅對待。一個善良之人的死，代表安格拉·曼紐及其追隨者的大勝，而且會導致埋葬處尤其不潔。屍體會吸引屍魔「納蘇」（nasu）前來。在「答赫馬」的周遭遊蕩絕不是祆教徒對假日出遊的想像：對他們而言，那裡是超自然力量在人世間帶來嚴重污染的地方。

我從「答赫馬」廢墟搭車回到亞茲德市中心。「祆教徒是善良的民族，」司機哈珊（Hassan）說。哈珊是個虔誠的穆斯林，紫色上衣彰顯其教徒身分。他告訴我，今天是一位伊斯蘭殉道者的紀念日。

「伊斯蘭經由戰爭進到伊朗，」他說，「來自阿拉伯人。但在那之

前，我們都是祆教徒。」年復一年，像哈珊一樣的人紛紛在慶祝晝開始比夜長的春分「諾魯茲節」（在祆教徒的觀念中，這代表善勝過了惡）之時，回想起他們的文化遺產。現代伊朗的諾魯茲節為期兩週，對照祆教徒本身安靜且宗教性質更濃厚的儀式，穆斯林在這段時間裡興高采烈地大肆慶祝。在桌上擺放創世七果實，是兩個族群共通的習俗。創世七果實對應的是七美德和七大行星。對祆教徒而言，果實包含了葡萄酒、牛奶、水、發芽穀類，以及胡頹子屬的漿果和甜點；一面鏡子和多枚硬幣也能端上桌，前者代表未來，後者代表繁榮。伊朗穆斯林則常用小麥、蘋果、蓮花果、蒜頭、一種叫「蘇瑪克」

（somalak）的香料、一款叫「撒麻努」（samanu）的布丁，還有醋。有個稍微次要的節日「紅色星期三」（Charshanbeh-e-Suri）在諾魯茲節前舉行，這個節日的儀式包含跳火，而穆斯林也會參與。伊朗宗教權威一直試圖停辦諾魯茲節，何梅尼在二〇一〇年也試著全面禁止「紅色星期三」，理由是這些慶祝活動「和伊斯蘭毫無關係」。不過哈珊和全國各地的許多伊朗人，雖然很多都是虔誠的穆斯林，卻不把他的禁令當一回事。我完全瞭解。這活動樂趣十足，深植社會、不可動搖，而且極富伊朗特色：唯有曾受伊朗影響的文化才會慶祝這些節日。

* * *

二戰後，拉雅的軍官丈夫沙赫里亞爾被派去伊朗西北部（也是我入境伊朗的省分，靠近「所羅門的監獄」）和受蘇聯支持的叛亂分子作戰。他在作戰時負傷，被丟在戰地等死。當他終於被發現還活著，

然後送醫救治時，他已失去了視力。沙王為他授勳，並送他到英國接受治療。戰爭退伍軍人的慈善單位認領了他，教他使用點字系統，並幫助他找到電話接線員的工作。那時的英國沒有很多祆教徒：他們的女兒莎殷（Shahin）在學校唱基督教聖歌長大（「父親想要我們融入。」她告訴我），而且只能靠談論聖經三賢士，為困惑的同學們解釋她過去信仰的宗教。

儘管人數不多，而且不太有人知道，祆教徒已是一個發達且有影響力的族群。過去，英國人在他們的印度帝國，向來偏好帕西祆教徒勝過其他團體；一位十九世紀的板球評論員在一八八七年某祆教板球俱樂部參訪英格蘭後寫道：「他們是散布在我們印度領地中最聰明、最忠誠的種族。」祆教板球選手（其俱樂部成立於一八五〇年的孟買）的回應倒是不乏批評。他們抱怨英格蘭很髒，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令人震驚：「男人女人長期骨瘦如柴，已幾乎不成人形。」

不過，英國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而印度最大的幾個貿易家族就是帕西人；他們當中有些開始在英國落地生根。事實上，第一個進到英國議會的印度人，是帕西人達達拜·瑙羅吉（Dadabhai Naoroji）。他在一八八〇年代幫助成立了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該黨最終成為印度獨立後的執政黨。聖雄甘地曾稱瑙羅吉是個「鼓舞人心的人」。日後的巴基斯坦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ed Ali Jinnah）曾擔任瑙羅吉的助手。當時，由於印度沒有自己的議會，瑙羅吉在英國議會做代表。他被選為倫敦北部郊區芬斯伯里公園（Finsbury Park）選區的自由黨候選人，參加一八九二年的大選。他勝選的機率不大：保守黨首相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有句名言，他說他對一個「黑人」能被選進英國議會一事

感到懷疑。此外，當時有家報紙攻擊瑠羅吉的宗教信仰，譴責他是拜火者。

因此，當瑠羅吉最後以微小差距獲勝，他的支持者組成代表團，大老遠從印度前來看他宣誓就職。此時距離議會終於接受非基督徒，只不過過了短短幾年而已。於是在預定宣誓就職的那天，瑠羅吉以唯一的印度人身分，站在一排戴高禮帽的維多利亞紳士當中，在下議院裡排隊等候。他口袋裡帶著一本祆教的《阿維斯塔》，打算以此進行宣誓，而不是用《聖經》。幾天後，他緊接在格拉斯頓和貝爾福

（Gladstone and Balfour）兩人後面發言辯論；他警告英國，對印度人民的不公將終止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他擔任了三年的議員，但不曾有歸屬感，也曾談到他發現自己陷入了「奇怪的處境」。在印度獨立之前，英國總共選出過三位祆教下議院議員（獨立後就再也沒有了——不過英國上議院現在有個帕西人）。英國祆教族群的規模向來很小。一九八〇年，他們的總人數為兩千人。

出於對新伊斯蘭政權的恐懼，拉雅和沙赫里亞爾在過去二十五年，從沒回過亞茲德或德黑蘭。他們成為新一波遷居英國的伊朗祆教徒的良師益友。英國祆教徒人數在一九八〇到二〇〇一年之間，增加一倍，從兩千變成將近四千——既有帕西人，也有伊朗人。二〇〇四年，祆教徒自己估計他們在美國有一萬人，在加拿大則有五千人。伊朗國內的人數下降，不過官方統計並未反映此趨勢，因為無論祆教徒受到多少欺壓，巴哈伊教徒的命運更慘，於是很多巴哈伊教徒開始在官方身分上將自己登記為祆教徒。

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利物浦希望大學（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的約翰·亨尼爾斯（John Hinnells）教授，為此離散社

會做了一項大型研究，針對世界各地數百名祆教徒進行訪調。他發現，很多祆教徒覺得被夾在不同文化之間。一名住在英國的祆教婦女告訴他：「我的腦袋說我應該表現得像個祆教徒，但我的身體說我應該當個西方人。」另一名在美國的女性則抱怨「世上沒有任何地方的從眾壓力比美國更大了」。但事實上，近四分之三的美國和英國祆教徒說，他們每天都禱告；近半數的英國祆教徒說，住在這裡沒有對他們的信仰造成影響。亨尼爾斯也記錄了資深神職人員的強烈反對，他們不認為與外族通婚者應獲准參與任何祆教儀式，或以祆教的葬禮下葬。孟買的大祭司說，祆教女人和非祆教男人的婚姻「令阿胡拉·馬茲達傷心痛苦」，因為嫁給外族的女人不能再遵守祆教訂立的純潔教規。異族通婚者所產生的後代，在傳統主義者眼中，也不算祆教徒。

拉雅和沙赫里亞爾的女兒莎殷，對祆教持比較開明的詮釋。她是世界祆教組織（World Zoroastrian Organisation）的發言人，該組織頌揚祆教的文化遺產，並試圖延續其文化與宗教生命。她也為在英國的伊朗祆教徒組織活動，像是一年一度的雨水節（Tirghan）；節慶上，祆教孩童被鼓勵朝彼此潑一桶桶的水——就像他們在亞茲德的祖先調皮地從屋頂對路過的人潑水。因為水（四大神聖元素之一）是一種祝福，被水潑到的人不能抱怨。在祆教徒面對世俗主義新挑戰的社會中，這樣的活動是一種保存傳統的方式。「我們覺得在西方的生活輕鬆愉快，因為這裡的人擁抱人文價值，」我們在倫敦某時髦郊區的藝術家俱樂部碰面時，莎殷對我如此說道。「我們被人文主義的價值同化，因為那和我們成長過程中學習到的價值一致。」不過平衡極難達成，莎殷也承認：「我們的小孩可能會緊握這個信仰的文化包袱，但也可能不會。」她正在尋找一個將她的信仰調整成符合現代社會的

方法——譬如，接受科學進步，而用祆教的話來說，就是善念緩慢地戰勝了惡。她甚至將她對祆教原則的詮釋和當代習俗結合，想出了處理遺體的改良方法。「給禿鷹吃的意義在於以死亡服務生命。就我個人而言，我喜歡回收再利用，」她眉開眼笑地對我說，「我已經把身體捐給研究機構了。」

我們和彼此分享各自關於亞茲德的故事；她自伊斯蘭革命後就不曾回去亞茲德。她和當地一間慈善機構保持合作，不過該機構最主要從事的是對長者的照護。那裡只剩下沒幾個人。「今天亞茲德很少房子裡住的還是祆教徒，」她說，「亞茲德差不多被拋棄了。我們試著為還留在那裡的祆教徒，繼續舉行禱告儀式（gahambars）。如果有泥磚屋頂垮掉，機構會幫忙付修繕費。」年輕的伊朗穆斯林，像是載我前往亞茲德的計程車司機哈珊，他們和前幾代穆斯林比起來，比較沒有偏見——可是伊斯蘭政府推行了新的歧視性法律。譬如，祆教徒今天在伊朗皈依伊斯蘭，就可以取代未改宗的兄弟姐妹，繼承雙親全部的遺產。

* * *

不過，今天的祆教故事，不單單只是衰頹與世俗化力道日漸增強的故事。近幾年，這個古老信仰接受了一千四百年來的第一批皈依者。在一群才華洋溢的年輕祆教徒於倫敦舉辦的印度和伊朗音樂演唱會上，我認識了皈依者卡洛斯（Carlos）。我遇過一些改宗基督教的祆教徒，他們把自己的決定歸因於看見其原生宗教的形式主義。原來是世俗西班牙天主教徒的卡洛斯，為什麼會做出完全相反的決定？卡

洛斯匆匆瞄了他的太太一眼，解釋道：「我們想對抗惡。在我們的宗教裡，我們和神相互幫助。我們不是祂的僕人。這個世界不是試煉，不需要等到世界末日來臨，才知道自己通過了沒。」他小時候從書本認識了祆教，深受吸引，可是他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祆教徒存在。在看了一部關於亞茲德火廟的BBC紀錄片後，他上網搜尋可能接受他入教成為祆教徒的團體，然後發現在斯堪地那維亞有一個。他穿戴庫須提腰帶，和一群驚惶失措的阿富汗皈依者站在一起。這些阿富汗人想回歸先人的宗教，但可以理解地，他們也對回到家鄉後要面對的後果感到不安。

不過我注意到，卡洛斯和他的太太整個晚上大部分的時間都獨來獨往，反觀聚會上其他人都從孩提時代就彼此認識。我遇到從名義上的穆斯林背景（兩人都說他們的家庭並不信教）改宗的兩位祆教徒時，也看到相同的情況：他們沒被排擠，但其他人也沒有非常努力地讓他們感覺受歡迎。特別是有些帕西人就承認，他們是個排他的團體，並不總是以信仰界定其身分，還會看種族，而且只有一些比較開明的祆教徒同意招收改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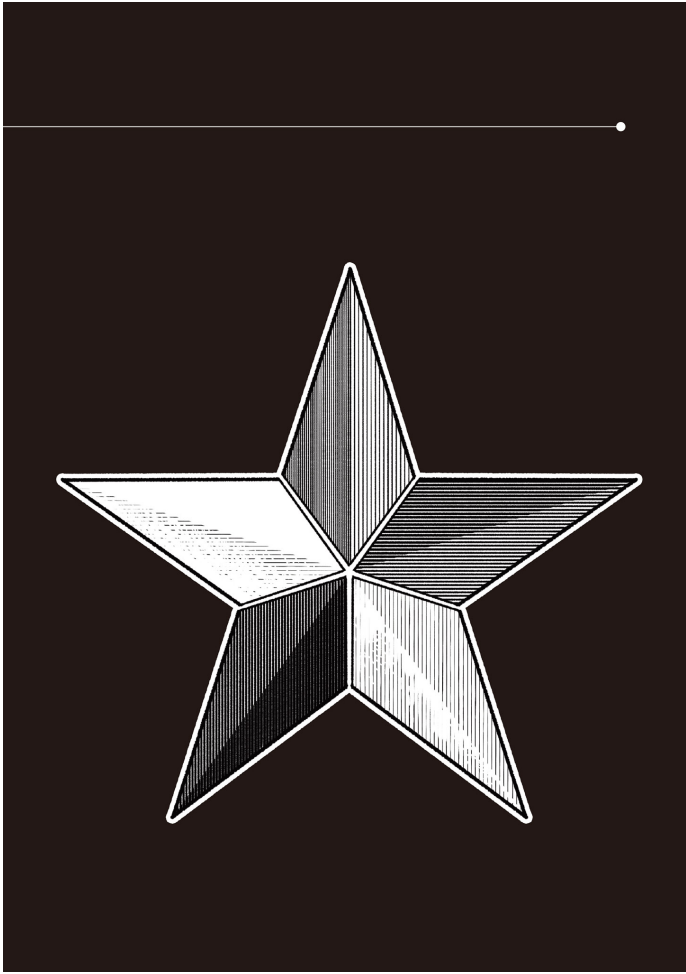
雖然祆教徒人數不多，他們內部有諸多的分歧。對於如何處理跨族群的婚姻（傳統主義者想要徹底排除跨族婚姻的後代，開明派則想將他們納入），以及是否准許非祆教徒進到火廟最神聖之處，也就是擺放永生之火的地方，開明派和保守派意見相左。關於如何詮釋《阿維斯塔》也眾口不一。舉例來說，在多數情況下，今天的祆教徒不太會像他們的薩珊王朝先民那般強調惡的獨立力量。此外，伊朗人和帕西人之間也有文化差異：伊朗人說波斯語，偏愛伊朗菜餚；帕西人說古吉拉特語，喜歡印度食物。

儘管如此，作為英國祆教首要社會與宗教重心的倫敦火廟，努力地接納各式各樣的祆教徒。這座昔日為電影院的聖殿，入口大廳有張伊朗壁毯，描繪大流士（Darius）時代波斯帝國的士兵。在以前的主要放映廳、現在的主要禱告大堂，有一幀瑙羅吉的照片，讚頌英國最名聞遐邇的帕西人。禱告大堂的左牆有幅查拉圖斯特拉的畫像，面對著右牆上的女王畫像。曾是銀幕的舞台下方，仍有著戲院時代留下的幾排舒適座椅。舞台上的一架鋼琴，顯示聖殿既提供禱告儀式，也發揮世俗的娛樂用途。舞台上方的牆，有金色字體寫著祆教的格言：「善思、善言、善行。」

我在出席拉雅和沙赫里亞爾的追思會時，造訪了這座火廟。二〇〇四年，拉雅和沙赫里亞爾先後於幾個月內去世。（他們長眠在布魯克伍德（Brookwood）的祆教墓園，那裡有間小禮拜堂會定期舉辦禱告儀式。禮拜堂周圍是受悉心照料的墳墓，石碑通常刻有法拉瓦哈的圖騰，比較豪華的波斯風石造墳墓則是有錢人家的逝者的安眠之地。）在追思儀式上，嘴巴被垂落至下巴的布面罩遮住（用意是防止聖火被氣息或唾沫汙染）的一名祭司，以古波斯語有節奏地持續念誦九十分鐘。他的身旁坐著他的太太，後者有一部分頭髮罩在圍巾底下。葡萄酒、牛奶、水、水果和白色與紫色的鮮花，擺在他們面前的桌上，最後一項象徵死者的靈。同樣擺在桌上的，還有拉雅和沙赫里亞爾的照片。他們在伊朗和英國的其他生活照，被投影機投放在銀幕上。檀香木枝在小火盆裡燒著。每隔一段時間，小火盆會被人端起來，那人會走進會眾之間，而人們則紛紛揮手把香氣朝自己的身上撥。追思結束後，幾道菜被端出來供人享用，其中包括印度和伊朗菜餚。

當我在儀式後喝著塑膠杯裝的葡萄酒與祆教徒攀談之際，我意識到：在倫敦北部郊區的一間廢棄電影院裡，我終於置身哈菲茲筆下的馬吉的酒館。

-
- [1] （譯注）亞茲德又被稱作風塔之城，有著世界上最高的風塔。這種以高聳的塔樓，把風引進室內，經過室內冷水池把進來的空氣冷卻，再帶進室內，以達到清涼效果，甚至能儲存冰塊的風塔，常見於北非與波斯灣周遭的西亞國家。
- [2] （譯注）這是亞茲德特有的納哈爾儀式（Nakhl Gardani）。在每年伊斯蘭穆哈蘭姆月（即伊斯蘭曆的第一個月）第十天的阿舒拉節，亞茲德的什葉派穆斯林會以鏡子、燈飾與黑布裝飾這座象徵性的棺木，並將之抬起在城中繞行，以紀念胡笙在卡爾巴拉（Karbala）的戰役中殉難。
- [3] （譯注）所羅門王在伊斯蘭脈絡下通常譯為「蘇萊曼」。
- [4] （譯注）祆教有三大聖火，除了古什那斯普之外，還有代表農民之火的伯贊·密爾（Adur Burzen Mihr）與代表祭司之火的法恩巴格（Adur Farnbag）。Adur一詞的意思是「聖火」，而後面接續的詞則被認為是最初點燃火的人，儘管祆教徒認為這三大聖火最初都是由智慧之神阿胡拉·馬茲達所點燃，然後才被放在牛背上，進而運送到人世間，以宣傳信仰、消除疑慮並保護全人類。根據《阿維斯塔》記載，法恩巴格被視為最神聖之火阿塔爾（Atar Spenishta，又譯為the atar most holy）在人間的樣貌，因此在三大聖火之中，法恩巴格最為人所崇敬。
- [5] （譯注）對伊朗人而言，十三是不吉利的數字，因此他們認為在為期十三天的諾魯茲節的最後一天，一定要外出踏青，若是待在家裡，接下來一整年都會過得不順遂。



第四章

德魯茲派

Druze

永生之族

我對德魯茲派一無所知。

——瓦利德·鐘布拉特 (Walid Jumblatt) ·黎巴嫩德魯茲派領袖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位於地中海東岸，由長達三十二公里、住有百萬居民的現代建築群組成——紅屋頂的蜂蜜色老房點綴其間，這些老房從貝魯特仍是風景如畫的小城時就已存在。二〇一一年，我沿著濱海大道散步，經過低調的戀人和海景俱樂部，到哪都聽得見海浪拍打在岩石上的聲音。另一個形而上的海洋也顯而易見。一百年前，在英吉利海峽冰冷的海上，馬修·阿諾（Matthew Arnold）聽見信仰之海的「憂鬱長嚎」。^[1]在貝魯特，那片海仍潮水高漲，狂風暴雨。

儘管黎巴嫩長達十四年的內戰在一九八九年正式結束，內戰中與彼此為敵的形形色色的宗教團體仍對彼此抱持戒心。每四名黎巴嫩人中有一人因內戰受傷，每二十人中有一人喪命。所有團體都幹了喪盡天良的暴行，所有團體也都是暴行的受害者。但黎巴嫩的宗教多樣性並非只是衝突的來源。這個國家的五百萬人口，可區分為十八個公認的教派和宗教，可說是為中東地區示範了宗教平等——其憲法宣告

「國家尊重所有信仰」，而且根據蓋洛普民調，其人民比世上多數民族更懂得包容宗教多樣性。

「憐憫宗教林立但信仰空洞的國家。憐憫四分五裂的國家，各霸一方，各自為政。」黎巴嫩詩人哈利勒·紀伯倫（Kahlil Gibran）在《先知的花園》（*The Garden of the Prophet*）語氣尖刻地談到教派林立的現象。不過，促成這種多樣性的背後原因是很正當的：這些團體在黎巴嫩比在多數地方更安全，因為黎巴嫩國土大抵由政府勢力無法輕易穿透的山區組成。同時，瀕地中海的地理位置使黎巴嫩既屬於西方，也屬於東方。西方古文明的心臟是地中海，而非歐洲大陸：古希臘人沿地中海而居，誠如蘇格拉底所言，「有如池塘邊的青蛙」。

商人載運香料、小麥、染料和奴隸渡海。哲學家與聖人跨海交換觀念與知識。基督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荷馬、基督前五世紀希臘史家希羅多德，以及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沒有一個來自希臘本島：他們分別來自愛琴海島嶼、義大利南部和埃及。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也是如此。他在愛琴海的薩摩斯島（Samos）呱呱墜地，父親是黎巴嫩人，生命最後歲月在義大利南部教書度過。我來黎巴嫩會見十八個宗教族群之一的德魯茲派。我想知道他們會不會是畢達哥拉斯信徒的現代傳人。畢達哥拉斯信徒就是人稱畢達哥拉斯兄弟會（Pythagorean Brotherhood）的古老希臘哲學家的祕密團體。

* * *

我在大學時選修的哲學課的教學大綱上看過畢達哥拉斯，因為他有可能是蘇格拉底的老師，但我記不得他的任何著作。我在貝魯特的書店買了一本關於這位哲學家的法文書阿語譯本。翻閱此書之際，我意識到為什麼過去很少見到他的作品：他不曾寫過任何書。儘管黎巴嫩在當時屬於希臘世界，它也因為曾是古文明的發源地，而仍被希臘人（十九世紀的東方學家也是如此）看作帶有異國風情且神祕的地方。畢達哥拉斯巧妙利用這份異國情調，以及時人認為東方擁有古代迦勒底人與以色列人傳承下來的祕傳智慧的看法：他師承猶太拉比、埃及祭司和迦勒底占星家的傳說廣為流傳。然而，除了獲准進到他的學校的少數菁英，他不願揭露他究竟學到了什麼。弟子們必須保持五年的絕對緘默，而且唯有在五年結束後，才有資格看到老師的廬山真面目。那些洩露畢達哥拉斯學說祕密的人將遭到其他成員的冷酷報復

——他們認為任何違背保密原則之舉，都是不可原諒的背叛。保密原則甚至適用於他們相較別人摸不著頭緒的學說。舉例來說，大家都知道畢達哥拉斯派不能吃豆子，甚至不能踩到豆子。沒有人瞭解為什麼，因為兄弟會寧死也不願解釋。他們的保密精神在當時被其他人譴責是江湖騙術，可用我手上這本書的法國作者在書本開頭引用的一句格言來總結：「靠過來，你們這些哲學家，畢拉哥拉斯的生活之道擁抱你！但你們，平凡的老百姓，門都沒有。」

不過，透露那些祕密的人數已足以讓一些畢達哥拉斯的信仰內容浮上檯面。畢達哥拉斯派相信轉世，這驅使他們專注於淨化靈魂，然後忽略身體，因為他們把身體看作只是不朽靈魂暫居的外殼。他們穿全白、未染色的服裝，象徵對儉樸克己生活的投入。（當凱撒在高盧〔Gaul〕遭遇凱爾特的德魯伊教徒〔Celtic Druids〕，他以為他們一定也是畢達哥拉斯派，因為他們也相信轉世、穿白衣、守護著信仰學說，而且研究星象。他有可能是對的，畢竟高盧曾受希臘思想薰陶了幾百年。）有些畢達哥拉斯派共享財產，而且他們往往避免吃肉類、動物製品，乃至熟食。他們相當團結，以至於在草創初期能接管整座城市，而且之後幾世紀仍以團結一心聞名。他們以密語和源自對數字與幾何學的迷戀所產生的符號，確認彼此的身分。我找到一本德魯茲雜誌，其收錄的文章讓人看到故事的全貌。在〈明智的畢達哥拉斯〉（The Wise Pythagoras）這篇文章裡，作者指出「迫害抑制了教派的發展，使成員被分散，但畢達哥拉斯派的學說代代相傳，因而被保存了下來」。

到希臘尋找這些希臘哲學家的繼承者，而不是到黎巴嫩，似乎比較有道理。但如此一來就會忽略了被某些史學家看作上古之終結與中

古時代之始的一個事件。基督後五二九年，柏拉圖學院永遠關上了大門。自柏拉圖最初在雅典創立學院已過了九個世紀。學院是人們能無須付出任何代價學習知識的地方，而它本身也延續了某種對希臘哲學的詮釋。它並未因柏拉圖去世，羅馬人放火燒城，以及老師們四散而消亡。學院教師嘗試將他們最尊敬的古代諸賢哲的學說——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結合在一起。他們倡導宇宙之所以存在來自一個終極理想，他們稱之為「太一」（the One）。但這個太一其實就像數字一——千古不變，不受如心智或意志等人類缺陷的影響。

基督教厭惡這樣的觀念，因為基督教相信是神透過意志創造了世界。拜占庭統治者查士丁尼是虔誠的基督徒皇帝，他認定學院的存在對其信仰和他的帝國力量是一種侮辱。他下令，在雅典，「沒有人應當傳授哲學，亦不應當詮釋律法」。學院的最後七位教授，也就是「柏拉圖的繼承者們」，前往波斯避難。雅典的學校最終變得破敗不堪。

希臘哲學在地中海世界的盛世戛然而止。在地中海世界，哲學家有時被當成先知、乃至神對待。柏拉圖引起了一支宣稱保有哲學家不成文教義的教派的注意；它有自己的專屬的入教儀式。蘇格拉底的老師，即神祕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最終被當作一名奇蹟締造者，能夠預見未來，甚至同時身處兩地。這樣的信仰有著強烈的道德內涵：譬如畢達哥拉斯的追隨者（畢達哥拉斯派）被鼓勵每晚檢視自己的良心，並克服貪吃、懶惰、好色和憤怒。但這樣的信仰也被設計得能和各色古老異教崇拜並存。彼時在歐洲，基督教正在掃除異教崇拜。「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麼關係？」一名基督教辯論家寫道。富同情心的思想家，像是希波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譯按：就是

聖奧古斯丁），重新解釋柏拉圖的觀點，使其符合基督教教義。但亞里斯多德直到中古時代以前都被忽視，此外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人們普遍只記得畢達哥拉斯的三角定理。

在中東，希臘哲學逃離了查士丁尼詔令的魔爪，因為這個地區和拜占庭相距甚遠，部分地區受拜占庭敵人波斯帝國的統治，而且不到一百年後，落入了伊斯蘭的統治。哈蘭人直到十一世紀仍推崇畢達哥拉斯為先知。許多早期穆斯林一點也不敵視希臘哲學，而是樂見他們自己的文明能作為古希臘的真正傳人。偉大的阿拉伯哲學家肯迪（al-Kindi）主張，阿拉伯人和希臘人是親戚：阿拉伯人之父卡哈坦

（Qahtan）是希臘人祖先伊奧納（Yunan）的兄弟。更晚期的學者法拉比（al-Farabi）則認為，穆斯林接受了基督徒傾向忽略或壓抑的希臘哲學思想。一位早期伊斯蘭哈里發曾宣稱在夢裡遇到了亞里斯多德，而且還和他進行哲學辯論。這場辯論最終使這位哈里發授權將希臘作品翻譯成阿拉伯文。

非正統穆斯林對希臘人的敬意更高。有一群十世紀時住在伊拉克南部、自稱「精誠兄弟社」（Brethren of Purity）的神祕穆斯林，也無比地崇敬畢達哥拉斯（保守派學者泰米葉將他們的著作詆毀為「畢達哥拉斯哲學的無味碎屑」）。如同畢達哥拉斯派，精誠兄弟社覺得宇宙是圍繞數學構建的，於是說道：「創造物的本質和數字的本質一致。」德魯茲派也非常著迷大哲學家，特別是某幾位，而且不全是西方世界最知名的那幾個。德魯茲史家納吉拉·阿布·伊宰丁

（Najla Abu Izzeddin）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德魯茲信仰超越了我們傳統上認識的一神教，是人類尋找與太一交流的早期展現。所以德魯茲對神聖訊息的遞送者赫耳墨斯（Hermes）、畢達

哥拉斯……以及非凡的柏拉圖和對普羅提諾（Plotinus，譯按：生於三世紀的埃及，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思想家）懷抱敬意。」在我為黎巴嫩之旅做行前準備，於我在哈佛的辦公室裡讀到這句子時，其中有三樣東西引起我的興趣。誰是赫耳墨斯？為什麼柏拉圖「神聖」？為什麼畢達哥拉斯和普羅提諾這麼重要？一切終將撥雲見日——或更確切地說，稍明朗些。

我在拉利什見雅茲迪宗教領袖時，他們曾告訴我，德魯茲派和他們很像。「他們甚至留跟我們一樣的八字鬍。」其中一名領袖補充道。有位德魯茲教授在我停留黎巴嫩期間告訴我，德魯茲派和伊斯蘭教的關係就像摩門教和基督教。他們有自己的啟示與哲學，被主流穆斯林認為是非正統的。他們多數時候由單一家族領導：鐘布拉特家族（the Jumblatts）以位於黎巴嫩的南部山區的一座城堡為基地，不可思議地在保持封建地主身分的同時，也經營一個現代的激進社會主義政黨。鐘布拉特家族在很大程度上仰賴德魯茲派的忠誠，不過他們的政黨理論上接納所有宗教。黎巴嫩內戰期間，他們憑藉政治技巧打敗宿敵阿斯蘭家族（Arslan family），取得德魯茲的領導權。阿斯蘭家族的譜系更源遠流長，可是論財力和勢力都不如鐘布拉特家族。我希望這趟能見到塔拉勒·阿斯蘭王子（Prince Talal Arslan）和瓦利德·鐘布拉特（Walid Jumblatt）兩人，以及資深的德魯茲神職人員。

貝魯特的市中心有一小群人在抗議。我在改建後的市中心的路燈燈桿和海報上看到他們的口號：「拒絕宗派主義」、「拒絕賄賂」、「拒絕愚蠢」。他們要求世俗婚姻權，以便來自不同教派的黎巴嫩人能更容易結婚。他們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黎巴嫩在很多方面是開明

的社會；酒吧和夜店每晚都擠滿穆斯林和基督徒。但一股深層的保守主義勢力在開明表面底下流動著，舉足輕重的保守基督徒和穆斯林宗教階級並不贊成通婚。

士兵們駐守在市中心各處的重要地點。黎巴嫩議會內部政治派系之間的爭吵已持續好幾個月了，政府遲遲未能組成，於是軍隊上街防止亂事發生。德魯茲派的幾個政黨是能影響爭議結果的關鍵，但他們永遠當不上關鍵要職：在一百二十八個席次組成的議會裡，瓦利德·鐘布拉特只能號召至少六名議員效忠，而阿斯蘭則能號召兩名議員。

我和英國大使約在一間咖啡館碰面，之後我們將一起去見鐘布拉特。我穿越修復得很棒的城區趕忙赴約。這裡位於內戰前線，一度被彈片和砲火破壞得滿目瘡痍。不過，黎巴嫩億萬富豪總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曾在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和二〇〇〇年代初期，投資大筆金額修復城市。^[2]他在二〇〇五年於城市附近遭到暗殺身亡，原因是一起汽車爆炸案。這起事件可能是受到敘利亞政府的鼓動，無法不讓人聯想到內戰，因而導致一些黎巴嫩人預期新一波內鬥即將展開。

我經過一間新落成的清真寺，建築巍峨聳立，高過旁邊的一間教堂。教堂因此正在加高塔樓，好與對方的宣禮塔匹敵。我還在參酌著這個現象是否算是宗教競爭，令人沮喪，抑或是它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提醒我宗教自由確實存在，但我的注意力被另一個發現轉移了。德魯茲派城市行政長官在好幾世紀前興建的一座清真寺藏在一條小街深處，和這兩座新穎大型建築相比，很容易被忽略。我從外頭看著清真寺，注意到其外牆上的鐵窗有一顆五芒星。

五芒星對畢達哥拉斯派是尤其重要的符號，也是他們用來辨識其他成員的符號。他們之所以喜歡五芒星，是因為它是由十個三角形組成——他們認為十是完美的數字，而三角象徵畢達哥拉斯的著名定理。畢達哥拉斯派相信，數字及數字的幾何呈現是堆砌宇宙之磚。因此每當幾何學或數學中出現規律，他們便尋找其中的道德和實用訊息。對他們而言，畢達哥拉斯的理論不只是證明了如果三角形的兩邊為三和四，則弦一定是五。在畢達哥拉斯的數字語言中，二是代表女人的數字，三屬於男人，所以兩數相加起來的五就是代表婚姻的數字。四代表正義，因為它能被一分為二。因此三角形的三、四、五公分的三個邊，道出了寫在宇宙數學結構中的一則訊息：「男人在婚姻中務必行得正。」身為畢達哥拉斯派的丈夫以對妻子忠貞著稱。

我納悶，出現在這裡的這個畢達哥拉斯符號，代表什麼意思？難道純屬巧合？我暫時把問題丟到一旁，因為我赴約要遲到了。我加緊腳步走過高級服飾店和餐廳，有著優雅的圓拱或百葉窗戶的建築，及時搭上大使的車，出發至瓦利德·鐘布拉特家。

* * *

德魯茲派約有一百萬人，其中半數或半數以上住在敘利亞，其餘分散在以色列（十二萬）和黎巴嫩（二十五萬）兩地。他們在每個國家都得選邊站。在以色列，德魯茲派從軍，然後和巴勒斯坦人保持距離。在敘利亞，二〇一一年起義後的血腥鎮壓期間，他們大多支持老阿薩德的政府。當黎巴嫩內戰在一九七五年展開，鐘布拉特的德魯茲派民兵團和大抵由穆斯林和左派組成的聯盟並肩作戰，對抗有西方撐

腰且以基督徒為主的政府。戰爭越打越錯綜複雜。雙方陣營內部都產生分裂：基督徒團體常和彼此作對，而且有時會和伊拉克與敘利亞等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結盟。德魯茲派和其他穆斯林團體鬧不和，特別是後來成為黎巴嫩最大單一宗教族群的什葉穆斯林的民兵組織。因此，在長期反反覆覆的衝突中，古老的市中心受到重創。

現在它又是個時髦的城區了。鐘布拉特家附近的街道很安靜，看起來也很富庶，而他的別墅又大又舒適。入口附近到處都有守衛。我們搭電梯上樓，出了電梯，一隻大狗蹦蹦跳跳地朝我們奔來。鐘布拉特緊跟在後。他光禿的頭兩側有狂野的白髮，留著濃密的八字鬍，一臉精明。他在接替父親卡邁爾（Kamal）成為封建莊園主、社會主義政黨黨魁、內戰游擊隊首領之前，曾是個歷史老師。「每次我們來，他都會給我一本書，」大使在電梯裡對我悄聲說道，「然後我每次見到他，都擔心他會考我上一本書的內容。」

進到他的書房後，我立刻懂大使的意思了。書本和新聞剪報鋪滿在好多張書桌上。牆上掛著十八世紀鄂圖曼人的肖像畫，還有一把觀賞用的火槍。他告訴我們，他在伊斯坦堡發現了一間他很喜歡的古董商店。我心想，這人肯定和我一樣熱衷於追尋自己族人的起源，以及探索他們和古典時代希臘的關聯。可當我問起關於德魯茲信仰的事，他的回答出乎意料。「我對德魯茲派一無所知。」這位德高望重的德魯茲派領袖手臂大力一揮地宣告道。他從書堆中挑了兩本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的書，給我作禮物。他邀請我日後拜訪他在山上的豪宅。接著就和我們說再見了。這位黎巴嫩最有影響力的德魯茲人，而且是堂堂一位知識分子，若不是沒有資格接觸其宗教教義，就是深知

不能把教義傳授給外人。我打算接受他的邀請，去和德魯茲人好好相處一番，但首先，我得找個比較願意和我聊天的人。

幸好，有個德魯茲人拉比葉（Rabieh）同意出手相助。他認識大使，而且熱衷於幫我們認識他的族群。他對我們說，唯一的問題是他自己也知道的不太多。在這方面和他一樣的人很多。德魯茲平信徒基本上過著自己選擇的生活，前提是他們會幫忙守護與維護自己的族群，而且不與外族通婚。但他們不被允許去認識德魯茲派的教義。因此他們被稱為「朱哈爾」（juhhal，直譯就是「無知者」）。儘管有錢有勢，鐘布拉特以前也曾是個「朱哈爾」。唯有完成入門儀式者（也被稱為「謝赫」或「烏克爾」（uqqal，譯按：即知祕人），畢生奉獻於沉思和清貧）才知道完整的宗教教義。拉比葉解釋，這就是他安排我們參觀「教派院」（House of the Sect，即德魯茲派在黎巴嫩的行政總部）的原因。穿過貝魯特水泄不通的交通後，我們很快就抵達了教派院。

到了這聽起來神祕兮兮的地方後，我發現它是一幢低調的建築，只有兩層樓高，位於西貝魯特的德魯茲區維登（Verdun）。屋內走廊上穿梭的男人們，身穿黑披風及鬆垮黑褲，頭上戴著以白布包裹的無帽簷高氈帽——這是德魯茲謝赫的傳統服飾。我偶爾也看到一些女人經過，她們以白布覆蓋頭髮和半張臉。她們是女謝赫（若單指一名女謝赫，則稱其為「謝哈」（sheikha））。

我們和一位知祕謝赫（Sheikh al-Aql）有約。此人是德魯茲神職人員的官方領導人。我被預先警告不要占用他太多時間。他出名地忙碌，而且脾氣不太好。因此我有點戰戰兢兢地和拉比葉與大使一起進到他的辦公室。我問他關於德魯茲派和伊斯蘭之間的關係，而他也展

現對伊斯蘭議題的淵博知識，頻頻引用《古蘭經》，渴望證明德魯茲派是正統的穆斯林。「我們教人要做好事。一切不被宗教和國際法允許的都要避免。我們尊敬其他人。我們的信仰是伊斯蘭。我們的宗派是穆瓦希敦（Muwahhidun），也就是認主獨一者。我們的稱呼是德魯茲。」

他沒因為就此打住而感到抱歉。「事關隱私，而非只是為了保密，」他說，「女人在家難道沒有隱私嗎？我們希望外人給我們的信仰同樣的隱私。」我被他的氣勢嚇得不敢吭聲。但拉比葉不滿意只聽到這裡。他從我背後大膽發言：「謝赫，跟我們說說塔卡木斯

（taqammus）。我們相信塔卡木斯的根據是什麼？」謝赫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以學校老師的態度以另一個問題回問他，彷彿試圖鎮住不禮貌的學童。拉比葉知道塔卡木斯的含義嗎？如果不知道，他問這問題是在做什麼？他語調中的訊息非常清楚：拉比葉正在侵犯他的信仰的隱私。

我從沒聽過塔卡木斯。它聽起來像卡米斯（qamis），也就是阿語裡的「上衣」。謝赫為什麼不想談論它？拉比葉在我們開車離開時，解釋塔卡木斯的意思是「轉世」，也就是人們能像換衣服一樣更換身體的概念：身體只是靈魂的外衣。我瞭解謝赫為什麼不喜歡這個問題。多數穆斯林認為轉世是非正統的信仰觀點。但這倒是說明了德魯茲派對畢達哥拉斯的興趣。他以相信轉世名聞遐邇：他有次阻止一名男子打狗，說他從哀號中認出一名死去友人的聲音。基於相同理由，畢達哥拉斯派往往吃素。德魯茲派對希臘哲人的敬意有多深呢？

我希望能在接下來的另一個會面得到更多答案。這次會面的場所比先前都更富麗堂皇。阿斯蘭家族的城堡坐落在貝魯特南方的山丘

上。每過一道門都有僕人接待我們。他們領我們進入接待廳，而剛步入中年的阿斯蘭王子，身材高大，和藹可親，就坐在父親的肖像畫下方。畫中抽著水菸的父親看起來比兒子更平易近人。王子（他因為是伊斯蘭傳來前的阿拉伯國王後裔而有此頭銜）證實了我對塔卡木斯的瞭解。「我們不相信死亡。」他說。德魯茲派一點也不在乎墳墓：靈魂僅把身體當作暫時的外殼入住，而且會一再重生。德魯茲人沒有哭喪的習慣。少數被德魯茲派視為神聖的「墓碑」，其實只是紀念碑。

「我們的信仰有三大要件，」王子解釋，「轉世說，尊重所有神聖的宗教，以及相信宇宙意識（Universal Mind）。」

但我纏著他再多說些時，得到的答案卻模糊不清。坐在王子旁邊的紅髮男子告訴我，德魯茲信仰注重心靈勝過儀式。另一名王子的下屬則說，它注重哲學勝過宗教。「不是所有謝赫都瞭解箇中哲理，」此人語帶責備地補充道，「他們當中很少人懂謝赫阿布·阿雷夫·哈拉威（Sheikh Abu Aref Halawi）的新柏拉圖主義。」哈拉威是德魯茲的聖人，以苦行著稱，二〇〇三年過世時已超過百歲。德魯茲家家戶戶展示著他寫給「宇宙創造者」的宗教詩。不過，說他是個新柏拉圖主義者是什麼意思呢？宇宙意識又是什麼？

* * *

拉斐爾有幅畫把所有古希臘哲人展示在同一個場景中（譯按：《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肩並著肩，站在所有哲人的中央。此外，亞里斯多德手指著下方的大地，柏拉圖則指著上方的天堂，使這幅畫巧妙地總結了兩大思想學派

的差異。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專注在有形世界；現代的「物理學」

（physics）一詞正是衍生自他的著作的書名。另一方面，柏拉圖則認為有形世界不過是觀念世界的影子。他的觀點對基督後前幾世紀重塑希臘哲學的一批作家很有影響力。他們被現代學者稱為新柏拉圖主義者，當中最著名的要屬三世紀的普羅提諾。普羅提諾及其追隨者楊布里科斯（Iamblichus）與波菲利（Porphyry）都來自中東（分別出生於埃及三角洲一個靠近敘利亞大城阿勒坡〔Aleppo〕的小鎮，以及黎巴嫩城市泰爾〔Tyre〕），這一點其實就透露希臘哲學早已是地中海乃至中東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三人及其同時期但影響力較小的作者試圖結合所有的希臘哲學，消除各式各樣希臘思想學派的分歧。

我閉上眼睛思考，彷彿凝視著這些抽象概念——像是數字，或愛與真理等觀念——它們完美且恆常不變，明顯不同於我在物質世界遭遇的事物。柏拉圖把物質世界比喻為掠過洞穴牆壁的影子，唯有關閉心智，向內觀望，專注在觀念世界，才可能瞥見物質世界只是事實的倒影。柏拉圖相信，只有人的思考可能倖免於死，而不是身體。但精神的或知識的世界顯然有能力影響物質世界。透過思考，我可以決定要做什麼，然後我移動自己的手臂執行我的決定。因此新柏拉圖主義者主張，靈魂，或稱心智，既可在物質面，也可在知識面上運作。他們從理論上說明多個存有層面（planes of existence）的階層體系，以及諸如心智這類能跨越不同層面的存在。太一高居這個階層體系的頂端。

儘管被稱為新柏拉圖主義者，他們也熱衷於畢達哥拉斯的學說。畢達哥拉斯似乎是一神論的擁護者，而畢達哥拉斯派的神聖符號是帶

有一點在中心的圓圈。圓代表宇宙，點代表太一——它是整個宇宙仰賴的且恆常不變的「靜止點」，和T·S·艾略特（T. S. Eliot，譯按：二十世紀英國詩人）詩中所說的「旋轉世界的靜止點」（still point of the turning world），頗有幾分神似。這不是說太一擁有意志，或能夠有所作為。它的本質和我們有缺陷、轉瞬即逝的世界截然不同，人類就連找一句話來描述它的知識能力都沒有，只知道它存在，而且是完美且永恆不變的。它並未創造世界——把它固定在一個特定時間點，就破壞了它的完美。它的存在，意味著其他一切的存在——就像數字一的存在，也意味著所有其他數字的存在。用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話來說，宇宙「流溢」於太一，而宇宙為何存在的理論稱為流溢說（emanationism）。

首先從太一流溢出來的是宇宙意識，或稱宇宙智性（Intellect），然後名為宇宙靈魂（Universal Soul）的存在接著出現；三者構成某種有如哲學家的三位一體。接著，物質與精神世界從宇宙意識和宇宙靈魂流溢出來。部分新柏拉圖主義者主張，還有其他精神存在，是太一與人類之間的媒介。一套道德準則根據這個宇宙想像而生：為善就是朝太一前進——透過放棄物質世界，讓自己和太一變成一體。普羅提諾寫道：「凡堅強的，且昇華而後撤入己身，永久地棄絕曾使他愉悅的物質之美。」自私和自我中心是分歧之源，也是和太一分離的初始原因。普羅提諾堅持他的哲學不可為外人知。「不洩露絲毫給未入門者」是他的規矩，不過規矩在他死後被打破，因為追隨者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

我起初不懂的是，這些古老觀念如何進到了這個黎巴嫩現代伊斯蘭教派的核心。王子準備為我打通任督二脈。他從我們所在的接待

廳，望向窗外那條分隔他的城堡與海濱的狹長土地。由此據點可看見北上貝魯特的主要道路。「這是個戰略要地，」阿斯蘭王子說，「所以阿拔斯人把這塊地給了我們。」他向助手示意，不一會兒，助手拿來了一本厚重、裝幀精美的阿拉伯語書。這本書講述王子的家族過去一千年的歷史。王子把書送給了我。藉由閱讀這本書，加上爬梳接下來幾天許多德魯茲好心人士給我的一系列書籍，我拼湊出了至少一小部分的德魯茲故事。

* * *

阿斯蘭王子給我的書敘述，八世紀時，阿拔斯哈里發派遣其家族從巴格達前來黎巴嫩沿海抵禦拜占庭人入侵。阿斯蘭家族守衛有成，但有個徹底出乎意料的全新威脅出現在他們面前。阿拔斯人在九一〇年接獲令人不安的消息：在無人聞問的北非荒野，有個男子自稱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可合法繼承先知的伊斯蘭統治者位置。拜一名忠心耿耿的助手在當地柏柏人（the Berber）部落間散播訊息之賜，此人得到了許多支持者——他們擊敗並推翻了阿拔斯王朝的當地附庸。此人自稱馬赫迪（Al-Mahdi），信仰伊斯蘭一個小眾的分支伊斯瑪儀派（Ismailis）。他和他的後人將在接下來幾世紀創建並統治龐大的法蒂瑪帝國（Fatimid Empire，譯按：即中國史籍中的綠衣大食），版圖不僅涵蓋北非，還包括埃及和黎巴嫩。他們興建了開羅。他們宣布包括基督徒和猶太人在內的臣民皆享有宗教自由。而且他們建立了一間藏書豐富的希臘哲學圖書館。

對想將希臘哲學融入伊斯蘭教的人而言，法蒂瑪帝國的開羅具備極好的環境條件。法蒂瑪人非常重視學習，興建艾資哈爾（al-Azhar）清真寺，還有一間傳授伊斯蘭律法、哲學和天文學的學校。在開羅與巴格達的穆斯林學者間，希臘思想始終不曾退流行。這些學者重新解釋了新柏拉圖主義的觀念，以使其符合伊斯蘭教義。太一自然是被看作安拉。真主和萬物之間的諸多媒介被某些學者認為等同於無形的意識，或「大天使」，而且有哲學家（譬如法拉比）曾說過，這些意識化為了星星和行星。

馬赫迪突獲天啟的一百年後，他的玄孫成為開羅的統治者，人稱哈基姆·比·阿瑪安拉（al-Hakim bi Amr Allah，[譯按：基督後九八五至一〇二一年在世](#)）。他打破寬容傳統，以前所未見的殘暴強加沙里亞（shari' a law，[譯按：即伊斯蘭教法](#)）於臣民。他頒布了幾道具爭議的法令：他下令在清真寺和市集入口張貼對第一批遜尼哈里發的詛咒，禁止基督徒百姓慶祝復活節，要求燒光城裡的葡萄乾（因為葡萄乾可能被做成葡萄酒），要求市民把蜂蜜倒進尼羅河（因為蜂蜜可能被做成蜂蜜酒），而且宣布鞋匠不能再製作女鞋（因為女人不被准許到戶外）。他要求非穆斯林在脖子上戴上極重的重物。他聽說了人們在復活節於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Holy Sepulcher Church）舉行的聖火儀式，認定那是個詭計，而且為此大發雷霆，竟命人放火將教堂夷為平地。教堂直到他死後才重建，但被毀一事引發了十字軍東征，永久地傷害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關係。

儘管哈基姆的行為對受害者（以及其他很多人）而言顯得殘酷，甚至毫無理智，他的仰慕者卻認為他的古怪代表了他與真主關係密切。一連串千禧年事件——基督後一〇〇〇年的到來，也是穆罕默德

死後的第四百年——引發末日將至的猜想。一群思想家正是在此狂熱氛圍中提出了認主哲學（philosophy of Tawheed），也就是德魯茲信仰。就連「德魯茲」一詞背後的命名原因都是個謎。它大概是從納什塔金·德拉齊（Nashtaqin al-Darazi）的姓氏演變而來。德拉齊是後來被德魯茲開除教籍的早期信徒。德魯茲的教義也引起許多驚人的謠言。德魯茲派相信，或者說開羅人曾如此津津樂道，哈基姆是真主的人類化身或顯靈。至少開羅的八卦是這麼說的。今天的德魯茲派否認這些謠言。但新柏拉圖主義者確實保留了把凡人看作神一事的解釋空間。在阿拉伯文翻譯中，lahut是真主本身，而nasut是真主以人類外貌出現在人世間的化身。

無論德魯茲派怎麼表達這點（它或許像《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3]一樣微妙而複雜），他們似乎認為哈基姆是真主在人間的化身（nasut）。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自家領袖中的五人是其他次級神聖事物的塵世化身：宇宙意識、宇宙靈魂，還有另外三者名為文字（Word）、^[4]先例（Precedent）和繼任者（Successor）。這五個存在曾化作人形出現——化為耶穌及其使徒，摩西和亞倫（Aaron，[譯按：摩西的兄長，曾協助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畢達哥拉斯，以及穆罕默德及其友伴。每一回，他們藉由建立一個新的宗教，引領人類在世界觀上進入全新的時期。摩西帶來猶太教，耶穌帶來基督教，然後穆罕默德帶來伊斯蘭。現在德魯茲信仰要帶領人類進到歷史新紀元，取代正統伊斯蘭。德魯茲改革運動領袖哈姆宰·阿里（Hamza bin Ali）相信自己就是宇宙意識在人間的化身。在前世，他曾是畢達哥拉斯和耶穌。

哈基姆在世時，德魯茲派仍受到包容。但一〇二一年他到默卡塔姆山（Moqattam Hills）散步卻神祕地失蹤後，他的兒子繼承其位，可是顯然沒那麼願意容忍一個相當敬重他父親（而不是他）的宗教。數千名德魯茲人遇害。他們逐漸撤離到黎巴嫩南部的丘陵，短暫接收了一些改宗者——族裔相當多樣——並透過祕密符號和密語辨識自己人。舉例來說，五芒星（每個角各有不同顏色：白、藍、黃、紅、綠）代表五個德魯茲領袖，以及他們各自對應的五個神聖存在。德魯茲社群很快停止接受新的皈依者，朝保密更進一步。一名黎巴嫩史學家寫道：「德魯茲信仰因而變得全然世襲，變成一種神聖特權，是應該受到小心且熱情看守，以免遭褻瀆的無價寶藏。」這番話肯定連畢達哥拉斯都會認同。

這個新興信仰的規矩和儀式少之又少。一名忠貞穆斯林的義務包含每日禱告五次、每年在齋月禁食，以及到麥加朝聖。但這些實際義務被德魯茲派重新詮釋為比較抽象的要求，像是保有信仰，說實話，幫助有共同信仰者。德魯茲派的平信徒可以吃豬肉和喝葡萄酒。他們也可以用自己喜歡的任何方式禱告——抑或完全不禱告，如果他們覺得不禱告比較好的話。一位德魯茲平信徒告訴我，他每年受邀參加禱告會兩次，理論上他能在那時詢問關於信仰的疑問。但參與並非義務。他解釋：「如果你問我關於神學的事，我無法回答你。做德魯茲人是一種對群體的社會忠誠——生來就離不開。」

不出所料，德魯茲派對伊斯蘭的開明見解激怒了原教旨主義的神職人員。十四世紀，當阿拉伯人的土地遭敵人從兩側包夾——十字軍在西邊，蒙古人在東邊——學者泰米葉想以暴力粉碎一切「偏差」觀念。他保守到（據說）一輩子不曾吃西瓜，因為他找不到先知及其友

伴吃過西瓜的證據。做前人不曾做過的事，有「創新」的風險，而這對保守派學者而言是危險的事。毫無懸念，泰米葉成為德魯茲派可懼的大敵。他頒布對德魯茲派與阿拉維派不利的一道伊斯蘭教令，稱他們為「外表會騙人的無信仰者」。他們的食物被拒吃，他們的女人被奴役，他們的錢被奪取，他們的悔過不被接受，他們的學者被殺，他們的葬禮被抵制——「無論在哪裡發現他們，格殺勿論，而且要像前述那樣被詛咒。」隨之而來的迫害期間，德魯茲派不得不表現得符合正統伊斯蘭。不過，他們此時的領主鄂圖曼人最終心軟，賦予他們自治權和（實質的）信仰自由。

今天呢？我心想，德魯茲派會從不同意其密教理想的穆斯林身上，看到怎樣的態度？我在貝魯特市中心的時髦酒吧和一名女子見面，她的父親是德魯茲派的民兵團成員，死於內戰。她開一輛黃色保時捷前來。酒吧貌似街坊的社區酒吧，但其實是貝魯特富家子弟經常出入之地。「政治決定了一切。」我們坐在一雙褪色椅子上時，她這麼對我說。「瓦利德·鐘布拉特站在遜尼派那邊時，遜尼派就很友善，然後當他和什葉派站在一起，遜尼派就都說德魯茲人不能被信任。」在迂迴波折的內戰之後，人們迎來了比較不血腥但同樣變幻莫測的政治結盟問題。

她在學校遇過各式各樣不友善的指控——譬如德魯茲人一年會縱樂狂歡一次，或說他們崇拜一隻藏在盒子的金牛犢。這些指控很常被用來針對中東所有的少數族群。前者常被用來指控德魯茲派、撒馬利亞人、阿拉維派，以及雅茲迪人。後者則針對德魯茲派和撒馬利亞人。不過兩項指控都曾被拿來抨擊基督徒，而且基督徒把同樣的指控稍做修改後，轉而用來抨擊穆斯林。這習慣背後的原因不明：它不只

是一種惡意，反而帶有某種淫穢幻想，或許還出於人們對真的提倡自由性愛的諸多宗派的殘餘記憶（譬如，另立門戶的祆教，以及九世紀各式各樣的蘇非主義團體）。德魯茲派被控性淫亂的最大原因或許在於他們准許男人和女人一起禱告，而且賦予女人接近與男性平等的權利。（畢達哥拉斯派也准許女人和男人共享團體的祕密。）

* * *

為了更深入挖掘德魯茲派的神學，我將造訪其信仰的核心地帶，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舒夫山（Shouf）。在黎巴嫩的每趟旅程都是一堂宗教課程，因為該國各式各樣的宗教全都喜歡自我宣傳。在寬敞但經常回堵的濱海高速公路向北行，會經過賭場和超市，還有一尊擁抱世人的偌大基督像；然後若開進山區，就能深入許多坐落在讓人看了頭暈目眩的山崖邊緣，有著聖母馬利亞像、葡萄園和阿拉姆名字的村莊。如果從貝魯特南下，則會經過張貼真主黨（Hizbullah）領袖哈珊·納斯拉勒（Hassan Nasrallah）海報的擁擠郊區。^[5] 穿越建設日新月異的兩大城，即泰爾和西頓（Sidon），會來到什葉派重地的開闊鄉村。進到那裡的村莊，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可能是拳頭朝以色列士兵頭部重擊的照片。惡名昭彰的哈伊馬（al-Khiam）監獄張貼著以色列占領黎巴嫩南部期間在獄中死去之人的名單。^[6] 這些政治符號讓人清楚知道該區居民的宗教認同。

不過，往東邊的路上風景比較微妙隱晦。瓦利德·鐘布拉特派來接我的車，左彎右拐，沿途踩煞車，在疾駛了一個小時後，我們終於抵達舒夫山。那是德魯茲族群歷來聚集之地，也是鐘布拉特城堡所在

之處。在沿路經過的村莊裡，我沒看到任何象徵他們宗教的事物。司機哈山（Hassan）在路途中經過的一間店暫停，買了塊用乳酪製成的油膩甜蛋糕「珂納法」（konafa）。我邊吃邊看向橘子園、高山峻嶺和舒夫山的深谷。人們在這裡種植番茄、橄欖、香蕉和檸檬。粉色的鐘形花朵為畫面增添幾分色彩。由於大興土木，覆蓋薄薄一層奶油色石灰的紅屋水泥別墅，滿布一座座山坡。

在海拔極低處，有時可以看到海從四周圍繞的丘陵縫隙中露面。這畫面不僅是實景，還隱喻了黎巴嫩的寫照。我認為，山與海共同造就了今天的黎巴嫩——雜糅世界和地方，開明的現代性和頑固的部落主義，生活之樂和狂熱篤信，令人陶醉。聖潔的男女在基督教時代初期來到黎巴嫩山間隱居，靠著當地村民的糧食捐獻度日。中世紀記載顯示，伊斯蘭傳入之後，穆斯林隱士們同樣受到基督教村莊的歡迎。當第一批德魯茲派傳道者從埃及移居外國，進入舒夫山，倡導並實踐克己之禮，前人早已為他們開闢明確道路。「去找住在黑門山（Mount Hermon）山腳下的民族，」早期的德魯茲文獻寫道，「他們很容易就會追隨。」

傳道者不僅將在此發現基督徒村民，還會找到一個異教信仰的最後勢力。在第一批德魯茲傳教士抵達時，哈蘭人在黎巴嫩的巴勒貝克有座神廟——就在舒夫山的北方九十六公里處，而我現在就在這個地方。或許採納德魯茲哲學的人當中有些是哈蘭人；他們發現這麼做讓他們比較容易接受伊斯蘭，畢竟德魯茲和他們一樣相信轉世，而且准許他們繼續尊崇畢達哥拉斯，以及其他來自古希臘傳統、但被基督教和伊斯蘭忽略的人物。

我在某個德魯茲小鎮注意到許多古怪的商店名稱，譬如「智慧藥局」和「證悟醫院」。我也在一間乾洗店看到德魯茲宗教詩的海報如此破題：「喔，宇宙造物主——」那詩出自備受敬重的謝赫哈拉威，我在阿斯蘭王子的城堡曾聽聞其名。此外，我還看到一棟大抵樸素的建築的入口上方畫有一顆五芒星。

還有一個特色讓德魯茲村莊顯得獨一無二：穿棕色連身工作服、戴白色羊毛帽的光頭男人，奇異地無所不在。他們是建築工人，也在花園或加油站工作。他們每個人唯一保留的毛髮，是短短的八字鬍。我問哈山這些人是何方神聖。「他們是謝赫。」他說。這些人是比我拜訪教派院時所看到的謝赫更資淺的「知祕人」（uqqal）。德魯茲派的平信徒可過他們想過的生活，但德魯茲神職人員遵守一套克己哲學。男性謝赫被鼓勵靠土地維生，只吃自己親手栽種的食物。這讓他們感到特別高尚。他們過簡樸的生活，規律地禱告冥想，在齋月期間禁食，避免吃豬肉和喝酒，而且在任何事上從不過分放縱（譬如，就算有人給謝赫一杯水，他也不該全部喝完，只能啜飲，讓自己保持有些口渴的狀態）。德魯茲神職人員的人數並不少：大概有百分之十五的德魯茲人是謝赫，有男有女。哈山告訴我，投入神職不是太複雜的事：只要申請入神職，然後接受一段時間的評估，測試他或她堅決的程度，以及對宗教理解的能力。

哈山的太太是德魯茲神職人員。一如男性謝赫耕田，她和其他謝哈從事刺繡和其他家庭手工藝，藉此賺取收入，無須入世。如果哈山的太太走出家門，她會在頭上戴白手帕，半遮著臉，就像我在教派院看到的女人。哈山不是個健談的人，但他正慢慢對我敞開心房。我問他去過黎巴嫩哪些地方？「下去貝魯特，然後回來這裡。」他不曾離

開德魯茲地區。我猜想，他的整個世界可能不超過方圓二十四公里。我推測他曾參與內戰。

旅途中，我們經過散落於山坡上的德魯茲村莊。這些地方的房屋寬敞，有些相當大，不過僅被移居國外的富裕德魯茲人當作夏日度假別墅。哈山告訴我，他自己村子的六千名居民當中，大約有二十到二十五人的身家超過一億美元。這些財富多是在國外經商成功的成果，特別是在西非。很多德魯茲村已成了鬼城，可能僅三分之一的房舍真的整年有人住。當我們經過哈山村子的一座鄰村，我問他在戰爭期間那裡是否有很多人被殺。十三人，他說。此外，村子被以色列轟炸時死了五個，剩餘的人則是在經過檢查站時，因身分證顯示他們是德魯茲人而被殺。「那是場可怕的戰爭。」我接著問他，戰爭什麼時候結束的？「還沒結束，」他告訴我，「還在繼續。」

內戰爆發後，舒夫山發生了德魯茲人與基督徒鄰居的惡鬥。這些基督徒在十七世紀被德魯茲統治者引進此地佃耕。德魯茲人最終取得上風，把基督徒趕出舒夫山區（不過鐘布拉特近年來鼓勵他們回歸）。戰爭後期，德魯茲人更常和什葉派民兵團交手，後者的活動重地位於南方。內戰於一九八九年化解之後，德魯茲派和什葉派之間的衝突偶爾還是會再次浮現。最糟糕的一次事件發生於二〇〇八年五月，真主黨轟炸舒夫山的德魯茲人，然後控制了位置具戰略作用的兩座德魯茲村莊。德魯茲人在接下來的打鬥中，繼續採用招牌的割喉手法殺敵。鐘布拉特和阿斯蘭的幾名顧問後來告訴美國大使（對話最終被維基解密公諸於世），德魯茲人住在一片「什葉海」裡，害怕受什葉派報復。二〇〇八年的事件展現了社群之間的暴力如何能夠悄然在黎巴嫩再度崛起，因為那裡沒有有效的中央當局能夠解決紛爭：黎巴

嫩政府，本身就是被同一種對立關係挾持的人質。「我們是支弱小的民族」，這是在連綿的舒夫山山丘上常聽到的一句話。

* * *

情況曾經有所不同。十七世紀早期的德魯茲封建主法赫爾丁（Fakhreddin），從鄂圖曼領土割出一塊基本上能獨立自主的地盤，其邊界接近現代黎巴嫩的國界。法赫爾丁是重要的民族人物：在有人說黎巴嫩是一九二六年法國殖民勢力創造的產物時，他給了黎巴嫩一個土生土長的建國者，以及歷史合法性。鄂圖曼土耳其軍隊最終終結了他的獨立小國。哈山帶我到位於舒夫山南端陡峭懸崖上的一處要塞廢墟。昔日盤踞在此的大城堡居高臨下地俯瞰下方平原，而今僅剩斷垣殘壁。它過去也是法赫爾丁的城堡。「突厥人包圍這裡，」哈山說，「但法赫爾丁不肯放棄。他繼續抵抗。然後突厥人對供應城堡水源的泉水投毒。可是就連這樣，他也拒不投降。我告訴你他做了什麼。他蒙上自己和馬的眼睛，一起跳下這懸崖，就為了不要被捉住。」我向下瞅。從懸崖落下的高度肯定有三十公尺左右。哈山走回被下毒泉水曾經的所在位置——如今我們只能感受到腳下的濕氣。但對他而言，那塊地近乎神聖。一位偉大的德魯茲英雄在此殞落。「被遺忘的王國（Forgotten Kingdom）？」哈山在我告訴他我這本書的書名後說道，「我們不曾遺忘。」

法赫爾丁的故事是個神話，象徵德魯茲的勇氣。但他其實是被突厥人活逮，然後處死。在他死後，許多家族爭相成為壓倒群雄的德魯茲人。今天的贏家鐘布拉特家族自十八世紀起就住在穆赫塔拉

（Moukhtara）的一座城堡。一八五三年，英國貴族卡納逢勳爵（Lord Carnarvon，其子日後將資助挖掘圖坦卡門〔Tutankhamun〕陵墓的探險）前來城堡拜訪。這名英國人在一八四〇年代發現德魯茲派是需要資助者的少數族群，於是決定扮起這個角色。當時的卡納逢勳爵希望成為資深政治家，想認識英國最新結交的盟友。卡納逢勳爵在英格蘭的莊園本身就相當雄偉——前幾年，它以唐頓莊園之名，出現在同名的電視節目裡。即便如此，他似乎由衷激賞穆赫塔拉城堡，並在幾年後付梓的著作中描述其見聞。他筆下最華麗的場景，是對在城堡庭園舉辦的中世紀風格騎馬比武的描述：「練兵場的騎士個個一身灰，

『侍童』站在馬兒旁，遞全新的長矛給騎士，每一回幸運的刺擊都引來一陣讚賞，城垛上的淑女們……全副武裝又傲慢的群眾……每道長長的城牆邊，都聳立一座方形塔樓。」

卡納逢確信他參觀了一座來日無多的中古時代遺跡。即便在回憶穆赫塔拉的狂歡活動時，他以哀悼的筆調描述德魯茲的「風景如畫和封建獨立……如今可能注定在敘利亞的山區滅絕」。德魯茲人活得比他預言的更久，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拜卡納逢及其他人的支持所賜。德魯茲社群在一八六〇年代遞交給英國人的一份集體請願書中寫道：

「我們德魯茲人，在真主之後，除了英國政府以外，沒有其他的保護者。」德魯茲人甚至開始散布他們源於英國、或至少和英國有共同祖先的想法。有些德魯茲人直到二十世紀初還相信這說法，而許多德魯茲領袖有時確實仍會向英國請求援助。我後來見到一位德魯茲的資深謝赫。不久於世的阿布·穆哈瑪德·賈瓦德（Abu Mohammed Jawad）躺在他那簡單小屋裡的床上（屋內擺著自製甜點的推車，供賓客自由

取用），而他唯一有力氣說的故事正是上述這奇妙久遠的結盟的由來。

一個基督教國家採親德魯茲派政策一事可能頗令人吃驚，畢竟德魯茲派在當時的頭號敵人之一是馬龍派基督徒（Maronite Christians）。然而，在英國人眼中，比起德魯茲派被法國支持，馬龍派基督教一點也不重要。英國青睞德魯茲派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而它一定會讓陰謀論者感到十分絕妙。在所有關於德魯茲起源的精彩理論中，除了上述提及的英國起源，還有說法據稱他們是一位法國伯爵德勒（Dreux）的後代，或根據俄羅斯神智學者（theosophist）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說法則是西藏喇嘛的後人——最有趣的說法出自深藏在倫敦圖書館中的一本於一八九一年出版的書，其中收錄了一間共濟會所「四冠會」（Quatuor Coronati）的會議紀錄。該書第一篇文章的作者神父哈斯克特·史密斯弟兄（Brother the Reverend Haskett Smith）主張：「直到今天，德魯茲人保有很多明顯的標誌，顯示他們和古代石匠工會（Ancient Craft of Freemasonry，譯按：古代共濟會是不對外公開其建築技藝的石匠行業工會）有密切親近的關聯。」

共濟會成員相信，德魯茲人承襲了建造所羅門聖殿之石匠的傳統。哈斯克特弟兄認為德魯茲人貨真價實——是石匠們的真正後裔——於是決心要證明這點。他在黎巴嫩待了好幾星期，和德魯茲人住在一起，並用一個簡單的試驗做測試。共濟會成員相信他們使用的密語從聖殿建築工以降代代相傳。哈斯克特弟兄因此假設德魯茲人一定知道同樣的單字。但由於穿不透他們的守密厚牆（他曾語氣可憐地詳

述，每當問起德魯茲人關於他們信仰的問題，「話題就被巧妙轉移」），他意識到他得要些詐來克服他們的守口如瓶。

他將一幅相當怪異的迷人情景描述得栩栩如生：「我多次嘗試以文字勾引德魯茲人，像個扣人心弦的戲劇旁白神祕地低語，或是莊重地宣告，又或是在德魯茲人最無防備之時隨興地說些什麼。」我想像一名穿著硬白領的英國教士，從乾癟的德魯茲農夫背後突然冒出來，朝後者大喊一些古希伯來單字。倘若德魯茲人真的聽得懂他說的單字，他們仍會保持泰然自若，因為哈斯克特弟兄不曾證實自己的理論。儘管如此，他還是向其他共濟會成員提出了他的理論，誠如一八九一年的紀錄所示——紀錄顯示他們對其理論抱持懷疑。哈斯克特弟兄的其中一位聽眾，不滿他自身的教派竟只被當作一個分支，而一個中東族群卻被當成共濟會的始祖，便宣稱德魯茲人的習俗肯定只是向共濟會借用而來。（事實上，史學家菲力普·希提〔Philip Hitti〕稱共濟會嘗試模仿的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可能受過德魯茲「組織與學說」的影響。）克己儉樸的戰士僧侶的概念是騎士團和德魯茲派的共通之處，不過沒有太多證據顯示他們有同樣的哲學觀念。）

無論兩團體的文化相似性背後的原因為何，共濟會成員如卡納達肯定看出了相似之處。他在描述德魯茲人挖掘其信仰的最高祕密時所展現的態度，不全然是冷靜的觀察：「逐漸地，非常緩慢地，他獲准掀開一層層掩蓋偉大祕密的面紗……他之所以不斷地學習，是為了拋棄舊習；他前進，並且踏在從前信仰的廢墟之上：慢慢地，痛苦地，暈眩地，他爬過一級又一級的入門儀式……而且他每次跨步，就會聽

見上一級階梯崩塌，墜入腳下的無底深淵——那聲音彷彿在嘲笑任何對於回頭的期望。很少人能真的登上這神祕階梯的頂端。」

* * *

我納悶，我在鐘布拉特的城堡能得知多少祕密呢？哈山載我上山之際，把車速放慢以顯得恭敬。我注意到前方路邊有顆簡單的石頭。

「那是卡邁爾貝克的紀念碑。」哈山說，他指的是瓦利德的父親卡邁爾·鐘布拉特（貝克〔Bek〕是種尊稱）。他將車熄了火。「他就在這裡被殺。」哈山說道。他坐在方向盤前，定定不動地注視著石頭。哈山當時可能是個孩子，但他的語調和態度暗示，他目睹了他即將描述的這一幕。「他只有一個保鏢，他的車跟我們走的路線相同。另一輛車從對向駛來。」我看向前方的下一個髮夾彎，道路彎彎曲曲，一路向上。「就從那裡，」哈山說，「車裡有一群人，他們開槍殺了他。」他不願說誰是幕後主使，但廣為接受的說法指出，是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安排了這次攻擊，懲罰鐘布拉特拒絕了由敘利亞出面調停的和平協議。該協議試圖以鐘布拉特無法接受的條件，終止黎巴嫩內戰。哈山嘆氣。又一個德魯茲英雄殞落。

他重新發動車子，然後我們爬過最後幾公尺的路進到穆赫塔拉村。我終於在此瞥見瓦利德·鐘布拉特城堡的廬山真面目。那是由蜂蜜色的石頭蓋成的偌大建築物，聳立在有著理髮店、雜貨店及整齊花園的山坡聚落之上。我在城堡的附屬建築中放好包包，走向門樓，那裡的守衛們坐在一個舊櫥櫃前，聊天喝咖啡。我透過櫥櫃沾滿污垢的玻璃門看到一批步槍，還有一個看似火箭發射器的東西。

終於，我看見有著一頭狂野白髮的熟悉身影：瓦利德·鐘布拉特前來接我，愛犬在他身後蹦蹦跳跳。我暫時避免再問他關於德魯茲宗教的問題，而只是欽佩地參觀著他的祖宅。城堡是照所謂的黎巴嫩古典風格建造的：紅瓦屋頂，紅橘色塊相間的牆壁，一根根細柱撐起尖拱，每個拱頂都掛著一盞燈。庭院（也許是卡納達看騎士比武的同一個地方）有噴水池，帶三角楣飾的窗戶，和以酒神在葡萄間跳舞的畫面作裝飾的一具羅馬石棺。城堡內部則更奢華：大片大理石地板、噴泉、鑲嵌雕刻的天花板。蘇聯餽贈了列寧格勒圍城的巨幅畫作，暗示了德魯茲派在英國資助枯竭後轉向何處。

晚飯席間，我再次嘗試讓他談德魯茲的宗教，而他答應介紹我認識一些神職人員。但他比較想談政治。敘利亞逐漸陷入內戰，那裡的德魯茲人得選邊站：幾杯伏特加和熱呼呼的黑咖啡下肚後，他說令他難堪的是有很多人想支持阿薩德。我問他德魯茲人當初怎麼會到了敘利亞？他告訴我，他們在一七一一年因為德魯茲自己的蓋斯派

（Qaysis）和葉門派（Yemenis）內鬥，被迫逃往那裡。葉門派被趕到東邊，進入後來的敘利亞。他們的後代如今是世上最大的德魯茲族群，多數生活在名為德魯茲山（Druze Mountain）的玄武岩高原上。以色列的德魯茲人（現在總數為十二多萬人），因國界於一戰後被加諸這個地區，而與他們在黎巴嫩的弟兄們分開了。

翌日，瓦利德·鐘布拉特遵守他的承諾，在午餐時間帶我去海拔更高一點的山丘與知祕人見面。我對他竟選擇開車赴約感到有些意外：難道他不擔心發生在他父親身上的悲劇會在他身上重演嗎？「一切都是命。」他說。在中東地區，人們普遍相信特定事件一定會發生，而且無法避免（這樣的想法行之有年：巴比倫占星術的基礎，就

是相信人類事務已預先注定）。除了經過的一個村子有人對鐘布拉特揮手，我們的旅途平靜無事。我們抵達舉行午餐會的花園時，彷彿走進一片白氈帽和黑披風之海：近百位謝赫坐在長桌前，凝視著大盤大盤的羊肉與米飯。主人謝赫阿里（Sheikh Ali）前來招呼我們。他是個讓人感覺十分快樂的矮胖男子，穿著十九世紀德魯茲人會穿的黑色垮褲和紅色的鄂圖曼菲斯帽，好似從三〇年代東方主題電影走出來的帕夏（pasha，[譯按：鄂圖曼帝國的文武官員頭銜](#)）。有人告訴我，他特別擅長安排野餐。我這是眼見為憑。但餐後參觀他家時，我看到客廳牆上的照片揭露這位謝赫的另一面。這張照片來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是內戰剛爆發的時候，年輕的謝赫阿里正訓練軍校生作戰。危機在那個時候來得如此迫切，就連致力於苦修的謝赫也得上戰場。

謝赫們急忙解釋這不是常態——一般而言，他們會一絲不苟地避免捲入任何一種衝突。「我們謝赫的職志是為民服務，」謝赫阿里說，「維護使教派延續下去的習俗，守護德魯茲派的榮譽，以及防止世風淪喪。」不過，他補充，當德魯茲派的榮譽危在旦夕，一切都會被容許。「沒錯，在戰時，所有人都得參戰，而且如果有必要，拿棍子也得上。」謝赫身旁圍繞的一群年輕人同意地大笑。謝赫阿里解釋，他說拿棍子可不是玩笑話：德魯茲人在一九二〇年代就是這樣和法國人作戰，用劍、棍子和石頭打敗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然後奪取他們的武器，開啟全面起義。這一切，只因法國人逮捕了當地德魯茲酋長的一位貴賓。德魯茲人認為這是對他們榮譽的侮辱。

另一名單眼失明的謝赫和我聊起希臘哲學家。他告訴我，十一世紀的時候，穆斯林學者嘎札里在一篇精彩論說文裡主張哲學是自相矛盾的。哲學不能解釋真主，因此只會引導研究哲學的人走上懷疑之

路。嘎札里帶頭攻擊希臘人的知識，於是正統遜尼派伊斯蘭漸漸停止從他人的哲學中汲取靈光。可是德魯茲派在山村中離群索居，而且本來就是堅定的非正統派，因此不受嘎札里影響。他們仍舊尊敬柏拉圖、畢達哥拉斯和亞里斯多德。

用完午餐回到穆赫塔拉後，我穿梭城內巷弄，從橘子新落一地的階梯拾級而下。我經過一座教堂，但教堂唯一的小門緊閉。教堂附近有一間小餐廳，我在那裡寫作好一陣子後，隔壁桌一群歡樂的年輕人邀我共飲亞力酒（arak），還請我吃鷹嘴豆泥和黎巴嫩蔬菜沙拉

（fattoush）。「真希望能請你吃我們的地方菜餚，」他們說，「人們會獵山坡上的小豬，然後放在紅酒裡煮。可惜現在不是季節。」在伊斯蘭教裡，沒有比用紅酒煮豬肉更禁忌的菜餚了。我知道他們一定是朱哈爾，也就是沒參加過入門儀式的德魯茲人，不受任何關於食物的宗教律法束縛。

「告訴我們，你對轉世有什麼想法？」他們問道，「你相信嗎？」我試著圓融地回答，但他們並不滿意。「不，轉世是真的，」其中一人說道，「我們有證據。」另一人拉大嗓門說道：「我的表親小時候會說一般人不會說的話，做對同年紀小孩而言不可思議的事。」還有一人說，有個男人記得自己曾在大喜之日被殺，而且能畫出婚禮女賓客們所穿的禮服。他甚至去見了殺害自己前世的兇手，然後原諒了那人。

當天稍晚，我認識一名因為夢到自己住在美國而改名的女子。她的家人在聽過夢境後，認為她是一名移居美國而後英年早逝的德魯茲女孩轉世。那女孩的名字是卡門（Carmen），因此她改名卡莉曼

（Karima），紀念死去的自己。一位德魯茲友人後來告訴我，他們普

遍都相信轉世，他甚至曾聽過，有個男孩擁有大約在他出生時同時去世的一名男子的生命記憶，因而被認定是死去男人靈魂的新生，並獲死者子女的信任，得以一同平分遺產。

德魯茲派否定早期穆斯林團體支持的、比較怪異的轉世說（其中一個團體從生命在新軀殼重生一事，看見因果報應的可能性。該團體相信，和綿羊發生性關係的男人，可能會在來世重生成一隻綿羊）。舉例來說，阿拉維派相信人可能變成植物重生，但德魯茲派不接受這看法。他們相信德魯茲社會的成員永遠都會在德魯茲社會中重生。根據此觀點，德魯茲人早在其信仰出現之前，就生而為人生活在世上：他們的軀殼還年輕，但他們的靈魂已有數千歲，而在他們成為今天的德魯茲族群之前，他們曾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友伴們，以及畢達哥拉斯的弟子們。對於若沒有足夠身體能接收靈魂會發生什麼事的老掉牙問題，德魯茲派自有答案：根據德魯茲民間神話，德魯茲靈魂在這樣的情況下，會來到中國。

當晚我在穆赫塔拉街頭四處遊蕩之際，思索著相信轉世對德魯茲群體的種種影響。建教之初，這可能有助他們獲得改宗者。我想像早期德魯茲人對基督徒說：「你接受穆罕默德為先知，不代表否定了耶穌：因穆罕默德乃耶穌轉世。」對尊敬希臘哲人的異教徒，他們則可以主張德魯茲領袖哈姆宰是畢達哥拉斯再世。在往後幾個世紀，德魯茲人作戰的勇氣因著相信死亡會帶領他們快速通往重生而更加堅實。

上戰場時，德魯茲士兵會大喊：「今晚誰想安睡在母親的子宮裡？」轉世信仰也使德魯茲人對族群擁有深刻的忠誠心。他們認為自己發了〈時間之主的誓約〉（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of Time），也就是效忠哈里發哈基姆的諾言。他們當然不是在這輩子才

承諾效忠，而是在十一世紀——在某個前世，當時的他們組成了最早的德魯茲族群。

最後，轉世鞏固了他們反對接受皈依者或通婚的嚴格教規。普通德魯茲平信徒男女得遵守的少數要求之一，就是只和同信仰者結婚。由於他們會在群體內以重生的方式獲得永生，因此和外人生小孩——也就是德魯茲人以外的人——不僅會影響那些小孩此次的人生，還會影響他們的來世。而且，與外人通婚可能在世上造成一些可怕後果。二〇一三年七月，一名男子娶了一名德魯茲女子，男子對女方家人說他是來自別村的德魯茲人。當女方發現他其實是個遜尼派穆斯林後，他們追捕他，然後將他去勢。瓦利德·鐘布拉特對這個事件加以譴責。不過，德魯茲人對知名德魯茲家族的後代艾瑪·阿拉穆丁（Amal Alamuddin）於二〇一四年和美國演員喬治·克魯尼訂婚一事，顯得比較寬容。但艾瑪的祖母接受地方報紙訪問時，態度冷淡。據報導，她說：「怎麼回事？世上已經沒有年輕德魯茲男人了嗎？」

* * *

舒夫是德魯茲人在黎巴嫩的心臟地帶，但他們也有人住在更南邊的一座山上，靠近和以色列的邊界。這座山上有個名為哈斯巴耶（Hasbaya）的聖祠。和知祕人午餐會的隔天，我有幸和英國大使與拉比葉一同前去參觀。拉比葉就是在貝魯特見知祕謝赫時，提出關於轉世的放肆問題的那人。這是趟漫長的旅程：我們先是爬到山頂，然後沿著陡坡往下走至傳說中法赫爾丁策馬縱身的懸崖下方的山谷，穿越

被葡萄園環繞的一個基督教村莊後，接著再經過四處張貼真主黨海報的一個什葉派村莊。

抵達哈斯巴耶後，我發現這是個由古老石屋組成的小鎮。有個石頭建築是座荒廢的城堡，其中搖搖欲墜的一隅，還住著自十字軍東征時便定居在此的一戶人家。他們以花朵稍微緩解了灰石庭院的荒涼感。另一處居住條件更差的角落屬於同家族的另一支人所有，他們用此空間舉辦政治集會。在一座高挑石拱廊的內部，懸掛著鐘布拉特的對手阿斯蘭王子的巨幅肖像，並擺放了為恭迎大使到來的臨時接待會而排的塑膠椅。

接待會一結束，我們就去參觀位於附近山頂上的聖祠巴雅達（al-Bayyada）。那是個「凱爾瓦」（khalwa），亦即德魯茲男女用來讓自己與世隔絕並進行禱告的地方——用西方的話來說就是修道院。聖祠的中央是一間禱告室（它看起來樸實無華，而我透過窗戶看到，禱告室本身禁止入內）。聖祠周遭的建築大抵是供一群像是德魯茲謝赫的僧侶起居用。五名隱居的謝赫，其中一人穿涼鞋，為我們準備了一頓有松子與蜂蜜的餐點。他們定定地坐著，有耐心地回答我們的問題。那位穿涼鞋的隱居謝赫已在這裡生活四十年了。就和其他德魯茲謝赫一樣，他們習慣只吃自己做的食物。「這個地方在三百五十年前由一位非常虔誠的人創立，」另一人解釋，「他變成相當聖潔的人，然後決定在這裡蓋間凱爾瓦。本來在山下聚落，後來被搬到山頂。他的目的不是任何世俗收穫，因此這裡變得遠近馳名。人們紛紛前來，蓋私人的凱爾瓦。」

德魯茲人也曾在聖祠旁蓋了個古怪的東西：一塊圓石板，放在一個低矮的石環中間。它似乎具有某種我們的主人沒說明的宗教意義，

因為我得脫掉鞋子才能踏上去。石板的中央有個小圓石，顏色較深：由上往下看，這顆小圓石是圓圈中央的一點。圓圈中心帶有一點的符號是畢達哥拉斯的神聖標誌，代表宇宙之心的太一，「旋轉世界的靜止點」。站在點上說話，我聽見聲音清楚地被石環彈回。畢達哥拉斯肯定也會被這回音效果吸引。他是解釋什麼是八度音階的第一人，發現悅耳的和聲是按照數學公式運作的（將一金屬條對半切，意味著敲擊得到的單音將升高一個音階）。他相信行星在空中旋轉時會產生音樂，而且一個人只要專注得夠久，然後對要聽的東西心裡有數，就能聽見「天體的音樂」。和我會面的其中一位謝赫偶然發現了這個觀念。他用阿拉伯語稱這個概念為Hanin al-afla。儘管我在西方大學鑽研希臘哲學多年，倒是第一次有人跟我提起這觀念。

聖祠的守護者是位有淘氣幽默感的大鬍子長者，我們在他位於鎮上的住處而非聖祠見到他。他領我們進客廳，桌上擺滿為迎接賓客準備的大盤菜餚。大使和他逗趣地談論女性在德魯茲神職中的地位：他解釋說，她們可以當謝赫，但權力比較小。他接著問大英帝國是怎麼結束的，反將大使一軍。「太陽落下了沒？」他問。（基於某種原因，「大英帝國從不日落」的說法在中東廣為流傳。我不知多少次聽人對我引用這句話。）

這位守護者在我問起畢達哥拉斯時變得嚴肅。他能否解釋這位哲學家為何禁止追隨者吃豆子呢？謝赫聽了之後一臉驚奇。他說，畢達哥拉斯沒有禁止吃豆子。他將手指向家人為賓客準備的一盤盤食物。

「早知道就為你們準備一盤豆子，」他說，「這樣你們就能親眼作證，德魯茲人是可以吃豆子的！」他下意識地假設，當我問起畢達哥拉斯准許和不准許的事，就等於是在問他關於德魯茲習俗的問題。

（收錄〈明智的畢達哥拉斯〉一文的黎巴嫩德魯茲雜誌，有份列表把他下達的指示統統詮釋為隱喻，這也是德魯茲派對伊斯蘭規矩的解釋方法。）

* * *

今天，德魯茲派的處境比雅茲迪人或祆教徒要來得好。目前為止，他們成功保有自己的土地和自治權，部分原因在於黎巴嫩不受單一宗教團體支配。瓦利德·鐘布拉特仍健在，沒遭暗殺，而且在黎巴嫩保有政治影響力；在敘利亞，德魯茲派住的地方遠離主要城市，加上族群規模較為龐大，使他們不受內戰蹂躪；在以色列，德魯茲派則有宗教自由，而且很多人為以色列軍隊效力。可是威脅四起。黎巴嫩局勢不穩，敘利亞腥風血雨，以色列則是沒收了很大比例的德魯茲土地，用來安置國內的猶太移民。世俗德魯茲人對自身信仰的一無所知，也導致他們在國外不易維繫信仰。儘管如此，在每個地區，他們的神職與世俗領袖都有效維護了族群的團結和獨特性。有卡納逢對德魯茲人的錯誤描述作為前車之鑑，我從穆赫塔拉和哈斯巴耶歸來後，拒絕重蹈覆轍。

回到貝魯特，我和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德魯茲教授薩米·馬喀蘭（Sami Makarem）安排了最後一個會面。我應邀到他的公寓赴約。進門後，他請我喝了一杯甜桑椹汁。「我們的神和你們的亞伯拉罕神不一樣，」他說，「在閃族的宗教裡，神以事蹟為世人所知。但對我們而言，神同時內在又超驗。」德魯茲人認為真主是永恆不變的，就像新柏拉圖主義的太一——並非

宇宙的來由，而是引發眾多宇宙來由的來由（太一引發宇宙意識和宇宙靈魂；宇宙意識和宇宙靈魂則引發宇宙誕生）。真主不可名狀——因此德魯茲人簡單將其稱呼為「宇宙創造者」，因為其他名稱用起來都沒把握。

德魯茲人忠於流溢說的觀念，相信世界是真主的一部分，就像夢是做夢者的一部分。馬喀蘭教授接著說道：「把自己和真主分開，思索這種分離即是惡。自我存在於真主流溢出的個體之中。自我必定產生。我們能用什麼對抗自我呢？用愛。還有接受我們確實受到宇宙秩序的影響。」這個概念讓我想起聖伯爾納鐸（St. Bernard of Clairvaux）說過的話：「就像一滴水落入葡萄酒中失去自己，變成葡萄酒的顏色與滋味；或像一根鐵條被熱得火紅，變得好似火本身，忘記了自己的本性；又或者像空氣在陽光下絢爛，彷彿不是被照亮，而就是光本身；聖人的人類情感被某種難以形容的鍊金術熔解，鑄成了神的意志。」

我問教授，德魯茲人是畢達哥拉斯派的繼承者嗎？他謹慎地對我笑了笑，並未回答我。他顯然認為一個沒經過入教儀式的外人沒有資格知曉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告訴我：「天文學始祖赫爾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esmegistus）說，對還沒準備好的人揭露真理，是一次犯了三種罪。這麼做會使他不相信真理，使他對你產生錯誤的看法，使他直指真理是胡言。」從馬喀蘭的觀點來看，一個人要怎麼為接受真理做準備呢？研究希臘哲學會讓我有資格嗎？似乎不然。馬喀蘭說：「真理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時間去適應。轉世的意義就在這裡。真正的知識是記憶。」畢達哥拉斯認為透過回想他的前世，他可以累積多於一次生命的智慧。同樣地，德魯茲派相信，由於他們

投胎轉世到已被啟蒙的群體之中，唯有他們才能盼望獲得真智。這是個相當畢達哥拉斯派的概念。

[1] （譯注）馬修·阿諾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作者在此使用的典故源自阿諾的詩歌〈多佛海灘〉（Dover Beach）。

[2] （譯注）然而，二〇二〇年八月四日下午，貝魯特港口發生大規模爆炸，港口與建築毀壞嚴重。

[3] （譯注）基督教三大信經之一。基督後三二五年，康士坦丁大帝為解決東西方教會嚴重的教義分歧與爭議，於是召集各地主教，召開了基督教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大公會（First Ecumenical Council），會中制訂了尼西亞信經。

[4] （譯注）此處的Word在中文版的《和合本聖經》中譯為「道」。《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寫道：「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5] （譯注）真主黨是一九八二年由伊朗資助成立的什葉派伊斯蘭政治和軍事組織，其成立的宗旨為消滅以色列，並把西方勢力趕出黎巴嫩。

[6] （譯注）哈伊馬監獄最早是一九三〇年代的法國軍營，日後成為黎巴嫩的軍事基地，到了內戰時則落入以色列支持的南黎巴嫩軍手裡。一九八五年，這座過往的軍事基地被改建成監獄，其中獄卒對待囚犯的手段極其殘忍。二〇〇〇年五月，隨著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及南黎巴嫩軍的垮台，這座監獄才被關閉，並被改建為博物館。但以色列在二〇〇六年的以黎衝突中轟炸了這座設施，將其夷為平地，引發外界一系列的臆測。



第五章

撒馬利亞人

Samaritans

失落的以色列民族

我們從沒說過：「嘿，我們的家族曾經擁有這地方，這裡是我們的。」我們知道領土紛爭為整個地區帶來了多少苦難。我自己是覺得，我擁有的已經超乎我的期待。

——班尼·譚達卡(Benny Tsedaka)，
《A·B·撒馬利亞新聞》(*A.B. The Samaritan News*)共同創辦人

失落的以色列十支派可說是所有失落民族中最容易被找到的民族。九世紀時，他們據傳出現在阿拉伯半島。幾個世紀後，他們看來是在印度附近——一則中世紀寓言故事作者興奮地報導，說他們受到歌革（Gog）、瑪各（Magog）和亞馬遜女王的守護，而且正策劃摧毀基督教。^[1]即便歐洲人探索新大陸時，也無處不看到十支派，彷彿他們是一支鬼魅大軍。有些人主張，美洲原住民也許就是這麼來的；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問道，他們還有可能想回到錫安的故土嗎？

我住在耶路撒冷時找到了失落的十支派，那是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一年間的事了。我是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目的才去到那裡。身為英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館參事，我的主要任務是說服巴勒斯坦人支持中東和平進程。我派駐在那的時候，雙方似乎真有可能達成某種協議。協議不會完全符合任一方的要求，不過將終結已成為巴勒斯坦特色、循環發生的反抗與鎮壓，並且提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雙方更和平地、更有尊嚴地生活的機會。

儘管後來希望落空，在我初抵耶路撒冷的一九九八年，那裡散發一股樂觀其成的氛圍——而且在這個我客居的迷人區域進行探索還算很安全。我在以色列堪稱奇蹟的大小城市中目睹，國家、語言和開拓經濟，全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後、也就是猶太大屠殺結束後的幾十年內蓬勃發展。（現代希伯來語其實是學者艾利澤·本·耶胡達（Eliezer Ben Yehuda）從一八八〇年代起，從《聖經》中的希伯來文巧妙構思而成的簡化版。耶胡達的兒子在成長過程中，因父親的堅持，只能說希伯來語——這個規矩相當嚴苛，因為這代表沒有任何孩

子能聽懂他說的話。但最終，耶胡達的計畫戰勝了懷疑和敵意，於是現代希伯來語被廣為採用。）我也看到了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它們在一九六七年被以色列征服。巴勒斯坦文化在所有阿拉伯民族中顯得極富生命力：他們對自由的渴望，砥礪他們培養出堅定的身分認同，從電影、藝術和劇場都能夠看到。

我多次造訪耶路撒冷北邊約四十八公里處的納布盧斯（Nablus），那是座有著許多白色石灰岩屋的城市，曾以其秀麗的風景和橄欖油出名。這個城市的名字來自羅馬人給它起的名字「尼亞波利斯」（Neapolis），也就是「新城」的意思。在附近且被羅馬人摧毀了的舊城名為示劍（Shechem），意為「山鞍」。因為就像山鞍中央凹陷，兩側為山脊，此處有兩座山包圍著山谷。它們分別是西邊的基利心山（Mount Gerizim）和東邊的以巴路山（Mount Ebal）。兩座山距離很近；胡狼曾經能隔著兩山夾著的谷地，對彼此嚎叫。古示劍遺址今天被名為巴拉塔（Balata）的聯合國難民營占據，我有幸在領事館贊助難民營的一項戲劇計畫時前去參觀。

一九五〇年，住在今日特拉維夫（Tel Aviv）附近村莊的巴勒斯坦人，被打勝仗的以色列軍隊嚇跑或驅離，來到此地以帳篷為家。現在帳篷已被水泥屋取代，此處也成了納布盧斯的貧窮郊區，但這裡的人不曾接受他們原來的家被沒收。參與戲劇計畫的一群難民營年輕人帶我參觀當地。我們穿越納布盧斯城，吃了以乳酪製成、浸滿蜂蜜的著名甜點「珂納法」；這道甜點和橄欖油皂是當地的特產之一。

在巴拉塔的邊緣有座雅各伯的井（Jacob's Well）。無論猶太族長雅各伯是否曾用過這口井，它被當作聖址無疑已有數千年。在基督教福音書中，耶穌要求一名女子從井裡取水給他喝。這女人是個撒馬

利亞人，對他竟和她說話一事感到訝異，因為「猶太人不和撒馬利亞人往來」。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之間的衝突，也同樣出現在耶穌的好撒馬利亞人寓言故事中：一名猶太男子負傷倒在路邊，然後路過的一名猶太祭司與一名利未人（Levite）都不理睬他（不是因為他們冷酷無情，而是因為祭司觸碰屍體是大忌，他們害怕他或許已經死了）。最後幫助了受傷的猶太人的是個撒馬利亞人，因此耶穌說，追隨他的猶太信徒應該愛這個撒馬利亞人。由於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是宿敵，出手相助者為撒馬利亞人一事正是故事出乎意料的轉折。他們的宗教習俗幾乎一模一樣，可是歷史解釋上的分歧使他們與彼此對立。

撒馬利亞人的解釋如下：在基督前八世紀，以色列和猶大兩個王國大致占據今日以色列的領土。兩個王國交戰，但居民擁有共同信仰，而且同宗同源，因為他們都屬於雅各伯十二個兒子所代表的十二支派。以色列王國是兩者中歷史較悠久的，而且當初是猶太教聖址所在之處。可是基督前八世紀遭亞述人入侵後，數十萬以色列王國的居民被強行帶到今日的伊拉克北部。猶大王國倖免於難，其居民開始被稱作猶大人，然後才被稱為猶太人；他們也被流放到巴比倫，後來帶著新觀念和轉變的傳統回來。至於以色列王國的流亡者則再也沒有音訊，於是被稱為失落的以色列十支派。

但撒馬利亞人說，並非全部十個支派都徹底消失了。有些支派被亞述人驅逐出境了沒錯，但有些還在。尊敬基利心山是他們的第十誡的內容。在撒馬利亞信仰中，亞當是用採自基利心山的塵土做成的。挪亞的方舟在此停駐，而非在亞拉臘山（Mount Ararat）；摩西在此得到上帝給的律法，而非在西奈山（Mount Sinai）；亞伯拉罕帶以撒到此獻祭，而非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亞山（Mount Moriah）。他們對它

有十三種不同的尊稱，像是阿爾基利心（Ar Gerizim），意為「十誡山」；迦拜特歐楠（Gabat Olam），意為「世界之山」；和阿爾阿什基拿（Ar Ashekina），意為「神居之山」。他們在山上蓋了一座聖殿，每年在山頂搭帳篷，並根據〈出埃及記〉記載的儀式，再現逾越節的獻祭。

他們不稱自己是猶太人，而是希伯來人或以色列人（Israelites，譯按：不同於當代的以色列公民〔Israeli〕）。他們也自稱撒馬林（Shamarin），來自意為「守護者」的阿拉姆字詞，而該詞也是「撒馬利亞人」（Samaritans）一字的起源。撒馬利亞人自視仍嚴格尊奉已被其南方鄰居猶太人拋棄的古代傳統。他們認為耶路撒冷的猶太聖殿是大衛王（King David，譯按：基督前十世紀以色列聯合王國的國王）瀆神的一項革新。他們相當厭惡大衛王：直到今天，沒有撒馬利亞人會被取名為大衛。在撒馬利亞人眼裡看來，耶路撒冷是不適合建造聖殿的異教徒城市。

猶太人對歷史的解釋直到十支派的消失為止，都和撒馬利亞人的解釋相同，接著就開始有些不同了。猶太宗教專家裁決，十支派確實消失了。撒馬利亞人是來自亞述帝國其他地方的民族後裔，他們取代了十支派在其家鄉落腳，而且後來採用了猶太習俗（《聖經》的〈列王紀〉記載：「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Cuthah〕、亞瓦〔Avva〕、哈馬〔Hamath〕和西法瓦音〔Sepharvaim〕遷移人來，安置在撒馬利亞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這群人最終說服了來自耶路撒冷聖殿的一名變節祭司，在基利心山為他們設立一座聖殿。撒馬利亞人有可能和猶太人平起平坐——但誠如巴比倫版的《塔木德》所述，前提是「他們得否定基利心山，承認耶路撒冷與死者復活」。此外，因為

他們「娶了非法的女人」，而這可能意味著他們和其他族裔的女人通婚。只要他們繼續保有這個無可容忍的習慣，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之間就不能有所往來。

《塔木德》的裁決勢必造成對立，但政治競爭使關係雪上加霜：以色列與猶大古王國時期存在一個模式，即雙方傾向支持區域權力鬥爭中的對立方。當亞歷山大大帝和猶太人作戰時，撒馬利亞人便與前者並肩出征；當亞歷山大改變心意，支持起猶太人，便和撒馬利亞人處於戰爭狀態。當猶太人於基督前二世紀的馬加比戰爭（Maccabee Wars）反抗亞歷山大的希臘繼位者，撒馬利亞人站在其對立面；猶太叛民為了報復，於是燒毀了撒馬利亞的聖殿。然而，在那些戰事結束後，猶太人遭鎮壓，撒馬利亞人則欣欣向榮。

到了耶穌的時代，撒馬利亞人可能已有五十萬人。不過，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的關係空前惡劣。基督後九年，一個撒馬利亞幫派滲透耶路撒冷，將人骨撒在猶太聖殿，加以玷汙。基督後五〇年，一名猶太人從加利利（Galilee）出發造訪耶路撒冷的聖殿，在位於今日傑寧（Jenin）的一座村莊被撒馬利亞人殺害。在這段期間布道的耶穌，也許是出於上述原因，或因為擔心使徒的安危，他起初告訴使徒們，不要在布道時踏進撒馬利亞人的城鎮。不過，後來他改變心意，計畫在前去耶路撒冷途中穿越撒馬利亞人的地盤。耶穌和撒馬利亞女人在雅各伯的井邊的相遇，以及好撒馬利亞人的寓言，展現了猶太人對撒馬利亞人較為友善的態度。也許是因為這樣，基督教在早期就吸引到撒馬利亞的改宗者。

撒馬利亞人後來怎麼了？原來，巴拉塔的朋友們有個驚喜要給我。我們沿著基利心山山側的蜿蜒小路上山，進入位於山頂的一座村

莊。建築物上寫著細長的古希伯來文字。一名戴紅白神職氈帽的白袍男子走在街頭。我在一間小小的博物館中得知男子和村裡的其他居民是何方神聖。這個山頂的村落名為洛茲（al-Loz，意為「杏仁樹」），它和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市郊的一條街，是唯二還能看到世上僅存的七百五十名撒馬利亞人的地方。

撒馬利亞人躲過了猶太人的命運。基督後七〇年，羅馬兵團擊退了猶太叛亂，洗劫耶路撒冷城，永久地摧毀了猶太人的聖殿。更可怕的災難在一三〇年代另一次叛亂後降臨：五十萬猶太人被殺，其餘全數被逐出故土。撒馬利亞人在宿敵消失後蓬勃發展。他們當時的領袖巴巴·拉巴（Baba Rabba）死後，在傳說中被塑造成一位改革者和奇蹟締造者。基督教傳教工作可能在六世紀引發了一連串的撒馬利亞叛亂，而後查士丁尼皇帝毀壞所有撒馬利亞人的會堂，禁止他們擔任公職或為帝國軍隊效力，也禁止他們出庭對基督徒做不利證詞，甚至阻止他們將財產傳給後代子孫。難怪撒馬利亞人變得對外人充滿敵意：基督徒皮亞琴察的聖安東尼（Antoninus of Piacenza，譯按：於基督後三〇三年，因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對基督教的迫害而殉教）通報，每當他造訪撒馬利亞城鎮，他們「以稻草燒掉我們的足跡，無論我們是基督徒或猶太人，他們對兩者皆嫌惡至極」。撒馬利亞人「歡迎」阿拉伯穆斯林在六三七年的到來也是理所當然。

有鑒於今天的阿拉伯—以色列衝突決定了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的關係，雙方曾經親近且互相尊重一事也許顯得有點奇怪。猶太人和穆斯林一度都面朝耶路撒冷的方向禱告，後來穆斯林才轉向了麥加。儘管早期穆斯林和阿拉伯半島的猶太部落交戰，《古蘭經》有很多章節要信徒尊重並容忍猶太人。穆斯林和猶太人一般都認為彼此比基督徒

更徹底地信仰一神論，因為雙方都否認耶穌乃神的化身，而且他們拒絕以任何具象方式描繪神。猶太大學者邁蒙尼德（Maimonides，他在獲准重歸猶太教前，曾被迫當個穆斯林，因而對伊斯蘭瞭若指掌）斷言穆斯林「認為真主有獨一性——他們說的一點也沒錯」。穆斯林學者在設計伊斯蘭早期法學時，借鏡猶太人的學問，有時還拿源自《塔木德》的懲罰，取代比較《古蘭經》中較不嚴厲的懲罰（譬如採用對通姦者投石致死的慣例）。不過，這一切並不保證猶太人會得到比較好的對待。拒絕皈依伊斯蘭一事是他們的軟肋。在伊斯蘭征服後，他們在法律上被歧視，而且經常遭受迫害。但他們直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始終忠於其穆斯林統治者，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更和穆斯林並肩作戰，守衛耶路撒冷不受基督教法蘭克人（Franks）的攻擊。

早期穆斯林統治者對撒馬利亞人是否真為有經人存疑，因而對他們徵收比其基督教和猶太教鄰居更多的賦稅。然而，撒馬利亞人從伊斯蘭征服中獲益良多，甚至多過猶太人。以色列史學家內森·舒爾（Nathan Schur）表示：「阿拉伯征服實際上幫助了內陸的撒馬利亞社會，賦予他們幾百年來不曾有過的信仰自由，使其宗教和文學在中世紀盛行起來。」撒馬利亞人拋棄了阿拉姆語，開始說起阿拉伯語，他們還為自己發明了獨特的名字（譬如使用阿貝·雅威〔Abed Yahweh，意為「雅威的僕人」〕，而不是穆斯林版本的阿貝·安拉〔Abed Allah〕；此外，撒馬利亞人的十誡不同於猶太人的十誡，不包含不可妄稱神的名字這個忌諱）。

然而，儘管沒被迫害，撒馬利亞人為了經濟利益、社會晉升和神學上的理由，仍皈依伊斯蘭。於是撒馬利亞族群持續縮小，同時也沒有持續受到善待。硬派穆斯林統治者有時受到來自神職人員的壓力，

通過懲罰性的、侮辱性的法律，意圖促使撒馬利亞人改宗。就算是開明或友善的統治者，他們最多也只能給予撒馬利亞人暫時的喘息空間。撒馬利亞社群在開羅、加薩、阿勒坡和大馬士革的社區，逐一萎縮，漸漸消失，直到納布盧斯成為這世上唯一能找到他們的地方。時至十六世紀，當時的撒馬利亞人首度出現在西方文獻中，他們絕望地尋找散落世界各地、或許還存在的同胞。法國學者約瑟夫·斯嘉利格（Joseph Scaliger）在那時，誘使他們以為他可能是撒馬利亞人，屬於某歐洲失落已久的群體。撒馬利亞人於是滿心期待地寫信給他：

「我們以主之名要求你，並以其聖名敦促你，切莫使我們對你的請求未得回應……你們當中是否有利未、亞倫或菲尼亞斯（Phinees）的嫡傳祭司，或者該說，你們當中還有人是祭司嗎？」（亞倫來自利未支派，是聖經時代所有猶太祭司的祖先，菲尼亞斯則是亞倫的孫子。）這是他們自己的十支派神話。

儘管人口減少，撒馬利亞人自認繼承了一段令人驕傲的古老歷史。在給斯嘉利格的信中，他們誇耀自己仍有一位繼承菲尼亞斯血統的大祭司（「猶太人沒有菲尼亞斯血統的祭司。」他們在信中爭強好勝地補充道）。他們記得自己所屬的支派，但多數猶太人早已忘記——撒馬利亞祭司和猶太祭司一樣是利未的後裔，撒馬利亞平信徒則追本溯源至約瑟（Joseph）。撒馬利亞人以色列·撒拉比（Israel el-Shalaby）在一八二〇年代告訴傳教士約瑟夫·沃夫（Joseph Wolff），撒馬利亞人並未忘記他們是約瑟的後裔。約瑟遭兄弟們背叛，然後被出賣為奴。撒馬利亞人銘記他的委屈，因而討厭猶太人。撒拉比說道：「我們作為他的孩子，永遠無法忘記我們的父親約瑟被弟兄們如此糟蹋。」

到了一七七二年，納布盧斯的律法仍要求撒馬利亞人在公眾場合佩戴鈴鐺，而且禁止他們騎馬（遇到緊急情況，他們可以騎騾子）。納布盧斯的政治情勢充滿暴力且瞬息萬變：許多蠱惑人心的政客把攻擊撒馬利亞人的機會，看作擦亮自己伊斯蘭資格的手段。其中一人在一八五〇年代引發了一次暴亂，期間有些人開始高聲嚷嚷撒馬利亞人應該在皈依伊斯蘭或者受死之間做抉擇。但就在此時，剛從耶路撒冷來的猶太大拉比，認證他們為真正的一神教信徒（有鑒於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傳統上關係不睦，這堪稱劃時代的舉動），及時阻止了災難發生。

美國傳教士普林尼·菲斯克神父（Reverend Pliny Fisk）過世後於一八二八年出版的回憶錄記載了他和撒馬利亞人的相遇。「他們詢問英格蘭是否有撒馬利亞人，然後當我們告知沒有時，他們似乎不太滿意。他們得知我來自美國後，接著詢問美國有沒有撒馬利亞人。我說沒有，但他們自信滿滿地斷言事實不然，還說印度也有很多撒馬利亞人。」還有一位名叫約翰·彌爾斯（John Mills）的威爾斯人，自學希伯來文、拉丁文和希臘文，曾在一八五〇年代前往納布盧斯。彌爾斯說他覺得撒馬利亞人是個迷人的民族：「他們這個族群在巴勒斯坦無人能出其右……他們高大且氣宇高尚。」他也有力地補充，他們「在五官上有相似的族群特徵，絕不會搞錯」。今日看來的確如此，譬如他們都有獨特的大耳垂。當撒馬利亞人問他，他的國家可有希伯來人，他以為對方指的是猶太人，便答覆有。他們於是再次發自內心對於可能找到了失落的撒馬利亞居民興奮不已。事實是，他們是世界碩果僅存的撒馬利亞人。

撒馬利亞人期待彌賽亞的到來，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大埃伯（Ta' eb，譯按：意為「復興者」）。彌爾斯寫道，撒馬利亞人相信，他們的彌賽亞的降臨「不會使人淌血，而是為了替民族療傷；不會帶來戰爭，而是為了帶來和平」。彌爾斯沒有交代背後原因，不過撒馬利亞人預言彌賽亞將在一九一〇年出現，結果事與願違。另一方面，一九二〇年開始實施的英國託管（British Mandate）成了轉捩點。從那一刻起，撒馬利亞人在英國基督徒的鼓勵下開始復興。英國基督徒對撒馬利亞人慈眉善目，是因為他們被記載在《聖經》中。這是一場及時雨：當時，撒馬利亞人的族群人數來到有史以來的新低——共計一百四十六人。

千百年來，他們持續把古《聖經》文本抄寫在羊皮紙卷上，相信其內容證明了基利心山是神的聖山。他們也記得以色列王國和猶大王國的陳年齟齬。當建立新猶太國家的計畫在一九四〇年代被提出，一名撒馬利亞祭司拿出以色列王朝最後繼承人的一派莊嚴，對一名英國官員說明：「我不反對猶太人再次擁有他們的王國。我不滿的是把他們放在明明是以色列王國的土地，這地方從來不屬於他們！」當時撒馬利亞人只剩兩百人，但猶太人多達一千一百萬的事實，完全沒讓他有所動搖。英國旅行作家H·V·莫頓（H. V. Morton）在大約同一時間評論道：「我覺得撒馬利亞人認為，基督後六三八年才到那裡的阿拉伯人是不速之客！」

* * *

我在二〇一二年為本書的寫作做研究時，回顧了在耶路撒冷當領事時留下的物品。諸多回憶湧上心頭。我找到一張聖墓教堂的復活節彌撒門票票根，想到我當時從教堂圓頂俯瞰，看見正教會宗主教從據說是基督之墓的小隔間奇蹟般地變出火來。我也找到一張哭牆

（Western Wall）的照片；猶太人至今仍會去那裡悼念羅馬人在基督後七〇年將聖殿夷為平地一事。羅馬人當時剷除猶太宗教的心意堅決，因為它太抗拒被他們統治了。（哭牆其實本來是包圍聖殿的擋土牆，而不是原始建築本身的一部分。）此外，我還找到一張有著金光閃閃的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的照片；^[2]在穆斯林征服後，這座建築被興建於聖殿舊址之上。

我也找到一個和撒馬利亞有關的紀念物：以四種語言印製的時事通訊，上面有阿拉伯文、英文、希伯來文，還有一九九八年我在他們村裡建築上看到的細長書寫體。這是古撒馬利亞文字，是一種更古老的希伯來文字。這本小冊子每頁的底部都寫著《A·B·撒馬利亞新聞》（*A. B. The Samaritan News*）。其中記載道，二〇〇一年在巴勒斯坦大起義最激烈的期間所舉辦的逾越節非常平和地展開。^[3]當時巴勒斯坦人同意避免和以色列軍隊產生衝突。他們對我的涉入表示感謝——在初訪撒馬利亞人之後，我又去造訪了多次，包括有次他們請我和巴勒斯坦人談談在逾越節期間停戰。

他們之所以如此拜託我，倒不是因為他們本身和巴勒斯坦人相處有什麼困難之處。誠如時事通訊的報導：「下山到納布盧斯為慶典採買的撒馬利亞人，受到當地居民的熱情歡迎……納布盧斯居民通常會對陌生臉孔投以懷疑眼光……然而，當顧客揭露其撒馬利亞身分，他們的懷疑消失無蹤，笑逐顏開並和對方握手。」讀到這裡，我心想，

撒馬利亞人也許能扮演比失落的以色列十支派還了不起的角色：他們可以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橋梁。

因此，我希望他們會是適合本書的一章。他們的觀念與習俗和猶太人相似，對多數讀者而言，比其他章節的主角更容易親近。以色列學者舒爾把這個族群的存在描述為「大概是史上保有自我民族意識超過千百年的最小群體」，這個說法或許有助說明是什麼讓一群人自認為一個民族。是什麼讓人劃下我們與他們的隱形界線？

我第一次拜訪撒馬利亞人時，很多人仍希望能實現長久的和平。十多年之後，那些希望已變得渺茫。我對於回去會發現什麼感到害怕。但我前去的心意已決，因為我得到了一份邀請。我寫信給《A·B·撒馬利亞新聞》的編輯班涯敏·澤達卡（Benyamim Tsedaka，班涯敏就是撒馬利亞版的班雅明〔Benjamin〕），希望他仍記得我曾短暫訪問過村子。他起初並未回覆。但幾個星期後，我收到他寄來的一封奇妙的電子郵件：「今年的逾越獻祭（Paschal Sacrifice）將在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星期五正午舉行。」他在信中署名班尼（Benny），而且似乎寄給了一大堆可能感興趣的團體。信中也附上一份選自〈利未記〉的閱讀清單，以及何時該閱讀它們的指示。在無酵節（Festival of the Unleavened Bread）期間，人們按規定吃通過潔食認證的無酵餅（kosher matzos，即未發酵的麵包），而且禁止吃麵條。此外，人們應該面朝東方禱告——除非你在印度或是俄羅斯，在這情況下，你應該面向西南。逾越獻祭和無酵節很明顯就是猶太人的逾越節，不過撒馬利亞人的日期和猶太人不同。（兩個族群有些許不同的曆法，撒馬利亞人的節慶可能比猶太人早個兩天，或是遲上一個月。）

我心想五月四日是拜訪班尼和撒馬利亞人的好時機。不過，我先得搞定以色列境管當局。我有理由相信這會很棘手。我的護照幾乎蓋齊了會讓他們起疑的所有戳章：伊拉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這已經使我在抵達芝加哥和倫敦機場時被耽擱。我不敢想像在國安意識強烈的特拉維夫會發生什麼事。不過很久以前，我在派駐耶路撒冷期間曾上過幾個星期的希伯來文課。我想這或許能幫助我稍微化解和境管當局的尷尬氣氛，但我下一秒便意識到我還記得的內容只剩下一首情歌。我懷疑那是否能擄獲任何人的心。

以色列班·古里安機場（Ben-Gurion Airport）的邊防人員很困惑。「你為逾越節而來的嗎？」她說，「但逾越節結束了。」我試圖說明還有另一個逾越節，將在約旦河西岸一處小村莊、由叫做撒馬利亞人的民族舉辦——但在我這麼說了之後，我發現她從來沒聽過他們。我被帶到入境大廳一角的特別等候室，這裡專收需要進一步盤問的可疑人士。我坐在長椅上。約莫十二名巴勒斯坦女人坐在我對面的長椅上。我旁邊是個膚色黝黑的男孩，留著捲長鬚角，頭戴正統派猶太人的小帽子基帕（kippa），身旁還有一大袋有著阿拉伯文標籤的消費品。他告訴我，他從葉門來，剛結束到葉門首都沙那（Sana'a）附近一個村子探親的行程。直到幾個月之前，他都還是葉門僅存最後的四百名猶太人之一。他現在在等待核發以色列公民身分。

幸好盤查很快就結束了，因為機場有位工作人員聽過撒馬利亞人，然後拯救了我。於是在兩個小時內便搭上前往耶路撒冷的巴士，而且因為回憶紛紛湧現，我開始對從斯堪地那維亞前來觀光的同行乘客介紹起景點。我們身後是濱海的特拉維夫城，由猶太移民建於二十世紀；在左手邊的是阿拉伯人的亞布高許村（Abu Ghosh）；前方

則是耶路撒冷——誠如一九六〇年代一首以色列金曲所說，「金色的耶路撒冷」（golden Jerusalem）。城裡最金光閃閃的東西，就是它最重要的穆斯林聖祠的圓頂。但正如其建築的白石頭因為太陽反射而產生不斷變化的光線，耶路撒冷的個性也會隨著一個人觀看的角度而變化。這裡是以色列政府機關所在之處，但也是宗教和世俗觀光客的熱門目的地。它是個建築瑰寶，其城牆至今仍是從數公里外就可看見的顯眼地標，但也是信徒和俗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經常為競奪空間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爭得面紅耳赤的邊境城市。

當晚抵達飯店後，我打電話給班尼，問他前往基利心山洛茲村的最佳路線。他回覆說，這很容易：我只要在耶路撒冷舊城的大馬士革門（Damascus Gate）搭上一輛巴勒斯坦小型巴士。小巴會北上到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巴勒斯坦城市拉馬拉（Ramallah）。接著，我再轉搭另一輛有巴勒斯坦車牌的巴士去納布盧斯。到達納布盧斯後，就有計程車可搭。這路線聽起來可行：我以前就搭過巴勒斯坦的小巴。不過上路前，我還想確認一件事。我知道有時候巴勒斯坦車輛在西岸會受到旅行限制。於是，我致電給納布盧斯的巴勒斯坦行政長官，確保能順利前往洛茲村。長官的聲音聽起來很驚恐。「他們已經為撒馬利亞逾越節關閉全部道路了，」他說，「你絕對到不了。下星期再來吧。」我試圖說明，我恰恰是為了逾越節而來，不過電話已被掛斷。我滿腦子問號。但當我開始尋找替代方案，我意識到還有另一個方法能帶我去找撒馬利亞人。

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的戰爭奪取了東耶路撒冷，以及遠至約旦河的土地，那時有很多猶太人，包括以色列政府在內，想要盡快撤軍。其他人則是持擴張主義的理念，想保留這些征服而來的地盤。他們主

張，以色列的前國界根本無法作為防禦之用。宗教情懷站在他們這邊：耶路撒冷舊城，還有古老聖殿的遺跡，自基督後七〇年，首次回到猶太人的掌控。以色列繼續控制這些地方，而且自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明顯想把東耶路撒冷變成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虔信宗教的以色列人相信，介於以色列前東部國界和約旦河之間的其餘土地——所謂的約旦河西岸地區——也應該永久地屬於以色列。他們在那裡建屯墾區，通常利用以色列當初為軍事目的沒收的土地。由於這違反了《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禁止占領勢力將沒收土地用於平民屯墾的條款，此舉立刻引發爭議。這也使以色列和住在屯墾區附近的巴勒斯坦村民持續發生衝突，同時屯墾者成了恐怖攻擊首當其衝的目標。儘管如此，加入宗教屯墾者行列的還有受經濟動機吸引的其他人：新土地被以很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猶太裔以色列人，其中很多土地底下有珍貴的水源，而土地本身就位於戰略要地之上。屯墾者掛以色列車牌的汽車和巴士不受道路封閉和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移動限制束縛。但即便巴勒斯坦人不能使用道路，這些車輛仍能通行——顯然我得搭上其中一輛。我朝耶路撒冷中央巴士站出發，想看看能否找到一輛可能載我到靠近撒馬利亞村子的車。

巴士站人滿為患。不過多數人都是要去常見的目的地——特拉維夫、內坦亞（Netanya）、伊拉特（Eilat）。我諮詢站務員，得知前往西岸的巴士是從車站最遠的一個特別停車區發車。上車後，我發現巴士車身是防彈金屬做的，而且和我同行的大多是佩戴機關槍的士兵。屯墾運動倡導者認為，在西岸建立社區象徵回歸聖經時代就屬於猶太人的土地，同時也是對恐怖主義的積極反抗。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這些社區再現了以色列對西岸地區的軍事征服當中，那份具種族

歧視意涵的剝削，以及一種在不知不覺中阻擋他們獨立建國野心的剝削。這些年來，屯墾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頻仍又血腥。

巴士一路向北，穿越了一道「隔離圍牆」：半柵欄、半高牆，是為減少對以色列人的恐怖攻擊而蓋的。它將巴勒斯坦人與耶路撒冷隔絕，有爭議地限制了前者前往聖地的管道，無論是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或穆斯林。在牆的另一邊，我既身在以色列，又出了以色列。我在一輛以色列巴士裡，前往某個和以色列城鎮沒什麼不一樣的小鎮，駛在一條以色列人修築的道路上。但我已正式離開以色列了：我進入的區域不是由若干民選文官而是一位軍政長官負責管理，生在那裡的非猶太幼童不享有以色列國籍。一條給巴勒斯坦人用的路坑坑洞洞，頗為顛簸，它有時和以色列人用的道路平行，然後又消失不見。我的手機收到一封電信公司自動轉換時會寄來的簡訊：「歡迎來到巴勒斯坦。嗅聞茉莉花，大啖橄欖！」防彈玻璃窗使外頭氣味傳不進來，但廣播訊號無法如此輕易被擋住，就像回憶和罪惡感。就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手機電信網路似乎也彼此重疊、相互競爭。

多年來，以巴和平進程的目標在於劃出一條介於兩者之間的界線。然而，地圖上的界線只是個平面上的東西；二〇〇〇年大衛營（Camp David）協商期間，有人主張立體的界線有其必要。在此提案中，穆斯林心目中神聖的「尊貴禁地」（Haram ash-Sharif，也就是「聖殿山」）屬於巴勒斯坦人，山下的古老猶太聖殿遺址則屬於以色列。但也許立體的界線同樣有所不足。要瞭解以巴之間錯綜複雜的難題，還需要透過第四個維度——肉眼看不到，但住在那裡的每個人都很熟悉：歷史。以色列、西岸地區、加薩走廊的每個地方，都有一個阿拉伯名字和另外的希伯來名字；每個地方也同時與猶太和巴勒斯坦

有所淵源及歷史。居民至今仍不太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來稱呼兩個獨立國家，而是把那些當作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土地的替代名稱。占總人口五分之一的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漸漸開始自稱巴勒斯坦人，但在西岸逐步蔓延的以色列屯墾區使「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也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變得越來越沒希望。

我正前往的城市納布盧斯被以色列人稱為示劍——這是該地在聖經時代的地名。這座城市有一座歷史悠久的穆斯林清真寺，但也有像約瑟墓址（Joseph's Tomb）這樣的猶太聖地。就像巴勒斯坦人的歷史古城雅法（Jaffa）位於特拉維夫的郊區，住在納布盧斯市郊的難民也有很多人原本來自雅法。兩民族不只在地理上糾纏得難分難解。語言也是：耶胡達發明現代希伯來語時，如果在《聖經》找不到他需要的單字，便從阿拉伯文借用單字。這個過程自那時起便持續不輟，譬如以色列人採用阿拉伯俚語，像是「呀拉」（yalla），意為「走吧」，或是巴勒斯坦人使用希伯來單字「馬素姆」（mahsoom）稱呼檢查哨。兩個民族的DNA也有跡可尋。一份二〇一〇年出版的研究總結——撇開南歐人對猶太DNA的影響（這可能是前者皈依猶太教所致），「多數猶太人口在基因上最親近的鄰居是巴勒斯坦人、貝都因人和德魯茲人」。

即便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有共同的祖先，他們的信仰隔閡勝過了親族關係。一起禱告和擁有相同信念所培養出的信任感，最終大於因來自同個家族或部落所產生的信任感。類似情況曾發生在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之間。二〇〇四年，一份基因研究顯示，猶太祭司和撒馬利

亞人為近親——支持了撒馬利亞人聲稱他們的確是被亞述人饒過一命的以色列支派後裔的說法。

來到這座撒馬利亞村莊並非易事。同行乘客跟我說，最靠近撒馬利亞人的屯墾區是祝福山（Har Brakha）。它的規模很小，居民極為虔誠。要前往此地得搭三班不同的巴士。我首先在阿里埃勒（Ariel）下車，這是屯墾擁護者在七〇年代創立的大學城，徒有規模卻乏味，而其建立的目的是藉由讓建物直接坐落於西岸地區的正中央，以阻擋巴勒斯坦建國。此後這裡吸引了不少人口流入，其中很多人只是看上了便宜的住房。我沿著安靜的林蔭街道遊蕩，飢腸轆轆，一邊尋找到頭來完全找不到的市中心。我放棄買食物的念頭，等待下一班巴士。這班巴士比第一班空。我在車子行駛時，看見當地猶太屯墾者開墾的葡萄園和花園。他們嘗試過更貼近真實的《聖經》生活。假使他們和巴勒斯坦人的關係能稍微和睦一點，他們或許會從橄欖收成期間的巴勒斯坦村莊，或是正午時分有個謝赫坐在帳篷入口的貝都因營地，感受到一幅幅《聖經》景象。但事實是，他們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拓荒者。

第二班巴士把我載到納布盧斯外一處有水泥防暴牆保護的路邊庇護所，附近還有一座加油站。這裡位於基利心山腳下，而祝福山就位於基利心山山頂。要不是有群幼童和我一起等下一輛巴士，任誰也想不到這裡有歷史或神聖性可言。就像我在機場遇到的葉門人，這群孩子留著虔誠猶太教徒的捲長鬚角，對我投以好奇的眼光。顯然，來這裡的陌生人不多。下一班巴士進站，載我們——活潑好動的男孩在前，嫻靜端莊的女孩在後——上山去成群房屋構成的祝福山。在屯墾

區邊緣，我可以看見在兩三百公尺外的撒馬利亞村莊。有一條路通往那裡，路的一旁是樹木，另一旁則是曠野。我下了巴士，開始步行。

以色列人稱這個撒馬利亞村莊為「基利雅特盧札」（Kiryat Luza），它的巴勒斯坦名字則是「托爾」（al-Tor）。撒馬利亞人也給這裡取了名字：洛茲。在洛茲，他們謹慎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維持中立，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洛茲的居民同時擁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政府發放的證件，此外也可以持有鄰國約旦的護照。他們明顯不是穆斯林，卻也不是猶太人。他們多數時候設法對兩個民族皆保持開放。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來村裡是和一群巴勒斯坦難民。這次我則在一名猶太人的陪同下入村；他在我步行時開著貨車到我身旁停下，說要載我一程。他把前座滿地的紙張掃到一旁。「這裡除了我和神以外，不常看到其他人。」他開玩笑說道，然後說明自己是會拜訪屯墾區和巴勒斯坦城鎮的行動業務。他說，這工作沒太危險，而且現在的情勢還算平靜。

這座村莊本身彷彿被設計成文化多樣性的展示櫃。村裡只有一條街，是青少年社交的地方。一群男孩說著阿拉伯語——原來是有一群來自納布盧斯的大學生來到這裡見一位撒馬利亞友人。穿短裙的女孩們坐在主要商店裡的桌子前以希伯來語聊天。她們是來自特拉維夫郊區的撒馬利亞人，比較融入以色列社會（衣著就清楚地說明了這點——這裡的一般村民穿著比較保守）。我猜來此逗留對她們而言，可能是找丈夫的好機會，因為撒馬利亞人——尤其是撒馬利亞女人——不可以嫁給不同信仰的人。

我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解決。我來村子前沒有安排過夜的地方，本打算住在納布盧斯的飯店，但看來維安規定會使我去不成。我完全不

知道今晚要睡哪，但我想說，至少能在村裡的兩家店買點食物。可是在逾越節準備期間，村裡沒人吃、也沒人賣平常會有的發酵麵包。我的最佳果腹選擇是一罐橄欖和一塊起司。排隊付錢時，我看到許多馬克杯和T恤懸掛在商店的天花板，印著「好撒馬利亞人」的字樣。村子的迎賓中心也是這個名字，但當天沒開。

我走到位於村子最高處的撒馬利亞聖殿遺址。柵欄圍繞著考古學家仍在挖掘的區域，他們在那裡有些引人注目的發現。有個男孩自願帶我參觀，但得付他一筆費用。他用身上的鑰匙幫我開了門，帶我看支撐這座在過去絕對十分雄偉的聖祠的岩石地基。考古學家已辨識出這座撒馬利亞聖殿興建於兩百五十年前，就位於這九十五公尺乘九十七公尺大的圍籬範圍內。過去，同一時間能有數千名訪客進入聖殿禱告。遺址出土的骨頭碎片多達四十萬件，說明了用於獻祭的動物之多。有段銘文告訴人們它是「聖主之家」（House of the Lord）。挖掘這座遺址的首席考古學家提出了充滿爭議的結論，認為撒馬利亞聖殿建造的時間比第一座猶太聖殿更早。

我們從這圍起來的區域邊緣，鳥瞰位於下方谷地的納布盧斯。我看到有雅各伯的井的教堂。雅各伯有十二個兒子，每個兒子各自成為一個支派，即以色列十二支派。我問男孩他來自哪個支派。「瑪拿西（Menashe）。」他說。瑪拿西人是約瑟支派下的兩個分部之一，也就是說約瑟是這男孩的祖先。我們看得到約瑟的墳墓也在下方。當然，約瑟可能是今天非撒馬利亞人的很多其他民族的祖先。納布盧斯和周邊村莊的許多穆斯林居民，一定也有撒馬利亞血統。有些家族直到最近才皈依伊斯蘭。來自這樣家族的阿迪里·耀什（Adli Yaish），曾作為支持哈瑪斯（[Hamas](#)）^[4]的候選人，以百分之七十六的差距，獲

選為納布盧斯市長。班尼後來對我聲稱，有超過九成的巴勒斯坦人是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的後裔。「如果你問任何一邊的虔誠信徒，他們會說這是胡說八道。但這是真的！」（班尼很看重把他和他所生活的土地連繫起來的悠遠歷史。後來有一次，我和班尼在英國，有個猶太人問他的家族住在以色列多久了。他錯聽班尼的答覆，然後說：「一百二十七年？那還真久！」但班尼回答：「不，是一百二十七代。」）

* * *

結果從聖殿遺址到班尼家只有一小段路。班尼有點像是撒馬利亞人的發言人。他舒適的夏日別墅還兼作社區報紙的總部。房子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常用的奶油色石頭作為外牆，遮住用來蓋房子的灰色水泥，以提升質感。班尼住在二樓，整座山坡的景色盡收眼底。除了我之外，他也在這裡接待絡繹不絕的訪客——一位拉比、一對基督教新教夫婦、一個電影工作團隊——然後回答我們的所有問題。我的問題是關於撒馬利亞人的信仰。撒馬利亞人不承認諸如〈但以理書〉和〈以賽亞書〉（Book of Isaiah）等猶太宗教文獻：對他們而言，《摩西五經》（或稱《妥拉》）獨一無二。不過，撒馬利亞人的《妥拉》和猶太版本的《妥拉》稍有不同。誠如前文所述，他們的十誡並未禁止他們稱呼神的名字，不過卻明確要求他們在基利心山上建造祭壇。班尼主張，撒馬利亞人的《妥拉》是比較可信的版本。在他看來，他的民族在過去千百年來將文獻保存得更好，因為他們留在同一個地方，嚴謹地將珍貴經文從古卷抄寫到新紙卷上。

但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實際上最大的分歧，在於撒馬利亞人不承認在《妥拉》成書後發展出的一切猶太傳統。舉例來說，由於《妥拉》並未明確要求男人時時刻刻將頭覆蓋住，撒馬利亞人一般而言不像正統猶太人那樣穿戴基帕。撒馬利亞女人也不穿戴假髮或用頭巾遮住她們的頭髮。然後，因為《妥拉》確實要求他們在逾越節獻祭羔羊，並把羊血塗在門框上方與兩側，他們便老老實實地照做——誠如我接下來將看到的。此外，他們不慶祝猶太人的普珥節（Purim）和光明節（Hanukkah），因為這些節日出現的年代晚於《妥拉》。

他們也不承認任何背棄或鬆綁《妥拉》規定的猶太做法。他們保存古老的祭司傳統。猶太聖殿仍屹立時，眾多祭司在一位大祭司的率領下進行侍奉。利未支派的世襲祭司仍在猶太教扮演它的角色：舉例來說，他們在正統的猶太禱告儀式上，負責傳遞祭司的祝福，而且根據猶太律法，不可娶離過婚或改宗的女人。然而，他們不做獻祭，而且在猶太社會裡，其領袖角色已大致被拉比取代。另一方面，在撒馬利亞社會，祭司的功能則仍和兩千年前如出一轍。班尼告訴我，有二十八名撒馬利亞男人是祭司，他們是從據稱為利未之後的家族挑選出的成年男子。他們監督且指導割禮、讀《妥拉》、訂婚、結婚、離婚（「這很罕見，」班尼信誓旦旦地說，「一百年來只發生過五次。」），並負責領禱。他們每年也在逾越節時獻祭動物。撒馬利亞的大祭司則扮演宗教事務方面的最高法院。

撒馬利亞男人和正統派猶太男人一樣，不碰正值生理期的妻子。不過撒馬利亞規矩更進一步規定：就連行經婦女碰過的物件都被認為是不潔的，而這代表她們必須被徹底隔離。班尼解釋：「女人月經來的時候會有一個特別的房間讓她在那裡住上七天。生了兒子之後，要

住四十天，如果生的是女兒，那就是八十天。期間不可以和他人有任何肢體接觸，但她可以說話——只是要坐在另一張桌子。不過天大的好處是——」他接著說：「丈夫要做她在家中的一切家務！全家人一起幫她。這能減少身體自然產生的壓力。」月經結束後，婦女會行沐浴儀式，自我潔淨。

撒馬利亞安息日是從星期五日落後開始，直到星期六日落結束，和猶太人的一樣——可是更嚴格。他們沒有到像愛色尼人（Essenes）那麼極端。愛色尼人是個嚴格的猶太教派，他們給自己制訂了不能在安息日排便的（肯定很痛苦的）規矩。但撒馬利亞人不能在安息日點火，而這在只有蠟燭和煤油燈的歲月，意味著一片漆黑——他們和猶太人不一樣，不能請不同信仰的人幫他們點蠟燭。他們在十六世紀時寫信告訴學者斯嘉利格，在安息日，丈夫不能與妻子共眠。他們只在禱告時才會走出家門。即便到了今天，撒馬利亞人不會在安息日走出村莊，此外他們在這天也不抽菸。他們仍在安息日穿著他們相信為猶太人在出埃及時所穿服裝的複製品。班尼告訴我，他在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念書時，每逢安息日也都是作如此打扮。

班尼說，撒馬利亞人必須住在以色列之地。這在他們的見解中是包括埃及在內的。（事實上，撒馬利亞人在基督前二世紀曾生活在希臘小島，但規定在那之後變得更嚴格了。）班尼可以到國外旅行（他旅行是為了參加會議），但不能在離開撒馬利亞社區後吃肉：對撒馬利亞人而言，除非動物是由撒馬利亞人嚴格依據〈申命記〉（Book of Deuteronomy）規定宰殺，將其右前腳獻給一名祭司，否則就不算潔食。可是，班尼仍能到清真認證餐廳或潔食餐廳吃素食。

班尼也更新了我的撒馬利亞歷史知識。他來自擁有悠久歷史的詩人和拓荒者家族。他的曾祖父在一九〇五年離開納布盧斯，在雅法建立了第二個撒馬利亞社區。相較於偏僻又保守的納布盧斯，雅法是有龐大猶太社群的濱海大都市，能提供更多樣化的工作機會。在這麼多猶太人生活的城市裡，也有比較多的潛在結婚對象。撒馬利亞新娘的人數越來越少——基於尚未查明的原因，族群已經歷好幾代女嬰不足的情況——他的兒子耶費特（Yefet）決定打破古老禁忌：他將迎娶一名猶太女子。（說服耶費特這麼做的，是後來的以色列總統伊扎克·班—茲維〔Yitzhak Ben-Zvi〕。茲維遇見耶費特的父親時，被對方以古希伯來文稱呼，因而對撒馬利亞人起了興趣。）

儘管困難重重，耶費特成功了。他娶了來自俄羅斯的猶太女人米利安（Miriam）。班尼是他們的孫子。坐在客廳沙發等太太準備晚餐之際，他自豪地指著愛因斯坦般的狂野捲白髮——從俄羅斯血統那邊得來的遺傳，他說。「如果你問我，我會說這也讓我變得比較酷（cooler）。」他對我說，但我想他意思是「比較有耐心」。但為什麼撒馬利亞人有不能和外族通婚的規定呢？保護他們不和勢力更強大的族群糾纏不清是其一。根據伊斯蘭教法（撒馬利亞傳統亦然），孩子應該信奉父親的宗教。嫁給外人的女子，等於帶著她將來的孩子一起離去了，剝奪了族群內一些男人娶妻的可能性。因此，中東的族群盡量不讓他們的女人嫁給信奉其他宗教的男人——有時甚至動用暴力。直到最近，對撒馬利亞男人而言，身為區域內人口最少的弱勢族群，因為迎娶其他族群的女人而挑釁了該族群，可能危及所有撒馬利亞人的安全。對撒馬利亞女人而言，嫁給外族就意味著撒馬利亞族群的衰頹。不過，不許嫁給外族的禁令，確保了撒馬利亞人的文化和血

脈能延續下去，而不至於被周邊規模更大的民族吞沒。除此之外，撒馬利亞人珍惜他們的系譜，視之為與聖經時代祖先的親密聯繫。

我問班尼，他的祖母後來怎麼了？他說，打破先例當然造成一些爭議。「長老們起初不承認她。可是，」他咯咯笑，「在她生了六個女兒之後，他們就接受她了。」撒馬利亞人最需要的就是女兒。通婚變得越來越普遍，特別是在雅法的撒馬利亞人。班尼自己就娶了羅馬尼亞血統的猶太人；她在嫁給他時，接受了撒馬利亞的種種習俗。

「問對方的出身有點種族主義的意味：『你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班尼說，「她改變自己融入我們。她成為像我們一樣的以色列人（Israelite）。」他說，這年頭，撒馬利亞人約二成五的婚姻，是撒馬利亞男人和非撒馬利亞女人通婚。女方多是猶太人。有些來自東歐。還有兩人來自中亞的穆斯林家族。

有部關於撒馬利亞人的紀錄片，訪問了兩名嫁給撒馬利亞男人的烏克蘭女人（而且她們顯然很適應在新群體的生活），也訪問了對此趨勢不滿的一名祭司家族成員。「當我們接受外來女人進到我們的民族，」他說，「這令我對未來感到害怕，害怕我們有一天會無法控制她們。我們的民族維持獨特傳統與習俗已有三千六百四十二年，我們務必在未來繼續保持，否則會陷入混亂。」

撒馬利亞女人和非撒馬利亞男人結婚是被嚴格禁止的。另一部拍攝於二〇〇八年的紀錄片直視蘇非·薩德卡（Sophie Tsadka）的痛苦；她因無視規定嫁給了一名猶太男人，遭撒馬利亞社會放逐。她是以色列電視圈的知名女演員。撒馬利亞男人們在一次訪問中表現得對她毫不同情。有一人表示，要是他自己的姊妹打算嫁給外人，離開原生宗教的話，「我會說好啊……但她晚上睡覺時，就會沒命了。就好

像殺一頭綿羊那樣。」沒有證據顯示任何撒馬利亞女人曾因這個原因被殺害，但千百年來，正是這樣的嚴厲態度保護撒馬利亞社會不被同化。這是撒馬利亞人在溫情和群體精神之外比較黑暗的一面。在紀錄片中，蘇非顯然很想念前者。

撒馬利亞人恪守傳統——若非如此，他們今天早已消失。但就像他的祖父一樣，班尼找尋詮釋信仰古老傳統的新方式。他的創舉之一是把撒馬利亞觀點與生活方式傳播出去，好讓非撒馬利亞人也能模仿。彌爾斯在一八六四年出版了一位撒馬利亞祭司在幾十年前寄給格蘭撒馬利亞社會的一套表格，講述的是撒馬利亞版的失落的十支派神話，內容虛無縹緲。彌爾斯說他出於歷史考量，添加了圖表，「畢竟這很可能會是這類文件中最後一份由撒馬利亞祭司草擬的。」他錯得離譜。班尼如今繪製類似圖表，寄給世界各地想要追隨撒馬利亞生活方式的人。「這是一個新的現象，人們想加入社群——單身者社群、家庭、部落。我和數千人透過網路保持通訊。我不相信可以一次接納數千人。我們接收一個家庭又一個家庭。他們想按照《妥拉》的訓示生活。他們寄給我很多問題，然後我寄書給他們。他們很興奮。他們來自世界各個角落：印度、前蘇聯、歐洲、美國、澳洲、巴西。其中有些人是猶太人。」

我意識到，班尼的群組信原來是給想採納撒馬利亞生活方式之人的指南。這些電子郵件顯示撒馬利亞《妥拉》的哪些內容，可以對應年曆上的哪個安息日，以及什麼時候該慶祝撒馬利亞曆法的七大節慶。七大節慶包括五旬節（Shavuot），此時撒馬利亞人會到基利心山上的許多聖址朝聖（譬如他們心目中亞當、以撒和挪亞向神獻祭之處）；贖罪日（Yom Kippur）的禁食日這天，撒馬利亞的禱告儀式會

不間斷地持續二十四小時；還有住棚節（Sukkot，譯按：也叫做收藏節），是撒馬利亞人以水果裝飾住家，慶祝收成的節日（不同於猶太人在戶外搭建棚子，撒馬利亞人從頭到尾都在家裡慶祝住棚節）。野心勃勃的撒馬利亞人家客廳，可能裝飾有石榴、蘋果和檸檬，而且全都是超大的果實。此外，參與筵席的人頭頂上的天花板可能掛著高達半噸的水果，和棕櫚樹細長的葉子與柳樹支條交纏在一塊。撒馬利亞人坐在滿天花板的大豐收下，喝自釀啤酒，吃蛋糕和浸泡過水的杏仁。

班尼的線上追隨者，只有極少數真的來村裡生活。「他們不需要親自過來加入我們。大家都可以在家中過撒馬利亞生活。如果他們派代表前來，我會負責接待。人總在尋找讓他們不再感到無聊的事物。而人們視我們為真理的民族，令我們感到自豪。」就我的觀察，班尼在他只有七百五十人的族群裡地位獨特。可是當我問他，一旦他不在了，誰會接手發布新聞、參加會議，以及做撒馬利亞歷史的研究時，他微笑回答：「我們有句諺語：每個世代都有神安排的接替者。我想他們在每一代都會找到像我這樣的瘋子。」

截至目前為止，有一個和班尼通訊過的家庭來到洛茲生活。他們是美國人，以前是基督徒。我在洛茲時，這家人的一員馬修

（Matthew）來找班尼，我因而有機會與他交談。馬修告訴我：「我媽對《舊約》越來越感興趣。」他的母親莎朗（Sharon）納悶基督徒為什麼沒保留猶太律法；她想要更切實地遵守這套律法，於是在上網找資料時發現了班尼這號人物。「六到八年前，班尼來訪，我們慢慢開始仿效撒馬利亞人做的任何事。隔離不潔的婦女，安息日留在自家社

區，諸如此類。年邁的大祭司邀請莎朗加入他們的社群，因此她申請宗教研究課程，然後被希伯來大學錄取。」

在與撒馬利亞人初次相遇的八年後，馬修在班尼家為逾越節獻祭做準備。他的其他家人並未堅持下來：馬修的兄弟們在厭倦了必須定期上會堂禱告後，和撒馬利亞生活漸行漸遠，莎朗則是搬到了耶路撒冷。不過，在我造訪的兩年前，馬修就已獲邀加入社群的逾越節宗教儀式，並曾吃過獻祭的羔羊肉。這是最終極的接納。「許多家庭一起生活，這是我愛這個社群的地方。」他說。實際上，搬來和撒馬利亞人一同生活，意味著學習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他還沒開始學，但他有打算接受這項任務，然後念商科，並在撒馬利亞人位於特拉維夫的社區長久安頓下來，成為第一位美籍撒馬利亞人。（隔年，我聽說他放棄了這個計畫，回到美國去了。自此之後，沒有其他外人追隨他的腳步來村裡居住。）

那天下午，班尼帶著我參觀村莊，讓我看看這裡的人家如何為逾越節做準備。我親眼目睹他直接走進別人家裡，甚至不需要按門鈴或徵求許可。在某戶人家的地下儲藏室，搖籃與嬰兒車被推到牆邊，好騰出空間。有個阿拉伯名字叫蓋特（Ghaith，他的希伯來名字是摩西）的男子，正在熱燙的金屬弧形托盤「塔布」（taboon）上，擀開只以水和麵粉製作的麵團。需求量極大：一如猶太傳統，在即將到來的逾越節七天期間，人們只能吃未發酵的麵包。班尼遞了兩片烤熟的麵包給我們，燙口酥脆，味如雞肋。在逾越節的預備階段與節日期間，男人得負責煮飯與其他任務。蓋特的太太坐在一旁，心情有點不太好。「我一年煮飯三百六十四天，」她用阿拉伯語說，「沒有人來拍我煮飯的照片。他一年做飯一次，大家都覺得了不起？」

撒馬利亞人還有一項義務我從沒看過，不過隔天清晨，我獲得了熱情洋溢的介紹。撒馬利亞人讓我在賓客大廳過夜，我斷斷續續地打著盹，被怪異聲響吵醒，窸窣耳語的回聲從四周空房間傳出。那很明顯不是對話或辯論的聲音，因為大約有三十個聲音不停地出聲，可是又彼此不協調。我一時半刻搞不清聲音到底打哪兒來。然後我意識到：賓客大廳就在撒馬利亞的會堂「津夏」（kinsha）旁邊。我走去探個究竟。我得在「津夏」入口處脫去鞋子，然後把鞋擺在外面的一間房。誠如摩西在西奈山（根據撒馬利亞人的信仰，應是基利心山）上領受律法時把鞋脫掉一樣，撒馬利亞人也在律法的面前脫鞋。

禱告房朝東，一端的神龕被黃色簾幕遮住。簾幕前站著白袍大祭司和他的兄弟。小時鐘和七燈燭台（menorah）一起被掛在白牆上。天花板懸著吊燈和吊扇。這棟建物在一九八〇年代落成，但神龕裡擺著好幾百年、甚至可能有上千年歷史的羊皮紙卷。彌爾斯稱它們為「歐洲學者的欲望與絕望」，他想看它們的決心「幾乎成了一股狂熱」。當他終於有機會一探究竟，他發現有一份紙卷聲稱這些紀錄是聖經時代寫下的。這可能性不大——就算是羊皮紙也沒那麼長的壽命——但也許它的內容是從聖經時代的文書抄寫過來的。大英圖書館有些有著七百年的歷史卷軸，是在十九世紀向撒馬利亞人買來。卷軸上寫著祝福語的地方被祭司邊摸邊念誦，因此羊皮紙顏色發黑、磨損嚴重。

我聽到的呢喃聲是由村裡所有的撒馬利亞男性發出的；他們穿著下襠長及腳跟的薄棉袍，聚在這間房裡念誦禱詞，每個人按照自己的速度與節奏，用不同的詞語，而非齊聲禱告。三不五時，他們會停止念誦，手膝貼地跪拜，以額頭觸碰地板。撒馬利亞人在禱告時會覆蓋住頭部，誠如某些虔誠的猶太人無時無刻不戴著基帕。撒馬利亞人有

三種不同的頭帽：穆斯林穿戴的那種白色祈禱帽、紅色的氈帽，還有黑色的貝雷帽。住在特拉維夫的撒馬利亞人偏好最後一種，因為他們比較跟隨現代潮流。換裝的效果出奇。長袍加上一件羊毛夾克，搭配紅氈帽，使我眼前這人彷彿從談論鄂圖曼帝國的書籍走進現實。此人旁邊的人穿著雨衣和貝雷帽，活脫像個法國藝術家。

撒馬利亞人在逾越節前的一個星期，日夜祈禱；平時的每個星期六，人們可能在家禱告，或去會堂禱告。禱詞是撒馬利亞版《妥拉》的內容，摻雜撒馬利亞人幾世紀以來所寫的宗教詩。多數人似乎倒背如流，不過有個戴眼鏡的青少年拿著書宣讀。後面的年幼孩童就沒那麼投入了，其中一個還在角落打起瞌睡，氈帽落到一側。他的同學咯咯笑，請我把他拍下來。青少年叛逆頂多如此而已。缺席禱告顯然是難以置信的。其中一名青少年在禱告暫歇時，忍不住打開話匣子，稍微跟我描述了他的家庭：他有個姪子因為是祭司家族的長男，按照傳統，當天會被人在前額塗上獻祭的動物的血，另一個姪子念資訊工程，想到以色列軍隊服役。男孩在講人生故事時，偶爾會中斷並和其他人一起行跪拜禮。

那天上午，禱告儀式結束後，我在主要大街上閒晃。街的盡頭有家店賣啤酒和威士忌，經營的撒馬利亞人叫賈米爾（Jameel）。我們坐著喝咖啡，聊了一會兒。村裡其他男人加入我們，並欣賞我拍的照片。我為什麼給睡著的男孩拍照？他們懷疑地問。我是不是把他們當作笑柄？我們的對談被電話多次打斷，納布盧斯的巴勒斯坦人打來下訂單，賈米爾稍後得離開處理送貨與其他事宜。

「昨天真是累翻了，」他說，「我為家裡準備無酵餅。我們是個大家庭！」他父親曾是祭司，而店鋪其中一面牆的顯眼處，貼著一張

逾越節獻祭儀式的巨幅照片。我問撒馬利亞人現在的處境如何。「我有點擔心。」他說。納布盧斯暫時無風無雨，這是好事，但情況可能會改變。「應該維持現狀。巴勒斯坦大起義對以巴雙方都不好。現在很平靜、安全。我們需要納布盧斯——我們從那裡取得一切，我們所有的食物。」有幾位撒馬利亞人還在納布盧斯經營店鋪，而且擁有其他產業。撒馬利亞人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都還住在納布盧斯，但他們被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嚇得搬回自己的獨立村莊。

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譯按：一九九四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後的首任主席）經常吹播，撒馬利亞人在巴勒斯坦治下受到善待，暗示這可以是巴勒斯坦在西岸地區擁有主權的先例，而西岸地區也同時開放猶太人進入。他在巴勒斯坦議會為撒馬利亞人開創了一個保留席。隨後賈米爾的父親贏得了選舉，大抵因為獲得穆斯林的支持票：他在納布盧斯小有名氣，他的啤酒和威士忌店顯然為他贏得不少朋友。

賈米爾的父親繼承了撒馬利亞人輔佐穆斯林統治者的悠久傳統。儘管過去千百年，撒馬利亞社會整體而言脆弱且處於不利地位，但因為他們沒涉入分裂地方穆斯林的部落殊死鬥，經常有人獲得青睞擔任要職。不過，那些殊死對抗可能讓撒馬利亞顧問性命不保。男子雅各伯·艾什·薩拉比（Jacob Esh Shalaby）是個非比尋常的撒馬利亞人：他很小的時候就愛上金錢與冒險，收了一名傳教士的錢，爬下雅各伯的井，將外來訪客掉入井內的《聖經》撿回。後來，他旅行到英格蘭（大概為此打破了撒馬利亞規定），並在一八五五年寫了一本回憶錄。在回憶錄中，他記錄祖父的兄弟擔任納布盧斯行政長官財務長的經歷。行政長官隸屬一派系，後來另一個派系掌權。祖父的兄弟接

到死亡威脅，被打入大牢，然後判了死刑——不過他成功脫逃，也可能是被釋放或得到緩刑。最終他輪流效力每一個敵對的交戰家族，性命是保住了，不過很早就白髮蒼蒼。

阿拉法特邀請撒馬利亞人進入納布盧斯政治圈一事，最後平安地劃下句點。他們的保留席被廢除，使規模稍大的基督教族群成為在巴勒斯坦議會唯一擁有保留席的少數族群。我和賈米爾及其他幾位村民坐在一塊，我問撒馬利亞人是否覺得被冒犯。不，他們齊聲回答。事實上，他們鬆了一口氣。撒馬利亞人涉入政治只會招惹麻煩，他們寧願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很困難，特別是對一個脆弱的少數族群社會。可是截至目前為止，撒馬利亞人很有技巧地堅持中間路線。當天稍晚，我遊蕩到村子的盡頭，穿過了很明顯是來阻止外人在安息日進村的一道門。我走過馬鈴薯田和林木稀疏的坡地。一八五五年，彌爾斯曾在同一片坡地，聽到夜裡的胡狼對彼此嚎叫，「交互輪唱駭人的音樂，吸引彼此的注意」。那時，山上沒住人，每當撒馬利亞人前來執行逾越節獻祭，他們會搭起過夜用的帳篷。如今胡狼不太可能還能在那裡過活。建案四起，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億萬富豪慕尼·馬斯里（Munib al-Masri）的超級豪宅。幾名地方工人正忙著蓋其中一棟房子。他們有點懷疑地打量我，直到我以阿拉伯語和他們攀談。這點令他們很滿意。他們說，情勢風平浪靜，這是好消息。「這些房舍還算是撒馬利亞村的一部分嗎？」我問。「不，」其中一名工人答，「住在這裡的是巴勒斯坦人。」但撒馬利亞人難道不是巴勒斯坦人？「應該算吧，」他猶豫地答覆，「尤其是老一輩的。年輕一輩的我就不確定了。好，這樣吧，就說這些房子屬於阿拉伯人好了。」

男子的困惑反映現實，因為撒馬利亞人的地位模糊。二十世紀中葉時，撒馬利亞人和穆斯林比一百年前更能和平共處。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派出的特使，在一九五〇年代寫信給男爵說，撒馬利亞人「和穆斯林關係良好」。來自納布盧斯的穆斯林女子雅琳（Ahlam）告訴我，她有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在住棚節慶時到不同撒馬利亞人家中的回憶：「我們逢年過節會到他們家中拜訪，他們在其中一個節慶期間拿水果裝飾住家。事實上，他們爭取外界關注的努力勝過基督徒。他們不會接受我們的款待。」這是因為飲食法則（kashrut）的規定；撒馬利亞人被規定只能吃以特定方式準備的食物，這點和猶太人一樣。「但他們會邀請我們和他們一起吃飯。」雅琳說。但她後來發現這份親密並非無限上綱。她放學後會上一位學校老師的私人家教課程。這位老師暗戀一名穆斯林同事；他有膽跟學生說，但絕對不可能告訴那名女同事。雅琳不懂為什麼。她當時年紀太小，不瞭解那些將撒馬利亞人和穆斯林與其他外人分離的嚴苛規範。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征服西岸地區後，他們發現雇用撒馬利亞人擔任半官方行政職務的好處，使得撒馬利亞人的地有了進一步的改善。與此同時，撒馬利亞人繼續維持和巴勒斯坦人的友好關係。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後，暴力事件變得頻繁發生。一名不幸的撒馬利亞祭司在同一個晚上被射中兩次，一槍是來自誤把他當作以色列屯墾者的巴勒斯坦槍手，後來他在無法操控方向盤的狀況下，被以色列士兵看到他左彎右拐地朝他們直衝，以為他是自殺炸彈客，於是也朝他開了一槍。他福大命大活下來了，並在事後得到雙方的道歉。現在

太平無事，撒馬利亞人的生活比過去幾百年都更好了，但他們沒把和平視為理所當然。

回到班尼的公寓，夕陽漸落，逾越節慶祝活動即將開始。我在一旁等待著，聽兩名婦女和他討論錄製聖樂的計畫（各式各樣的撒馬利亞音樂已被錄製並以光碟發行，由撒馬利亞人主唱）。他們討論完畢後，我問了他一些政治問題。「我們正嘗試扮演以巴之間的某種橋梁，」他說，「我們沒有貢獻己力的實質力量。我們還在為自己的生存奮鬥。如果我們選邊站，結果另一邊贏了，我們會有什麼下場？他們一定會說我們是通敵者。」但撒馬利亞人完全沒想要屬於自己的領土。「我們沒有領土上的需求——我們從沒說過：『嘿，我們的家族曾經擁有這地方，這裡是我們的。』我們知道領土紛爭為整個地區帶來了多少苦難。我自己是覺得，我擁有的已經超乎我的期待。」

我該離開班尼家了，因為他得準備參加獻祭。這次的時間比往年都早，因為這天日落後就是安息日了——獻祭必須在下午進行，趕在安息日開始前完成，而不像過往是在夜間進行。撒馬利亞人按傳統要求穿著聖經時代先祖出埃及時所穿的衣服：他們穿上長袍，每件袍子都有二十四個鈕釦（分別代表每個撒馬利亞字母）。祭司則穿上有特別顏色的長袍：紅色代表羔羊血，藍色代表天空，白色代表心的純淨。活動吸引了大批觀光客，這對撒馬利亞人而言是憂喜參半。「我不想被獵奇，」班尼說，「但事實就是這樣。保存傳統的人就是稀奇。」他說明，保存傳統是撒馬利亞認同的核心所在。

在街頭等待的過程中，我看到一群群遊客前來。有些人是基督徒，很多則是猶太人，他們來看世間絕無僅有的景象：獻祭羔羊來慶祝逾越節，這和猶太聖殿在近兩千年前被摧毀之前所行的儀式相同。

街上逐漸停滿了車子，攝影大隊正架設著他們的相機，早到的人占據了觀禮的最佳位置。我受邀參加獻祭之前的酒會，活動將在我過夜的大廳舉辦。

在這場酒會上，人們發表一系列的演講——這種形式很容易讓人覺得乏味，但台下的聽眾組合非比尋常。以色列軍隊在西岸地區的領導人，就坐在巴勒斯坦的納布盧斯行政長官對面，兩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相互調侃。大廳另一頭還有更不可思議的兩群人：屯墾運動的代表們，就坐在稍後將發表關於以色列統治不義（尤其對巴勒斯坦人的移動限制，此事重創納布盧斯經濟）激情演說的巴勒斯坦人旁邊。

所有演說者——行政長官、將軍，以及贊助這場活動的富豪馬斯里——都對撒馬利亞人表達他們的敬意。這讓我想起班尼曾說過的話：撒馬利亞人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能取得共識的唯一議題。最後，一位撒馬利亞男子起身發言，他五短身材，容貌獨特，不久前經歷喪父之痛。「我們的族人本來瀕臨滅絕，」他說，「但我們自立振作，建立撒馬利亞社會，現在我們哪裡都不去：我們留在這裡。」

這場酒會展現了撒馬利亞人在拿捏與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關係時的審慎。族群內部無疑有些不同的政治觀點——住在特拉維夫的撒馬利亞人，對於說希伯來語感到自在，而且比較敢說出他們對以色列的忠誠，而基利心山上的一些撒馬利亞人則和巴勒斯坦人比較親近。他們每個人都瞭解和雙邊維繫良好關係的重要性。以色列提供比較好的求學與就業機會，而且其政府對撒馬利亞人向來慷慨。以色列總理班雅明·納坦雅胡（Binyamin Netanyahu，譯按：於二〇二〇年五月宣誓就任總理，開啟他的第五屆任期）曾說他有一張和大祭司的合照：有好幾人訪問他時都看過那張照片。有人告訴我，大祭司預言了

納坦雅胡的崛起。另一方面，撒馬利亞人對以色列的保守宗教階層體系有些感冒。「我們傾向不要和猶太拉比打交道。」一名撒馬利亞人對我說道。在巴勒斯坦法律中，撒馬利亞人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宗教族群，意思是（譬如說）由撒馬利亞祭司主持的婚禮受到法律承認；反觀在以色列法律中，他們的地位就模糊許多。

酒會結束，人們魚貫而出。獻祭即將開始。數十年前，撒馬利亞人還為儀式成群結隊地到山上搭帳篷，如今這裡已有專為此活動而蓋的觀禮場地，四周以金屬絲柵欄圍住。數百名觀光客在柵欄邊你推我擠，還有人試圖爬過柵欄，被魁梧的保全喝斥。撒馬利亞人擠過群眾，開始在儀式場地內聚集。祭司穿著色彩繽紛的傳統長袍。其他撒馬利亞男人則穿白圍裙，戴棒球帽，為他們即將執行的血腥工作做準備。女人和幼童站在比較後面。依據〈出埃及記〉中所記錄的逾越節規定，每個人丁夠多的家庭都要帶一隻羔羊來獻祭。因此，撒馬利亞人群的中間，聚集了一小群羔羊。在此同時，他們將焚燒用的木柴填入場地內一端的幾個大坑洞，旁邊還備有一堆堆泥土——對羔羊實屬不祥。

資深祭司們在羔羊被帶到宰殺處時唱起歌來。金屬架已在宰殺處預備就位。然後撒馬利亞人吆喝一聲：羔羊的喉嚨被劃開。穿圍裙的男人們開始動作，把屍體吊掛到金屬架上，方便剝皮。他們一邊對彼此比手畫腳，一邊滿意地以古希伯來語吟唱：「真主獨一！」他們吟唱〈海之歌〉（Song of the Sea），^[5]這是以色列民族逃離埃及後所唱的慶祝歌曲：「法老的戰車和駕駛，把他摔進海裡。」羔羊血被裝盛起來，準備以牛膝草枝塗到村裡每扇門的門楣上。獻祭的羔羊最後被烤肉叉穿刺固定。一旦坑裡的薪柴燒成木炭，羔羊就能被放入坑

中烹煮，以一層土覆蓋保留熱度。就像班尼保證的，這幅景象簡直讓人穿越回到遙遠的過去。

數百年來，在撒馬利亞民族漫長的衰頹期期間，前來拜訪的人提出悲觀預測如今都被撒馬利亞人推翻了。一七七四年，一名英國作家表示：「撒馬利亞支派如今在世間已存在了兩千四百年，而且還留在它最初出現的同一地點。這麼了不起的事當然會使人好奇心大作，一點也不奇怪。」但他最後說道：「他們長久以來延續香火的地方很快就會不再記得他們；他們的名字也許很快就只存在於史冊中。」威爾斯傳教士彌爾斯在一八五〇年代也同樣悲觀。「等不及更多世代化為塵土，」他哀嘆，「這個民族，非常可能先一步滅絕。」然而事實證明，他們都錯了。

在這裡，在聖地的一座聖山上，第一百三十二代的大祭司（第一代大祭司是摩西的哥哥亞倫）穿著一襲華麗長袍，在完成逾越節獻祭儀式後，和同僚們一起休息。社區的女人們前來親吻他們的手。他們在長子的前額塗羔羊血。在這非常猶太的畫面上方，我看到有個看板寫著此次活動由「巴勒斯坦電信公司」（Palestinian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贊助。想像撒馬利亞人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這個紛擾之地所有族群共存的基礎，也許太過天真了，畢竟撒馬利亞經驗有所侷限又不夠穩定，而且同時仰賴以巴當局的善意。但它至少讓人看到了一線希望。

[1] （譯注）歌革和瑪各是出現在聖經的《創世紀》與《啟示錄》以及《古蘭經》的傳說人物。在早期基督教作家的筆下，他們是帶來世界末日之人。

- [2] （譯注）雖然Dome of the Rock在中文世界已約定俗成被譯為「圓頂清真寺」，不過這座建築並不是清真寺，而是一座紀念碑式的建築。聖殿山（Temple Mount）上有座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就在「圓頂清真寺」不遠處。
- [3] （譯注）這裡指的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又稱為阿克薩群眾起義（Al-Aqsa Intifada）。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以色列政治家夏隆（Ariel Sharon）訪問聖殿山上的阿克薩清真寺一舉被巴勒斯坦官方視作挑釁，象徵宣稱對聖殿山擁有主權，因而引發了相較一九八七年的第一次大起義持續更久，以巴之間長達五年的血腥衝突。
- [4] （譯注）哈瑪斯為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成立於巴勒斯坦的伊斯蘭遜尼派組織，具備軍事實力，是巴勒斯坦僅次於法塔（Fatah）的政治力量。該組織拒絕承認以色列，呼籲以武力摧毀以色列，進而在今日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地區及加薩走廊這一地區建立伊斯蘭國家。
- [5] （譯注）出自〈出埃及記〉13:17 - 17:16。〈海之歌〉是以色列人在越過紅海（或稱蘆葦海）之後，向上主抒情地傾瀉經歷的詩歌。



第六章

科普特人

Copts

信奉基督的古埃及人

埃及是我的母親。我流著埃及的血。我愛妳埃及。

——科普特神父穆沙(Father Mousa)之女

今天是「殉教紀元」(Era of Martyrs)一七二七年的聖週五(Great Friday)。現在是巴拉慕達月(Baramouda)，季節性沙塵席捲尼羅河谷地，是收成小麥以及避暑的好時節。數千年來，每逢此時，埃及人祈禱尼羅河氾濫，以富含泥沙的河水灌溉田地。除了氾濫季，這裡是地球上最乾燥的地方之一。於是他們聚攏在我身邊，開始祈求「河水高漲」。若在某些時刻閉上眼睛，我完全可以想像自己身在古埃及。但西方曆法告訴我今年是二〇一一年，離我最近的河流是泰晤士河。我張開眼，透過彩色玻璃窗，看到了一棟棟美麗的倫敦公寓。

肯辛頓區的聖馬可教堂(St. Mark's Church)供奉的是一世紀的布道者兼傳教士聖馬可，傳說他就是把基督教引進埃及的人。維持基督教信仰的埃及人被稱為科普特人(Copts)。他們的人數在人口統計上差異極大，從四百萬到一千兩百萬都有，另外在蘇丹、利比亞和西方都有他們的移民社會。五世紀時，由於基督教會內部在基督的本質問題上出現分歧而分裂，科普特人接受此後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基督教，科普特正教會(Coptic Orthodox Church)，接受亞歷山大宗主教(Patriarch of Alexandria)的領導。科普特基督教從埃及，向南傳播到厄利垂亞和衣索比亞——或許也曾北傳。一九七九年，科普特領袖（和天主教領袖一樣被稱為「教宗」）、第一百一十七代亞歷山大宗主教謝努達三世(Shenouda III)為聖馬可教堂祝聖的時候，它是歐洲唯一的科普特教堂。但與其說這是科普特教宗初次入境歐洲，其實更應該說是重返。八世紀時，有一本愛爾蘭殉道者的書提到了「長眠在阿爾斯特迪瑟(Disert Ulaidh)的七位聖潔的埃及僧侶」。

像這樣曾在愛爾蘭安頓下來的科普特僧侶，可能在早期愛爾蘭教會發展時發揮一定影響力——愛爾蘭教會和科普特人都重視修道院制度，以及苦行。

埃及與歐洲基督徒的另一個差異是，科普特人保留、甚至強化了很多歐洲基督徒已放寬的規矩。聖馬可的會眾得忍受超過五十天的、難熬的科普特四旬期齋戒（Lenten fast）；期間，他們完全不碰所有的魚類、肉類，以及諸如奶和乳酪等動物製品。在聖週五（英美習慣稱為受難日〔Good Friday〕），他們什麼也不吃直到日落，而且整日禱告：在聖馬可舉行的儀式從黎明開始，他們把一個十字架放在教堂的走道上，並以蠟燭和玫瑰作裝飾。其中一項禱告要信徒敬禮四百次（對某些人而言，一次敬禮只要點一次頭，但有一名男子卻跪倒在地）。雖然科普特人離家數千公里，他們對其信仰的熱情不減。

我眼前看到的景象大多可上溯至基督後前幾個世紀：一面分隔聖壇與會眾的精美屏風，以及聖馬可及聖母馬利亞的肖像。那時基督教取代了埃及古老的多神信仰。但從貼心擺放在走道，作為儀式導覽的書本中，我看出教堂既不是使用西方曆法，也不是使用有時會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伊斯蘭曆法。他們用的是法老們認得出的曆法，月份的名稱有巴拉慕達、齊亞赫（Kiahk，即「靈魂團聚的月份」）和托奧（Thout，以有著狒狒頭的神托特〔Thoth〕為名），而且年份的計算是依據殉教紀元。^[1]殉教紀元元年是西曆的二八四年，那年皇帝戴克里先屠殺基督徒——科普特人至今仍銘記在心。

那天，我在聖馬可教堂聽到的吟誦風格，希臘政治家兼學者法勒魯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應該會覺得熟悉；他住在基督前三世紀的埃及濱海城市亞歷山卓（Alexandria）。「在埃

及，」他寫道，「神父在唱詩歌讚美主時，使用七個母音，以特定順序念誦。以這些字母編成所唱出的歌聲音調美妙，人們覺得比笛子和里拉琴（lyre）更好聽。」他們現在仍舊如此唱著。噢—噢—噢（oh），主禮神父和輔祭高歌，以抖音唱出一連串單音，接著是痾（eh）和阿（ah），幾乎聽不到子音（譯按：指oh、eh、ah裡的h）。這個吟誦的曲名是〈在神的寶座前〉（Pek Ethronos）。它在唱到耶穌復活有望時，曲調由悲轉喜，就像它所根據的古調，既哀悼死去的法老，也慶祝其繼位者登基。我在倫敦最枝葉扶疏的街道聆聽法老的輓歌。這音樂是怎麼傳入的，對埃及的基督教有什麼意義，是本章要探討的主題。

* * *

開羅是我的第一個外派地，那時是一九九七年。我當時是從倫敦空降的語言學生，一個新手外交官。「歡迎來到大使館，」大使說，「我希望你不要誤會我的話，但我們不想在大使館再見到你。到外頭去，花時間和埃及人相處。」我們一小群學生不用人督促。開羅城無處不是啟示。它的人口密度之高，大概有一千八百萬人口，每天還有多更多人湧入——拋下尼羅河沿岸的村莊生活，搭火車、搭公車、徒步行走，或搭篷車，不停地湧向首都，在現有城市邊緣未經規劃、雜亂無章的棚戶區，落地生根，貧富接界。我以前會從住處附近的林蔭街道散步到貧民窟，看看站在汙水橫流的泥土巷裡的耍刀者與街頭小販。

開羅也是個歡樂、混亂、令人困惑、勢不可擋的噪音嘉年華。我住在翠綠的現代市郊穆罕德辛區（Mohandiseen）。但即便在那裡，清晨五點時，我能聽見窗戶外傳來薄荷小販拉著馬車沿路叫賣的呼喊，還有清真寺在正午時分的擴音器廣播，以及汽車刺耳的喇叭轟鳴直至深夜。我在尼羅河岸的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念書——實際上沒那麼浪漫，因為有間火葬場排放的煙霧會吹拂過我享用午餐的陽台。但上述我都能忍受，我也能忍受這座汙染嚴重、人滿為患城市的一切惱人之事，因為我當時沐浴愛河。令我墜入愛河的不是人，起碼當時不是。我愛上的是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是為我打開一個視而不見的世界的鑰匙。它讓我進到若不懂阿拉伯文不可能前往的許多地方，使我能閱讀超過千年歷史的書籍與詩歌——因為這一千多年來，作為《古蘭經》神聖語言的阿拉伯文變化不大。它也開啟了若我不懂阿拉伯文就絕不會發生的對話。這個語言還有個別出心裁的獨特系統。取三個字母，你就得到了一個字根。那個字根，看起來像是樂譜符號，能夠以十二種不同方式處理，每種方式都會使字義產生微妙的變化。如此構成的語言，就和巴哈（Bach）的經文歌（motet）一樣在結構上十分精確。

對多數西方人而言，阿拉伯文是伊斯蘭的語言。但我發現說阿語的埃及，星期日上教會做禮拜的基督徒比英格蘭還多。我加入他們：每星期搭計程車或乘地鐵（日本製，乘坐起來十分平順，乾淨得像在診所）到有點破敗、不起眼的市郊舒卜拉（Shubra）。要逃離僑民生活，這是最棒的地方。這裡是埃及的國家重心，有許多小商店、一間遠近馳名的餐廳，以及鋪過的平坦街道，可說是呈現了埃及對中產階級的定義。街上有沙子、有吵鬧聲，還有空汙的強烈酸臭——但我的

埃及友人們似乎不覺得這一切有什麼問題，受影響的只有我。埃及村莊不是富裕人家會選擇的居住地，比較好的公寓（我朋友是這麼跟我說的）都蓋在吵鬧的主要大街上，而不是大街後塵土飛揚的靜巷。一名友人到倫敦拜訪我時，她抱怨街上太安靜，讓她無法入眠。

以前沒有觀光客會來舒卜拉，今天也是如此。可是，如果以為這裡沒什麼值得看的，那就錯了。舒卜拉至少有一個在全中東都看不到的東西：一個以歐洲聖人命名的車站。在開羅市中心搭上地鐵，我會經過以埃及總統命名的車站，像是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沙達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我還會經過一座以法老拉美西斯命名的車站，然後下一站就是聖德蘭（Sainte Thérèse）車站了。

被尊稱為「耶穌的小花」（Little Flower）的里修的聖德蘭（St. Thérèse of Lisieux，譯按：又譯為「聖女小德蘭」，一九九七年被天主教會封為教會聖師）的名字，怎麼會出現在開羅地圖上呢？答案就在舒卜拉主要大街旁，在一間令人嘆為觀止的教堂裡。這座教堂以聖德蘭為名，是因為它是由法國聖衣會（French Carmelites）所創辦，而它令人嘆為觀止之處在於教堂的義式門廊（portico），由頂端到底部全覆蓋著還願的匾牌，上頭可以看見英文、法文、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是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對聖人所施展奇蹟的見證。教堂至今仍吸引一些穆斯林訪客，他們到教堂後方點蠟燭祈願，就連好幾年前有個伊斯蘭好戰分子蓄意破壞教堂，雖然攻擊了十字架，聖人的肖像卻毫髮無傷。

有天我走進鋪著瀝青、面積不大的教堂前院，遇見了後來我在埃及一年來的朋友圈。這群人當中有一副保鏢樣但想當修道士的大隻佬

阿特夫（Atef）、勤奮受訓想成為建築師的麥姬（Maggie），以及自信的工程師薩米（Samih）。我也在這群人裡注意到法老時代的痕跡，像是拉美西斯和娜芙蒂蒂（Nefertiti）等名字。有個名叫威爾

（Wael）的男子立志要當模特兒，他聲稱自己的五官和法老們一模一樣。出身科普特天主教家族的祭司保羅神父（Father Paul）莊嚴地率領眾信徒。（十九世紀，天主教教會在埃及籌辦了一間東儀教會

〔Uniate church〕，其科普特成員在接受羅馬主教的權威之際，同時保存自身傳統。這個東儀教會迄今有超過十六萬成員。）對我而言，保羅神父充分展現了埃及人的禮節。這幾乎是位於天平另一端，與低調、冷淡的英國禮節完全相反。我親身感受何謂溢美之言、做做樣子的邀請，還有殷勤款待。神父和某個花卉商人的一次對話為我完美地示範了一切。在議價良久後，花販稱：「我當然巴不得能免費給你這些花。」神父以我永遠望塵莫及的敏捷，立刻以同樣不誠懇的讚美回敬道：「你不知道，我來光顧只是為了享受見你一面的快樂啊。」

神父慷慨大方地帶我認識開羅，但當我試圖回報他的盛情款待，他卻反而讓我感到難以捉摸。有一次他來我的公寓，他喝了一杯水，然後我說服他多待一會兒，他卻回說：「不，我已經給你足夠的榮譽了。」然而，科普特友人們對我的善意從未枯竭。這間教會不只是教會。會眾會一起去度假，在前院一聊就是幾小時，而且週間經常碰面。他們教我跳埃及舞，還有一次邀請我加入他們對開羅窮人（即住在高樓公寓屋頂上臨時搭建的棚屋的人）的慈善訪問。新朋友們也常為了英國基督教的馬虎鬆懈責罵我。這也難怪。虔誠的科普特人每天都應禱告七次，避免喝酒，而且絕不抽菸。科普特人不只在四旬期禁食，將臨期（Advent）期間，還有一年中某些時候也禁食——一年總

共齋戒兩百一十天。雖然他們在這些時候必須放棄吃肉和奶製品（四旬期時連魚也不吃），有些人甚至更進一步，只吃水果，或埃及人稱為「富爾」（fuul）的燉豆子。四旬期時，有些人每天甚至從午夜到日落之間，什麼也不吃。這比穆斯林的齋月還要辛苦。我忍不住想轉述希羅多德的見解。埃及有一座大神廟一度因各方善款變得極為富裕，擁有國內三分之一的肥沃土地。他在兩千五百年前，心存敬畏地參觀了這座神廟並說：「埃及人虔誠過頭，是世間國家之最。」（在最近的意見調查中，埃及人認同希羅多德的看法：他們認為自己是世上最虔誠信教的民族。）

這不僅是我對科普特人的想法，也是每星期五，我聽到地方清真寺的擴音器播放布道時的感受。此外，這裡的計程車司機似乎人人都以卡式錄音帶播放機播放《古蘭經》，有時還會像鑑賞家般，指出特定吟誦者的特色。在一場蘇非音樂演唱會上，戴著深色鏡片的主唱歌手令聽眾欣喜若狂地鼓掌，有些人甚至進到出神狀態。宗教的無所不在，意味著宗教歧異也顯而易見。好幾次我走在開羅街頭，人們朝我走來，問我支持哪支足球隊。偶有幾次，他們（以差不多的態度）改問我——我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我的阿拉伯文老師告訴我，人們也問她一樣的問題，不過不會直接地問。他們會問她的名字，然後再問她父親的名字。（身為開明派穆斯林，她出於原則盡量避免回答他們的問題，認為人們應當有權利保有宗教隱私。）而在問同一個問題時，科普特人有獨門祕訣。有一次在當地超市，收銀員偷偷把他的手腕伸了過來，給我看了他的十字架刺青。

我住在埃及時，那些分歧不時透過暴力衝突展現在我面前。大使館禁止我到南埃及某些地區，尤其是敏亞（Minya），因為那裡有攻擊

國安部隊和地方基督徒的伊斯蘭恐怖團體。一九九七年九月，我和聖德蘭教會的友人們在亞歷山卓，從電視上看到幾名德國觀光客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被槍斃。那是我第一次遭遇恐怖主義。「不要慌，傑拉德。那是命，」薩米說，「我們都會在自己的將死日死去。」這番話沒安慰到我。兩個月後，路克索（Luxor，譯按：古稱「底比斯」）發生六十二人的大屠殺命案，下手的恐怖分子以槍和刀子作案。遇害者包括五歲小孩。後來有張讚美伊斯蘭的紙條，在其中一位遇害者肚破腸流的屍體裡被找到。

然而，在這些可怕事件之間，偶爾也有些故事提醒人們如何更富同情心地和平共處。就拿解放廣場的攻擊事件來說好了，我在亞歷山卓看到新聞時擔憂不已。歹徒們在犯案後逃往附近的布拉克·阿爾·阿喇區（Bulaq Abu' l Alaa）。至少我從報紙讀到的消息是如此。該區居民窩藏作案兇手。我碰巧對這地方頗為熟稔。那是我最愛徒步尋訪的地方之一，在那裡能看焊接工的手邊火光四濺，刺眼地照亮曾經優雅的殖民風建築，也照亮建築之間的荒蕪小路上的塵土。可是這區的神父卻告訴我，那裡的穆斯林是他的弟兄們。這個主持義大利風格偌大教堂的高大男子也說，他們不曾找他麻煩。科普特人來這區上教會從未被騷擾。我走出那個社區後，經過賣衣服的街頭市集。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族群：包頭巾的男人們，穿西裝、穿牛仔褲、穿連褲工作服的男人們。戴面紗的女人們、沒戴面紗的女人們，還有一名女子大概是窮到不可能買得起面紗，於是拿了一個硬紙箱套在頭上，作為遮陽用。我還看到一名綁長辮的女孩正在教她的幼弟做十字架。

我在一九九八年離開埃及後，回訪的次數不多，而且都只是短暫停留。然後在二〇一一年，我看到解放廣場又上新聞了。埃及人聚集

在廣場把總統拉下台。基督徒和原教旨主義穆斯林並肩合作。被買通的暴徒攻擊示威者。總統穆巴拉克辭職。埃及軍事委員接管總統權力。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爆發鬥毆。有些教堂被攻擊。不少基督徒遇難。為了本書的寫作，我本來就已計畫去埃及，而這趟行程似乎比以往都更有意義。

* * *

二〇一一年三月，飛機降落開羅之際，我看向窗外這個時常縈繞在我心中的城市。我能看見富人豪宅在太陽城（Helipolis）的寧靜北郊。我能看見開羅貧戶中的貧戶，住在毫無遮蔽的小艇上每天晚上被豪華遊船的尾浪搖晃著。他們是無家可歸的尼羅河居民。從機場出來的路帶我經過了一座雄偉的軍營，壁畫展示埃及法老大軍的勝利。車子轉彎駛上一座巨大的高架橋，我們加速通過了政府、各機關部門髒兮兮的大廈，以及火車總站。我們還看到了科普特大教堂的圓頂，旁邊則是一座清真寺——兩者是團結一心？抑或爭強鬥勝？

我的飯店位於尼羅河上的札馬萊克島（Zamalek），有點破舊但愜意，是開羅昔日風華的遺跡。一位退休建築師古怪地坐在大廳一張褪色的椅子上，正對一名熱心的工作人員口授多封信件內容，多是投訴信。飯店外，一群戴頭巾的年輕女性正在繪製展現人民力量的壁畫。我沿街散步時，注意到店家和牆壁上的各種招牌。在西方盟友與阿拉伯盟友威脅開戰之際，有個招牌以英文公告創下新低的利比亞貨幣兌換率：「利比亞第納爾（dinar），買進二，賣出三點六五。」另一個招牌以阿拉伯文寫道：「以真主之名：社會上有很多值得尊敬的警

察。讓我們一起讚美我們的警察。」第三個招牌則在一間店鋪的門上，比較沒那麼含蓄，僅以顏色鮮豔字母寫著一個字：「威而鋼」。

札馬萊克島上個世紀才出現在尼羅河，由年復一年被沖刷到下游的淤沙堆積而成，這些順流而下的淤沙賦予尼羅河谷肥沃的繁殖力。

（一九七〇年尼羅河興建水壩後，淤沙不再流動。此外「河水上漲」（河川每年一度的枯水與洪水期）也告終。）札馬萊克島吸引了上層階級，他們曾在島上興建的宮殿和公園如今變得蕭條斑駁。我搭計程車跨橋到開羅較老的城區，位在尼羅河東岸。橫跨尼羅河時，司機驕傲地指出燒毀的前執政黨總部，焦黑骨架就蹲踞在河邊。廣播節目的主持人說：「社會裡的貪汙腐敗——我們現在可以自由地談論了！」

我的目的地是一棟粉色的簡樸灰泥建築，坐落在多層高架橋和解放廣場之間的區域。埃及博物館（Egyptian Museum）每天有數千人前來參觀十六萬五千件的雕像、人偶、石棺和木乃伊。觀光業在二〇〇九年提供埃及勞動力高達百分之十二的就業機會，但這間博物館向來不只是一隻金雞母而已。它是埃及認同的典範。博物館正面的牆上有另一個符號——一長串曾統治埃及的王朝列表，好像是在跟埃及人說：你們一直都是受帝王統治的。在革命席捲埃及的二〇一一年，這是獨裁者（不過是已作古且變成木乃伊的那種）仍受到推崇的唯一地方。

這裡的木乃伊不以繁複機關陷阱和詛咒驅退入侵者，而是有博物館館長塔力克·阿瓦迪（Tariq el-Awadi）的守護。我在館長位於博物館地下室的辦公室見到他。他的書桌邊擺著一系列精美的鍍金時鐘收藏，每一座顯示的時間都不同。我是來請教他歷史問題的。「埃及人和他們的歷史脫離了，」阿瓦迪說，「他們被教導覺得自己和昔日

歷史沒有任何關聯。」他說明，學校課程把歷史分成許多時代：法老時代、科普特時代、伊斯蘭時代。伊斯蘭時代獲得最多重視。但阿瓦迪認為，對先前幾個時代的認知越多，能幫助埃及人成為更團結的民族。他本身是穆斯林，而他覺得國家的古老歷史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共享的文化遺產。「我們的國家是有凝聚力的社會，儘管國內的宗教信仰不止一個。習俗、語言，甚至特定宗教傳統，對所有埃及人都是一樣的，而且和阿拉伯人完全不同。」但埃及人幾十年來一直被灌輸他們是阿拉伯人。因此，誠如阿瓦迪所說：「埃及人一直在問：『我是誰？我是阿拉伯人，還是埃及人？』」

見過阿瓦迪後，我走過博物館走廊，欣賞玩具、船模型與墓葬用的巫沙布提俑（ushabti）。文物保存得如此完美，好像昨天才製作完成。我有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時間的簾幕莫名地變薄了些，而木乃伊化的法老們也許真的會從簾幕後走出來，來到現代社會生活。埃及人無疑曾預期他們的身體會復活，這是其他古老民族沒有的生死觀。舉例來說，當伊拉克史詩中的國王吉爾伽美什從凡間下到地獄，尋找他死去的朋友恩基杜，他遇到的是鬼影，而非有血有肉的人。「恩基杜，」他說，「已變成了黏土！」

然而，尼羅河谷的子民被比伊拉克沙漠更乾燥一百倍的沙包圍——乾燥的程度讓埋在這裡長達兩千年的紙張出土後，上頭的文字仍清晰可見。古埃及人把他們的死者埋在這沙裡，即便沒經過後來發明的技術如臟器移除及填入天然鹽做屍體保存，屍體通常還是會被沙子的乾燥和熱度自然木乃伊化。多年後挖出來，他們的外觀應該仍可辨識。人們因而得以想像，靈魂（卡〔ka〕）重新進到這些軀殼，死而復生。基督前二十四世紀的埃及銘文宣稱：「讓墳墓裡的人們再起；

讓他們拆除身上的繃帶。抖落你們臉上的沙（這裡開始應該是在對逝者說話），從你的左側起身，用右側支撐你自己。」

如果法老們今日真的復活，從鍍金的石棺中再起，他們會發現國家已變得面目全非。他們大概只有在鄉下才能看到一些熟悉的景象：民家在尼羅河邊洗澡，也洗他們的鍋碗瓢盆。田野間，偶見綠色棕櫚樹和成堆的脫殼小麥。水牛在溪流邊遊蕩。除此之外，他們只會訝異於開羅使人窒息的廢氣和擁擠的公寓大樓。開羅如今是世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他們會訝異於埃及的人口如今比古埃及多了二十倍，而且曾是羅馬帝國麵包籃的國家如今有百分之四十的糧食依靠進口。然後他們會發現，他們崇拜獸首神祇的宗教，儘管一度牢牢掌控著埃及社會，如今已消失。

或者該說是，快要消失。我和自稱「歐西里斯信徒」（古埃及冥神歐西里斯〔Osiris〕的現代埃及信徒）的一對夫婦相約在解放廣場旁的一間飯店。先生哈姆迪（化名）跟古埃及抄寫員的雕像長得很像，身材健碩，面目和善。幾罐薩卡拉（Saqqara）啤酒被送到我們的桌上。薩卡拉是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的名字。從印花沙發和玻璃窗背後向外望去，可以看見流經此處的尼羅河，顏色棕濁，永恆不老。根據埃及神話，冥界之神歐西里斯曾上了邪惡弟弟賽特（Seth）的當，被關在一具棺材裡順流而下。妹妹伊西絲救了他，但賽特再次找到他，把他大卸八塊。伊西絲找回所有的屍塊，但獨缺陰莖，於是以黃金替哥哥重建了這個部位，然後奇蹟般地使他復活。他成為重生之神——尼羅河的枯竭與氾濫象徵了死亡與重生，而他也因此被認為能控制河水的變化。

歐西里斯信徒夫婦告訴我，歐西里斯、伊西絲和賽特，還有像阿蒙（Amun）之類的其他埃及神祇，原本只是同一個神。他們補充，把古埃及人說成是多神信仰者或某些穆斯林口中的無信仰者「喀菲爾」是錯的。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當代宗教觀念都出自埃及，其中包括「阿門」（amen）一字。

「其他人說『阿門』，我說『阿蒙』！」哈姆迪說。

「我們發明了安息日，」他太太補充道，「還有大衛的《詩篇》（*Psalms of David*），作者就是法老阿肯那頓（Akhenaten）。你看他寫給太陽神阿頓（Aten）的讚美詩，就會看出它們和《詩篇》如出一轍。」

她向我介紹了一個可追溯至古代的現代埃及節慶。兩千年前，它被稱為「歐西里斯登月」，今天它叫聞風節（Shamm al-Nessim，[譯按：在阿拉伯語中，Shamm是「嗅」的意思，而Nessim則是「微風」的意思](#)），不過仍然在春分時節慶祝。「這一天是特別神聖的一天。唯有這一天，萬事萬物全都靜止下來。」現代埃及沒有別的節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共襄盛舉的。「人們吃綠色的食物，還有魚和生菜，坐在草地上，彩繪他們要吃的蛋。」（他們在聞風節會吃的一道埃及菜餚是埃及鹹魚（fiseekh），是某種醃漬而成的魚料理，學者說它一千年前就存在了。我嚐過一次，味道刺鼻得驚人，但有些埃及人愛得不得了。）她堅稱，這個古老的埃及節日就是復活節的起源。

她懷著深深的民族驕傲，為我列出一長串源自古埃及的普遍宗教習俗和觀念：朝聖和禱告的習俗、齋戒、救世主彌賽亞的觀念、聖誕樹和聖誕節這名稱的由來、在教堂內點蠟燭等等。「埃及國旗已有一千四百年的歷史，」哈姆迪說，「紅白黑一直都代表民族驕傲。中央

的老鷹則是荷魯斯（Horus，譯按：鷹頭人身，是古埃及法老的守護神）的符號。」我看出這對夫婦也在尋找能代表所有埃及人特質的身分認同。儘管我很難想像會有很多人加入他們的歐西里斯崇拜，他們大膽地做出最後宣言：「埃及宗教正在回春！」一年後，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主掌埃及，我和這對夫婦再聚首，他們的言論變了，而且更加謹慎。他們說，他們感興趣的是古埃及文化，而非宗教。

即便如此，他們說得沒錯，古埃及人確實影響了後來的宗教。埃及人不僅是信仰肉身會復活的先驅，而且圖坦卡門的父親，即法老阿肯那頓，是史上已知的第一位一神論者。他廢除了自己鍾愛的太陽神阿頓之外的所有神祇，造了兼具男女兩性特徵的雕像，象徵陰陽的結合。有篇獻給阿頓的讚美詩流傳至今，作者很可能就是法老本人：

「大地在汝於東方地平線升起時明亮起來，然後像阿頓一樣在日間發光發熱……祢各式各樣的鬼斧神工！人類肉眼看不見。噢！太陽神，在祂之上，再沒有其他神！」另一方面，住在埃及的猶太人和法老們有些相同的習俗：猶太人和埃及人都避吃豬肉和鯰魚，也都為男嬰割包皮。不過，相比於我在伊拉克經常看到許多長盛不衰的古老傳統，我在埃及比較少看到。這個國家沒有像曼達安人或祆教徒之類的族群，持續不輟地保存前基督教時代的傳統直至當代。此外，埃及的民間習俗儘管又多又豐富，大多出自中古時代。我只找到三個可上溯至法老時代的民間習俗。

第一個是埃及人和死亡相關的習俗。在開羅的中世紀墓地，很多迷你別墅靜靜地沿著艾資哈爾清真寺附近空蕩筆直的泥土路集中排列。儘管這些別墅在一年中大多時候，其實有許多占屋者住在裡面，

它們底下是死者的墳，而且是為一個特別的埃及習俗才存在：親戚過世四十天以後，以及每年死者的逝世紀念日，很多埃及家族會聚在小別墅一起吃頓飯。他們的祖先也是這樣到至親至愛之人的墳墓邊吃飯，祭供逝者的靈魂。有個醫生曾告訴我，為喪禮雇用哀悼者的古老習俗還存在於南埃及，而且每當有人去世，喪家會在七日內，提供住宿和伙食給前來追悼的訪客。這位醫生曾在動手術之際，遇到一群即興吟誦的哀悼者。他們站立著，穿著一身明顯的黑色喪服，環繞手術台，為此場合即興創作了一首輓歌，因為他們拒絕接受病人可能活下來。「喔，可憐女子如妳，活受肉身挨刀！」

第二個比較不吸引人的習俗則可明確追溯至法老時代。希羅多德寫道，埃及人「為潔淨之目的行割禮」。此外還有張出自基督前二世紀的莎草紙顯示，女孩和男孩都要接受割禮。至今仍是如此。一份二〇〇八年的聯合國贊助調查，令人震驚地發現，超過九成受調女性曾接受割禮——不過這在教育程度較好的埃及人當中並不常見。女性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的過程涉及用刀切除陰蒂，有時還包括陰唇。二〇〇七年，穆巴拉克政府在一名女孩於手術過程死去後，下令禁止女性割禮。儘管不是源自伊斯蘭（部分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行此禮），這個古埃及所有習俗中最醜陋的習俗，保存得比任何習俗都還好，而且不同於其他習俗，它獲得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的支持，而非抵制。

第三個習俗則和一個古埃及符號有關，多數觀光客一定都曾和它大眼瞪小眼。開羅許多汽車後照鏡都掛著藍色的「法蒂瑪之手」

（Hand of Fatima），今日的人們相信它能擊退邪惡之眼，也就是人們因好運招惹來的忌妒。古時候的「荷魯斯之手」（Hand of Horus）

通常是以藍色青金石製成，也有同樣的作用。十九世紀的埃及人為躲避邪惡之眼用盡所有辦法——譬如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把漂亮女孩的臉弄髒以遮蔽其美貌，還有給自己取些像「阿醜」、「小鳥」或「驢子」等不好聽的名字。

很少埃及人深究這些習俗背後的意義，就像多數英國人在敲木頭求好運時，不會想到提爾神（Tiu）。^[2]然而，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統治集團，要其信徒拋棄這些傳統。薩拉菲伊斯蘭（Salafi Islam，譯按：遜尼派中的原教旨主義派）尤其譴責這些傳統。二〇一二年，穆斯林原教旨主義派政治人物穆爾干·葛哈利（Murgan al-Gohary）呼籲摧毀人面獅身像和眾多金字塔。薩拉菲團體也在埃及杯葛聞風節慶祝，並訴求打壓這個節日。對伊斯蘭主義者而言，法老始終是個骯髒的單字。二〇一一年，穆斯林兄弟會想推動一部新憲法，表決將以贊成或不贊成投票進行，於是他們提出口號：「不贊成，就等著天降法老！」

* * *

埃及的原始宗教被基督前四世紀以降幾世紀的外來統治逐步削弱；波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都統治過埃及。雖然克麗奧佩特拉（Cleopatra）的家族試圖採用埃及習俗（其中比較不光彩的是曾實行法老迎娶自家姊妹的傳統，克麗奧佩特拉就是好幾代亂倫婚姻產下的後代），就連她都是希臘人和波斯人的後代。本土埃及人後來得到了專屬於他們的稱呼，用以區別他們和擁有多數土地且主掌行政事務的希臘移民。他們被稱為Aiguptioi——「埃及」和「科普特」二字都是

由這個字衍生而來。到了基督後三世紀，基督教傳道者宣稱，古老宗教的信徒主要是希臘人，而基督教則是科普特人的宗教。

在克麗奧佩特拉死後進入埃及的羅馬統治勢力並未取代希臘人，但確實導致法老被廢除——這連帶破壞了神廟的建造基礎，因為神廟仰賴法老的財政支持，而且在延續古老文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基督後二世紀，從俄克喜林庫斯（Oxyrhynchus）城市的象形文字雕刻者同業公會報告，我們看到文化失傳的現象：同業公會記載，他們只有五個人，而且沒有任何學徒能繼續傳承此職志。

儘管力量被削弱，神廟在羅馬統治時代又存活了幾百年。但羅馬帝國在四世紀時立基督教為國教，傾囊而出地鎮壓舊信仰。很多埃及人熱烈響應，攻擊異教徒哲學家，毀壞神廟壁畫中的神祇臉孔，好讓祂們再也無法施展神奇魔力。穆斯林征服時，狹長的埃及尼羅河谷裡，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非基督教社群的存在。就連古埃及語言也被基督教帶來的新單字一抹而去：指稱「靈魂」的希臘單字「賽姬（psyche）」，取代了法老時代的「卡」。

我在聖馬可教堂學到，有些習俗之所以得以倖存，是因為被認為值得納入成為新的基督教儀式。很多留存下來的案例顯示，埃及的基督教神職人員若不是變成基督徒的神廟祭司，就是神廟祭司的小孩。諸如〈在神的寶座前〉之類的讚美詩，也就是我在肯辛頓的聖馬可教堂聽到的吟誦，他們應該會覺得很熟悉。只需稍做修改，就可以讓詩歌讚美的對象變成耶穌基督。銅鈸也是崇拜舊神的信徒會使用的樂器。有段時間，基督教教會禁了銅鈸，但後來又取消禁令；它們至今仍被用於科普特人的儀式中。

一邊是科普特、亞美尼亞和敘利亞教會，另一邊是拜占庭和歐洲教會，雙方在五世紀的「迦克墩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後，因對基督的本質的看法不同而分裂。雙方的歧異直白來說就是，科普特人覺得迦克墩會議在反對那些想區分耶穌神性與人性的人時表現得不夠堅定。科普特人強調耶穌只有一個本性，而且他們仍自稱為「一性者」（Miaphysites, mia physis在希臘文意為「一個本性」）。結果就是科普特宗主教拒絕承認會議；儘管埃及當時是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埃及真正的統治者是宗主教，而非拜占庭皇帝。科普特人和拜占庭當局的關係受挫。這次的爭議也反映了其他緊張關係——其中大概包括科普特人對外來政權存在已久的厭惡。宗教分歧無疑加深了這層厭惡，於是科普特人在阿拉伯穆斯林於七世紀入侵埃及時，幾乎毫不抵抗。雙方關係約在新穆斯林政府對非穆斯林人口加徵苛稅時惡化。即便如此，多數埃及人直到十世紀前仍是基督徒，而科普特語直到十三世紀、人們逐漸被強迫使用阿語前，仍是百姓普遍使用的語言。十四世紀，十字軍東征和蒙古入侵結束後，反基督徒的暴動越來越頻繁爆發，當局以法律限制科普特人的影響力與地位。德國修士約翰·凡斯萊布（Johann Vansleb）曾在一六七二年到埃及勘查，他在報告中指出，科普特人「因不間斷的暴政驚恐萬分，一點聲響就足以讓他們像樹葉般顫抖」。

在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間，仰慕法老都是一個晚近的現象。《古蘭經》對拒不讓摩西與猶太人離開埃及的法老有許多描述。他被形容是「腐敗者」，為自己樹立神一般的地位，誇耀自己的偉大，並且鄙視窮人。因此，不同於哈蘭的「拜星教」，法老們總是毫無疑問地被定義為偶像崇拜者，他們的宗教遺址也被以懷疑眼光看待。據傳，一

位早期穆斯林統治者曾想拆除所有金字塔。中世紀史家馬各里齊（al-Maqrizi）也記載，有一位十四世紀的蘇非神祕主義者，顯然是出於不滿當地農民把人面獅身像當作神祇敬拜，一怒之下便砸斷了人面獅身像的鼻子（這份文獻十分罕見，因為它指出舊神可能仍被人暗地崇拜）。此外，住在埃及的一般人也不一定把「埃及人」視為一種身分認同。在十八世紀來到開羅的英國觀光客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e）說，地方商人僅自稱為阿拉伯人。最初用來指稱本地埃及人的科普特人一詞，到這個時期已專指基督徒。

然而，這個態度在十九世紀期間出現變化。一系列的發現促成改變的發生——起初是西方考古學家揭露了古埃及人的技術和藝術成就。一八一三年，考古學家發掘了阿布辛貝神廟（Abu Simbel），一旁有約二十公尺高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看守。一八一七年，他們在帝王谷發現塞提（Seti，譯按：拉美西斯二世的父親）之墓，畫家的畫筆還留在地板上，壁面的天青色和金黃色圖畫，則呈現了法老靈魂在死後的歷程。這種種發現在歐洲和美國引發了「埃及熱」——也就是建造仿古埃及建築的狂熱。

埃及內部碰巧也發生了文化和政治變遷。儘管十九世紀的埃及與蘇丹屬於伊斯坦堡鄂圖曼素檀統轄的帝國省分，實際上卻被當作獨立實體，由穆罕默德·阿里王朝（Mohammad Ali dynasty）治理——王朝以創立者穆罕默德·阿里為名，他是一位成功的阿爾巴尼亞冒險家，透過邀請對手們參加筵席，並在他們賦歸時一一下手剷除，進而確立了自己的權力基礎。儘管起步腥風血雨，這個王朝推動了埃及的改革與現代化。

伊斯梅爾（Ismail）是這個王朝的第三任統治者，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九年在位，而他尤其有野心抱負。他限制奴隸貿易，修築非洲最大的鐵路網，並動工開鑿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他還在一八六三年建立了第一間埃及博物館，是今日解放廣場上的博物館的前身，在設計上採用法老的風格。法老崇拜多神，為了安撫不太願意模仿法老的虔誠穆斯林，宗教學者塔哈塔維（Tahtawi）向他們保證，法老們其實是「拜星教」，崇拜化為不同形式的一神。一八六四年，塔哈塔維的門生阿布·蘇烏德（Abu' l Suud）撰寫古埃及歷史，呼籲當代埃及子民效仿其祖先「攜手合作，做個正宗的埃及人和真正的愛國者，為埃及的復興打拚」。金字塔自一八六七年起出現在埃及郵票上。

這不單是個緬懷往昔的浪漫運動。它和埃及的世界地位有關。埃及的歷史榮光使伊斯梅爾能夠自信地直視歐洲統治者，也構成讓埃及被視作獨立國家的基礎，就像伊斯梅爾期望的那樣，而非被當作鄂圖曼帝國的省分。對埃及獨立地位的強調也影響了伊斯梅爾對宗教的態度。伊斯梅爾責罵一名穆斯林部長，因為他輕蔑地稱某政府雇員為「這個科普特官員」；他反駁說這話的人，因為「所有人都是埃及人」。主張基督徒和穆斯林地位平等（以及一個統一的民族認同）意義重大：基督徒直到一八五五年，才擺脫非穆斯林得多繳的吉茲亞人頭稅。伊斯梅爾發放土地給科普特人蓋學校，把科普特人納入他成立的、名為代議諮詢議會（Advisory 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的原型議會，並任命一名科普特人為政府官媒主任，以及另一名科普特人為財政機構首長。在主政末期，他指名亞美尼亞基督徒努巴爾帕夏（Nubar Pasha）擔任他的總理。埃及的猶太人也受惠於這股嶄新的宗教開明風氣：伊斯梅爾鼓勵猶太裔埃及劇作家雅考伯·撒努（Yacoub

Sanoo），讚揚他是「埃及的莫里哀（Molière，譯按：十七世紀法國喜劇作家）」。宗教解放，頌揚埃及古文化遺產，以及建立一個埃及人的國家的計畫，全都相輔相成。

也難怪受教育的科普特人會擁抱古埃及，即便基督教《聖經》對埃及的描述幾乎不比《古蘭經》友善。他們成立了一間名為拉美西斯的俱樂部，以及一本名為《法老》（*Pharaoh*）的期刊雜誌。甚至有人嘗試在日常生活中復興科普特語。凡斯萊布曾在一六七〇年代寫道，他「有幸見到可能是最後一位精通科普特語的人」。而就在二十世紀之始，科普特古文物研究者克勞第烏斯·拉畢（Claudius Labib）堅持要他的孩子在家說科普特語。一九〇八年，一間科普特博物館開幕，頌揚後法老時代的埃及文化成就。

到了一九一九年時，科普特人已和穆斯林同胞差不多富裕：根據一份英國數據顯示，他們擁有國內百分之二十的農地，而且這遠遠超越了他們在國家裡的人口占比。那年的總理尤瑟夫·瓦賀巴（Youssef Wahba）是個科普特人（也是第三位出任總理的基督徒）。但此時的政治脈絡和伊斯梅爾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英國人在幕後支配埃及政府——伊斯梅爾雄心勃勃的計畫支出使埃及陷入負債，英國於是成為埃及的最大債權人與實際管理者。除了進入政府，科普特人也活躍地和穆斯林一同參與埃及獨立運動：遊行示威者在一九一九年齊聚解放廣場，結合新月與十字架的旗幟在人們頭上飄揚著。埃及民族主義華夫托黨（Wafd Party）由高瞻遠矚的領袖薩阿德·宰赫魯（Saad Zaghloul）率領，組織了由七名埃及議員組成的代表團，拜訪英國大使，並要求獨立；他謹慎地將一名科普特代表納入代表團。一九一九年，甚至有基督教神父開先河，在國家最重要清真寺艾資哈爾的布道

壇傳道。「英國人若妄稱為保護科普特人而留在埃及，」神父薩吉歐斯（Father Sargious）說，「那就讓科普特人死盡，穆斯林重獲自由。」

我在二〇一一年造訪開羅期間，看到了一些令人想起那個歲月的東西。在解放廣場附近，一間外牆沾有血跡的古董書店對面，我看到有名男子T恤上寫著「殺人的不是槍，是政府」，他正在賣有著新月與十字架標誌的T恤。我在城市的牆上到處都看得到那個符號。彩繪這符號的人藉由喚起一九一九年的精神，強調民族團結，回應想挑撥基督徒與穆斯林之人。

可是，並非所有在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要求獨立的埃及政治人物都有宰赫魯的開明。一九二八年，在港口城市伊斯梅利亞

（Ismailiyya）的英國軍營工作的一群勞工，拜訪了反對世俗主義的學者哈桑·班納（Hasan al-Banna），並對他說：「我們認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沒有地位，而且尊嚴盡失。他們不過是受雇於外國人的雜工。」他們發誓成為為伊斯蘭而戰的士兵，但班納為這個團體取了一個更無害的名稱：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對埃及政府提出的第一批要求當中，包含禁酒和打擊賣淫。娼妓問題因外國士兵駐紮在埃及，而於一戰期間變得猖獗。穆斯林兄弟會要求英國人撤離埃及。但它還有更大的野心：將所有穆斯林國度，統一在願意行嚴格伊斯蘭教法的一名哈里發之下。

科普特政治人物威廉·馬克蘭·埃貝德（William Makram Ebeid）試圖尋找和穆斯林兄弟會的共識，而且他是埃及政府在一九四八年瓦解穆斯林兄弟會運動時，唯一跳出來抗議的政治人物。他也是隔年班納被政府特務殺死後，唯一出席其葬禮的政治人物。因此，穆

斯林兄弟會聲稱和科普特人沒有不和。然而實際上，新興的伊斯蘭主義運動想要削弱其世俗對手。由於科普特人經常在國家的世俗政黨扮演要角，攻擊科普特人有助於這項任務的進行。在一九四〇年代，伊斯蘭主義的煽動言辭導致多起教會縱火案、毆打神父案，以及對科普特人儀式的攻擊行動。與此同時，班納特別注重對抗信基督教的外國人，這點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穆斯林兄弟會對基督教的整體論述。穆斯林兄弟會不像伊斯梅爾那樣，熱衷於讓埃及成為所有公民生而平等的國家。相反地，班納之所以以埃及為傲，主要是因為埃及在歷史上曾守護伊斯蘭不受十字軍攻擊，而這樣的歷史觀點不可能賦予科普特人太多尊嚴。穆斯林兄弟會將科普特人降至次等地位，與他們和平共處，而不是像世俗民族主義運動者那樣，提供他們實質的平等。

當獨立真正降臨，上台掌權的既非宰赫魯風格的自由派，也不是伊斯蘭主義者。一九五二年，穆罕默德·阿里的第十任統治者法魯克（Farouq）被一群本來名不見經傳的軍官廢黜。其中一名軍官穆罕默德·納吉布（Mohammad Neguib）成了埃及總統。四年後，納吉布被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上校（Colonel Gamal Abdel Nasser）除掉。納賽爾讓英國全面撤軍，此後，他從一九五六年統治埃及直到一九七〇年去世。儘管他幫埃及擺脫了所有外國勢力，他的傳記名稱卻不是《頭號埃及人》（*The First Egyptian*），而是《最後的阿拉伯人》（*The Last Arab*）。傳記作者的意思是，納賽爾其實自視為一名阿拉伯人，而不是埃及人：他想要讓住在馬拉喀什（Marrakesh，[譯按：位於摩洛哥西南部](#)）到巴格達之間各個國家的阿語民眾團結起來，起身對抗殖民領主，共組一國。

納賽爾對真正的埃及不太感興趣。實際上，「埃及」這名稱曾從地圖上消失了十年以上，因為納賽爾把國名改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試圖將埃及和敘利亞統一起來。他還重新分配了埃及的土地，粉碎古老的封建秩序。此舉同時影響到穆斯林和科普特的地主，但由於科普特平信徒菁英在君主政權下發展順遂，這對他們的衝擊尤其巨大：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科普特人失去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財富與資產。因這項措施而被奪去財富的上層階級科普特平信徒，大多是族群的政治領袖，因此科普特人不僅變得更窮，而且影響力也跟著下降。由十八名成員組成的埃及革命指揮會議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在革命後主管埃及，連一名基督徒都沒延攬。儘管如此，納賽爾還在世時，對科普特人的暴力攻擊幾乎聞所未聞。他令人聞風喪膽的維安單位是部分原因所在；他們曾冷酷地鎮壓各種伊斯蘭主義運動。另一部分原因則來自於他本身的高人氣。納賽爾不曾表現任何宗教偏見——阿拉伯民族主義可以同時容下基督徒和穆斯林（更何況，運動的一些早期支持者可是敘利亞基督徒）。此外，納賽爾和科普特教宗私交甚篤，而且會透過像是參加他們在開羅的全新大教堂開幕式，向科普特人表態致意。

對另一個族群而言，納賽爾的出現標誌著不幸的開始。一九五六年，在以色列夥同英法密謀動搖埃及並奪取蘇伊士運河之後，納賽爾剝奪了許多猶太裔埃及人的公民權。他甚至將數千名猶太人驅逐出境，然後把他們的事業國營化——也就是沒收充公。猶太教是這個國家最古老的宗教：猶太人至少在基督前七世紀就出現在埃及了。「小時候，我們有猶太鄰居。」基督徒埃及醫生阿敏·馬克蘭·埃貝德

（Amin Makram Ebeid）在他眺望尼羅河的公寓中告訴我。「修海特先

生（Mr. Shoheit）一家。修海特先生告訴父親，他幫我姊姊找到了先生。幾個月後，他消失了。他們全都人間蒸發。我們大概猜到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被驅逐出境了。「但沒有人有勇氣去問，因為那可能會讓我們這些基督徒受牽連。」醫生嘆息道，「一個人私下的信仰，怎麼會影響到他在社會上的生存呢？」他把一幅身披猶太祈禱披巾的男子畫像掛在訪客第一眼就會看到的地方，希望這麼做能衝擊人們，動搖其偏見。開羅還有一間猶太會堂，但全國上下只剩十位猶太人。

納賽爾死後，科普特人面臨新的挑戰。在納賽爾掌權之前，教堂縱火案相當罕見，在他主政期間更是不曾發生。但安瓦爾·沙達特（Anwar Sadat）在一九七〇年成為總統後，情況改變了。沙達特把自己包裝成「虔誠篤信的總統」，而且為了打敗左翼批評者而與伊斯蘭主義者結盟。埃及大學的管理之門向極端主義派大開，讓他們在學界攻擊沙達特的左派批評者，並強化他們在校園實施的某種沙里亞法。一九七二年，一名縱火犯攻擊了一座科普特教堂，成為了教派之間暴力相向的新紀元的起點。

同時，政府對教育的態度發生大幅改變。在開羅市中心的辦公室裡，科普特報紙《瓦塔尼報》（*Watani*，意為「我的國家」）的編輯尤瑟夫·希德霍姆（Youssef Sidhom）在和我談話的時候回憶起那段時期。「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埃及伊斯蘭化之後，課程大綱裡的基督教歷史被刪去。壓力來自接掌教育部的人。科普特歷史被偷走了。」在兩百四十頁的新版教科書中，只有四頁講述埃及的基督教歷史。阿語課不上世俗詩歌，改教《古蘭經》，把基督徒和穆斯林曾經擁有的共同文化遺產邊緣化。國家電視網每星期分配三十小時給伊斯蘭宗教節目，但基督教節目一年只配到一個時段（也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二〇一三年五月，埃及《金字塔報》（*al-Ahram*）刊登一篇深度文章：教育專家卡梅爾·穆西斯（Kamal Mougheeth）記述在一九八〇年代，他有一本教科書宣稱《聖經》是捏造的故事。他的基督教同學們被迫背誦《古蘭經》經文。

身經百戰的埃及軍政府反對者喬治·伊沙克（George Ishak）也明確地告訴我，沙達特時代就是關鍵時期。六十多歲的伊沙克，在十年前因直言不諱地反對穆巴拉克總統，變得家喻戶曉。我在一間藝術家咖啡館葛羅比（Groppi's）和他見面。那裡的顧客顯然都認識他：在我們談話的同時，每隔兩分鐘就會有人上前來和他握手，或是他自己起身和另一桌的某人打招呼。

「埃及的宗派主義始於沙達特，」伊沙克在忙著打招呼的空檔說道，「當沙達特說，『我是個穆斯林，這是個穆斯林國家』，人們的驚恐超越其字面意思。無論是運氣好或運氣壞，當時的科普特教會領袖謝努達——」他指的是為聖馬可教堂祝聖的謝努達三世宗主教，

「他充滿個人魅力，吸引人們進到教會，最終他們的生活大小事都不脫教會。」我點頭。我在舒卜拉的教會看過這後遺症，教會遠不只是會眾祈禱的地方。謝努達改革了科普特教會，把權力賦予知書達禮、活力充沛的新一代神職人員；他和同時代人促成了修士人數的激增。

「然後對立展開。神父因被禁止修築教堂上街抗議。」一條埃及舊法要求科普特人在興建新教堂、乃至修復現有教堂前，都必須先取得許可。沙達特的政府發放許可的速度之慢，導致科普特人心生極大的不滿。一九八一年，針對一間科普特教堂興建計畫的紛爭，在人口過度擁擠的開羅貧戶郊區發生了一場血腥衝突：共十七人死亡，使得此事件成為當時有史以來發生在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間最嚴重的暴力

事件。謝努達三世宗主教率領了一場非暴力抗爭，抗議他眼中政府在保護科普特人方面的失職。伊斯蘭主義者指控謝努達企圖建立一個科普特政府，主張唯有一個伊斯蘭教政府能阻止科普特人的挑釁，並呼籲全面禁止興建新教堂。沙達特藉由軟禁謝努達和幾名穆斯林神職人員作為回應。然而，同年稍晚，沙達特被不滿他和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刺殺。（發射致命子彈的男子在開槍時大喊：

「我殺死了法老！」）穆巴拉克取代沙達特，表面上和科普特教會建立了更好的關係，不僅授予修建教堂的許可，還把科普特耶誕節訂為國定假日。但伊沙克有不同的看法。「穆巴拉克發現，」伊沙克滔滔不絕地說道，「他可以用這個議題轉移注意力。維安部隊和薩拉菲主義者此時展開戰略結盟。」薩拉菲主義者和穆斯林兄弟會是程度相當的伊斯蘭主義者，不過前者不碰政治。

面對恐怖分子的威脅，維安勢力大規模成長。一九七四到二〇〇四年之間，隨著對科普特人和警察本身的攻擊增加，埃及警力從十五萬人成長為一百七十萬人。然而，科普特人始終受到差別待遇。埃及國內沒有任何大學校長或國營企業首長是科普特人。一名穆斯林埃及銀行家告訴我，人們對科普特人的態度就好像「對自家小弟的態度——更該說是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你知道家裡有這個人，但其實寧願他不存在」。穆巴拉克政府也沒有徹底地保護科普特人，譬如二〇〇〇年一月，柯薛村（al-Kosheh）有十六名基督徒遇害身亡。雖然其中一位加害者因持有未經許可的槍砲，另外被判了十年徒刑，此次案件中加害者最長只被獲判兩年刑期。

然而，科普特教會不曾像過去和沙達特短暫交鋒那樣，和穆巴拉克正面對決。教會也沒有要求在埃及實行民主，或准許科普特人參與

二〇一一年在解放廣場的示威活動。教會顯然認為穆巴拉克的接替人選——穆斯林兄弟會——是更大的災難。穆斯林兄弟會在一九九〇年要求科普特人不得擔任軍隊資深將官，以及在二〇〇七年要求埃及憲法明文規定唯有穆斯林能成為總統時，幾乎沒花心思安撫科普特人的恐懼。二〇〇六年，兄弟會最高領袖馬赫迪·阿克夫（Mehdi Akef）被人引述曾說出「At-tuz fi Masr」，大意是「管埃及去死」——顯然，身為一名伊斯蘭主義者，阿克夫不贊成民族國家，而是支持重新建立一個伊斯蘭哈里發國。

對某些科普特人而言，解決之道是移民出走。所幸他們擁有相對高的學歷，而且比較受西方政府的青睞。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間，申請成為美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永久移民的埃及人，有百分之七十六是科普特人。有些科普特人則比以往更獻身於教會，把精力投注在將教會變成更有效且一應俱全的團體。我遇到一名曾在抗議教堂縱火案的場合受傷的科普特人；他們在抗議時丟擲石頭，遭維安警力開火回擊。「只要你覺得受到其他人威脅，你的身分認同就會很強。」他說，而他受傷的腳還未復原。不單只有基督徒變得重視宗教組織，勝過世俗組織。二〇一三年蓋洛普民調指出，所有埃及人，包括穆斯林及基督徒，有百分之九十二對其宗教組織有信心。其他組織皆望塵莫及。簡言之，謝努達宗主教以及地位與他等同的穆斯林領袖，因其精明與奉獻精神，取得了極大影響力。有些強硬派神職人員濫用此影響力。整體結果就是，穆斯林和基督徒越來越難找到團結的理由。

上述一切是我在開羅學到的。但我知道，若想瞭解埃及，尤其是瞭解埃及的基督徒以及他們和穆斯林鄰居的關係，我必須前往多數埃

及科普特人的發源地——開羅南方。在那裡，尼羅河谷地蜿蜒穿越連綿數百公里的沙漠。這一帶（稱為上埃及〔Sa' eed〕——和古代的名稱相同）的人較晚皈依伊斯蘭，而且直到一九二〇年代，百分之八十的埃及基督徒還住在上埃及。

儘管大量科普特人自此北遷（一名學者告訴我，超過半數的科普特人如今住在開羅和其他北方城市），上埃及仍是他們的心臟地帶。舉例來說，在開羅南邊兩百二十五公里的敏亞，是埃及所有城市中科普特人比例最高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是科普特人。它所屬的行政區財政困窘，失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三分之一以上人口不識字（敏亞的識字率較高）。該行政區也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發生最多衝突的地方——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宗派暴力衝突在此發生。我認定欲理解科普特人的歷史、信仰與未來，我必須更深入認識這個地方。我在二〇一二年埃及首次民選進入第二階段時來到這裡。在我來訪此地不久後，埃及人將在剩下的兩位候選人當中抉擇：曾為穆巴拉克總統效力、從耶穌會學校出身的穆斯林艾哈邁德·沙菲克（Ahmad Shafiq），以及隸屬於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罕默德·穆希（Mohammed Morsi）。（敏亞是整個埃及最挺穆希的地區之一，穆希在此的得票率為百分之六十四，沙菲克則只有百分之三十六。）

開羅的火車總站名為拉美西斯站，因為曾有一尊這位法老的雕像矗立在此。它最初興建於一八五〇年代，當時伊斯梅爾正式請人建造非洲的第一條鐵路，以把棉花從開羅運到亞歷山卓出口。拉美西斯站也是一九二三年埃及女性主義者胡達·沙拉維（Huda al-Shaarawi）從歐洲開會歸國，在前來迎接她的群眾面前脫去頭巾，使他們一臉驚愕的地方——此舉啟發了往後無數的阿拉伯女性主義者。我加快步伐

穿過摩爾風格的拱門，經過貼有彩陶瓷磚的牆，去買車票。我發現，到上埃及有專門的月台，那裡有零星的乘客等著登車。月台上一間小書店陳列許多書籍，其中好幾本的封面上有符合主題的驚悚圖片：黑魔法術士會使用的魔術，以及如何對抗這些魔術。我想起有群薩拉菲男孩以為他們在付之一炬的教堂地下室找到了施咒道具。

火車不久後開始緩慢向南移動，穿越開羅郊區廉價的磚頭公寓大樓。在開羅最貧窮郊區的一個車站，那裡綠樹如蔭，男孩們進到火車裡賣有添加香味的面紙和便宜糖果。車再向前行駛約半小時後，一條與火車軌道平行的狹窄、淤塞的運河出現在眼前。我們最終離開城市，深入尼羅河谷的綠野，頻繁地停靠一個個小鎮。運河總是在鐵道一旁。我看到人們在運河裡洗碗盤，也洗衣物。傍晚時分，我們抵達敏亞。就在我踏上月台之際，一名上了年紀的行李工拿起我的包包，儘管我拒絕他的服務，他仍堅定地緊抓著我的包包，拎過鐵道橋。

城裡有間大型飯店，是棟名叫阿肯那頓的水泥大樓，我今晚就在那下榻。我的房間有以過去的標準來看十分優雅的裝潢——我猜是七〇年代的優雅。沒有任何觀光客住在這裡。大廳的人都是飯店員工，抽著菸。我和他們聊了一陣子，他們告訴我敏亞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棒。「你不能信任開羅的人，而且他們不像我們這樣友善，」其中一名員工對我說，「如果你從這裡再往南去，到艾斯尤特（Assyut），那裡的人又太魯莽了。但在敏亞這裡，人們介於兩者之間。剛剛好。」

我在城裡散步時發現，敏亞的確比開羅更讓人感到友善，而且展現了一種安靜的美，面朝尼羅河和遠方低矮的沙質懸崖。有座河濱公園滿是攜家帶眷的居民，有些人踢著足球，其他人則是抽著水菸。停

泊在河濱的一艘船上，人們正熱鬧歡騰地舉辦婚禮派對，新郎新娘隨一首廣受歡迎的埃及歌曲起舞。城市的各個廣場都有享受夜間微風的民眾，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女人多數沒戴頭巾；在這保守的城市，這幾乎篤定意味著她們是基督徒。（開羅有不戴頭巾的穆斯林女人，但我在敏亞一個也沒見過。）現在是星期天晚上，我猜測這些情侶們大概剛從附近街上的教堂和基督教社區中心離開。我走去和路邊攤販買了一杯柳橙汁，一名修女排在我前面，點了榨甘蔗汁。

我在飯店的友人幫忙我找了一名當地司機，載我去鄉下的村莊和修道院。次日清晨，我在等待司機時，再次散步穿越了公園。我看見河的對岸有頭公牛在田裡耕犁。在昨日溫柔夜幕下的狂歡過後，城市裡的人們在公園的小徑上留下了一堆垃圾，一輛輕型貨卡前來收拾。一個戴著頭巾的女孩（我猜她大概來自附近村子）把一袋袋垃圾丟進貨卡，然後再爬回車上。她的腳踩在垃圾袋上，在卡車開走之際，邊唱歌邊說笑。

司機接我們上車時，很高興得知我們將會參觀一些當地的科普特修道院。他本身是科普特人，名叫喬治。（儘管聖馬可據稱是科普特教會的創立者，以聖喬治命名的小孩更多——聖喬治執長矛屠龍的畫面常見於教堂與一般人家裡，就好像古埃及人過去喜歡描繪荷魯斯把矛插向河馬。）「從來沒有觀光客對科普特景點感興趣，」他抱怨道，「他們只想看古埃及的東西。我跟他們介紹我們的教堂，他們每次都不想要參觀。」但修道院在某方面就像現代版的古神廟。在基督教早年歲月，苦修主義就代表隱居：男人走到偏僻的地方，通常在沙漠裡，開始禱告。大概是基督後三二〇年，聖帕科繆（St. Pachomius）在埃及成立了第一個基督教僧侶的社團。他希望收容無法

忍受獨自生活所帶來的嚴苛考驗的人。但修道院發展出了一個熟悉的模式：一群虔誠男子，住在有圍牆的住所，到附近田裡耕作，在圍牆內的禮拜堂敬神，然後有朝聖者以訪客身分前來——這是埃及神廟向來的運作模式。很多早期的修道院有向內傾斜的高牆，並在入口處做雕刻裝飾，和埃及神廟有幾分神似。

喬治給我看了幾間當地修道院的照片。其中一張吸引我的注意。許多玻璃陳列櫃裝著不完全木乃伊化的屍體，從標籤上看，可以得知裡頭是戴克里先時代死去的基督教烈士。這些屍體的黑色肉身痛苦地蜷扭成一團，牙齒閃閃發光，被尊敬地以銀箔包覆，並穿上婚禮服裝，象徵殉教為他們贏得永恆幸福。起初我被這些照片嚇到，甚至覺得怪誕醜陋。但我意識到，他們展現的是一股深刻、堅定信念。科普特人對殉難的信仰，幫助他們忍受艱難時局。喬治和我開車經過田地，其中有些堆滿收割小麥，有些則有高高的甘蔗挺立著。他指向甘蔗說道：「以前這裡還很混亂時，槍手都躲在那裡。我有個警察朋友，他就是那樣被射殺的。」一九九二到一九九八年間，有個好戰的伊斯蘭主義團體「伊斯蘭團結」（al-Gama' a al-Islamiya）以敏亞和其他埃及南部城鎮為基地，攻擊維安警力及地方基督徒百姓。二〇一一年，「伊斯蘭團結」組成了一個政黨，努力展示它已洗心革面：它說服了五名科普特人入黨，呼籲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且贏得敏亞十六席議會席次的其中一席。

我們開在鄉村小路上，沿路幾乎沒有遇到其他的車。一名騎驢男子拉著一車的苜蓿超越我們的車。接著經過的是一輛婚禮派對巴士，播放著熱鬧的音樂。「他們是從修道院出來的，」喬治說。他指的是聖法納修道院（The Deir Abu Fana），我們的第一站。「他們在婚禮

前，先去向僧侶求點巴拉卡（baraka）。」巴拉卡在阿語中意為「祝福」，我發現自己在這趟敏亞行很常使用這個字。當我們來到修道院，我發現單單去見神父或僧侶也是一種巴拉卡。「我來見你，和你拿點巴拉卡。」年輕男子們和穿搖曳黑袍、頭戴以金色十字架裝飾的服貼黑帽的僧侶打招呼時，總會這麼說。有不少年輕男子到此拜訪修道院的年輕男子。其中有些人不是太禮貌。他們當中有一人自以為沒人看見，跑去坐院長在修道院禮拜堂的寶座——他被扶手上的獅子雕刻吸引了過去，那是福音書作者聖馬可（St. Mark the Evangelist）的符號。

這座有著高牆與大門的修道院位在尼羅河谷谷地與沙漠交界的最外緣。有人認為，這裡可能曾有一座舊神廟；附近的荷爾鎮（Hor）可能是以荷魯斯為名。埃及人阿布·法納（Abu Fana）在基督後四世紀來到此地，途中把所有的財產全捐了出去。他以苦修聞名（根據傳說，他的奇蹟包含三十七天沒進食），讓死人復活，讀人的心，還曾在根柱子上度過了十八年。到了中古時代，修道院漸漸被人遺忘。十五世紀的阿拉伯學者馬各里齊表示，那時的修道院裡只剩下兩名僧侶。

今天，這裡有超過二十幾名僧侶，很多還很年輕，是科普特教會復興的成果。其中一名僧侶負責顧修道院商店，販賣耶穌受難像和宗教主題的海報。他告訴我，他進修道院之前，曾是一名醫學院學生。他給我一條麵包作為祝福，上頭刻有神聖符號和科普特文字（我們從墓穴畫看到，法老時代的埃及人有時會為了裝飾而戳破了麵包）。科普特僧侶的生活包括數小時的集體禱告（甚至每天凌晨三點都要），獨自禱告，有時還要從事粗重的勞力工作。

喬治介紹我認識院長，我們一起坐在一間灰塵有點多、堆滿沙發的悶熱房間裡。他們請我喝茶，還無限量地供應過甜的軟性飲料。後來，我們走到戶外曬太陽。「那裡，在那座塔，每當有盜匪闖進修道院，僧侶都會躲去那。」院長告訴我。類似問題持續存在。一名僧侶走向我們，然後院長一聲命令，他不情願地捲起袖子：他上臂曾經骨折的地方皺縮起來。幾年前，他曾經被住在附近的一群貝都因人抓走。儘管綁架案和一起土地爭議有關——修道院想在貝都因人用來放牧的土地上蓋房子，後續卻演變為宗派鬥爭。這位僧侶表示，綁架他的人要他朝十字架吐口水。他因為拒絕而被他們打斷手臂。「我們找到他時，他營養不良，嚴重脫水，動也不能動。」院長說。這名僧侶是才華洋溢的藝術家，修道院很多壁畫都是他的作品。他花了幾個月才重新學會畫畫。

* * *

那晚回到敏亞，我從飯店搬走，住進尼羅河的一艘船上。我後來發現經營者是城裡的一個科普特新教團體。（就像加入天主教東儀教會的科普特人，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也有其他科普特人加入不同的新教教派，而且敏亞周邊的許多村莊既有新教和天主教堂，也有科普特正教教堂。）河水整晚拍打船側，就在我的腦袋旁邊。在我光顧這艘船屋一年後，它被一群不滿穆希總統遭推翻的伊斯蘭主義暴徒燒掉，而隔壁船有兩名男子被活活燒死——他們一個是基督徒，一個是穆斯林。與此同時，其他穆斯林團結起來，保護城裡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教堂。這次鬧事的主事團體最終被懲以五百二十九條死刑，留下了

惡名，但原因倒不是在於教堂被一把火燒掉，而是在於暴動期間有一名警察死亡。

隔天，我說服一名科普特神父帶我參觀他的教區。約尼斯神父（Father Yoannis）住在屈法達村（Qufada）一棟簡單大樓的頂樓公寓，離敏亞約幾公里。從他主持的教堂再往前走一段路就是他家。喬治載我去見他。我們一起坐在廚房裡；我小口小口地吃著神父特別為今天買的一塊有點走味的甜膩奶油蛋糕。我得知他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曾是神父。他很擅長與人親近，而且有獨特的、埃及人的奉承之道。他問喬治是哪裡人，當喬治說他來自敏亞，神父立刻端出他的標準讚美：「敏亞？敏亞來的人最棒了。」

四萬名屈法達居民中，有超過九成是穆斯林。不過，村長（埃及人稱為「姆達」〔umda〕）是個基督徒。他的家族曾擁有村莊的地，直到納賽爾政府將多數土地充公，重新分配。儘管如今財力遠不如以往，他的家族依然備受敬重。「一九四〇年的時候，」神父說，「政府派士兵前來告訴村長，要他懲罰當地民眾，因為他們都沒有繳納稅款。但村長沒有懲罰村民，而是幫他們把稅都繳了。」村民對此永誌難忘，也很樂意讓這個家族保有村長的頭銜——雖然他們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住在別的地方。

「他們家的人今天幾乎都不住在這裡了，」神父邊開車載我們四處繞邊對我們說，「老宅幾乎空了。現任村長是城裡的牙醫，住在老宅裡的是他姊妹。年輕一代紛紛拋售土地。而我們這個社區的問題，」他補充道，一邊對他認識的人按喇叭。「是人們離開村子後就不回來了。穆斯林到外地工作，但他們留著村裡的房子。基督徒到城

市求學進修，然後就待在那裡了。我現在大概一年才會見到教區居民舊識一次，而且是在於開羅舉辦的婚禮上。」

村長的白牆老宅矗立在大街後方、一處未鋪砌地面的小庭院裡。約尼斯神父的教堂就在它隔壁。我在約尼斯神父對當地基督徒孩童講話時，到正廳後方找了個座位坐下。孩子們男女分坐，專心地聽神父跟他們說埃及最古老修道院之一的僧侶故事，他們虔誠聖潔到可以飛行的程度。然後他指導孩子們在教堂裡應該有的規矩。「你們應當知道，這是個神聖的地方，」他說，「當你們進到這裡，天使們正看著你們。所以要舉止莊重！」

村裡不曾發生宗派之間的暴力衝突；約尼斯神父帶我去拜訪他的友人哈珊謝赫（Sheikh Hassan）時，我便看出了箇中原因。哈珊謝赫是登記穆斯林婚姻的戶籍管理員，這是個具有宗教和社會權威的職位。神父把車開進一幢裝潢講究的大房子的車道，然後把他飽經風霜的車子停在一輛昂貴的轎車旁。房子主人的太太出門熱情迎接神父，然後把我們領到一間溫室般的小房間。戶籍管理員在村子裡是十分有影響力的人物：出於尊重，人們稱他謝赫。他跟村長不同，幾乎不曾缺席村裡的日常事務。他喜歡約尼斯神父，幫過他很多忙，最近一次是在穆巴拉克政府垮台後，保護教堂抵禦趁治安崩壞之際大肆掠奪的一幫歹徒。

基督徒神父和穆斯林官員之間的和睦關係，是村莊維繫和平的關鍵。隨著納賽爾土地改革導致基督教上層階級變得貧窮，加上他們紛紛前進城市，在這個權勢比法定權利與正義更有分量的國家，科普特教會是能代表其社群居間調停的唯一機構。親眼目睹約尼斯神父的幽默感、簡樸生活，以及他和自己人之間的交流，我很能理解人們為什

麼會信任他。可是，人們越想讓宗教機構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投注到與不同信仰者共存的其他機構（像是政黨、工會或世俗的社會團體）的時間與金錢就越少。與此同時，警察若發現介入紛爭可能讓他們變得不受歡迎的話，他們就傾向不介入紛爭，即便是暴力衝突。因此，倘若宗教領袖能使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共處，宗教衝突就不會發生。否則，這些族群幾乎沒辦法阻止意外升溫成流血事件。

「我們上埃及的人性情火爆，」喬治在我們再度搭上約尼斯神父的小車後說道，「人們前一分鐘還很友善，下一分鐘可能就開始動手動腳。一點小事都會擦槍走火。」約尼斯神父舉附近某村莊一年前左右發生的事為例。一對當地基督徒夫婦把女兒嫁給一個條件還可以的科普特人當太太，但她暗地裡愛上了一名穆斯林男人，而且與對方發生婚外情。他們都有服藥。雙親外出時，女兒用他們的家當幽會地點。有天晚上，雙親意外提前回家，發現他們的女兒和情人躺在床上，兩人都精神恍惚。母親一刻也不遲疑：親手將他們掐死。

她在廚房度過那晚，分屍死去的男子，把屍塊裝進塑膠袋裡。她吩咐先生到沙漠棄屍。他選了個不好的地點，把屍袋丟棄後，才發現那地方是個考古遺址。警衛看到他的車燈，前來探查。他人雖逃跑了，但袋子被找到，可怕的内容物也隨之曝光。

犯下罪行的雙親知道不久後一定會東窗事發。死去男子的家人正在找他，他們自己的女兒則是人間蒸發；人們很快就會看出端倪。於是他們畏罪潛逃。死去男子的家人循古法復仇。在這份血海深仇平息之前，兇嫌家有七人被殺。然後，這對殺人夫妻回來了。神父繼續說道：「在某個被報復波及的人死後，遇害穆斯林男子的母親出現了。她告訴這對夫妻：『當初你們要是能告訴我們事情的始末，我們一定

會感激你們殺了他。要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也會殺了他。』」話雖如此，將他棄屍荒野的這份侮辱，他們必須還以顏色。

在埃及，愛與死的關聯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在敏亞附近看到伊西多拉（Isidora，托勒密〔Ptolemies〕統治時期一名異教徒祭司的女兒）之墓。伊西多拉在夜裡橫渡尼羅河，與父親不准她交往的愛人幽會時溺死。她的墓成了年輕情侶朝聖的聖地；他們今天面對更大的障礙——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愛情，經常導致兩個族群暴力相向。埃及人通常沒有選擇嫁娶對象的自由，而且根據伊斯蘭教法和埃及法律，婚姻並非對等關係。伊斯蘭不准基督徒男人娶穆斯林女人，埃及法律則規定夫婦所生小孩要跟隨父親的信仰，而不是母親的信仰。因此嫁給穆斯林男人的基督徒女人，不能把他們的小孩當基督徒教養。嫁給穆斯林的女人，絕大多數都被她們的家人放逐；其中很多人乾脆皈依伊斯蘭。一名科普特主教在二〇〇七年估計，每年約有五千到一萬名科普特人皈依伊斯蘭，其他科普特神父也個別表示，這些改宗者大多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女孩。女兒被穆斯林追求者拐跑的恐懼，是科普特人打造獨立的社會網絡的另一個原因。

科普特教會幾乎完全不允許離婚這點也是人們改宗的原因之一：謝努達教宗把規定變得更嚴格，只剩通姦能作為終止婚姻的理由。基於其他原因想要離開丈夫或妻子的科普特人，一定必須先離開教會。有些人加入其他基督教教派，有些人則是成為穆斯林。成為穆斯林的科普特人當中，有些後來試圖回到科普特教會，但他們這麼做可能引發衝突，因為根據沙里亞法，背叛伊斯蘭的變節者必須被處以死刑。在這類糾紛中，宗教成為丈夫或妻子動員更廣大社群站在自己這邊的手段。舉例來說，住在敏亞的科普特婦女阿碧爾·法喀里（Abeer

Fakhry) 和一名穆斯林男子墜入情網，使她在二〇一一年離開了她的丈夫。她先被自己的家人跟蹤，接著被科普特教會扣押，教會試圖說服她回到先生身邊。然而，謠傳她已改宗伊斯蘭（她也證實了這個傳聞），於是她受扣押一事引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暴動，甚至放火焚燒教堂，更引發了一場造成十二人死亡的槍戰。此外，在開羅郊區艾特菲赫（Atfih），一名科普特男子和一名穆斯林女孩的情事，也導致了讓教堂付之一炬的多起暴動。

外部因素也可能引發衝突。約尼斯神父說，幾個月前，科普特神父札卡利亞·布特羅斯（Zakaria Butros）在賽普勒斯經營的電視台，因為攻擊伊斯蘭而聲名遠播。他的節目在埃及最出名的時候，科普特神父們分別感受到來自當地穆斯林的極大敵意。譬如，有一群穆斯林女人曾對約尼斯吐口水。「散播對伊斯蘭的仇恨、對《古蘭經》的侮辱，和焚燒《古蘭經》，」他說道，「這全都會為我們帶來非常慘痛的後果。」

* * *

我問約尼斯神父，科普特人是否曾生活在只有科普特人的村莊。他答覆說，那很罕見，因為在埃及務農的基督徒少之又少。不過，他所知道的村子當中，有兩個村莊全是科普特人，他同意帶我們去參觀其中的代爾·賈爾努斯（Deir al-Jarnoos）。喬治有點沒信心。他說代爾·賈爾努斯的人「很兇惡」。「沒人敢找他們麻煩，」他說，「事實上，附近所有的村子都怕他們。當他們成群結黨地走出村子，其他人都逃之夭夭。」不過，約尼斯神父知道怎麼應付他們。於是他

載我們進村，拉下車窗，對眼睛所及的每個男人、女人和小孩親暱示好：「你好嗎，親愛的？你看起來太美了！」他表現得熱情洋溢——大概想要確保人們會望向他，然後看到他的神職服裝，還有懸吊在後照鏡的十字架。在這地方，載著陌生人的車子可不常見。

國家在鎮上沒有一絲一毫存在感。在這方面，代爾·賈爾努斯像是位於埃及南部的好戰穆斯林城鎮的基督教版本，警察從來不敢踏入。一如那些城鎮（還有開羅的一些郊區）無視開羅當局，實行自己的規定，代爾·賈爾努斯正在修建使四周櫛比鱗次的陋舍相形見绌的大教堂。穿灰色長袍的男人們站在教堂的屋頂上，修築穹頂和塔樓，好讓教堂拔地而起、傲視天下。我們爬上屋頂和他們談話。約尼斯神父問他們來自哪裡。艾斯尤特，他們說，指的是從這邊再往南駛約一小時的城市。「啊，艾斯尤特，」他說，「最棒的人都來自艾斯尤特。」我們回到地面，巡視隔壁的石造老教堂。一位村民把一推開教堂的門就會看到的水井的木蓋掀開，垂降繫著繩子的金屬杯至井裡。他邀請我共飲。他說，這是一口神聖的井：耶穌的家人將還在襁褓中的耶穌帶到埃及時，曾經汲這口井的水喝。他把水杯撈起，我啜飲冰涼的水。

* * *

隔天，約尼斯神父招待我去見一群科普特神父時，喬治和我同行。我們在離敏亞不遠的一個村子碰面，約在和村子教堂相通的一幢屋子。留著黑鬍子的穆沙神父（Father Mousa）負責接待我們，而他的友人尤努斯（Younus）也和我們坐在一塊。尤努斯說：「老一輩的

人把基督徒當兄弟對待。我的朋友大多是穆斯林。他們來參加我們的節慶，來教堂裡禱告。這裡有位神父能驅魔，他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都很受歡迎。但後來薩拉菲主義者從各個大學前來。苛待基督徒的是薩拉菲主義者和穆斯林兄弟會。他們要穆斯林別在街上和基督徒打招呼。而年紀在十八到二十七歲之間的年輕一輩，他們是糟糕的一代。他們有很糟糕的老師。首先是沙達特。」他補充說，新世代有個新傳統，據說穆斯林男孩會在學期結束的那天毆打基督徒。「老師們沒有鼓勵這樣的行為，」尤努斯說，「起碼我們看不出來。以前軍人還會到學校制止這樣的行為，但他們也分身乏術。政府垮台之後，一切徹底失控。沒人怕軍人，沒人怕守衛，沒人怕上帝。」

問題出在教育。穆沙神父對此深有同感。三十年前左右，他曾效力軍隊，他的同袍有一名來自埃及北部的男子。穆斯林和基督徒通常一起上國立學校（埃及有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基督教學校，不過家境較差的科普特人負擔不起這些學校的學費；它們招生的對象是中上階層的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由於基督徒傳統上多住在南邊，這個北部人從來沒見過基督徒。他看到穆沙戴的十字架時，嚇得縮了起來。「這個十字架是什麼？」他問穆沙，接著說：「我聽說這是邪惡的符號。」在一份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的皮尤研究中心民調中，僅百分之二十二埃及穆斯林表示認識基督教信仰或習俗（學校課程並未提供對伊斯蘭以外宗教的充分知識），並且有百分之九十六的穆斯林認為基督徒會下地獄。

儘管說了上述故事，這群科普特人仍然熱愛他們的國家。穆沙九歲大的女兒就坐在房間的一角，在一張白紙上寫著字。我查看後，發現她寫的是英文。她用不同顏色的筆寫著：「埃及是我的母親。我流

著埃及的血。我愛妳埃及。」但科普特人一個個離開了埃及，我在喬治最後一次載我回敏亞時這麼對他說。「如果有機會，人人都會走，」喬治說，「穆斯林的處境比基督徒好一些，因為他們可以到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基督徒的人身安全問題特別嚴重，可是大家都一樣不好過。我有個不錯的住所和一份好工作，可是若能給我的兒子一個美好、安全的未來，我願意明天就放棄一切到美國，然後在餐館裡做工。」移民到西方世界是科普特人偏好的出路。美國有超過兩百間科普特教堂，以及約七十五萬名科普特人。

隔天我搭區間車回開羅。離開埃及前，我還得做一件事。我在距離上次來訪的十四年後，搭開羅地鐵回到聖德蘭教堂。抵達時，儀式正進行到一半。保羅神父在做彌撒，兩個我認識的人，阿許拉夫和馬各迪（Ashraf and Magdi），擔任輔祭——他們在至聖時刻敲擊銅鈸，延續著他們的先人從事數千年的傳統。儀式結束後，我在他們走去神父住宅的路上，追上他們三人的腳步。保羅神父有點駝背，阿許拉夫一頭白髮，但他們還記得我。薩米人在哪？我問。他去美國了，他們說。他去念書，最後就留在那裡了。麥姬現在呢？她嫁給一個法國人，去了巴黎。威爾到哪去了？他到貝魯特追求當時尚模特兒的夢。我心想，這些人才的流失不是科普特人的損失，而是埃及。

我回到教堂。一位包裹伊斯蘭黑色頭巾尼卡布（niqab）的女人，只露出一雙眼睛。她等到彌撒結束後，才從後方的座位走上前，點著了柱子旁沙盤上的蠟燭。然後她緩緩拾級而下，進入地下禮拜堂。我跟在她身後，準備和躺在底下的聖人雕像道別。當我們雙雙站在雕像前，那位穆斯林女人俯身向前，伸手撫按聖德蘭的側身。

- [1] 〔譯注〕科普特曆法的月份如下：一月為托奧，二月為包畢（Paopi），三月為哈索爾（Hathor），四月為齊亞赫，五月為托比（Tobi），六月為麥希爾（Meshir），七月為帕拉蒙（Parenmhat），八月為帕拉摩德（Parmouti，即巴拉慕達），九月為帕瓊（Pashons），十月為帕尼（Paoni），十一月為伊琵（Epip），十二月為梅索里（Messori）。每月皆為三十日，因此每年除十二月份外，又餘五日或六日，稱為小月（Pi Kogi Enavot，即The Little Moon）或閏日（Al-Nasi）。
- [2] 〔譯注〕又寫作Tiw、Tyr，是古日耳曼神祇。英文「星期二」（Tuesday）之名即來自於此神祇。



第七章

卡拉什人

Kalasha

谷地裡的異教徒

神在問：我們為什麼不用整座山谷慶祝丘謨思？

——阿慎貝格(Azem Bek)·卡拉什人

二〇〇七年夏天，我搭機從伊斯蘭瑪巴德（Islamabad）前往喀布爾，這代表我在伊斯蘭瑪巴德的出境大廳乾等了好幾小時。要辨認出發去喀布爾的外國人是很簡單的事：他們通常背著The North Face品牌的包包，身材魁梧，肌肉發達。我是個例外——肌肉非常不結實的外交官，為了管理英國大使館的政務團隊的一年任期動身。我在飛機上往窗外看到的風景，彷彿千百年來不曾改變過。「鼻煙色的山巒，」某英國旅人曾這麼形容，「蜿蜒小徑在三千零四十八公尺高的土丘上連綿不絕。」當我仔細看，能看出丘與丘之間有細細的綠線，那些就是山谷。肉眼完全看不到人類居住的痕跡。

我朝東凝視，看凌雲巔峰兀自矗立在綠谷棕岳之上，高達七千三百多公尺。它們是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一座沿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東部國界延伸，並將這些國家與中國隔開的雄偉山脈。興都庫什山其實是喜馬拉雅山的一部分。雖然它們有「世界屋脊」之稱，把它們想像成一道牆或壁壘更加貼切：歷史上，它們數次成為不同民族抵達的最東端。這些山岳之於人類文化，就好像珊瑚礁之於海洋生物：豐富而多樣。舉例來說，在興都庫什山阿富汗段，一處約美國紐澤西州大小的地方，就有二十種互不相通的當地語言仍為人使用。

亞歷山大大帝來過這山區，不過並未試圖跨越——他大概以為這裡就是世界的最東緣了。當地居民奚落他，一點不畏懼這位波斯的征服者、當時世界最大帝國的統治者：他們說，想拿下這些難以到達的祕境，他需要「長翅膀的士兵」。亞歷山大曾在某次打仗時肩膀中箭負傷。這位偉大的指揮官離開希臘北部的家鄉後，有長達八年的時間

不曾吃過一場敗仗。亞歷山大的史官記載，他此次的對手是其整趟印度遠征中遭遇過最頑強的戰士。亞歷山大非常佩服，於是娶了一名當地的女孩羅珊（Roxane，他的士兵們認為，她是「他們在亞洲見過最美麗的女人」，只有波斯皇后比她美）。

亞歷山大並非被興都庫什山居民擋下的唯一一位征服者。自七世紀起，陸續把伊斯蘭傳入阿富汗與印度北部的阿拉伯軍隊，安分地統治著富裕的低海拔城市，而不去打擾山區居民。十四世紀時，殘忍的中亞征服者帖木兒差點就將他們征服：他一路過關斬將到山上的最高要塞。然而，他無法持續控制當地，那裡的居民也不曾改宗伊斯蘭。在帖木兒離開很久以後，居民仍然祭拜他們的神胤拉（Imra）和冀胥（Gish），喝葡萄酒，然後在他們於村子裡謹慎搭設的木棧舞台上跳舞——舞台就如小斗笠的帽貝般依附在陡峭的山腰。他們驚恐的穆斯林鄰居稱他們為「喀菲爾」（Kafirs，意為無信仰者）。他們當時欣然接受了這個標籤。他們住的區域，過去就叫喀菲爾斯坦（Kafiristan）。

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經過此地時並不喜歡他們。「他們是偶像崇拜者，野蠻原始，全靠狩獵為生，以獸皮蔽體，」他寫道，「他們絕對是次等的。」這個描述並非全然錯誤——喀菲爾的確穿獸皮，而且不務農——但馬可波羅是否看過他們則有待商榷。亞歷山大造訪過後，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有西方人再次把目光望向興都庫什山。

* * *

（根據當地居民對後來的訪客所說的故事），據信有兩名天主教傳教士在十八世紀末進到了喀菲爾斯坦。其中一人因被誤認為惡靈而遭喀菲爾滅口；兩人都沒留下他們的見聞以作紀錄。一八二〇年代，生於伊利諾州、有西班牙血統、操愛爾蘭口音、受耶穌會教育的一神普救派亞歷山大·加德納（Alexander Gardner）旅行至中亞闖蕩（有段時間，他成為攔路打劫的強盜）。仰慕他的傳記作者表示，他在此的時光經常遭遇「埋伏、兇狠報復、千鈞一髮的逃脫，有時甚至是幾乎無法想像的殘暴事件，但也遇過暖心慈善之舉與至死效忠之事」。他還取了當地名字，叫勾達納汗（Gordana Khan）。

加德納宣稱曾兩度進到喀菲爾斯坦，但關於他的造訪的原始紀錄佚失，因為當時正值阿富汗戰爭之初，持有唯一原件的駐喀布爾英國特使亞歷山大·伯恩內斯爵士（Sir Alexander Burnes）遭一名暴徒殺害（當時有些人說，暴民是受一群阿富汗男子唆使，他們都被個性張揚的伯恩內斯戴了綠帽）。伯恩內斯是蘇格蘭詩人羅比·伯恩斯（Robbie Burns）的表親，說一口流利的波斯語，而且留下了從喀布爾的喀菲爾那兒聽來的一份證詞紀錄，揭露了喀菲爾會將死者放入棺材、埋葬在室外，會把他們的女孩按體型大小計價販售，以及男人會藉互相吮吸奶頭一泯世仇等習俗。

伯恩內斯死後，喀菲爾斯坦許多年不見外人來訪。它被稱作「亞洲輿圖的暗斑」——是連會派間諜探查最難以到達、教人裹足不前的邊境的大英帝國印度政府，也無法穿透的地方。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打算編纂一部喀菲爾斯坦地方誌，他們為每個和印度接壤的地區都做了地方誌，但他們絕無僅有地放棄了喀菲爾斯坦。

然而，認識喀菲爾斯坦之類地方對英國當局大有助益，喀菲爾斯坦鄰接他們英國領地的最北端：十九世紀末，他們在印度的帝國的最大外部威脅，來自正蠶食鯨吞中亞，而且迅速地向南推進的俄羅斯。偵察喀菲爾斯坦這種夾在英國人和俄羅斯人之間的地區，希冀和他們達成同盟關係，或征服他們進而增加領地，促成了長達數十年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1]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Anglo-Afghan War）的老將陸軍中尉麥克奈爾（Lieutenant McNair），於是在一八八三年特休期間，來到喀菲爾斯坦的邊界，以腰果汁液把皮膚變黑，並把測量工具收進偽裝用的醫藥包。他變身「古爾·麥克奈爾·胡笙沙閣下」（Sahib Gul McNair Hussain Shah，譯按：Sahib泛指閣下、大人、先生等尊稱），希望在來自當地普什圖部落

（Pashtun）的兩名友人的陪同下，進入喀菲爾斯坦。當麥克奈爾看到沿途成排的石堆墓，僅半遮掩下方遭喀菲爾（為保持遺世獨立而不惜一切）殺害的過往旅人屍體，他一定曾猶豫是否繼續前行。「喀菲爾認為，在所有值得一提的事蹟中，」麥克奈爾寫道，「殺害穆斯林是首要之務。」受害者的首級將被高掛在樹上。幸運的是，喀菲爾對與麥克奈爾同行兩名男子所屬的部落抱有毫無根據的恐懼，因此其部落成員一般都被准許安然通行。

麥克奈爾拜訪喀菲爾的時間非常短暫，因此沒有太多發現。他估計他們的人數在兩萬人左右。他補充：「他們有數不清的偶像，每個山谷都有一些只在該特定地區為人所知的偶像：據說是代表古時候生活在當地的英雄們，如今成為幫他們向安姆拉（Amra）求情的靈。」他認為喀菲爾的葡萄酒很清淡，而且他們對他隨身攜帶的威士忌嘖嘖稱奇。他提到，最重要的是，他們「對英國人相當有好感……一旦有

需要，只要我們吩咐，他們一定樂於效勞」。他把這一切記錄在蓋了「機密」戳章的一本小冊子，並將之交給英國戰爭部的情報部門。他編寫了一份他認為未來訪客應該用得上的字彙表當作附錄，像是「好陡，我可能會摔下去」和「我獻祭一頭羊給安姆拉」。

麥克奈爾的觀察停留在表面，而喀菲爾斯坦直到喬治·史考特·羅伯遜（George Scott Robertson）到來之後才撥雲見日。羅伯遜本來是一名軍醫，來自荒涼偏遠的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譯按：位於今蘇格蘭東北部](#)）。他在某次派駐英屬印度最西北端領地擔任行政官期間，在一座山的山頂看到了這「名符其實的仙境」，也許令他想起家的感覺。他形容眼前的喀菲爾斯坦「伸入無垠虛空」。他後來把遠征形諸筆墨時告訴讀者，他從那一刻起便對該地心醉神迷。他以英國政務官身分常駐附近的吉爾吉特（Gilgit）時，特別留意可能在那裡出沒的喀菲爾，後來終於碰上幾名喀菲爾到訪該區，然後被引介給他認識。起初他覺得他們的外表不甚討喜，但後來發現「長度及足跟的破爛棕色長袍，遮蔽了他們活躍矯健的身體；看似平淡無味的五官實則敏銳又勻稱，他們有時會明目張膽地凝視他人，或露出有如老鷹一般的銳利目光；此外畏縮要飯的人……可能在任何時候脫去卑下偽裝，展現他們的本色」。當他獲准去和喀菲爾一起生活，而不僅僅是拜訪他們，而且不知不覺待了整整一年後，他發現這一切都是真的。

他發現這群被稱為喀菲爾的人，可細分成很多部落，彼此有不同的語言和習俗。此外，其他鄰近民族如今雖受穆斯林統治，也曾和喀菲爾有同樣的宗教信仰。卡拉什人就是這些鄰近民族的其中一族。不同於住在高山上、始終保有自由的喀菲爾，卡拉什人位於較低海拔的

地盤曾被契特拉（Chitral）的王子們征服，因而被迫以徭役的形式進貢。^[2]對想要尋找驍勇戰士的羅伯遜來說，卡拉什人毫無用處。他曾經蔑地表示，他們是「十足卑躬屈膝的劣等民族」。相較之下，他選擇生活的部落「砍族」（the Kam），是所有喀菲爾中最好戰的民族。某天他試著向砍族人形容肥胖的人長什麼樣子，卻始終無法讓他們理解。他們當中沒幾個人看過胖子。唯有當地祭司聽懂他想表達的。他說，祭司「一直很困惑。但在終於聽懂我的意思後，他高呼：『我記得我在阿思瑪爾（Asmar）殺了的男人就像你所形容的那樣——我們說他是「矢奇歐」（skior）。』」

不只是祭司會殺人。砍族的血腥仇殺並非偶爾發生的不幸事件：那是一種生活方式。離他們最近的穆斯林村莊是他們殺人打劫的對象，通常是為了分得戰利品（在如此貧窮的社會，可能單單幾件衣物就值得殺死一個人），或作為對穆斯林部落逐漸蠶食砍族土地的報復。羅伯遜列出砍族人欣賞的特質，名列榜首的就是殺人的能力，其他則還有「一個好山男永遠做好與人爭吵的準備，而且風流多情」。砍族人彼此經常有過節，但他們有個巧妙的習俗能躲避仇殺：一個人只要假裝在躲他的殺人仇家，對方就會假裝看不到他。

沒能殺死與部落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的成員，可能會被自己同胞擲煙灰。他們可能成為被惡整的對象，而且他們的妻子會在公開筵席上為他們添菜時，把臉別過去。恥辱（gal）是驅使砍族人行動的強大動機。階級也是。從社會階梯滑落的人，可能淪落為低階的「薄撿」（brojan），可以被人當作中世紀農奴般買賣。另一方面，手下有五個冤魂的年輕人，能穿戴用死者衣物製成的藍披巾。羅伯遜客居期間看過不少這樣的年輕人。他還見到了妥拉格·梅拉克（Torag

Merak）。這名男子活脫像從維多利亞時代冒險小說走出來的人物。

「喀菲爾斯坦最有錢的男人」梅拉克來見羅伯遜時，穿了一身豔紅長袍，手持一面銅盾。「他有明顯的閃族五官，他的長髮一綹綹像老鼠尾巴，落在肩上，而他時不時用自豪的眼神，掃視陌生人是否看出他的了不起。」

梅拉克聲稱殺了不下百人，當中不乏女人和小孩，他在棍杖底端綁了一個小鈴鐺以資慶祝。「在他悲傷的眼裡，」羅伯遜寫道，「有個令人同情的世界。那完全與事實不符。他本質上是個大呼小叫的粗野人，但靜下來時，他的五官好似看盡亂世苦難的人。」羅伯遜很幸運，身為基督徒的他被當作非穆斯林同胞，以及某種名譽上的喀菲爾。砍族人早就聽過英國人，雖然原因有點特別：他們告訴羅伯遜，他們的戰神冀胥曾到倫敦生活。

砍族人無論如何很難忽視死亡。所有喀菲爾都把他們的死者葬在戶外，可能只是因為冰凍的土壤很難挖鑿。羅伯遜表示，風向不對時，腐爛屍體的臭味會飄進村莊。所有葬禮都會有舞蹈表演——屍體被放在椅子上，並被舞者包圍在正中央。

羅伯遜的描述和馬可波羅幾百年前的描述一樣不客氣。他記載砍族人從不洗澡，不斷地偷他的東西，而且「他們說謊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不過對羅伯遜而言，深受大英帝國尚武傳統薰陶的他，上述特質和「他們的英勇卓絕，他們的愛家，以及他們對自由難以抗拒的愛」一比之後，變得微不足道。他說，換個角度來看，是客觀環境決定了他們的樣子。「對他們而言，世界沒有變得越來越和平……如果他們不像現在這樣，他們早就被奴役了。」

儘管他非常欣賞砍族對自由的熱愛，他成了促成砍族被征服的無心信使。他的旅程有個隱藏目的：英國當局試圖決定喀菲爾部落是否值得納入帝國。印度部的機密文件揭露，羅伯遜的任務是「調查其部落組織，以及查明他們作為友善但中立的盟友或戰時活躍支持者的價值」。他的結論是，當局應該不要去打擾他們。他稟報上級時表示，喀菲爾「沒有任何戰略或政治重要性……不該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擾」。這也許是懷抱良善意圖所提出的上上策，不料卻成了喀菲爾斯坦的末日。

與喀菲爾的居住地接壤的阿富汗，當時由英國人口中的「鐵血阿米爾」（Iron Amir，譯按：阿拉伯文的阿米爾指的是『統率他人的人』或『國王』，本意為軍事統帥）阿布督·拉曼汗（Abdur Rahman Khan）治理。在他的回憶錄中，年邁的阿米爾聲稱想要軍隊陣中有喀菲爾，因為「他們是驍勇的民族，我認為他們有天會成為朕麾下很有用的士兵」。（他是對的：他們適時地成為了阿富汗軍隊的菁英。）他也想藉征服喀菲爾斯坦，勝過帖木兒。此外，儘管他不是宗教狂熱者（舉例來說，他雇用了一名印度教的祕書），他想擁有對無信仰者發動聖戰的光環。一八九五年，效忠拉曼汗的三支軍隊，朝喀菲爾斯坦發動鉗形圍攻。他們在凜冬出擊，讓喀菲爾不能輕易逃脫。無論多麼勇武殘暴，有鑒於他的敵人們還不懂得使用步槍，而且主要以弓箭作戰，拉曼汗勝券在握。喀菲爾被迫在皈依伊斯蘭和寧死不屈之間做抉擇；英國旅行作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在一九五〇年代，參觀了一顆被選擇赴死之人的鮮血染紅的石頭。拉曼汗贏得了「民族與信仰之光」（Zia ul-Millat wa ul-Din）的尊稱。而他征服的地盤

最終被重新命名為努里斯坦（Nuristan），意為「希望之地」，慶祝他將此地的人們強制改宗。

* * *

也許努里斯坦如今已是穆斯林地區了，但它還是像被拉曼汗征服之前一樣動盪又不受控制。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三日破曉，在努里斯坦省瓦納特（Wanat）臨時軍營的四十九名美國士兵，一睜開惺忪睡眼，映入眼簾的就是不祥之景：在昏暗的天光中，一個個人影從遠方山脊冒出。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們是帶著火箭發射器的塔利班分子。人影一個接一個出現，直到人數達將近兩百人。他們倏地開火，頭幾分鐘就炸毀了美軍陣營的重兵器。交織鮮血與噪音的混亂延續了幾個小時。襲擊者一度擊破美軍防線，然後終於在連續進攻幾小時後撤退，造成美軍九死二十七傷。這場瓦納特戰役是自二〇〇一年起，美國在阿富汗傷亡最慘重的一次交戰。美國媒體對此役的報導著重於突顯努里斯坦為「地表最凶險之地」和「蓋達組織與塔利班的中央本部」等名聲。伊斯蘭好戰分子特別喜歡努里斯坦的原因有三：這裡地形險惡（該省的群山最高有五千九百四十三公尺），與巴基斯坦接界，加上其居民的宗教熱忱與耐操耐戰（它是第一個在一九七九年對蘇聯發動聖戰的省分）。就好像在亞歷山大大帝的時代，他們和他們南邊的庫納爾省（Kunar）鄰居被認為是該區域最勇猛的戰士。

不過，作戰期間，戰地幾公里外有名希臘裔的老師，不受打擾地安睡著。雅典那西歐斯·雷洛尼斯（Athanasios Lerounis）住在邦伯雷村（Bomboret），打扮得像個當地人，在棕色羊毛扁帽上塞了點鮮

花。^[3]他雖是外來者，但獲准參加當地的冬至慶典：人們獻祭羔羊給眾男神與女神，暢飲自釀葡萄酒和濃烈的白蘭地；穿鮮豔紅黃服裝戴貝殼頭飾的女人，在男人身旁圍成一圈，端莊地隨著吟誦聲搖擺，徹夜舞蹈。他和巴基斯坦最後的異教徒一起生活，地點幾乎就在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活動中心。

這些人是卡拉什人。他們挺過了高山區喀菲爾近親被迫皈依的命運：契特拉的王子們受英國保護，拉曼汗無法進到他們的地盤。他們的谷地位於巴基斯坦境內，也是因為如此，才使巴基斯坦在一九六九年併吞了契特拉。卡拉什人說，曾經有段時間，全契特拉都信奉他們的宗教——但現在只剩下四千人，其他則都是穆斯林。最後四千名卡拉什人全集中居住在契特拉靠近努里斯坦邊界的三個谷地。山上的生活使他們不得不自給自足務農——種小麥做麵包，種葡萄做葡萄酒，放牧天生精瘦的山羊與綿羊，而不是骨瘦如材的牛。到了冬天，他們的土地冰封，他們自己也被雪困住。然而，山巒也保護他們幾乎不受外人入侵，即便幾公里外生靈塗炭，他們的谷地仍能一片祥和。

一八三九年，阿富汗人對到阿富汗的第一位英國公使威廉·麥克諾騰爵士（Sir William Macnaghten）說：「你的親戚們來了！」他們指的是來自喀菲爾斯坦的代表團。這種認為代表團在種族上是「歐洲人的窮親戚」（他們有時被這麼形容）的觀念，源自代表團蒼白的膚色，以及諸多被認為非常歐洲的習慣——坐在椅子上和握手，而不是像多數的阿富汗人，坐在地板上和抓肩膀。興都庫什山的民族來自歐洲的理論一度發展出更多細節。據說，他們是亞歷山大大帝及其士兵的後裔。卡拉什人實際上是一個失落的希臘部落的故事，在雅典、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譯按：今希臘第二大城市）乃至其他地

方傳開。捐款湧入。希臘遊客甚至攜帶亞歷山大的肖像到巴基斯坦村莊，比對亞歷山大和卡拉什人的五官。有些卡拉什人擁有金髮藍眼。這觀念也在卡拉什人間流行起來：一名當地男孩在十八歲成年後，把名字改成亞歷山卓（Alexandros）。與此同時，雷洛尼斯用捐款建立了乾淨的供水系統、廁所、學校，以及宣揚與保存卡拉什人文化遺產與宗教的一座博物館。

興都庫什山上的孤立部落為什麼看似歐洲人，可能不僅有一種解釋。二〇〇七至二〇〇九年間，我住在阿富汗並學習其語言，經常遇到聽起來像英文的單字。在阿富汗兩大主要語言之一的達利語

（Dari）中，^[4]lip（嘴唇）、bad（壞的）、am（第一人稱單數的be動詞）幾個單字，和它們在英文中的意思是一樣的。Madar、baradar和dokhtar聽起來，和它們的英文意思幾乎一模一樣：mother（母親）、brother（兄弟）和daughter（女兒）。「你」的單字tu，接近古英文的thou。完整句子有可能和英文對應句近乎一致。Baradar e-tu am意思是I am your brother（我是你的兄弟）。每當我在四周環繞雪山，常令人感到陌生的喀布爾，聽這些話從穿著鮮豔的chapan大衣、戴羊毛材質的pakol扁帽的人口中說出，知道他們見過的騷亂和殺戮，我一輩子都比不上，借用亞倫·班奈（Alan Bennett，譯按：英國知名劇作家）談在歷史中找到令人惺惺相惜的人物時所言，那感覺彷彿「有隻手伸出來，抓住你的手」。

箇中原因要回溯到三、四千年之前，遠遠早於大英帝國，甚至更早期的阿富汗帝國出現之前，那時歐洲人和阿富汗人都被同一支民族殖民：來自高加索的遊牧牧民，他們把印歐語言散播到廣袤千里。一九八〇年，在興都庫什山東邊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這些殖民者之一的

木乃伊化屍體被發現。這具木乃伊被稱為「樓蘭美女」，而她生活的年代，要回推至約三千八百年前。她有紅褐髮色、高顴骨，以及挺立的鼻子。她生活在今日的中國西部一事，告訴了我們印歐殖民者移動到多遠的地方。難怪亞歷山大到了興都庫什山會想起故鄉，並找起自家民族神話中提到的地方。他希望在興都庫什山區找到普羅米修斯因傳授人類火的祕密，而被神用鎖鏈困住的那座山。隨著向南朝印度推進之際，他益發相信自己正循著酒神戴歐尼修斯（Dionysus）的腳步，而他也看到當地人執行戴歐尼修斯的儀式。也許，他相信他已來到了世界的盡頭——一個神話成真的地方——而過度詮釋了這些巧合。抑或是他看到了可追溯到那個早期聚落的種種文化相似性。

所以卡拉什人有金髮藍眼一事，不能證明他們是亞歷山大士兵的後代，但這個想法絕非沒有可能。亞歷山大死後，希臘國王統治阿富汗南部和一部分的巴基斯坦超過兩百年。他們的「千城之國」以富裕著稱，和中國通商，並和印度的諸王們建立外交。希坎達（即亞歷山大）在喀什米爾仍是很常見的名字，而阿富汗的坎大哈城

（Kandahar）顯然仍保有這位希臘國王的名字。喀菲爾斯坦北方的巴達赫尚省（Badakhshan）的穆斯林統治者，持續自稱亞歷山大嫡系子孫直到十五世紀。希臘的鄰居馬其頓（Macedonia）也主張，亞歷山大的文化遺產屬於他們，不願被希臘人及其卡拉什朋友比下去。馬其頓邀請罕薩王子（prince of Hunza）在二〇〇八年前來特訪，因為這位住在契特拉北邊一帶的王子，也說自己是亞歷山大的後人。卡拉什人的口述歷史將他們的起源追至「塞拉克沙」（Shalak Shah），此人可能是亞歷山大麾下的將軍塞琉古斯（Seleucus）。一份二〇一四年的卡拉什人口DNA研究，似乎確實能為卡拉什人的傳說作證。它告訴我們

這裡的人有外來基因，可能是歐洲基因，在基督前九九〇到二〇六年之間的某個時候，進到了卡拉什人的基因池。

* * *

我一到喀布爾，就開始瞭解關於努里斯坦的種種事。當時看都看不到聳立在阿富汗首都東邊、白雪皚皚的山巒（它是興都庫什山的一部分），因為城市被夏日的濃霧與排煙的廢氣籠罩。不過，當迫擊砲落在城市，別人告訴我，砲彈就是從那邊的山裡被人發射而來。自此，那山在我眼中變得美麗又恐怖。畢竟「庫什」二字聽起來很像「殺戮」的達利語單字kushtan。即便如此，知道那些山脈還有我難以觸及的地方，令我深深著迷。我愛不釋卷地讀去過努里斯坦之人所寫的書，包括羅伯遜，還有一九五六年到達該省的英國旅行作家紐比。我有時人在離努里斯坦不遠的地方，也看過照片中令人膽戰心驚的無數山村，但雙腳不曾踏上努里斯坦的土地。

二〇〇八年，我決定從另一側冒險進入興都庫什山。我從北京搭火車、走公路西行穿越中國最動盪不安的新疆省，進入巴基斯坦的北部省分罕薩。羅伯遜來過此地，事後寫下因為當地統治者為避免暗殺而住在樹枝上，以致他得穿著全套的隊列禮服，又是佩劍又是頭戴黃銅軍帽地爬樹一事。這一帶在很多方面都與阿富汗非常相似，可是治安良好。我可以搭乘當地的迷你巴士到市集採買，然後自由地和人們交談（用一點點達利語，多數時候則說英語，因為這個區域沒有單一的通用語言）。這令人感到興奮。由於是冬天，馬球場空蕩蕩，我想像夏天時，球場一定滿是地方要人，他們會騎在馬背上，咆哮、爭

搶、追逐著一顆小白球。瘦骨嶙峋的牛隻在地方旅社閒置的草坪上吃草，旅社都是做夏季觀光客的生意。山上有個小男孩和我練板球，還告訴我，他想代表英格蘭比賽——儘管他和獨裁者薩達姆·海珊同名同姓。女孩們坐在操場上俯瞰主要道路，一邊嘲弄經過的男孩們。我經過的時候沒被嘲弄，畢竟她們所有的辱罵用在我身上都沒意義。她們反倒把我拉去比賽歌唱，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語言。

我住在一位名叫胡笙（Hussein）的男子家裡。他邀請我去見當地薩滿——這是他對她的稱呼。我們沿著村裡的徒步小徑走到她家。

「她就住在山坡上，」他說，「所有薩滿都是如此。」在她家裡——傳統的石屋，壁爐的火在一盤快烤好的麵包下燻燒著——她俯身看著散亂在一隻托盤上的各色大頭針。家境富裕的地方要人胡笙從薩滿那得到頗為尖銳的預言：「村裡有些人將會討厭你——他們覺得你太常不在，你對你的社區不夠用心。」到我時，她以阿語禱告，然後向我報喜：「你將完成你的書。」我完全沒跟任何人說我在寫書。

離開時，我問胡笙一名住在山居小屋的人如何成為薩滿。他說，要成為薩滿，必須在高入雲霄的山巔待上幾個月，只吃麵包，只喝茶，並和羶羊當鄰居。當羶羊產下乳羊，未來的薩滿必須喝母羊的奶，然後下到山谷測試他或她新獲得的預言能力。這個傳統的由來有一部分是相信高山住有精靈（當地語言稱作「裴里」（peri））。人們認為，和精靈相處能賦予人超自然力量（perichahra這個字，意為「精靈容顏」，是當地人的一種讚美）。這個傳統和信仰曾普遍在此區域流傳，就連穆斯林們都遵守，乃至於有一本書主張，整個興都庫什區，包括罕薩、瓦罕（Wakhan）、努里斯坦、契特拉，可以一起被稱作「裴里斯坦」（Peristan）——亦即精靈之地。胡笙告訴我，有

個叫卡拉什的部落還未改宗，然後提議帶我去見見他們。這趟從罕薩到契特拉的顛簸山路，搭吉普車要花上幾天。我當時空不出那麼多時間，但我對自己發誓一定要再回來。

* * *

四年後，我試圖重訪，而這時取得巴基斯坦簽證變得困難許多。我提出申請過後好幾個月，才被巴基斯坦在倫敦的最高公署傳喚。我到櫃檯自我介紹。「喔是你，」一名蓄著長鬍、精力充沛的短小男子說，「羅素先生。我們都知道你。你的案子很出名！」他告訴我，他們已經處理好幾個星期了。這大概是我的檔案夾變得這麼厚的原因。被另一名禮貌但疲累的官員叫到偌大的辦公室後，我親眼看到了檔案夾，就攤在他面前的桌上。「巴基斯坦那邊有人對你的名聲有疑慮，」他說，「為什麼呢？」

我說我曾在喀布爾工作，他眼裡閃過一絲理解，然後就沒再追問下去了。我知道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對彼此懷抱很大的猜疑：顯然，只是在其中一邊住過，就足以阻礙你造訪另一方。簽證最終發下來了。幾個星期後，我出現在巴基斯坦相當具現代感的首都伊斯蘭瑪巴德有點混亂的機場。但抵達目的地前，我還得再面對一個挑戰。契特拉在伊斯蘭瑪巴德北邊兩百四十公里外，靠近阿富汗的邊界。此區群山環繞，只有一條進出聯通的低海拔公路，穿越阿富汗（當地人指出，這是因為英國劃下的國界所致），現在已被封起來了。因此，我得搭飛機到那裡。儘管契特拉在夏天是陽光充足的觀光聖地，因為我的簽證拖了很久才發下來，現在已是當地的隆冬，下雪刮大風是稀鬆平常的

事。好處是，如果我能到達卡拉什山谷，也許趕得上冬至，參加卡拉什人為期一週的丘謨思（Chaumos）慶典。

我搭乘的第一班飛機試圖在契特拉機場降落，但因為天候因素，結果在下個山谷附近繞圈子，也讓我有幸看到興都庫什山的絕景。我懂亞歷山大大帝為什麼以為這些山脈是世界的盡頭：即便從飛機上，放眼望去盡是被雲霧覆蓋的連綿山峰與斷崖。在我屁股之下、契特拉之上，雲層又厚又黑。飛機像是試探般地慢慢穿越最上層的烏雲，但很快就放棄，然後轉向回頭。幾天後，在多跑了幾趟機場之後，我終於抵達藏在那雲層底下的山谷。

每次我到機場，都會看到一個道別的標誌。標誌上寫著，願安拉保佑您（Allah hafez）——好似提醒我們，此區古老印歐居民的語言遺產，如今正遭受挑戰。願神保佑您（Khoda hafez）是巴基斯坦以前道「再見」的慣用語，在阿富汗與伊朗至今依然沿用。然而，有些穆斯林相信用來指稱神的舊單字Khoda（和英文單字god關係親近，用kh取代了g）比不上阿拉伯文的安拉，因為後者在本質上更貼近伊斯蘭。我在伊朗已看過波斯詩歌藉復興前伊斯蘭時代的古語，強調波斯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差異。巴基斯坦反其道而行——一部分是受到他們與阿拉伯世界的商業與政治關係影響。數以萬計的巴基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工作，而且阿拉伯世界傳統上不信任伊朗和一切波斯的事物。

用阿拉伯單字取代波斯單字的運動，可回推至軍事獨裁者齊亞·哈克（Zia ul-Haq，在一九七八年廢黜巴基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總統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統治的時代。布托不受政治立場影響，藉通過一條反對瀆神的法律，將巴基斯坦推上皈依伊斯蘭之路；該法條的受害者很多都是宗教弱勢。不過哈克的手

段激烈得多，譬如以公開鞭刑作為飲酒的懲罰，通姦者則要被投石至死。巴基斯坦資助鄰國阿富汗境內最殘暴的武裝叛亂團體對抗蘇聯。宣揚伊斯蘭理念一事帶給巴基斯坦一個更清晰的團結使命。這個國家是由許多省分（包括契特拉在內）在一九四八年結合而成，彼此之間除了宗教，沒有太多的共通點。它和印度（巴基斯坦以印度教徒為主的東邊鄰居）之間的持續對立，也幫忙創造出一種越伊斯蘭等於越愛國的感覺。此外，貪汙腐敗無所不在，讓人認為唯有虔誠信徒會正直地為政。哈克的繼任者們從不曾推翻他做出的種種改變。

當我搭乘的班機終於抵達契特拉，我看見房舍隨意地散落在平坦翠綠的谷地各處。谷地南端有條大河流過，岩石裸露的陡峭山脈從兩側拔地而起。我們途中經過了麥克奈爾看見許多往生旅人屍體的陡坡。籠罩著谷地的些許霧氣是暴風烏雲留下的最後痕跡。麥克奈爾和羅伯遜途經此地時，這座山谷是王公（mehtars）治理的獨立土邦。我前往由現任王公的表親經營的一間飯店。他的曾祖父是羅伯遜拜訪之時的谷地統治者，曾竭盡所能地阻止羅伯遜接觸砍族喀菲爾——甚至拿錢要砍族人殺了他——因為他害怕英國人可能有意在併吞喀菲爾斯坦時，把契特拉一同拿下。（事實上，契特拉直到一九六九年被巴基斯坦併吞前，始終保有土邦地位，得以主控內部事務。）

他的後人沙札打·希拉吉·穆克（Shahzada Siraj ul-Mulk）相較之下極為熱心。他曾擔任航空公司的機長，他的太太佳薩拉

（Ghazala）有餐飲文憑。他們不在伊斯蘭瑪巴德自家沙龍招待外交官的時候，就在共同經營的飯店照顧獵人、登山客和作家。我在用餐大廳的爐火旁坐著時，希拉吉遞給我一本已出版八十年的老書，書背裝幀都解體了，作者是雷金納德·紹姆貝格上校（Colonel Reginald

Schomberg)。紹姆貝格會說六種語言，獲贈無數軍事勳章，包括一枚皇家地理學會的勳章，曾在探索中亞的二十年間到過契特拉。（他在晚年成為了天主教神職人員。）他在旅行期間寫下了這本《喀菲爾與冰河》（*Kafirs and Glaciers*）。我從寫在書本邊緣、怒氣沖沖的旁註看出，希拉吉的父親不同意本書對契特拉人的不友善觀察。紹姆貝格曾針對卡拉什人（契特拉唯一的非穆斯林）的未來提出悲觀預測。

「要不了多久，」他寫道，「他們將溫柔和緩但堅定地被說服、成為伊斯蘭教的信徒，而後成為作惡的穆斯林，而不是行善的異教徒。」

我很快就有機會對此提出自己的觀察。因為隔天我就要在希拉吉的陪同下，出發參觀最近的卡拉什谷地。與我們同行的還有一名司機，和一位巴基斯坦攝影師祖費卡（Zulfikar）；祖費卡和我住在同一間的飯店裡，也很想見見卡拉什人。有鑒於契特拉人共三十萬人，卡拉什人僅四千人，我不意外車行途中見到許多路標，上面寫著穆斯林對神的稱呼：至慈的、至尊的、賜予力量的、奪走力量的。半小時後，我們越過了契特拉河（Chitral River），河水從主要谷地的南側流過，轉入狹窄的峽谷。峽谷兩側的頁岩紋理錯綜複雜，狀似結凍瀑布。契特拉的支流之一卡拉什河大約位於我們下方九公尺處，河水在峽谷底部發出隆隆聲響。我們沿著道路，往山的高處前進。

當我們的車在崎嶇石路上顛簸前進，我聽到汽車座椅的彈簧的呻吟聲。峽谷有些路段的寬度僅能讓車輛勉強通過，司機得全神貫注地選擇特定角度，以免左手邊的崖壁刮到車門，同時又不能讓車輪超出右手邊險崖的邊緣。我驚訝得知，這條路有固定載客的一班迷你小巴。整條路上還能看到長達幾公里的電纜線——顯示即便巴基斯坦國力虛弱，效率不彰，還是有能力為人民做些服務。

過了一段時間後，峽谷豁然開朗成一座谷地出現在我們眼前。路邊偶有零星幾棟房子：起初看到的是穆斯林人家，這點從站在屋外的包頭巾女孩可以看出。再前進大約一個小時後，我看見路邊的樹枝上曬著顏色鮮豔許多的衣服，接著又看到一名穿著有紅白黃複雜刺繡黑底長袍的婦人，她的頭飾由五彩繽紛的羊毛、白色寶螺，以及一顆紅絨球製成，耳環叮噹作響。我們進到了卡拉什人的蘭布爾谷地

（Rumbur），這裡是還看得到卡拉什人的三座谷地之一。他們正在舉辦冬至慶典。我們在名叫格羅姆（Grom）的小村子停車。谷地在此敞開有兩百公尺寬，陡峭的兩側被白雪覆蓋，冷杉散布其上，谷地田野呈棕褐泥土色。現在大約下午兩點，不過太陽很快就會下山，落至山頂後方。我們朝由頁岩石和木頭梁柱搭建、有瑞士小木屋風格的房子走去。一名卡拉什男人阿慎貝格（Azem Beg，貝格只是尊稱，而非他的姓氏，因為卡拉什人一般沒有姓氏）從屋裡現身，把許多顏色鮮豔的花圈掛到希拉吉的脖子上，以迎接他的到來。（很多卡拉什人戴著這些花圈參加慶典。）他邀請我們進到還在施工的木造穀倉，我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被從空心窗框吹進來的冷風凍得直打哆嗦。阿慎貝格似乎不覺得冷。他兩個年紀還小的兒女加入我們，帶來了更多不同顏色的花圈，以及用杏仁串成的項鍊。「Ishpata。」他們說，意思是卡拉什語的「你好」。

一位長者端來一盆餘焰未盡的火盆來給我們取暖，並請我們喝茶和葡萄酒。「我在茶裡加了葡萄酒，」他說，「這樣味道更好。」十七世紀，在西方人到達他們的高山王國之前，葡萄牙耶穌會士鄂本篤（Bento de Goes）不知為何喝到喀菲爾的葡萄酒，贏得他的讚賞。我也覺得這酒意外香醇，邀請阿慎貝格也喝點。他先是伸出手，然後又

縮了回去。「我忘了，」他說，「我們正在辦節慶，而這間屋子是不潔的。我不能在不潔的屋內吃喝。」

原來這是卡拉什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規定。誠如羅伯遜的描述，喀菲爾是習俗各異的部落所組成的一群人（譬如砍族比卡拉什人好戰），但他們有同樣的信仰。舉例來說，喀菲爾都有一系列支配著他們生活的對立原則。右手、男性、高山、潔淨、奇數以及生命，全都和彼此相互隸屬；與之相反的是左手、女性、谷地、汙染、偶數以及死亡。所以男人坐在家裡的右手邊，女人在左手邊。同樣地，男人牧羊，女人種作物，男人入山，女人的地盤是谷地。除此之外，女人也較易受各種汙染。

卡拉什人至今仍遵守其中許多規定。特別是在丘謨思之後的那幾個月，山裡較高的地方只開放給男人。慶典期間使用的屋子，必須經過杜松枝淨化乾淨，而且位在更高處山坡上的房子也必須是潔淨的。在穀倉逗留後不久，我伸手摸經過的一間村屋時挨了罵，因為光是碰一下，就讓這屋子被汙染了，代表得燒更多杜松枝，才能讓它回復到原來的狀態。

但卡拉什人在面對有關潔淨的問題時，表現得很寬容。當我們站在穀倉裡，希拉吉的長鬍子穆斯林司機，溫順地低頭接受一名卡拉什小男孩為他獻上節慶花圈。幾分鐘後，司機爬上一張墊高的桌子（桌面比地板潔淨許多）行伊斯蘭禱告，卡拉什人面不改色。他們很習慣和穆斯林一起生活，因為村裡有些卡拉什人已改宗伊斯蘭。女性改宗者因為穿莊重的淡雅色調連身衣和頭巾，很容易辨別。卡拉什男人的服裝則和當地穆斯林男性相同。穿過卡拉什村莊時，我看到一名看起來好似兇狠穆斯林普什圖人的男子，穿著所謂的莎爾瓦卡米茲

（shalwar kameez，譯按：一種過膝的長衣，配上寬鬆長褲），頭戴契特拉扁帽，目不轉睛地盯著我，這感覺實在頗為怪異——我唯有從他脖子上的鮮豔花圈和扁帽上的一根羽毛，才知道他並非穆斯林，而是參與節慶的卡拉什人，準備去敬拜他崇拜的神祇。

希拉吉返回飯店，留下今晚要在此過夜的我和祖費卡。我們走向村子的中心，村民稍晚將在那裡跳舞慶祝冬至。一路上，我們經過村裡專供生理期女性居住的屋子「巴夏里」（bashali）。紹姆貝格在一九三〇年代把這裡形容得像個可怕的地方。他說，即便產婆進去也得脫得精光，還說男人一概不能靠近。七十年的時間似乎使這習俗獲得些許改善。「巴夏里」現在是一棟新落成的木造房，資金來自雷洛尼斯教授的募款，待在那裡的三名女子正佇立在門口，愉快地和路過的人交談。

我們走過一座橫跨卡拉什河的木橋時，緊握扶手以免在結冰橋面滑倒。在橋的另一端，有許多巨大的木酒窖位於水邊。我發現，酒窖無須上鎖：它始終保持開放，而每戶人家都把自己的葡萄酒和堅果存貨放在裡面。我在此看見兩個宗教並存的實例——一位牧羊人領著為丘謨思獻祭用的山羊，經過「古蘭之聲」（Voice of the Koran）伊斯蘭學院。人們在伊斯蘭喚拜聲中為慶典做準備，過程中喚拜聲從清真寺的擴音器傳出，在雪白山谷中迴響著。

祖費卡和我走到跳舞現場時，我們被帶到離舞者有些遠的地方。站在我們前面的是一排面露好奇的穆斯林女孩；她們靜靜地站著，時不時端莊地調整頭巾，觀賞她們比較活潑外向的親戚。從卡拉什宗教的角度來看，穆斯林在節慶時被認為是不潔的，因為他們沒有接受節慶開幕時的淨化儀式（儀式上，男人們要獻祭一頭山羊，女人們則要

被燃燒的杜松熏沐）。他們待過的房子、觸摸過的食物，都會變得不潔，因此他們不能加入儀式活動，而得站在一段距離外觀看。一九三五年，紹姆貝格參加卡拉什人的春日節慶時，留下類似的記載。「滿臉憂鬱的一群穆斯林改宗者擠在某個屋頂上，」他寫道，「巴巴望著他們昔日的宗教同胞正歡笑著。」

阿慎走到我和祖費卡跟前。「抱歉你們不能加入我們，」他說，「只有從慶典揭幕時就在谷地的人能參與。要是你早點到，」他對我說，「就絕對沒問題。穆斯林不能加入，但外國人可以。」我的確看到一名脖子上掛著相機的德國男子和他太太，如卡拉什人般優雅地迴旋擺臂。他應該有參與山羊祭儀。現場還有一位女士穿著全套的卡拉什服裝，連寶螺都有——但她戴著卡拉什女人當中幾乎無人配戴的眼鏡。而且從五官上來看，她絕對不是卡拉什人。她是個日本人。後來我有幸和她簡短聊上了幾句。她名叫亞紀子。她說，她住在谷地已經二十五年了。她最初來此攝影，結果愛上了一名當地男子。她說，她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感覺：如今她回去日本，都覺得那是個我行我素的陌生國度。

身為穆斯林的祖費卡，欣然接受他被排除在外一事，甚至因為握了阿慎的手而向他道歉（這麼做肯定汙染了他）。「有這規矩對他們是好的，」他對我說，「免得被大批遊客打擾。」遊客在冬季不是個問題，但我聽說夏至節慶吸引了很多巴基斯坦觀光客前來；他們對當地的好奇程度不下於從希臘、乃至其他更遙遠國家前來的遊客。很多遊客都是友善的，但有些人抱著錯誤的觀念前來：他們以為，因為卡拉什女人不戴面紗，而且不是穆斯林，所以她們會願意和人發生性關係。關於「八哈魯克」習俗（budhaluk，每年社區會選出一名卡拉什

男人，他要奉獻自己到高山居住，然後盡可能地讓越多女人受孕）的駭人傳聞，更是助長這觀念的散布。事實上，卡拉什人對性非常保守，而且在丘謨思期間，就連已婚夫婦之間都全面禁止行房。不過，這並不能阻止從巴基斯坦其他地方前來的娼妓，把自己打扮成卡拉什女人，撈一筆傳說財，將對異國風情的渴望兌換成鈔票。

儘管祖費卡和我沒有實際參與下午的舞蹈活動，我們看得很盡興。開場時，卡拉什女人和男人圍成一個大圓圈不停兜轉。女人服裝上的合成布料，除了傳統的紅與黑外，還有橘、粉紅和黃，七彩斑斕。男人則身穿莎爾瓦卡米茲，頭戴契特拉帽，打扮平淡許多。我看見群眾中有幾個特別勇敢的人，被吟唱歡呼著的旁觀者圍在中間，仍持續跳舞。漸漸地，男人和女人手搭著手，盡情舞蹈。

男女不做舞伴，各自成群，一方吟唱，另一方跳舞。我問阿慎貝格吟唱的內容是什麼意思。「是關於神重返人間，前來加入我們，」他回答道，「他們在唱，叔伯的兒子、姨嫂的女兒，都來和我們一起慶祝。」他也告訴我，吟唱的內容每二十分鐘就會改變。慶典期間，各式各樣的吟唱成為獻給慶典之神「巴力曼」（Balimain）的讚歌，而巴力曼將乘著長有翅膀的馬，從遠方前來收集卡拉什人的請願。小孩在跳舞的大人之間橫衝直撞，玩著追趕遊戲。他們幾乎不受責備。有時男孩形成一個個小團體，手臂搭手臂，對女孩吟唱。事後證明，這是戰略失誤。有個女孩發現搭著手臂的男孩們很難即時和彼此分開來追她，於是她用腳攻擊中間男孩的胯下，然後迅速開溜，開懷大笑。

一段時間後，跳舞人群開始減少，卡拉什人回家為晚間的另一場舞做準備去了。我前往我們今晚要過夜的家庭旅館，經營者是阿慎的

親戚薩爾瑪斯古爾（Zarmas Gul，此處也一樣，古爾不是姓氏，而是接在她名字後面的親暱稱呼——意為「花兒」）和她先生。我看著薩爾瑪斯古爾在柴燒爐旁做羊肉餅，成品有點像英國的康瓦爾肉派

（Cornish pasty），但完全沒得比，因為這羊肉餅是用新鮮的肉做的。一台老電腦時而播放印度教音樂，時而播放美國流行樂。等待爐子熱起來的同時，我們身穿精美刺繡連身裝的卡拉什女主人，輕輕地隨著蕾哈娜的歌曲節奏擺動。她的女兒坐在一旁，身上穿的是運動服，而不是傳統的刺繡連身裝（阿慎貝格後來告訴我：「她是男孩子氣的女孩，但倒是同意穿卡拉什連身裝上學。」），偶爾占用電腦打遊戲。

儘管有這些比較現代的生活方式入侵（當然是拜我先前看到的沿峽谷搭設的電線所賜），卡拉什人的日常作息在其他方面仍不仰賴各種現代化設備的協助。在村子裡，即使是最小分量的食物都需要準備時間——砍木柴，收集木柴，儲存木柴，保持乾燥，就算只煎一顆雞蛋，也是得生火。我心想，在這天寒地凍的冬天洗衣服該有多辛苦。欣慰的是，爐火很快把整間房變得暖和，而且我們因為知道外頭有多冷，於是更覺得暖上加暖。

羅伯遜時代的砍族人，其生活條件肯定更是難以想像的艱辛——他們住在更高海拔的山區，而且沒有電力或觀光收入。不過羅伯遜說，他們「從不憂鬱」——或許是因為他們從不停止社交。譬如，他們完全不理解他有時會想獨處。他沮喪地記錄道，每當他回房打算安靜寫作時，他們就以為他一定是怎麼了，於是會特地到他房裡，試圖逗他開心。（擺脫他們的唯一方法，是請他們教他砍族的語言：這令他們無聊到總是幾乎奪門而出。）卡拉什人似乎也安於住在自己的谷

地裡。很少人選擇到城市發展，就連改宗伊斯蘭的族人也很少離開。從我自己的西方立場來看，他們似乎每天都得奮力求生。但我也想到，他們從來無須煩惱現代都市人面對的問題：被陌生人群淹沒、被當作異類，以及孤獨。

那天入夜後，第二輪舞蹈開始。祖費卡和我從家庭旅館這邊，看到前方谷地出現熊熊火炬，然後一群年輕男女慢慢從漆黑中現身，朝附近一塊田走去。我們保持禮貌的距離，跟在他們後方。我們到田裡後，發現山丘到處點點亮光，原來那是卡拉什人從各自村子持火炬下山的景象。喧鬧聲隨著人們彼此噓寒問暖而起，其中有些人已經幾個月沒見了。舞蹈持續整個晚上，跳舞的人群被大型營火照亮。儘管雪持續地下，卡拉什人似乎不以為意。暖烘烘的火光和人們的活力趕走了夜晚的漆黑冷峭，預告夏天的到來。我隔天早上起床時，阿慎貝格還沒睡——他在舞蹈結束後的清晨，去給幾對前一天結婚的夫婦祝賀。

阿慎的父親是卡拉什人的長老之一，不過卡拉什人傳統上是一支平等民主的民族，沒有永久領袖。羅伯遜發現砍族領袖每次做重大決定之前，總是先等其他部落成員發表意見，然後按照多數人的意見達成共識。遇到重大分歧且沒有明確多數意見的情況時，砍族政治人物訴諸西方民主國家政治人物鮮少使用的一個手段：他們躲起來，是真的不見人影的躲，避免做製造分歧的決定。卡拉什人有負責確保族人正確執行儀式的「嘉德拉康」（gaderakan）長老們。不過他們是無給職的義工，而不是我們一般認知中的祭司。

* * *

那天晚上，我在一棟卡拉什民宅中過夜，爐灶發光的餘燼讓室內保持暖和。清晨升起的太陽驅除了谷地的夜寒，而我很快就會見識到另一種風格的舞蹈。另一個卡拉什人谷地比里爾（Birir）距離蘭布爾最遠，前往那裡的車程要好幾個小時——那裡的冬至慶典和蘭布爾的稍有不同。來自比里爾谷地的薩爾瑪斯古爾已經跟我們說過那裡的慶典，不過我自己的卡拉什同伴們似乎都沒有聽過。蘭布爾與比里爾之間的消息似乎不太流通，大概是因為卡拉什人幾乎都沒擁有車輛，也沒有強烈動機徒步離開自家谷地，去看看另一個卡拉什族群。阿慎和皈依伊斯蘭的卡拉什人瓦濟爾（Wazir）與我同行。

比里爾的觀光客很少，那裡也比蘭布爾貧窮，而且比里爾的卡拉什人很多都住在山坡上的同一棟木造建築裡。那是一棟老式建築——多層樓房，公共陽台區域由樓梯連結，每戶人家各自擁有一個房間。由於坡地陡峭，陽台由低樓層往高樓層節節退縮。它的外觀遠比蘭布爾相對年輕的建築賞心悅目（大幅現代化的中間谷地邦伯雷〔Bomboret〕就更不用說了），不過也更加擁擠。

山谷的平地上也有整群的屋舍，我們徒步穿越那裡，繼續前進一段距離，然後爬一小段山坡路，抵達居高臨下的神廟「潔思塔罕」

（jestakhan，供奉家庭女神潔思塔〔Jestak〕）。慶典在此舉辦。門外一名警察要求查看護照，然後才放我進神廟——不過神廟也只是有成排木造柱子的單一空間而已。神廟雖然是近期修建的，卻散發非常古老的氣息。也許是因為室內的柱子看起來像異國風情版的愛奧尼亞柱，抑或是因為柱子上結滿蜘蛛網，導致木頭上的符號雕刻難以辨識。神廟內部大抵陰暗，除了兩道薄光從屋頂上的正方形開口透了進

來，照耀著神廟的牆，另外還有一扇窗，能看到遠方冰封的山丘。屋頂上坐了一群男孩和女孩，從開口處凝視下方的我們。我猜他們可能是被禁止進入神廟的穆斯林。

神廟裡約有八十至一百名卡拉什人。有些坐在後方的長凳，不過多數都站著。有一排排穿彩色連身服的女人站在陰影處。朋友們見面互相打招呼，然後站著小聊一會兒。其他人則是靜靜聆聽身穿莎爾瓦卡米茲、頭戴契特拉帽的三名男子說話：其中一人披著紅色和金色、由合成纖維製成的閃亮風衣。他們三個吟唱簡單的小調，總共只有兩個音符，展現了悲傷的情緒。此外，有兩名男子在潔思塔罕的角落敲打不同大小的鼓，為他們伴奏。四十到五十個女人在房裡四周搭著臂膀形成長條隊伍，跟著歌者的領唱，反覆吟誦。他們並未嚴謹地遵守節拍，不和諧的愁緒樂聲盈滿整座神廟。站在人群中央，我的感受和蘭布爾時截然不同。蘭布爾的慶典打打鬧鬧，比里爾的慶典則是嚴肅又神祕。鼓樂徐緩，女人沿著室內空間的邊緣逆時鐘移動，男人持續歌唱。卡拉什男人時不時走到歌者面前，把皺巴巴的盧比紙鈔放到他們的扁帽裡，這是傳統上人們對好歌聲給予獎勵的方式。

阿慎為我詮釋樂曲：他說樂曲述說其中一位歌者的夢，以及昔日卡拉什人在山谷裡為慶祝節慶起舞的地方。「神在問，我們為什麼不用整座山谷慶祝丘謨思？」他翻譯道。隨著卡拉什人的數量減少，節慶的規模在過去幾十年也隨之變小。很多曾經用來舉辦慶祝活動的地方如今屬於穆斯林，等於受到汙染。我納悶，這些年來，有多少卡拉什人因伊斯蘭、基督教和其他傳教信仰進到他們的故土而興嘆？

節奏改變了。鼓聲越來越快。女人分成一個個四人組，有些男人也加入、隨意地跳著，有時還旋轉著身體。鼓聲漸大漸快，我和瓦濟

爾與他的朋友們也加入並跟著起舞。人們四人一組，男女分開，像先前一樣逆時針轉啊轉，一旦追趕上前面一組，兩群人便撞個正著。撞上後，雙方得彼此相視大笑。但也可以選擇旋轉面對後面一組，然後互撞，然後相視大笑。有一回合，我在場邊休息，眼前持續拍打的砰砰鼓聲、聽起來有點瘋狂的刺耳笑聲，以及人們在房裡急促轉動的景象，散發一種奇異的瘋癲氣氛。然後鼓聲消退，舞蹈又變得肅穆莊重。

我們在舞蹈終於結束後離開潔思塔罕，聽見山谷下方、靠近我們抵達時看到的古舊木屋附近，傳來更多歡笑和歌唱的聲響。「那些是純淨男孩。」阿慎貝格告訴我。純淨男孩指的是處男，他們在儀式上被認為是十分純淨的。在慶典中，純淨男孩代表卡拉什族人的先民，他們會挨家挨戶地給人送好運，然後對方會贈送新衣服作為謝禮。在我們從潔思塔罕走回到谷地的路上，男孩們仍繼續高歌，並和我們一樣經過了一處有屋頂的拱廊，裡頭有些住在谷地的穆斯林皈依者，正在給自己烹煮烤肉串。

「我們有開放的心，」阿慎在回蘭布爾谷地途中對我解釋道，「所以我們在露天場地禱告。」事實上，蘭布爾有兩間石造神廟，但規模很小，而且不是集體敬拜的中心。戶外的敬拜場地稱作「撒基閣」（sajjigor，和人們在那裡崇拜的神祇同名），位於村莊北方的樹叢裡，而那是我在節慶期間不被允許踏足的地方。不過，我們回到蘭布爾之後，慶典已結束，瓦濟爾答應陪我前往。我們從北邊海拔更高的地方離開村子（山谷兩側都是小山，但從此地看向谷地，會發現谷地本身也有一道明顯的坡），沿著一條地面結冰的濕滑小徑走向一座橫跨河流的橋，橋的另一端有生長在曠野的樹叢。我們在小徑上遇

見的年輕人說，我們可以去撒基閣看看，但不要碰任何東西。於是我們站在樹叢邊，從樹縫間觀看五尊木雕像，謹慎地保持一段距離。瓦濟爾說，儘管這些雕像讓他的親戚們飽受偶像崇拜的指控，它們卻並不代表任何神祇。這些雕像其實是族裡死去的重要人物，在往生一年後由他們的家人為了緬懷而造。雕像一旁的地面上有一塊汙漬，是前幾天獻祭一百頭山羊留下的。此外，還有堆石頭上疊了滿滿的樹枝，那是男孩長到要穿褲子的年紀時，舉行儀式的地方——儀式上，每個男孩都會朝石頭堆丟上一根樹枝。

我再看了木雕像一眼，腦海閃過魯德亞德·吉卜林的《要做國王的人》（*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故事裡，兩個不光彩的前士兵決定要當異教國王。「他們稱那裡叫喀菲爾斯坦，」其中一人對另一人說，「我認為是在阿富汗的最右上角，離白沙瓦（Peshawar）不超過五百公里。他們崇拜三十二個異教偶像，我們會是第三十三個。」根據故事中的說法，

喀菲爾認識共濟會符號，其原因在於這符號是由他們作古的祖先亞歷山大大帝傳下來的，而這也使兩人詭計得逞好一段時間才被喀菲爾揭穿——一個被殺，另一個則發瘋了。這些木造人像令我想起吉卜林的故事，以及小說寫成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對喀菲爾斯坦的狂熱。

* * *

正是那份狂熱的殘餘驅使我往山谷更北邊走，再更靠近努里斯坦的邊界一些。瓦濟爾告訴我，在卡拉什村子和阿富汗邊界之間，有個

努里斯坦人的村莊。他們不是卡拉什部落的後代，而是羅伯遜認識的砍族後裔；拉曼汗入侵期間，他們的祖先靠著逃到邊界的另一邊，躲在蘭布爾，躲過了被強迫改宗的命運。不過他們最終還是改宗伊斯蘭，因為他們發現，在努里斯坦的近親們都變成穆斯林後，維繫不潔的規定簡直強人所難。他們在紹姆貝格的時代被稱為紅喀菲爾（Red Kafirs），而卡拉什人把各種傷害都歸咎於他們。我問瓦濟爾是否能帶我去他們的村子。他說，他認識他們，可以介紹我給他們認識。於是我們從撒基閣繼續向北走，溜過危險的結冰木頭，再次渡河，往上爬直到重返主要路徑。有些卡拉什夏季小屋就在此處山徑上方的坡地。丘謨思過後，夏季小屋是女人的禁地。有個小男孩從其中一間小屋下山，手裡牽著一隻山羊，小心翼翼地在陡坡上的雪堆上走著。我們在他安抵小徑時鼓掌叫好，他害羞地牽著山羊朝村子的方向跑走。我們繼續前進，然後我和瓦濟爾談起宗教。

瓦濟爾是皈依伊斯蘭的卡拉什人，代表他能就族人在試圖留下所剩無幾的成員時面臨的挑戰，提供一些洞見。瓦濟爾告訴我，他在中學的班級裡是唯一的卡拉什男孩。「老師問班上有沒有卡拉什學生時，我舉起手，」他告訴我，「我是唯一的卡拉什人。經常被取笑。」當同學們提出關於他信仰的問題，他無法回答。他告訴我：

「如果我問卡拉什族人：『我們為什麼做這件事？』或『我們為什麼要遵循那個傳統？』他們只會說：『我們的祖父母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不知道那樣做的含義。」他是個熱愛思考的男孩，無法回答其他男孩和老師拿來挑戰他的任何問題一事，使他最終同意成為穆斯林——成為穆斯林，只需要背誦一個句子（「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而且一旦成了穆斯林就不能反悔了。如果

瓦濟爾皈依後放棄當穆斯林，他會使他的族群陷入危險。雖然背棄伊斯蘭在巴基斯坦嚴格來說並不犯法，二〇一〇年一份民調訪問到的巴基斯坦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六認為棄教應該被處以死刑。即使是有人要脫離伊斯蘭的謠言，都足以引發群眾暴動。

因為這樣的經驗，許多卡拉什家庭於是乾脆不送孩子去上學。不過，卡拉什人的希臘支持者在三個谷地都蓋了小學，然後在邦伯雷蓋了既收卡拉什人也收穆斯林的一所中學。在這些學校裡，至少有部分老師是卡拉什人，而且女孩可以穿傳統服飾上學。族人也開始發揚自己的文化傳統：在比里爾的潔思塔罕，我看到一群卡拉什男人扛著一台巨大的老式錄影機，其他人則是拿手機拍下人們跳舞的影片。邦伯雷的一間博物館的團隊開始編纂族群的口述遺產。也許因為對自己的身分重燃驕傲，（瓦濟爾告訴我）受教育的卡拉什人不再改宗伊斯蘭。然而，不變的是，鮮少卡拉什人為自己的信仰雄辯滔滔；這點和多數穆斯林社會相反，穆斯林社會裡通常都至少有一位熱愛公開發言的倡議者。羅伯遜碰巧遭遇了和瓦濟爾類似的問題：「如果困惑的外人要求說明儀式與用途，」他寫道，「答覆幾乎總不外乎是……那是我們的習俗。」

還有其他歷史因素導致卡拉什人改宗——這些因素再三出現在宗教史上。就像其他喀菲爾部落，卡拉什人有叫做「擺拉斯」

（bairas）的奴隸，他們被卡拉什人拿來買賣，而且不能和地位較高的卡拉什人結婚。可想而知，這些不幸的奴隸是最早皈依伊斯蘭的人，紹姆貝格在一九三〇年代（距離喀菲爾斯坦被迫改宗才不過四十年）訪問蘭布爾時也曾記載道。紹姆貝格發現，擺拉斯改宗前後的墳墓有很大差異（他把擺拉斯改宗前的墳墓比喻成一堆打包用的紙

箱），顯示他們在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大幅成長。（同樣地，巴基斯坦近三百萬的基督徒中，有些在過去是種姓制度底層的印度教徒。在伊朗，祆教的祭司階層似乎也是緊抓其信仰最久的一群人。）

改宗也能為家庭省錢。每逢節慶，卡拉什人家必須拿三到四隻山羊出來獻祭。喪禮可能貴到拖垮家中經濟：喪禮持續三天，可能要犧牲超過八十隻山羊和四頭牛。信仰伊斯蘭所需的個人開銷則少多了。卡拉什女人的服裝是改宗者再也不用考慮支出的另一筆錢，因為穆斯林女人通常穿便宜且簡單的布料。此外，改宗還能開啟許多新的機會，尤其是對女人而言。瓦濟爾告訴我，近年來皈依伊斯蘭的人主要都是女性。這消息出乎我意料，畢竟成為穆斯林代表她們得放棄自由。但我聽說有些女人愛上了從契特拉來訪的官員或警察，而嫁給這些男人意味著她們能過上更舒適的生活。

對照之下，改宗對瓦濟爾沒有帶來太大幫助。事實上，改宗讓他的生活變得非常棘手，因為他是村裡唯一的穆斯林，討老婆困難重重。我心想，他是否對當初的選擇感到後悔。他近乎傷感地談論卡拉什人的美德。他說，卡拉什人彼此互信。人們可以不用看管山羊，因為沒人會偷。卡拉什人以最嚴苛的處罰懲治偷竊：將罪犯逐出卡拉什社會。婚前性行為不受處罰。女人若想離開丈夫改嫁他人，丈夫沒有權利阻止（不過他有權要求拿回當初聘金的兩倍賠償）。伊斯蘭女性比較難主動離婚。「而且當我拜訪卡拉什人的家，」瓦濟爾補充道，「我能和他們全家一起坐在同一間房裡。可是當我拜訪穆斯林友人，我卻得坐在別的房間裡。」因為規矩嚴格的伊斯蘭家庭認為，唯有親近的男性親戚才能看到家裡的女人。

羅伯遜在一八九〇年代就感受到喀菲爾普遍的輕鬆態度，而且對他所謂的喀菲爾的「殷勤」感到震驚。他發現，他們通常把通姦看作一種歡鬧的事。當男人和已婚女人被捉姦在床，部落的人會前來觀看並大笑。通姦的男人可笑不出來，因為他得付一大筆罰金給被戴綠帽的先生（女人則什麼懲罰都沒有）。在喀布爾，上流人士及外籍人士流連的沙龍裡擺有木製的努里斯坦椅，椅背上刻有圓形圖案，並有長長的角形裝飾從椅背上突起。在這些椅子的主人當中，只有少數幾位知道圓圈本來代表外陰，而突出的角形裝飾代表曾經行房過的夫婦，因此這些（僅有男人坐在上面過的）椅子象徵生育。卡拉什人的態度比喀菲爾保守——不過，誠如瓦濟爾指出的，前者在某些方面又比穆斯林開明。

瓦濟爾和我沿著山路前往靠近努里斯坦的邊界，途中遇上他的一群穆斯林朋友。「這群人裡面什麼人都有，」瓦濟爾幫我介紹時說道，「這位是契特拉人，這位是和我一樣的卡拉什改宗者，這位是古遮人（Gujar），這位則是努里斯坦人。」他介紹給我的倒數第二個朋友來自一個人們膚色特別深的遊牧族群，最後一人則有褐色頭髮和相當白皙的皮膚。卡拉什改宗者面無表情地背著他綁在肩上的一個大箱子。他要親自送箱子到努里斯坦村的一間店。走著走著，箱子爆開，六袋甜麵包掉了出來。我們每個人撿起一包，幫他一把。我經常幻想造訪努里斯坦人的村子，但從沒料到我會在大雪紛飛時，到靠近阿富汗邊界的荒野給他們送布里歐許麵包作為日常補給。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打高爾夫——或者說是瓦濟爾所稱的「努里斯坦高爾夫」。一群努里斯坦青年站在狹窄谷地上、被卡拉什河（到這裡變得比較像一條小溪）切割而成的溝壑邊緣，以貌似曲棍球棍的長條木頭，揮擊木製圓

球，使其飛越溝壑，然後讓更小的孩子們蹦蹦跳跳地四處撿球。把球打得最遠的人就是贏家。瓦濟爾以前是冠軍選手。

一棟木造建築就代表了村子本身，就像我在比里爾看到的一樣。每戶人家各自有一間房，每間房都被陽台和室外木階梯連結起來。走進室內，我聞到走道有尿騷味。一名老人虛弱地臥床，不停咳嗽。壁爐在房間中央，牆壁邊還有其他床鋪，壁架上展示著亮晃晃的金屬餐具收藏。（羅伯遜曾提到，對喀菲爾人而言，銀器展示是一種地位的象徵。）老人的妻子給我和瓦濟爾泡了茶，她的兩個小男孫則坐在一旁，注視我的一舉一動。他們當中有一個跟我要了我的卡拉什花圈。我把其中一個花圈給了他，但另一個男孩完全不肯放過我，拉扯我僅剩的另一個花圈，希望我讓他得償心願。我要求給外頭一直看著我們的一名小女孩拍張照，但這一問顯然觸怒了祖母：給男孩照相可以，但不可以拍女孩。即便如此，這家人和有些家庭比起來已經不那麼一板一眼了，否則他們不會准許我們進房。這房間顯然同時住著男人和女人，因此有些穆斯林絕不會讓我們進去。正當我起身準備離開，房裡一側的一堆床單動了起來，底下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

喝完茶後，瓦濟爾和我走到樓下，他敲敲另一戶人家的門，想打聲招呼。一提到門外有個外國人，兩個小女孩在門邊短短露臉一秒就跑掉了，怎麼勸都不再出來。然而，村裡的男人很開心能被拍照，為我點出他們獨特的五官和淺色頭髮，然後自豪地指向他們村裡的清真寺——那是除了村屋之外，唯一的獨立建築。

* * *

離開谷地的時候到了。阿慎貝格和我一同搭車前往契特爾，並問我們要不要在卡拉什山谷腳下的一間屋子稍作停留，那個地方的人全是穆斯林（其實就是瓦濟爾的母校所在的同一個城鎮）。他要向住在那裡的一家人致哀，邀請我加入他。我發覺他是卡拉什族人很棒的大使，而且他這麼做有一部分是在淡化自己的卡拉什身分。他的名字可能被當成穆斯林的名字（有個人告訴我，人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給小孩取卡拉什古名了）。他和那家人以穆斯林的方式禱告，伸長他的雙手，象徵性地用手擦臉。以這種方式爭取穆斯林的尊重，未來若有需要時，將非常管用。有些卡拉什人曾在土地糾紛的過程中被挾持為人質，但阿慎和這家人合作，讓他們重獲自由。

卡拉什人需要外交手腕，因為他們很脆弱。一名捍衛卡拉什人的熱血巴基斯坦穆斯林在一九八二年寫了一本書，書裡呈現了卡拉什和穆斯林關係的陰暗面：卡拉什聖地被破壞，卡拉什人被賄賂改宗，「學校老師進行傳教，加上他們持續誹謗卡拉什文化」。作者相信，並且這麼說道，「自以為文化高尚的外人」正破壞古老傳統。他的作品反映巴基斯坦獨立不久後的一九五〇年代，當時許多人硬逼著卡拉什人皈依伊斯蘭。

阿慎貝格和瓦濟爾說，情況在過去幾十年已獲得改善。巴基斯坦警察管制谷地的進出，把一些積極強硬的傳教士阻擋在外。他們說，族人的數量逐漸增加。觀光業在發展上儘管不如以往，但明顯使村莊受益，現在卡拉什村子裡有幾間蓋得講究的新房。即便如此，有位卡拉什人告訴我，穆斯林遊客總是嘮叨不停地問他：「你怎麼還沒改宗？」

我擔心他們未來得面對更糟的事。巴基斯坦是充滿矛盾的國家。她由什葉派穆斯林建國，^[5]但過去二十年來，已有四千名什葉派在那裡遇害。有條瀆神法長期被利用來壓迫國家的弱勢團體。宗教極端分子在靠近契特拉的普什圖地區，建立起許多近乎各自為政的地盤，他們唯一的挑戰來自具爭議的、致命的美軍無人機。巴基斯坦政治人物在必須花錢收買的形形色色艱困選區中，看到一群廉價的選民：原教旨主義者若能影響民眾的教育和道德，他們將無償地給予支持。政治人物只消抵押未來。

然而，在未受原教旨主義者入侵的巴基斯坦，寬容還是隨處可見。長期以來，契特拉在很大程度上因其地形和英國劃下的國界（谷地的一部分被劃在阿富汗境內），而與巴基斯坦其他地區隔絕。很長一段時間，冬季進出的唯一陸路路線，是翻越海拔約三千公尺的洛瓦里山口（Lowari Pass）或穿越阿富汗領土。不過在我訪問時，山口下方有一條隧道正在開挖，一旦完工，將開通連結契特拉和巴基斯坦其餘地區的便捷路線。交通改善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不過也可能帶來其他不那麼受歡迎的改變。「隧道開通後，」巴基斯坦攝影師祖費卡沉重地對我說，「我懷疑卡拉什人還能延續多久。」

[1] （譯注）「大博弈」是英國小說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著名小說《金》（*Kim*）中所使用而流傳開來的名詞，生動地描述了十九世紀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在中亞（主要以阿富汗為中心）的明爭暗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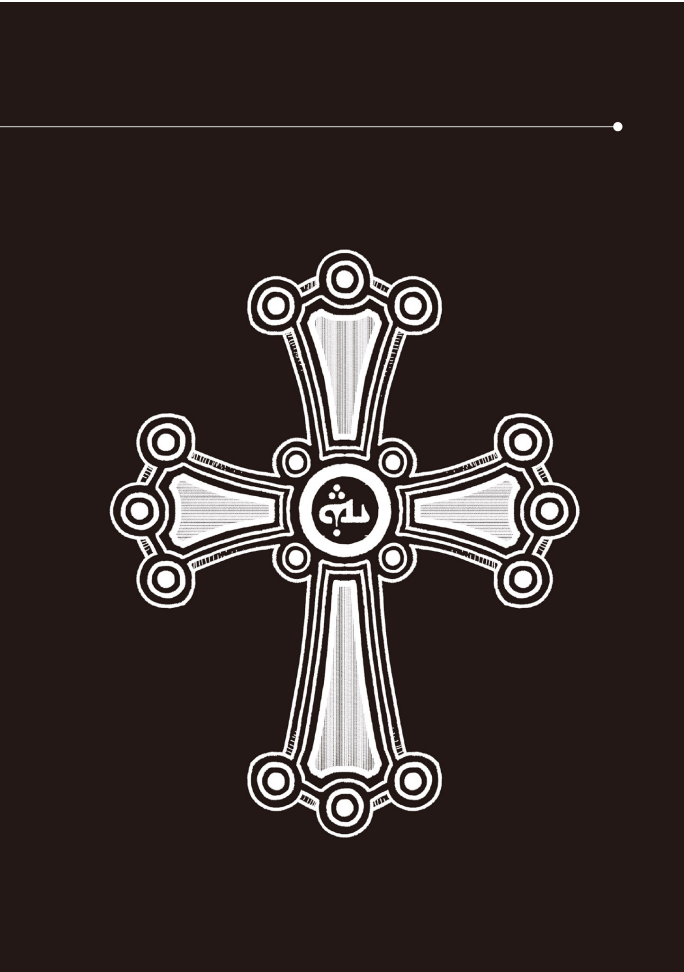
[2] （譯注）契特拉位於今天的巴基斯坦，在一八八五年成為英屬印度的土邦之前，為一個擁有獨立王權統治的地區。

[3] （譯注）雅典那西歐斯·雷洛尼斯是一名來自希臘的志工，曾在二〇〇一年來到巴基斯坦與卡拉什人生活近十年，並為卡拉什人的口語語言創造字母表。二〇〇九年九

月，雷洛尼斯遭塔利班分子綁架至阿富汗長達七個月，到了二〇一〇年四月才獲釋回到希臘。

[4] （譯注）達利語在伊朗被稱為波斯語，在塔吉克則被稱為塔吉克語（Tajik, or Tajiki）。

[5] （譯注）巴基斯坦建國者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出生於什葉派家庭。



後記

在底特律

Detroit

比起在家鄉，人們在這裡更努力地上教堂。教會變得像是個避風港，一個家的回憶……人們來這裡，看到其他人和他們有相似的臉孔，聽到人們用阿拉伯語交談。這不僅僅是宗教的團契，也是族裔和文化的友情。

——沙霍柏神父(Father George Shalhoub)，
密西根州利沃尼亞市正教會神父

我在底特律都會區（住有五十萬名具中東血統的居民）的一間超市裡，聽見穿白罩衣的女子暫停補貨，用我有點熟悉的語言和一名顧客說話。那語言類似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但又不同。我聽不懂那些單字，流動的句子中有很多刺耳的子音。那是阿拉姆語。我在美國郊區商店中播放的音樂和各式果汁的圍繞下，聽見了基督的語言。

阿拉姆語曾是中東地區前伊斯蘭時代的通用語。阿拉姆語的不同方言，全都和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非常類似；阿拉姆語基本上就是它們在語言學上的近親。（舉例來說，「願你平安」在阿拉伯語是salaam aleikum，在希伯來語是shalom aleichem，在伊拉克阿拉姆語則是shlama lokhum。）耶路撒冷的傳統拉比出言詛咒時仍使用阿拉姆語。最著名的一個猶太儀式「神聖祈禱」（Kaddish prayer）有個阿拉姆名字，而不是希伯來名字。（Kaddish是阿拉姆語的「神聖」。）阿拉姆語在中東如今已被阿拉伯語取代，但在伊拉克基督徒生活超過千百年的北部偏僻村莊，阿拉姆語仍被使用。那些村民看二〇〇四年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執導的《受難記：耶穌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時，不用字幕就能理解可能是耶穌時代使用的語言。

這些村民的祖先當初屬於以巴格達為基地的東方教會（Christian Church of the East）。在歐洲幾乎沒人聽過的東方教會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會之一。在中古時期，世界上有百分之十的基督徒效忠東方教會，其宗主教以巴格達為總部，主教和修道院分布的範圍勝過羅馬教廷。東方教會的傳教士在基督後六三五年將基督教帶到中國，此事被記錄在所謂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十三世紀時，東方教

會是唯一擁有具東亞血統宗主教的基督教教會（此人名叫雅巴拉哈〔Yahballaha〕，可能是個蒙古人，曾令人敬佩地從北京跋涉六千四百多公里前來巴格達朝聖）。此外，蒙古和西藏的字母都是以伊拉克基督教傳教士一千多年前傳入的敘利亞文字為基礎。

東方教會在波斯帝國的基督徒間持續茁壯。波斯帝國發現，東方教會和西方基督徒的思想差異，使他們不太會被懷疑是否可能和拜占庭人私下勾結。東方教會的成員有時被稱為聶斯脫里派，取自排斥基督徒在聖週五說「上帝已死」的聶斯脫里（Nestorius）。他想要區隔上帝耶穌和凡人耶穌。東方教會不曾真的採信聶斯脫里的教義，不過確實拒絕使用聖像，而且不那麼重視聖母馬利亞。英國傳教士稱他們為「中東的新教徒」，選擇忽略他們對聖人的非新教崇拜以及苦修主義。

今天，這個教會和其昔日輝煌完全不能比。這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帖木兒。他在一四〇一年劫掠巴格達，並在廢墟間留下九萬亡魂。他對基督徒有很強的敵意，自此之後，東方教會似乎僅在伊拉克北部山區、敘利亞東北部及土耳其南部，苟延殘存地生存了下來。教會成員在一八三〇年代也遭遇類似威脅；當時附近庫德族酋長很可能接獲伊斯坦堡鄂圖曼政府的吩咐，派出民兵團，殺死了兩萬名基督徒男女和孩童。東方教會——有時也稱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在幾百年的時間裡有過幾次分裂。有時分裂是源自教會領導權的糾紛。歷史上，教會領導權通常為父傳子的世襲制，這使得其他潛在繼承人感到不滿。異議團體往往會宣誓效忠羅馬教宗；東儀「迦勒底」教會（Uniate “Chaldean” Church）便是由教宗創立，該教會受羅馬承認，但仍保存其獨特禮儀和習俗。因此，今天世界上既有「亞述」基

督徒，也有「迦勒底」基督徒，以及為數不多來自其他傳統的基督徒。

離開超市後，我前往附近一間教堂——那是一棟組合屋，距離馬路有段距離，四周圍繞著停放在旁的汽車。室外是典型的美國郊區（不像底特律市，這裡完全看不見一絲一毫都市衰敗的痕跡——底特律都會區比市區大得多，也比較繁榮）。不過，一走進室內，彷彿讓人回到伊拉克。捐獻箱上貼著寫有阿拉伯文的貼紙。低沉的男性嗓音，以阿拉姆語念誦、執行迦勒底禮拜；該儀式誕生的年代可上溯至基督後五世紀，是基督教至今仍使用的最古老儀式。「Kaddisha、Kaddisha、Kaddisha。」神父朗誦道，翻譯過來就是，神聖、神聖、神聖。迦勒底食譜書在教堂後方的一間小書店打折出售。天主教風格的祭壇以黃金樹葉和人工水果束作裝飾。這間教堂以門上一張黑白海報上的瑪爾阿戴伊·謝爾（Mar Addai Scher）命名。瑪爾在阿拉姆語中是聖人的意思，而阿戴伊·謝爾則是一九一五年被土耳其士兵處死的迦勒底主教。除了有一百多萬名亞美尼亞人在那可怕的一年死去，成千上萬的迦勒底人和亞述人也遭到殺害，更多人則是逃往伊拉克。在馬爾丁（Mardin，即今天靠近土耳其南部邊界的美麗度假勝地），有很多房子的門上方，刻著已遇害或逃跑的昔日屋主的名字。

二〇〇三年後，換伊拉克的基督徒展開逃亡。這回他們逃到西方世界。截至一九九〇年代，伊拉克還有一百四十萬名基督徒。今天伊拉克國家動盪使調查室礙難行，不過大概僅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還在國內，甚至更少。這波規模龐大的移民潮，不單是因為基督徒在那裡面臨險境，也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有機會打造更好的生活——但誠如

一位伊拉克基督徒告訴我的，或許最關鍵的在於他們覺得自己在伊拉克變成不速之客。

我在巴格達的阿拉伯文老師娜迪雅（Nadia），是以阿拉姆語為母語的基督徒。二〇〇六年的時候，她告訴我，她每一次出門都會感到害怕。她永遠不知道綁票犯會不會把她看作可下手目標，又或者住在對街的那家人，還有那些似乎成天站在窗前觀察熙來攘往的人，會不會是在幫恐怖分子通風報信。（她家的穆斯林鄰居倒是友善又經常給予幫助，她說。）不幸被意圖攻擊其他人的炸彈炸死的風險也總是存在。上教堂變成一件特別危險的事。他告訴我，當她在傍晚回到家，不論是她還是她的父母都沒有心力和對方說上話。他們家吃飯時，所有人都一聲不吭，然後懷著對明日的恐懼就寢。娜迪雅在二〇〇七年離開伊拉克。她的雙親多撐了一年，然後搬到北邊的庫德斯坦。她爸媽不懂庫德語，只能接受較低的薪水和生活水準，不過起碼他們在那裡安全無虞。來到底特律的娜迪雅則過得比較好。她在她的教會裡找到了拉菲（Rafi）。他們在伊拉克度過孩提時代時就認識彼此，不過因為拉菲在戰爭前就移民海外，已經好幾年沒見。在兩人的婚禮上，證婚神父就是曾主持他們在巴格達當地教會的神父。神父也搬到了底特律。這讓人感覺彷彿整個社區被從半個地球之外移植過來。

亞述基督徒的領袖瑪爾丁哈四世（Mar Dinkha IV）宗主教住在芝加哥。底特律都會區的阿拉姆語者比巴格達還多：超過十萬名伊拉克迦勒底人住在底特律市和周邊地區，他們總共建立九間教堂、許多餐廳、一份《迦勒底新聞》報、一個廣播電台、一個年度節慶，以及一間百萬富翁俱樂部（給他們當中最富裕的人，一般而言，也是在此落地生根最久的人）。不幸的是，他們沒把伊拉克美學帶來，遺落了迦

勒底人傳統山村中的美屋和聖祠。二〇一二年，我在伊拉克北部周遊時，每個村子似乎都有一間修道院或聖人墓，或是和族群悠久歷史有某種關係的廢墟城堡。這是移民無法在新國度重建的。在大底特律地區的郊區別墅社區，房屋整齊劃一地連成一排排，彼此幾乎毫無二致。住在這裡的埃及科普特人、伊拉克迦勒底人、黎巴嫩什葉信徒、敘利亞遜尼信徒，完全不讓他們的民族文化踏出家門。

其他中東人都同意，迦勒底人是最保守的移民團體。教會出席率高，而且有兩名新神父剛獲得任命。社區報紙《迦勒底新聞》確實不太看得到叛逆青年蠢動的跡象；我在讀一篇社區文化中心的戲劇表演評論時，本以為會看到一些蛛絲馬跡——劇中主角是個試圖抗拒父母逼婚的男子。也許這齣劇會對族群的價值觀變化，以及開始緊抓世俗主義與現代性做一番前衛的檢視？不，故事有個美好結局。報導指出：主角找到了一個好迦勒底女人，並且抱得美人歸。

戲劇忠於現實人生。根據娜歐蜜·舍弗·雷麗（Naomi Schaefer Riley）在二〇一三年出版的著作表示，整體而言，美國不同宗教之間的通婚率為百分之四十二，而且父母在乎女婿和媳婦人選的政治觀點，勝過他們的信仰認同。但這點在美國的中東社會是不成立的，外婚在他們之中仍然相當罕見。芝加哥的亞述人宣稱，和外人通婚的族人僅有一成。有些家庭會刻意控制小孩的婚姻選擇：我在底特律附近的安娜堡（Ann Arbor）的一場晚餐派對上，遇到一名伊拉克裔的基督徒女子。她告訴我，當初她選擇逃家，是因為在家裡沒有和男人見面的自由。「青少女時期？」我問。「不，我那時二十六歲。」她回答。

儘管迦勒底人和亞述人不自認為阿拉伯人，他們的歷史和中東其他族群密切相關，無論是穆斯林或基督教的族群皆然。大規模離開中東的移民潮始自十九世紀末，背後因素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日漸惡化的貧窮問題及土地短缺，還有鄂圖曼帝國的壓迫與衝突。多數移民者是基督徒，最受歡迎的目的地是拉丁美洲，因為那裡不僅歡迎外來移民，還提供許多經濟機會。於是乎，拉丁美洲吸引了絕大部分的阿拉伯基督徒移民，創造出驚人的數據：譬如，今天阿拉伯裔占了拉丁美洲百分之五的人口；巴勒斯坦基督徒在智利生下的小孩，比在巴勒斯坦還多；中南美洲國家曾出過八位中東裔的總統；世上最有錢的人卡洛斯·斯利姆·赫魯（Carlos Slim Helú，商人）、拉丁美洲著名歌手夏奇拉（Shakira），以及女演員莎瑪·海耶克（Salma Hayek），都有黎巴嫩祖先。二〇〇四年，薩爾瓦多總統選舉由兩位政治人物角逐，一人是激進的左派，另一人是右派——但他們的家人都來自伯利恆附近的同一個小鎮，都是信基督教的巴勒斯坦人。

在美國，密西根州的阿拉伯裔美國人比例是全美最高。迪爾伯恩（Dearborn）有兩成人口是阿拉伯裔，該市的阿拉伯裔美國人博物館介紹了他們的歷史。我來到博物館時，看到有一小群人集結在館外。他們盯著馬路對面的一個人看，那人正站在迪爾伯恩市政廳的台階上。他自製了一個講台，並在黑布上寫著「喀菲爾！異教徒！」。男人站在講台後，設法讓自己的音量壓過支持者和反對者的喧鬧聲。

「停止接受穆斯林移民！」他要求。「別讓穆斯林進到政府高層！」《伊斯蘭屬於惡魔》（*Islam Is of the Devil*）的作者泰瑞·瓊斯牧師（Pastor Terry Jones）正試圖刺激迪爾伯恩的民眾。瓊斯焚燒《古蘭經》的計畫廣受關注，引發阿富汗群起暴動。^[1]

我看到，聽他慷慨激昂演講的阿拉伯人很多都戴著十字架。多數的阿拉伯裔美國人是基督徒，不過受到一波波新的中東移民潮影響，其人口組成正快速改變。鋪藍色馬賽克磚的博物館大廳有個告示牌，上面的說明文字反映了這個變化：它告訴參訪人，這裡是「讓曾祖輩來自敘利亞的第四代阿拉伯裔美國基督徒，以及從伊拉克來的穆斯林新移民，都覺得博物館說出了他們的故事的機構」。直到不久之前，移民美國的阿拉伯人往往孑然一身地來，全靠苦幹實幹和好運氣而有所成就。他們在一八五〇年代多是流動小販，在一九二〇年代是福特汽車廠一天領五美元的粗工，在一九六〇年代則經營小商店。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密西根州迪爾伯恩的汽車工廠於一九二八年落成，吸引了大批中東移民（那時大多是伊拉克和黎巴嫩基督徒），因為工廠讓英語不是太流利的人也有工作機會。他們聚集起來，陸續吸引了更多覺得到所屬文化和社群都已扎根的地方能有更好發展機會的人。根據阿拉伯美國中心（Arab American Institute）的統計，如今，有三百五十萬名美國人的故鄉在阿拉伯世界。博物館講述所有知名的成功故事：像是唐納·沙拉拉（Donna Shalala）等政治人物，金考快印（Kinko's）的保羅·奧法里（Paul Orfalea）等商人，以及紀伯倫等詩人

我在逛博物館商店時遇到了優席夫（Yusif）。他是我朋友介紹認識的，要帶我去看看當地的阿拉伯地標。他出現時頭戴毛線帽、腳踩牛仔靴，身穿有反戰布章的夾克，布章上有「我現在就反對下一場戰爭」的字樣。我們去了一間靴子店，他想買雙新的。他是實實在在的巴勒斯坦人，但也莫名地融入了一個特定的美國分類：叛逆嬉皮。儘管已七十幾歲，每天固定到冰冷湖裡游泳的他，身體比我還硬朗。

那天晚上是迪爾伯恩市阿拉伯裔美國節的開幕夜，我們接下來就要去節慶場地。抵達現場後，一個埃及樂團正火力全開地演奏，封閉路段裡擠滿了人，很多人圍成半圓形，欣賞表演。有一群人在群眾的圍繞下跳起「迭步開舞」（dabkeh）；這個傳統舞蹈要人們手握著手，節奏分明且快速地左右踏步。我惶恐地看著優席夫徑直走向舞蹈區。我缺乏節奏感、平衡感，以及不顧他人眼光的自信，趕緊溜到一旁。兩個年輕人，看起來像是葉門人，接受了優席夫的迭步開舞精進指導。一名戴著頭巾的年長女性，在我們經過時，隨著音樂起舞。

優席夫跳得心滿意足後，提議開車載我在這一區晃晃。他帶我看自己曾擔任祭壇侍者而且差點當上神父的正教會教堂，還有那座福特工廠——他和許許多多的移民一樣，也曾在那裡工作養家。工廠附近有一間他幫忙成立的阿拉伯文化中心。他也帶我看少年犯學校，他最近才卸下那裡的義工身分。他有很多朋友住在學校周圍綠意盎然的鄉間，這些朋友裡面不少人是猶太和平運動人士。

優席夫是以難民身分來到美國，失去了回到祖居地巴勒斯坦的權利。他始終對以色列憤恨不已。不過，一如我見到的好幾名美籍中東人，他在美國的生活似乎和猶太社群緊密相連。抵達美國後，他很快就和一名猶太女人生下了兩個孩子，因為覺得年紀太輕不適合結婚，於是他和小孩的母親決定把他們送人領養：一個送到了猶太慈善機構，一個則送到天主教慈善機構。幾十年後，步入中年的他想要找當初生下的一雙兒女，也成功找到了女兒，得知她接受正統猶太人的教育長大。他還在尋找兒子的下落。

優席夫的感情關係之所以非比尋常，不是因為他的女朋友是猶太人（我在英國和美國遇到的許多移民，儘管來自不同的少數宗教群體，都說他們立刻在美國猶太人身上找到一種親近感），而是因為這些少數族群往往不願與外界往來，而且毫無疑問全都不支持跨宗教的性關係。「我們住在史特林高地（Sterling Heights），」一名迦勒底人對我說，「穆斯林則都住在迪爾伯恩。」特洛伊（Troy）郊區最容易找到埃及科普特人。若要找馬龍派基督徒，我得到的建議是去格羅斯角（Grosse Pointe）。

移民教會既受益於社群認同，又有助於鞏固社群認同。沙霍柏神父（Father Shalhoub）主持位於密西根利沃尼亞市（Livonia）宏偉的正教大教堂，他驕傲地帶我參觀。他的社群（說阿拉伯語、遵循和希臘與俄羅斯正教一樣的傳統與教義的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基督徒）被稱為安條克正教會（Antiochan Orthodox），在全美各地共有五百間教堂。沙霍柏神父的教堂可能是五百間中數一數二漂亮的。「這是從敘利亞運來的大理石。」他邊說邊用手指著美麗的雕像。雕像在敘利亞精心繪製上色後從海外運來美國。此外，整間教堂以安條克附近的高柱修士聖西門教堂（Church of Saint Simeon Stylites）為範本。

和迦勒底人相比，他們這個社群在故鄉不是太虔誠，但這點在他們來美國後就改變了。「比起在家鄉，人們在這裡更努力地上教堂，」他說，「看守正教基督徒的是教會。教會保存他們的文化，維繫他們的阿拉伯認同。每個家庭來美國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聽我的消息——教會變得像是個避風港，一個家的回憶。在家裡（指中東），街坊鄰里保護人們不受外界攻擊，在這裡，教會扮演起街坊鄰里的角

色。人們來這裡，看到其他人和他們有相似的臉孔，聽到人們用阿拉伯語交談。這不僅僅是宗教的團契，也是族裔和文化的友情。」神父的房間擺滿了書、照片，以及來自中東的卡片。「我在這個信封裡放了五美元，」有個孩子在其中一張卡片上寫道，「請把它給需要的人。」他覺得，正教會不會被大幅同化。不同於迦勒底人與馬龍派基督徒，他們不受地方上的天主教區吸引，因為他們和羅馬教會沒有交流。因此，正教會似乎不但能讓人們繼續做基督徒，還能讓他們保存阿拉伯文化。

這個正教社群的一名成員後來也跟我說了類似的話。當她在一九七〇年代從黎巴嫩來到美國，教會是她和故鄉的連結，並幫助她適應美國生活。「那是家庭以外的另一個大家庭。」她說。不過她也告訴我，她的兒子有不同看法；他想先當個阿拉伯人，其次才是個基督徒，因此選擇不上教會。她說，在美國當有信仰之人的好處是信仰不會被政治化：生計不會明顯得仰賴宗教。她對照的是故鄉黎巴嫩的情況；在那裡，正教基督徒鮮少能得到政府公職。不過她真正懷念的是在黎巴嫩時，與其他族群，像是穆斯林和德魯茲派，在往來上相對輕鬆簡單。她認為美國的穆斯林比在黎巴嫩的穆斯林更虔誠；她在迪爾伯恩看到的所有戴希賈布頭巾的女人，都讓她覺得走在她們當中的自己像個外人。「這裡的人因宗教而凝聚，而非國家。人們覺得，倘若他們只找自己人，他們的小孩有一天也會和同信仰的人結婚。」

距離偌大的希臘正教教堂約九十公尺的地方，有一座什葉派的清真寺，規模和前者不相上下。表情嚴肅的接待員緊包著希賈布，迎接我臨時會見伊拉克伊瑪目哈山·卡茲維尼（Hassan al-Qazwini）。他對自家社群在美國的未來非常樂觀。「這是個多元的社會，穆斯林可

以很好地融入。這個社會提供史無前例的自由。我們在這裡，不僅經濟能繁榮，宗教也能蓬勃發展。」為了確保即便無信仰者也願意參與，他比較喜歡稱清真寺為「伊斯蘭社區中心」；這裡既可以舉辦婚禮派對，也能舉辦宗教儀式。不過，來這裡的多數人都是信徒。「第二代與第三代和地域的連結明顯減弱。人們不太熱衷到中東地區觀光。他們比較想在這裡度過夏天。但他們維持飲食的傳統、社交的傳統，而且很多人信仰虔誠。」此外，初來乍到的伊拉克什葉派比較有時間參加宗教儀式活動。「宗教是個磁鐵，它的吸引力道往往比任何隸屬關係更強，甚至超過種族。」

* * *

喬治·庫利（George Khoury）不像底特律的中東人一樣常聚在宗教場所附近。他是信基督教的巴勒斯坦人，住在以猶太居民為主的社區裡。他娶了一名非阿拉伯裔的太太。我剛抵達他家門外，就知道前述一切不意味著他已改變了身分認同。車牌正是線索：pal 4 evr（永遠的巴勒斯坦人）。模糊空間留得很巧妙。車牌上的文字也可能意味著他是某人的好朋友（譯按：pal在英文裡是好友的意思）。但我知道這裡的pal代表巴勒斯坦，他們家在一九四八年以難民身分離開了家鄉。喬治說他選擇住在猶太社區，一部分是想挑戰多數移民主動創造的種族隔離。他同時也是為了孩子著想。「這裡的犯罪率趨近於零。」他邊說，我邊喝著他在家煮的土耳其式咖啡，裡頭的豆蔻香氣，令我想起在耶路撒冷、伯利恆和雅法喝下的無數杯咖啡。「小孩高中畢業的比例百分百，繼續念大學的超過九成，我希望我孩子將來

也能這樣。同儕壓力控制著小孩。他們結交了猶太朋友，這讓我很開心——很開心我們可以和平共處。」學校裡的高年級生有找過他們麻煩。還有一次，老師對全班同學說：「巴勒斯坦這東西不存在。」喬治的小孩困惑地回家，納悶著不知該相信誰。於是他每個星期日自己幫孩子上特別課程，告訴他們巴勒斯坦的歷史。

他從政治觀點看待自己的身分，和迦勒底人很不一樣。他教給小孩的歷史是關於西方不義的歷史。的確，喬治不認為阿拉伯基督教在美國能撐太久。「清真寺之死還很遙遠，」他說，「不過我認為教會之死要開始了。」和美國人的相遇一點幫助都沒有。「當我們阿拉伯基督徒和美國基督徒對話時，他們說，他們是浸信會或一神普救派。而且他們沒有彌撒，沒有聖餐禮，不齋戒。然後阿拉伯人開始納悶，難道只剩下我們還在做這些？」

喬治也有他的哀傷。他跟我說大詩人兼大英雄阿布·齊德（Abu Zayd）的故事時，語塞地嘆了口氣。「我是能理解這些故事的最後一代人了，」他說。這對他影響很大。「這些故事塑造你——它們教你不要只想到自己，而是要更常想想整體，要有寬宏的胸襟。我試著把這精神傳給小孩。但阿布·齊德的武器只是一把劍。美國人有坦克！阿布·齊德在今天根本沒勝算。」他想到的不僅僅是阿布·齊德這號人物，也包含他希望能傳承給孩子的文化。「來這裡是我輩子最糟糕的決定，」他陰鬱地說，「我以為這裡會像一盆沙拉，每樣食材都因其他食材而增添風味。結果這個地方比較像是果汁機——一切都黯然失色。」不過，喬治這一代目前仍堅守他們的認同。「眼前這個時代的阿拉伯基督徒，」喬治說，「他們的生活正瀕臨徹底美國化的邊緣，但他們也忠於自身的阿拉伯主義。」即便如此，他知道其他美國

人永遠無法真正瞭解阿拉伯基督徒。「我被問過好多次，『你什麼時候皈依的？』」我們在這裡的神父也被問一樣的問題。」

* * *

我試著理解為什麼優席夫與喬治和我遇過的其他難民（尤其是伊拉克難民）相比，對美國生活有更多不滿。我的感覺是，問題出在他們的巴勒斯坦身分；他們流亡的經驗，因外人誤以為他們是被迫流亡而變質。而且他們在美國的時間遠比其他難民更久，更融入美國社會，已到了被徹底同化的階段。我心想，難道來西方世界生活，對移民族群來說一定總是一份回溯結算的合約（back-loaded contract）嗎——先拿繁榮的好處，後面再付失去身分認同的代價？抑或是他們有權塑造能受時間考驗的身分認同和社群結構？我和優席夫在一間店裡討論這問題，店主是一位黎巴嫩來的德魯茲移民。「我們正在瓦解，」優席夫同意，引用了巴勒斯坦詩歌裡的一句話：「我們是罪魁禍首。我們沒找到黏合的膠。」

這家店就像有著中東氣味與口味的阿拉丁洞穴：一包包牛至和八角，葡萄葉和橄欖罐頭，以及有著薄薄麵衣的黎巴嫩甜點。德魯茲店主哈凜（Halim）從一堆盒裝的鵝牌（Alwazah）茶包後面走出來，用他溫和的聲音加入對話。「如果不想在這片汪洋中無所適從，你必須牢牢抓住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文化遺產。可是我們德魯茲人沒有教堂、沒有清真寺，也沒有老師。我們獨自實踐我們的信仰。在黎巴嫩，有謝赫把我們團結在一起。在美國則什麼都沒有。也許我們在這裡太物質至上了。好多人欠缺對宇宙意識的信念。」他說。他們的社

區學校教小孩阿拉伯文，不教宗教。而且他們的人數寥寥無幾，下一代很難找到德魯茲先生和太太。

我知道在美國公開的宗教文化中，德魯茲人經常在說明德魯茲派信仰時遇到困難。蜜莉亞（Milia）是一名德魯茲女性，在德州達拉斯長大。她告訴我某次在學校的難堪經驗。那天，她和班上其他同學一站起來，描述他們信仰的宗教：每星期的聖日是哪天？信仰的內容是什麼？有什麼樣的禱告詞？她說：「我是德魯茲派。我們沒有聖日，我不知道我們的信仰內容，而且我從來不用禱告。」老師則回答：「妳在編故事！我要跟妳母親說。」當然啦，如果老師真的這麼做，蜜莉亞的母親就會證實她說的都是事實。「那些服從各種儀式的人，真的很難理解德魯茲派的教義，」以寧靜理性的安娜堡大學城為家的德魯茲學者琳達（Linda）說道，「它跟中國的體系很像——我們有傳統，但沒有規定。」姑且不論這些差異的指標，琳達發現美國德魯茲的年輕世代對宗教認同的興趣漸增。「我女兒現在三十歲，她開始問關於德魯茲文化的問題。她對德魯茲文化比對黎巴嫩文化感興趣。年輕一輩比較認同德魯茲身分，」她說，「他們比較狂熱。」我很難想像一個人如何對沒有規定或儀式的信仰狂熱。不過，顯然美國德魯茲族群越龐大的地方，人們對傳統的熱忱就越大。她說，加州甚至有個德魯茲謝赫。

另一方面，小孩在美國享有的自由，導致教養他們的難度比起倘若還住在德魯茲故土更高。「教養小孩很難，」琳達承認，「我們不能強加自己的道德原則在他們身上。他們十二、三歲時就看到親戚喝酒、嗑藥。他們會問：『我們為什麼不行？』」跨宗教的婚姻是另一個挑戰。美國德魯茲人有定期的社交活動，好讓德魯茲家庭能聚在一

起，而背後鼓勵年輕德魯茲人和彼此結婚的動機亦不難察覺。他們也得對外婚採用比較務實的態度，不再把外婚者徹底放逐於社群之外。一名德魯茲謝赫曾安慰一個因女兒脫離信仰而感到擔憂的僑民母親。「妳的小孩死後，」謝赫說，「她將轉世回到黎巴嫩，再做德魯茲人。」

美國德魯茲族群的緊密程度高得不可思議。他們在同樣的城鎮找工作，好讓至少六到七個德魯茲家庭能住在同個街坊，而不是和彼此分開。不過，一如優席夫與喬治，蜜莉亞一家也和美國猶太人有意料之外的共同點。「不管到哪裡，我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遇到猶太人，和猶太人進一步交流。我們在文化上有相似之處。」她說。很多宗教弱勢的中東移民覺得和猶太人有共通之處——尤其因為猶太人將傳統和習俗保密，維持自我認同，確保族群生生不息，但表面上融入世俗社會。

猶太人和德魯茲派之間還有另一個明顯的相似之處。猶太教不巴望別人改宗。德魯茲甚至拒不接受改宗者。有些美國德魯茲人想要改變這點，也想改變保密的文化，因為那讓他們無法學習自己宗教的內涵，也導致他們無法對他人清楚解釋自己信仰。我在波士頓參加了一場美國德魯茲青年討論其信仰的研討會。他們問在場的長輩，該如何看待認為沒轉世回到黎巴嫩的亡者之靈，將在中國重生的傳統信念？

* * *

不僅德魯茲宗教研討會在波士頓舉辦，我在二〇一〇和二〇一一年住在波士頓的時候，還見證了一場曼達安受洗禮儀式。學者艾德蒙

多·魯皮耶里（Edmondo Lupieri）在他的大作《曼達安人：最後的靈知信徒》（*Mandaeans: The Last Gnostics*）描述儀式如下：「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三日，星期日。一名穿白長袍的男子，長鬍子藏在罩住嘴巴的白圍巾裡，長髮被白頭巾包裹住，他站在河裡，左手握著一根長長的木棍。」那是波士頓的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此外，書中也說到獨木舟客划槳經過儀式現場時，連看都沒多看一眼。威森·布理季（Wisam Breegi）記得經過的獨木舟客。布理季是銀匠，也是曼達安社會運動人士，就是他安排了這場儀式。我們在他位於波士頓市中心附近的銀器店見面時，他對我說，這就是麻州的好處：沒有人在乎發生了什麼事。

儀式應該引人關注才對，因為這可是頭一次在新世界舉行的受洗禮儀式。對參與者而言，它就像第一個感恩節之於清教徒和美洲原住民一樣意義重大。而後曼達安教的「朝聖先輩」（Pilgrim fathers，譯按：作者在此以麻州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早期歐洲定居者比喻來到美國的曼達安人）隨之而來。威森是當時麻州唯一的曼達安人。如今，在短短十二年後，他告訴我麻州已有六百五十名曼達安人。他在店裡開班授課，教授曼達安傳統技藝給菜鳥移民。他試圖在西邊的伍斯特（Worcester），為和他有相同信仰的人成立一間社區中心。他把美國猶太人當作自家同胞的模範。不過，他明確想要仿效的是布魯克林的敘利亞猶太社區；這個社區在一九二〇年代通過了反對通婚的規定，就連皈依猶太教的人也不接受。威森認同這樣的做法：他認為，與外族通婚會沖淡曼達安人的色彩，直到有一天他們變得徹底世俗化，然後社區消失不見。他們絕對不該與外人通婚。

在我們對話之際，想要他幫忙赴美事宜的伊拉克人不斷打電話至威森的手機。他出生在北非，被當曼達安人養大。「可是，」他說，「我從來不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一如很多移民的德魯茲人，宗教的保密規範和流亡生活扞格不入。威森覺得，在無法接觸神廟與祭司的狀況下，要保有信念，實屬不易。但他鍥而不捨，而且努力地把美國的曼達安人聚集起來，鞏固他們的族群認同。政治庇護有其必要，但它是一把雙面刃，拯救了曼達安人不受傷害，卻也加速他們離開伊拉克。「搶救了曼達安人，卻斷送了曼達安教。」他說。

* * *

一個在西方更加不被瞭解、對結婚規定嚴格又複雜，而且教義大致祕而不宣的宗教，又會有怎樣的命運呢？我在本書第二章介紹了米爾薩·依斯邁的生平，他是定居加拿大的雅茲迪人權社運分子。我在二〇一一年寫信給他後，他邀請我在那個夏天一起去位於加拿大邊界對面的紐約州水牛城（Buffalo）。他去那裡見老朋友阿布·什哈波。什哈波和他一起逃離伊拉克，現在住在一個寧靜的郊區。米爾薩敲敲門，什哈波的一個孩子來應門，旋即屈膝親吻米爾薩的手。他們一家從住在伊拉克時就保有這個習慣，因為米爾薩是什哈波「來世的兄弟」。米爾薩說，他比較把自己當作像個基督教人家的教父，給予精神指引，以及解釋一些宗教的教義給他的「另一個家庭」。

我們坐在什哈波家的客廳，而在談話之際，似乎每隔幾分鐘，就會看到他的其他孩子露臉。一個男孩開心地咧齒笑，頭髮染成鮮豔的橘色，脖子上掛著一個精美的十字架（當然只是時尚宣言，而非宣告

信仰），然後進到房間，吵鬧的電玩聲從房裡傳出。一個女孩靜靜進出廚房，卻沒朝客廳看過一眼。後來什哈波年紀較大的兒子法罕出現；他曾被困在伊拉克長達二十一年。什哈波總共有十一個小孩，彷彿有意為世界增產雅茲迪人，彌補在連年戰事中殞落的雅茲迪人。

什哈波的長子西哈卜（Shihab）和他的太太加入我們。西哈卜剛得到每小時九美元的新工作；他因為沒通過英語考試，失去了前一份工作。我覺得西哈卜的英文夠好了，更何況他還會說其他兩種語言（阿拉伯語和庫爾曼吉語），但他因為同義詞而被考倒。他沒有機會到敘利亞上學，因為他住的難民營沒有發放必要的證書給他。總之，他得工作養家，好讓太太不用賺錢——這樣她才能專心念書，考取護理師資格。「然後換我工作，他休息。」她微笑地說道。

什哈波不贊同英美的外交政策。在他眼中，英美的外交政策都沒能解決他國家的問題——特別是他所屬的伊拉克西北部辛賈爾一帶的問題。不過，他特別向我提到，他對於來到美國之後所受的幫助銘感五內。「要不是有美國，我兒子不會活下來。」他說，手指向還是青少年的其中一個兒子，後者則連忙躲起來。這個兒子和什哈波的另一個女兒都有腎臟方面的問題，需要經常注射某種他們家絕對負擔不起的藥物。離開伊拉克後，他最先尋求保護的敘利亞政府不支付這樣的醫療服務。但即便以中東標準來看，什哈波一家也是貧困的；他在辛賈爾替生病孩子取得充分醫療照護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他說，那一帶住了五十萬名居民，但只有一間醫院，而且裡面只有十個床位。什哈波把手放在他染黑了的頭髮上。「記在我的頭上！」他說，意思是他銘記受了美國的恩惠。「我從來沒替美國和任何國家打仗，我們也

不是來自這裡，但我們因為人們的善心關懷得到免費醫療。在伊拉克，我是國民百姓，但我們什麼照顧都沒得到。」

什哈波一家在這個以白領勞工階級為主的郊區，和街坊鄰居似乎關係和睦（我作客時，有位鄰居來訪，還和我解釋，他希望可以幫伊拉克的雅茲迪人做點什麼，因為根據他從什哈波這邊聽聞的故事，雅茲迪人的生活聽起來很糟）。這家人對美國文化唯一的不滿，是美國人呈現他們信仰的方式。什哈波說他聽過一名CNN的記者形容雅茲迪教是「世上最駭人聽聞的宗教」。我很難相信CNN的記者會這樣說話，但他很確定他沒聽錯，然後他說，他希望如果我寫了書，至少之後不會有人再這樣說。確實，我離開時對什哈波一家的熱情、家裡的一塵不染（伊拉克的雅茲迪和曼達安人家都是以此著稱），還有世代之間的緊密關係，印象深刻。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到雅茲迪人的家作客，我也對他們家幾乎沒有顯露其信仰的蛛絲馬跡感到訝異。我只看到兩個線索：一張拉利什的畫（是藝術家印象中的拉利什，不是拉利什的照片）立在餐具櫃上，其次當然就是必放的孔雀畫像。

客廳裡的其他照片都是他們家人的照片——西哈卜年僅三歲的么女娜林（Naalin）的照片最多。當我們談論比較令人沮喪的話題時，娜林經常在沙發上呈四腳朝天姿勢，或是把手弄得像望遠鏡一樣偷看我們，替眾人減輕了那份沉重。米爾薩解釋說，她特別喜歡她的祖父母，他們也給她莫大的疼愛。我思忖她長大後會過怎樣的生活——特別是當她到達適婚年齡後。雅茲迪的婚姻規定複雜且一絲不苟。雅茲迪女人不僅得嫁給雅茲迪男人，而且這個男人務必得來自特定的階層與氏族。有些隸屬人數最少階層（位於中間的皮爾階層）的伊拉克家庭，必須找其他國家的先生或太太。譬如，一名伊拉克男子可能在俄

羅斯的雅茲迪族群找到太太。為了確保下一代的婚姻遵循這些規則，有些家庭強迫孩子在年僅十五、六歲的時候就結婚。什哈波一家屬於最低階層目里得（murids）。美國可能有幾個適合娜林的男人。在一個對信徒沒有太多要求的宗教中，與自己人通婚是他們唯一不能違背的規定。

什哈波一家想帶我看看當地景點，於是我們造訪尼加拉瀑布。他們把一張雅茲迪音樂的光碟放到汽車音響裡。什哈波告訴我，這位歌手叫做希德爾·法基爾（Khidr Faqir）。有一天，他突然地獲得了音樂的天賦。當他還是在辛賈爾田裡工作的年輕人時，有天夢到雅茲迪聖人希德爾·埃里亞斯（Khidr Elias）。夢醒後，他比任何活著的雅茲迪人更會唱歌，更會彈魯特琴（lute，長得像吉他的巴拉瑪琴〔baghlama〕）。什哈波拒絕穿庫德族服裝表演時，想到的就是希德爾·埃里亞斯。「他只穿雅茲迪服裝。」什哈波說。他和米爾薩都大力強調，雅茲迪認同和庫德族認同是兩個獨立的身分，而且兩人都挖苦我在伊拉克與親庫德族的雅茲迪人打交道。

這個雅茲迪家庭在水牛城頗為孤單，最近的教友住在一千六百多公里外的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Lincoln）。不過，他們做自己、堅持自己傳統的渴望似乎依然強烈。什哈波告訴我，他們家最早來到美國時，曾經上基督教教堂。教會的人在他們人生地不熟時給予幫助，而他們至今仍維持和這些基督教徒之間的友誼。「可是我們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他語氣加重地補充道。類似Skype等網路通訊服務使分散各地的雅茲迪人能和彼此保持聯繫。世界各地冒出許多線上社團，為雅茲迪人的小孩們開通了找結婚對象的康莊大道。但雅茲迪人在美國最大的挑戰始終是：他們和德魯茲派一樣，很少人知道自家信仰的神

學內涵。西哈卜說，曾經有人計劃在內布拉斯加州成立一間社區中心，讓族人能一起打牌，並且學習雅茲迪教的基本知識。「問題是老一輩的人，像是我爸，思想封閉。他知道關於雅茲迪教的一些東西，但他不願意告訴我們。只有謝赫米爾薩會告訴我們宗教的東西。」他太太加入談話，「你對雅茲迪教的認識可能都比我們還多。」雅茲迪人遇到必須向別人說明信仰時，或是在參與神學辯論的場合上，總是茫然不知所措。

美國社會中也沒有和他們一樣的對應族群。相較之下，中東基督徒立刻就與美國基督徒建立起感情。穆斯林移民如今也能輕鬆地找到願意提供實際協助的美國穆斯林族群，以及敬神的宗教場所。雅茲迪人則形單影隻——除了國際靈知派聖殿騎士團（International Order of Gnostic Templars）團長阿瑪魯·馬克·平罕（Amaru Mark Pinkham）。平罕團長告訴我，他長期在南美洲禪修，實驗感受現實世界的新方法，有天卻突然被一群孔雀包圍。對眼前景象感到困惑的平罕，請教朋友們對此事的看法，其中一人指引他認識了雅茲迪教。他在他的《聖殿騎士團祕辛》（*Secrets of the Knights Templar*，書籍兼線上影片）系列裡，增加了最新的、也是最後的一集：〈孔雀天使之謎〉（*Mysteries of the Peacock Angel*）。在網路上，他領導的團體自稱「致力於復興靈知智慧和聖殿守護者始祖的女神傳統」。平罕團長（在網站照片中，他和他的太太都戴著高高的紅白主教冠）透過抹大拉的馬利亞和聖殿騎士，追溯組織的歷史到施洗者約翰。我在二〇一三年和他聯繫時，該組織有三十到四十位成員，但他希望二〇一四年起開辦的「絕地聖殿守護者」訓練計畫，能為組織招來更多成員。

我對他將組織的歷史上溯至施洗者約翰的真實度存疑，不過雅茲迪人很歡迎他的幫助——儘管他們不能讓平罕入教。總之，這是我二〇一三年拜訪時，林肯市的雅茲迪人告訴我的。什哈波和謝赫米爾薩告訴我內布拉斯加州有更大的雅茲迪社群後，我很想知道這個來自伊拉克的密傳信仰如何在美國中部生存下來。當我降落林肯市的小機場，二十位雅茲迪人在那裡等著接待我——他們在剝玉米殼人之州（Cornhusker State，譯按：內布拉斯加州的別稱）像我展現伊拉克式的盛情款待。在這些人當中，有很多是最近才來到美國的雅茲迪人，他們透過聯邦難民重新安置計畫的幫助來到林肯市。

在林肯市住了好幾年的巴斯姆（Basim）是我此行的主人，他算是雅茲迪社區的幹事。他安排六名雅茲迪人和我在林肯市區的咖啡館會面。他們當中有一人屬於皮爾階層，另一人於是以這人為例，解釋為什麼他們必須改變過去的習俗。「他是個皮爾，在故鄉，我們見面時，通常會親吻他的手。但在這裡我們不那麼做。」他看看咖啡館的樸素木地板，和時髦簡約的室內空間，其他顧客全都戴著耳機，盯著眼前的iPad。「人們會覺得那很奇怪。」這些人大多在過去三年之間來到林肯。有一人到美國的時間已有三年以上，而且在林肯市念了高中，很早就經歷文化震撼。「看男孩和女孩在置物櫃旁親吻，」他說，「對我來說很難適應。而且我在那之前從沒看過大城市。」另一個新來的雅茲迪人則被不一樣的事情嚇到。「這裡的商店公開販售突擊步槍，」他驚呼道，「在巴格達，你絕不可能看到有人在賣那樣的槍！」

他們擔心自己的社區沒辦法長久維持雅茲迪信仰。「我們沒有錢舉辦自己的節慶，」巴斯姆說，「美國國慶一定會變得比雅茲迪新年

更重要，因為所有人都會慶祝美國國慶。雅茲迪人過起聖誕節，卻沒過紅色星期三。」他補充說，有位謝赫依然在家裡為宗教節日點三百六十六根蠟燭，而他自己則是偶爾會舉辦關於雅茲迪教的小測驗活動，考考雅茲迪人對雅茲迪傳說的知識。但他們全都有所知不足的障礙。「如果孩子問我雅茲迪人是怎樣的民族，」他們其中一人哀嘆道，「我沒辦法跟他們解釋。」那位皮爾告訴我，他面臨一個相當艱困的挑戰；儘管他理當和所屬階層的對象結婚，但皮爾如今幾乎不存在了。「我的家鄉有一萬五千名雅茲迪人，」他說，「但我一個也不能娶。」

我問他們是不是不知道怎麼跟美國人說明自己的宗教？他們的回應是，問題在於感興趣的人不多。「人們不想問開放式的問題。他們只是問：『你是穆斯林嗎？』九一一事件後有些麻煩，因為別人以為我們是穆斯林。」就和什哈波一樣，他們對美國心懷感激，而他們的抱怨多數是針對在中東的自家政府。他們談到有一家人試圖帶拉利什聖土上飛機，結果被一名約旦海關嘲笑並把聖土丟棄。他們談到土耳其；那裡的雅茲迪人（根據他們表示）仍然得自稱穆斯林，而且在那裡也還看得到一九一七年大屠殺期間，拒絕改宗的雅茲迪人被砍頭時所靠著的石頭。他們擔心庫德斯坦傳來的消息，因為幾個月前，有間雅茲迪人開的酒鋪被暴動者放火燒掉（他們播影片給我）。他們對中東沒有任何懷念。「這裡的囚犯的人權都好過那裡的自由人，」曾在美國念高中的那位年輕人說道，「我不認為有任何國家對待移民比美國更好。我只是得對新移民說明，在這裡，人們不和你打招呼是正常的。」美國小鎮的居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通常被認為特別友善，不過對這些雅茲迪村民來說，他們仍顯得冷漠且有距離感。

這些移民逃離了族群在故土的衰弱和消亡。他們到了美國後，基本上都不斷茁壯，建立新的宗教場所，也變得越來越有自信。敘利亞的基督徒看著同信仰之人在伊拉克的下場，恐懼地活在陰影裡，但在底特律，沙霍柏神父正在為新的一套雕像做最後裝飾。巴格達的教堂如今空空如也，但在波士頓，擔任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牧師的伊拉克修女，如今為住在這座美國城市的女人成立了一個新的修道會。在倫敦，嫁給英國人的納迪雅·嘉坦正把伊拉克的文化遺產教給她的孩子，而莎殷正幫祆教孩童準備噴灑彼此以慶祝夏至的水，就像他們的波斯先人在每年雨水節都會這麼做。

* * *

在本書的開頭，我對少數族群為何紛紛離開中東提出了一些看法。經過四年訪問，以及從書本認識他們的歷史後，我對他們的關心更勝以往。我們能做些什麼？中東人本身的當務之急是把支離破碎的族群縫合起來。更瞭解歷史，也許能賦予他們一個讓所有人感到同樣驕傲的寄託，無論他們的信仰為何。我的一位伊拉克穆斯林朋友在參觀大英博物館後所說的話，給了我很大的衝擊：「發現巴比倫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擁有比埃及更了不起的歷史，實在太棒了。我過去從來不瞭解那背後的意義。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故事，發現大英博物館收藏了很多我的文化，讓我能去認識海珊以外的事物。」最棒的是，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歷史知識能幫助所有人看清所有文明的黃金時代，都是對外人與外來觀念抱持最開放的態度的時候，無論是羅馬文明、阿拉伯文明或美國文明，皆是如此。

中東以外的人能怎麼幫忙？外人對少數族群的任何幫助，務必以對其所有族人的善意為出發點。譬如，基督教學校對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基督徒帶來更多幫助，因為它們也歡迎穆斯林孩童，因此實現了幫助基督徒自力更生，贏得穆斯林的好感，以及提供人道教育給每個人的三重目的。（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並不試圖要穆斯林學生改宗。）對照之下，西方軍事干預通常阻礙了少數族群的理想，而不是為他們帶來進展。少數族群的成員需要的保護應該來自國人同胞，而不是僅短暫停留就要離開的外國人。政治動盪經常使少數族群感到不安，他們（也確實）感到特別脆弱。美軍入侵伊拉克引發大批基督徒和曼達安人出走，離開逐步陷入內戰的祖國，就是最近期的例子。

同時，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以各種方式涉入中東；他們投資開發、提供軍事協助，也透過與人和組織的合作，默默地給了那些人和組織支持及認可。因此，無論他們自己的宗教選擇為何，他們可以、也應當堅決地站在反對煽動宗教仇恨的立場（記得在第六章，我曾提到有一名科普特神父，批評同儕從賽普勒斯發出反穆斯林的政治宣傳）。若人們只在極端主義走向暴力的時候才關注它，就忽略了暴力是從漫長的激進化過程所產生，而激進化的起點就是對憤怒與仇恨的鼓勵。西方政府應該嚴肅看待宗教信仰，善加理解，以利辨別虔誠信徒和仇恨散播者。

最後，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國家提供宗教弱勢政治庇護，此舉本身誘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原生國。政治庇護拯救了伊拉克基督徒、雅茲迪人和曼達安人免於陷入立即的危險。我看到他們由衷地感激新家園，而且產生很強的忠誠感——但這也讓他們在故鄉的族人欲振乏

力。幫助這些團體在新家園守護族群的傳統及壯大群體，能局部解決這個問題。透過讚揚他們的傳統與歷史，我希望本書能鼓勵他們堅持不懈。

[1] （譯注）瓊斯曾在二〇一〇年揚言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九週年時焚燒古蘭經，後來計畫取消，但二〇一三年時，瓊斯開車載運近三千本古蘭經前往公園焚燒時，遭警察逮捕。

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

首先，我想感謝身為本書研究對象的所有人。若不是納迪雅·嘉坦（Nadia Gattan）、米爾薩·依斯邁（Mirza Ismail）、阿布·什哈波（Abu Shihab）、莎殷·博赫雷蒂尼亞（Shahin Bekhradnia）、薩米·馬喀蘭（Sami Makarem）、班尼·澤達卡（Benny Tsedaka）、約尼斯神父（Fr. Yoannis）與我在聖德蘭的友人們、阿慎貝格（Azem Bek）、瓦濟爾·阿里（Wazir Ali）、我在內布拉斯加州的雅茲迪朋友們，以及在底特律接待我的人，像是喬治和優席夫，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

也感謝好心為本書寫序的羅瑞·史都華（Rory Stewart）。我在哈佛甘迺迪學院的卡爾人權政策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的一年半期間，史都華有一段時間是該研究中心的主任。該研究中心給我機會（其他東西就先不提了）為寫作此書做研究。我也想謝謝捷伍德基金

（Jerwood Fund）在二〇一一年頒給我一筆獎金，補貼因寫作本書所需的一些旅行花費：我在二〇一〇到二〇一三年之間，造訪埃及和黎巴嫩各兩次，還去了伊拉克庫德斯坦自治區、巴基斯坦、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地區。

基本圖書出版社（Basic Books）的拉拉·海莫特（Lara Heimert）和丹·葛斯托（Dan Gerstle），賽門舒斯特出版公司

（Simon & Schuster）的麥克·瓊斯（Mike Jones）以及墨好經紀代理公司（Inkwell Productions）的喬治·路卡斯（George Lucas），

引領我走過本書的編輯過程，不僅充滿耐心，而且不吝指教。傑克·費衛德（Jack Fairweather）、拉納·阿斯福博士（Dr. Lana Asfour）、約翰·詹金斯爵士（Sir John Jenkins）、布理季·羅素博士（Dr. Brigid Russell）、菲力普·奎岩布羅伊克教授（Philip Kreyenbroek）、喬倫·巴克利博士（Dr. Jorunn Buckley）、韋恩·馬吉（Wynne Maggi）、費莉絲蒂·戴馮夏爾（Felicity Devonshire）、納迪姆·沙哈蒂博士（Dr. Nadim Shehadi）、愛麗絲·布雷格（Alice Bragg）、芭芭拉·傑佛里斯博士（Dr. Barbara Jefferis）、葛爾·希爾舒堡（Gur Hirshberg）、康尼利士·赫斯曼博士（Dr. Cornelis Hulsman）和阿敏·馬克蘭·埃貝德醫生分別幫我看過初稿，或個別章節；書中表達的所有看法都是我的看法，任何錯誤也由我全權負責。我也受惠於哈佛大學的阿里·阿薩尼（Ali Asani）教授、奧克托·思嘉佛（Oktor Skjaervo）教授和查爾斯·斯湯博士（Dr. Charles Stang）。

在聖典之外，挑選任何認識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入門書單，都是個會得罪人的工作。Hans Kung的宗教系列研究，包括 *Christianity* (Continuum, 1996)、*Judaism* (Bloomsbury, 1995) 和 *Islam*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8)，讓我學到很多過去不知道的知識。Albert Hourani的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Faber & Faber, 1991) 和 Eugene Rogan 宗教色彩比較淡的 *The Arabs: A History* (Basic Books, 2011) 亦然。John L. Esposito 主編的 *The Encyclopaedia Iranica* 和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及 H. A. R. Gibb 與 J. H. Kramers 主編

的*The Shorter Encyclopaedia of Islam* (Brill, 1953)，全都是有用的參考資料。

關於皈依伊斯蘭的議題，我讀Richard Bulliet的*Conversion to Isl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Richard Eaton的*Rise of Islam on the Bengal Fronti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Jonathan Berkey的*The Formation of Isl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以及Michael Moronyand被收錄在M. Gervers與J. Bikhazi主編的*Conversion and Continuity*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90)的文章“The Age of Conversions: A Reassessment”。

另有三本著作是我在本書數個章節的參考用書，分別是Michael Morony的*Iraq After the Muslim Conque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Patricia Crone的*The Nativist Prophets of Early Islamic Ir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以及Christoph Baumer的*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ssyrian Christianity* (I. B. Tauris, 2006)。

《聖經》引用出自欽定版詹姆士王 (Authorized King James) 的版本，若有例外，下方會特別標注。《古蘭經》引用出自正訓國際 (Saheeh International) 譯本。希羅多德的引用則出自*The Histories*，見Aubrey de Sélincourt的譯本 (Penguin, 1954)。

緒論

On Identity by Amin Maalouf的英譯本請參見Barbara Bray (Harvard Press, 2004)。

嘎札里反對希臘哲學的辯論之作叫做 *Tahafut al-Falasifa*。

日耳曼皇帝的言論出自Kamal Salibi的 *Bhamdoun: Historical Portrait of a Lebanese Mountain Village*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 1997)。

摩根索大使 (Ambassador Morgenthau) 對亞美尼亞人種族屠殺的評估請參見Armenian National Institute網站，
www.armeniangenocide.org/statement_morgenthau.html。

蘇哈·拉珊 (Suha Rassam) 的評論參見其著作 *Christianity in Iraq* (Gracewing, 2010), p. 196。

亞瑟·貝爾福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的備忘錄，可參見Woodward and Butter,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 - 1939* (HMSO, 1952)。

第一章 曼達安教：倖存的巴比倫人

我在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六年間擔任巴格達英國大使館政治部主任時，和曼達安教大祭司見面。後來在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三年於伊拉克北部的艾比爾，接著是美國和英國，陸續見了許多曼達安人。想進一步認識曼達安人，以及本書的書單，我建議讀者上Mandaean Associations Union的網站www.mandaeanunion.org。

幫助我寫作這章的人有納迪雅·嘉坦與她的阿姨、謝赫薩塔和威森·布理季，他們慷慨撥冗受訪，而且對我信任有加。緬因大學

(University of Maine) 的喬倫·巴克利教授，寫了一本博雅的專書叫做 *The Mandeans: Ancient Texts and Modern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耐心地為我解答無數問題。波德利圖書館

的工作人員允許我參閱卓爾藏書 (Drower collection)；同樣地，法國國家圖書館也讓我參閱其敘利亞語和曼達語的手稿與書籍館藏。

對曼達安教的整體介紹，卓爾的作品絕對是最佳選擇，尤其是 *The Mandeans of Iraq and Iran* (Gorgias Press, 2002) ——以下標記為 *MII*——還有 *The Secret Ad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Mandeans: The Last Gnostics*, by Edmondo Lupieri (Eerdmans, 2001) 是書中西方傳教士遭遇曼達安人故事的文獻來源，包括爾撒和葉哈雅的引用，以及在後面章節出現的曼達安魔法藥劑。另一位研究曼達安教的重要學者是 Edwin Yamauchi，他著有 *Gnostic Ethics and Mandaean Origi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伍黎關於大洪水的發言出自 Leonard Woolley 的 *Excavations at Ur* (E. Benn, 1954)。本章的史詩節錄出自 Andrew George 出色的 *The Epic of Gilgamesh: A New Translation* (Penguin, 2003)，內容包括妓女的詛咒。「所以那城名叫巴別……」的引文出自〈創世紀〉11：9節。

關於巴比倫的歷史，我參閱 Samuel Noah Kramer 的 *The Sumeri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以及 Georges Contenau 的 *Everyday Life in Babylon and Assyria* (W. W. Norton, 1966)。Paul Kriwaczek 的 *Babylon: Mesopotamia and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Atlantic, 2012)，描述巴比倫在今日的遺產。我對海珊重建巴比倫的敘述是參考旅人影業 (Journeyman Pictures) 一九九七年九月的紀錄片 *The New Babylon*。

宗主教們書信末尾的簽名「寫於我在伊甸園……」引自Baumer的*Church of the East*。對二〇〇三年後肆虐伊拉克的宗派流血事件的觀察，可參考Fanar Haddad的*Sectarianism in Iraq* (Hurst, 2011)，以及Deborah Amos的*Eclipse of the Sunnis: Power, Exile and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PublicAffairs, 2010)。本章提到的巴格達旅遊書是Karen Dabrowska於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布拉特旅遊指南(The Bradt Travel Guide)。

Jaakko Hameen-Anttila的*The Last Pagans of Iraq* (Brill, 2006)是我談論《納巴泰農業》的參考文獻；它不僅翻譯了《納巴泰農業》，還添加評注（謝謝Philip Wood的指點）。

馬蘇第的部分參閱Tarif Khalidi的*Islamic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ies of Al Masud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5)。

哈里發歐瑪爾因阿拉米人(Arameans)改宗伊斯蘭而哭泣一事，參見Crone, *Nativist Prophets*, p. 10。

比魯尼對曼達安人的評論出自他的作品*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本書是基督後一〇〇〇年他二十七歲時的作品。更多關於比魯尼的資訊，參見*Encyclopaedia Iranica* (e.g., at www.iranicaonline.org)。薩頓的評論可見於他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illiams & Wilkins, 1927)。伊本·古泰巴(Ibn Qutaybah)的徵引出自Dimitri Gutas' s *Greek Thought, Arabic Culture* (Routledge, 1998)。

我使用阿拉伯文版的《大寶藏》，本書現在已有英文譯本。我讀了Wilfrid Thesiger的*The Marsh Arabs* in the Longmans 1964

edition. *The Drasa di Yehia*有部分翻譯可見於G. R. S. Mead的*Gnostic John the Baptizer*, republished by Jürgen Beck (Altenmunster, 2012)。

對羅馬帝國晚期宗教環境的描述，參見Keith Hopkins的*A World Full of Gods: Pagans, Jew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by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9)。伊斯蘭傳來之前的伊拉克猶太人口統計數據出自Morony的*Iraq After the Muslim Conquest*, p. 308；這本書也談論了異教在伊拉克的倖存狀況。我對馬吉安派和類似派別的興趣，當然是源自閱讀Henry Chadwick的*The Early Church* (Penguin, 1993)。

摩尼教的資訊來自Ibn Nadim的*Fihrist*, trans. Bayard Do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Samuel N. C. Lieu的*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以及Peter Brown的論文“Diffusion of Manicheism in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967。對聖奧古斯丁《懺悔錄》(*Confessions*)的引用出自Pine-Coffin的譯本(Penguin, 1961)。曼達安葬禮禱詞請參見<http://gnosis.org/library/tsod.htm>。

蘇美詩歌〈上學日〉(Schooldays)最初於一九四九年由克拉瑪(Kramer)翻譯；我在書中使用的譯本是A. R. George於二〇〇五年出版的版本。「烏曼奴」的禱詞出自Peter Whitfield的*Astrology: A History*, by (British Library, 2001)。亞里斯托克拉提斯的星座圖引用出自Derek and Julia Parker的*A History of Astrology* (London, Deutsch, 1983)。希羅多德對巴比倫人沐浴習慣的評論出自

其*Histories*, I:198。卓爾引用赫爾梅茲談論枚爾奇的内容則出自 page 282 of *MII*。

卓爾講述祭司的憤怒一事，請見p. x of *The Secret Adam*，形容克倫請見p. 270 of *MII*。我對迪那努卡的描述則是出自《大寶藏》的一段譯文，措辭經過修改，參見Eliot Weinberger的*An Elemental Thing* (New Directions, 2007)。卓爾對巴格達毒瘡的解方的討論，請見*By Tigris and Euphrates* (Hurst & Blackett, 1923), p. 228；關於利巴特的咒語，請見*MII*, p. 26；關於巴力和尼布的護身符，請見卓爾的文章“A Mandaean Book of Black Magic,”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5 (October 1943)。關於蠍子護身符和巴比倫絲塔門重建，請參觀柏林的別迦摩博物館（Pergamon Museum）。

曼達安人權團體二〇一一年的報告書請見
www.mandaeanunion.com/images/MAU/MHRG/MHRG_Docs/MHRG%20%20Report%202011.pdf。

第二章 雅茲迪教：孔雀天使的信徒

我在二〇一一年七月訪問拉利什，接著在二〇一二年和雅茲迪人在美國見面，二〇一三年又見了一次。感謝和我交談的每個人，他們的名字都出現在本書裡。但我想要特別感謝米爾薩·依斯邁，他花很多時間陪我。此外還有阿布·什哈波，他的家人在紐約州水牛城對我照顧有加。在內布拉斯加州，巴斯姆（Basim）為我詳細地介紹了他的社區。雅茲迪教的精神議會撥冗接見我，還有凱里·布杉尼（Khairi Buzani）、阿雅德（Ayad）和達克西爾（Dakheel）。菲力普·奎岩布

羅伊克教授好心地糾正了我初稿中的一些錯誤，但他絕對不該為書中還存在的任何錯誤負責。

更多關於雅茲迪教的資訊，有些實用的資料可參考 www.lalish.de。認識雅茲迪教的通論型書籍，我推薦John S. Guest 的 *YYazidis: A Study in Survival*, by (Routledge, 1987)、卓爾的 *Peacock Angel* (John Murray, 1941)，以及菲力普·奎岩布羅伊克的 *YYazidism: Its Background, Observances and Textual Tradition* (Edwin Mullen Press, 1995)。

關於辛賈爾的細節，我要感謝Nelida Fuccaro的1994 Durham University e-thesis, “Aspects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Yazidi Enclave of Jabal Sinjar (Iraq)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1919 – 1932.”。埃德薩和哈蘭的歷史描述大多出自J. B. Segal的 *Edessa: “The Blessed City,”* (Clarendon Press, 1970)。 *Egeria’ s Travels* 有譯本，請查閱John Wilkinson (Aris and Phillips, 1999)。

「上地拯救羅馬人」一說可參考Walter Emil Kaegi的 *Heraclius, Emperor of Byzanti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羅馬人章〉 (Surat al-Rum) 是《古蘭經》的第十三章。那波尼德的銘文，我採用Paul-Alain Beaulieu的翻譯，請見網路www.livius.org。沙利斯坦尼關於拜星教的言論出自他的 *Al-Milal wa al-Nihal*。關於哈蘭人的故事，參見Ibn Nadim in his *Fihrist*, ii:14 – 17。塔比特·伊本·奎拉的引文出自Berkey’ s *Formation of Islam*。

Yaron Friedman的 *The Nusayri-Alawis* (Brill, 2009)，本書徹底研究了中世紀史料中的阿拉維派。山謬·賴德神父的經驗出自他的

著作 *The Asian Mystery Illustrated in the History, Religion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Ansaiireeh or Nusairis of Syria* (Longmans, Green, 1860)。網路上有 *After the Moon* 的出版資料，是貝魯特出版社 Dar al-Shimal 的出版品，但我找不到任何實體書籍。我找到它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由 Nadra al-Yaziji 出版在線上雜誌 *Al-Maaber* 上 (是阿拉伯文雜誌 http://maaber.50megs.com/issue_november03/books4.htm)。關於雅各·維特里阿科的引述，見 Lyde, *Asian Mystery*。

馬可波羅對庫德人的評論出自 Ronald Latham 翻譯的 *The Travels* (Penguin, 1958)。G. P. Badger 的 *Nestorians and Their Rituals* (Joseph Masters, 1852)，描述拜架在伊拉克北部的經驗，包括雅茲迪儀式、桑賈克，以及這一章引用的謝赫阿迪禱詞。Matti Moosa 的 *Extremist Shiites: The Ghulat Sect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是我談論沙巴克人時所用的參考書目。考古學家 A. H. Layard 的 *Nineveh and Its Remains* (John Murray, 1849) 是我引述拉雅德言論的出處。

關於哈拉智生平的深刻剖析，請見 Louis Massignon 的 *The Passion of al-Hallaj*，英譯本見 Herbert Ma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Herbert Mason 也另外寫了一本較精簡版的傳記，*Al Hallaj* (Carson, 1995)。

孟他努的引文取自 Crone, *Nativist Prophets*。優素夫·布斯納雅 (Yusuf Busnaya) 和尼尼微的以撒的引文出自 Christoph Baumer 的 *The Church of the East*, pp. 134-135。我也參考了 Margaret Smith

的*Rabi' a the Mystic and Her Fellow-Saints in Isl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普魯塔克對在洞穴裡使用豪麻 (haoma) 的萃取物進行祭拜儀式的描述，出自他的*Isis and Osiris*, chapter 46。約翰·巴爾·潘卡耶的話引自Berkley的*Formation of Islam*。

第三章 祆教：拜火之人

我在二〇〇六年夏天到訪伊朗。我在二〇〇八年春天看到巴爾赫古城 (Balkh, 譯按：位於今日阿富汗境內，傳說祆教的創立者瑣羅亞斯德死於巴爾赫)。我由衷感激世界祆教組織及其前任主席莎殷，也很感謝歐洲祆教信託基金 (Zoroastrian Trust Funds of Europe) 善心的合作。我好幾次受到位於倫敦雷納斯巷 (Rayners Lane) 的祆教火廟的熱情款待與歡迎。

瑪麗·博以斯被認為是祆教的非祆教徒專家，我甚至看到她的照片被高掛在倫敦火廟裡。尤其是她的*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和*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 (Clarendon Press, 1977)，這兩本書在我寫作這一章時助益良多。另一本更早出版、但也很重要且激盪思緒的祆教研究專書，是R. C. Zaehner的*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1)。Paul Kriwaczek的*In Search of Zarathustra* (Knopf, 2003) 追尋祆教對世界廣泛的影響，直到現代。

不同祆教徒對自家信仰的概念略有不同，因此沒有任何一本專書能夠負起說明的重任。祆教徒對自己信仰的解釋，請見I. J. S.

Taporewala的*The Religion of Zarathushtra* (Sazman-e-Fravahar, 1980), 以及達達拜·瑙羅吉 (Dadabhai Naoroji) 在一八六一年給利物浦文哲學會 (Liverpool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發表的演講*The Parsee Religion*。

若要更進一步認識伊朗，選擇很多。我特別喜歡Roy Mottahedeh的*Mantle of the Proph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Oneworld, 2008), 也很推薦Said Amir Arjomand的*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沙普爾對基督教的批評出自Richard Foltz在*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Palgrave Macmillan, 2010)中的觀點。希羅多德對波斯教育的評論，請見*Histories*, I:136。我的《阿維斯塔》經文節錄，取用翻譯版本，見D. J. Irani at www.zarathushtra.com。〈但以理書〉(12: 2節) 引用自NET Bible, 詳見netbible.com。尼采對道德的評論，出自他作品的導論*Thus Spake Zarathustra*, translated by Thomas Common, released as a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in 2008。艾德華·布朗和在十九世紀晚期伊朗與祆教徒和巴哈伊教的遭遇，請參閱他的*A Year Amongst the Persians*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93); 波斯波利斯的銘文詩也是出自此書。狄奧多羅斯的話出自他的著作譯本*Histories* by Peter Gree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6)。

關於沙王筵席的細節，我參考了一篇Spencer Burke所寫的文章，收錄於*Harvard Advocate*, Winter 2012 issue。我手上由Iraj Peshehkzad所著的*My Uncle Napoleon*, 是藍燈書屋 (Random House)

於二〇〇六年出版的版本。沙王的評論被時任教育部長的馬努切爾·甘吉（Manouchehr Ganji）引用，參見*Defying the Iranian Revolution* (Praeger, 2002)。阿亞圖拉宣稱執政法學家的命令如同真主的命令，是在一九八八年說的，參見Arjomand in *Turban for the Crown*, p. 34。

希羅多德談論波斯人的獻祭*Histories*, p. 96。《列王記》的引文取自Dick Davis' s translation (Viking, 2006)。阿拉伯詩人賈迪的詩句出自Crone, *Nativist Prophets*。「屠殺阿拉伯人——這是波斯人的信仰」出自伍麥亞王朝的總督納斯爾·伊本·薩耶爾（Nasr Ibn as-Sayyar）的一首詩，指追隨阿布穆斯林的伊朗信徒。Boyce的*Zoroastrians*讓我發現了作家那夏齊（Narshakhi）；那夏齊則是我描述阿拉伯征服者在布哈拉行動的參考資料來源。

卡斯拉維的經驗參見Mottahedeh in *Mantle of the Prophet*。何梅尼認為柏拉圖「嚴肅而穩重」的說法，出自他的*Kashf ul Asrar*，他在此書中也形容亞里斯多德是個「了不起的人」；參見www.irdc.ir/en/content/19569/print.aspx。

Browne在*Year Amongst the Persians*描述了他和祆教徒與「巴比」的遭遇。*Divan*裡的哈菲茲詩是翻譯版本，取自Gertrude Bell的譯本(W. Heinemann, 1897)。

哈塔里亞的話引自他一八五四年對「改善波斯祆教徒處境學會」（Society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Zoroastrians of Persia）的報告（請上伊朗研究界〔Circle of Iranian Studies〕的網站[www.cais-soas.com/CAIS/History/Post-Sasanian/zoroastrians after_arab_invasion.htm](http://www.cais-soas.com/CAIS/History/Post-Sasanian/zoroastrians_after_arab_invasion.htm)，達爾由斯·約翰

博士 (Dr. Daryoush Jahanian) 的演講〈阿拉伯入侵後的祆教歷史〉 (The History of Zoroastrians After Arab Invasion) 中可以讀到這份報告)。「祆教徒改宗伊斯蘭的最後集體強迫皈依」這句話、亞茲德祭司人數漸少的統計數據，以及停屍架護送者說的話，全都引述自 Boyce, *Persian Stronghold*。希羅多德描述葬禮習俗請見 *Histories*, p. 99。哈梅內伊對「紅色星期三」的發言，請見 CNN 於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六日的報導，<http://edition.cnn.com/2010/WORLD/meast/03/15/iran.new.year.crackdown>。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www.historyofparliamentonline.org) 幫我釐清了一些達達拜·瑙羅吉的生平細節，一部分拼湊則是我參考報紙和 Sir Rustom Pestonji Masani 的 *Dadabhai Naoroji: The Grand Old Man of India* (Allen & Unwin, 1939)。

一些統計數字，以及祆教板球俱樂部的發言，取自 John Hinnells 的 *The Zoroastrian Diaspora: Religion and Mig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四章 德魯茲派：永生之族

我從二〇〇〇年到現在之間去過黎巴嫩很多次，但本章的多數遭遇發生在二〇一一年一趟為了和德魯茲派見面的行程。若不是英國大使法蘭西斯·蓋伊 (Frances Guy)，以及我們的共同友人拉比葉 (Rabieh Kays)，這趟行程的收穫會遜色許多。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納迪姆·沙

哈蒂糾正我在現代黎巴嫩歷史上的錯誤，並和我一起搜索《登月之後》。

我很感激在黎巴嫩與我會面的人們，尤其是瓦利德·鐘布拉特（Walid Jumblatt）、塔拉勒·阿斯蘭王子（Prince Talal Arslan）、貝魯特美國大學的薩米·馬喀蘭博士，以及謝赫阿里（Sheikh Ali Zeinadin）。已故的阿布·穆哈瑪德·賈瓦德（Abu Muhammed Jawad）聖潔無比，二〇一二年過世時，德魯茲人哀慟不已。埃亞德·阿布·夏克拉（Eyad Abu Shaqra）幫助我認識德魯茲的轉世觀點。阿巴斯·哈拉畢（Abbas al-Halabi）給了我他的書，書目請見下方。利法特·埃德（Rifaat Eid）、巴德爾·萬勞斯（Badr Wannous）和謝赫阿赫麥德·阿席（Sheikh Ahmed al-Assi）在我二〇一二年回到黎巴嫩討論阿拉維派信仰時，對我很照顧。

談論德魯茲派的書籍夠多，能列出書目：Sami Swayd的*The Druz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SES, 1998)、德魯茲信仰總論書籍Robert Brenton Betts的*The Druz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Sami Makarem的*The Druze Faith* (Carnarvon Books, 1974)、Kais Firro的*A History of the Druzes* (Brill, 1992)、Kamal Salibi主編的*The Druze: Realities and Perceptions* (Druz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6)，以及Philip K. Hitti的*Origins of the Druze People and Relig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我見到的德魯茲人對最後一本書有很多批評，因為他們不喜歡書中結論的特定部分。然而，這本書推崇德魯茲之謎是「宗教思想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謎題」。

知祕謝赫給了我一本精簡的德魯茲信仰官方導覽：*The Path to Monotheism*, issued in ah 1431/ad 2010 by the Office of Druze Sheikhdом. 此外，Abbas al-Halabi的*Les Druzes: Vivre avec l' Avenir* (Dar an-Nahar, 2006)，講述德魯茲知識分子質疑如何在全球化世界維繫他們密教信仰的思潮。

馬修·阿諾（Matthew Arnold）的話引用自他的詩作Dover Beach。

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一年之間，蓋洛普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六的黎巴嫩成人不反對不同信仰的人和他們做鄰居——這數字比英國的百分之五十七高，也比以色列的百分之二十三高。

Gibran的*Garden of the Prophet*的英譯本繁多，像是UBS Publishers (1996)，但我為更忠實呈現阿拉伯文，修改了譯文。

「似塘邊蛙」是柏拉圖〈斐多篇〉中蘇格拉底所說的話。關於畢達哥拉斯及其歷史遺產，我推薦Walter Burkert的*Lore and Science in Ancient Pythagore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Leonid Zhmud的*Pythagoras and the Early Pythagore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Daniel Heller-Roazen專注於探討畢達哥拉斯對音樂的興趣的*The Fifth Hammer* (Zone, 2011)，以及Christiane Joost-Gaugier討論中世紀歐洲人（像是基督徒）對畢達哥拉斯的興趣的*Measuring Heave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我在貝魯特讀的阿拉伯文書，是Hubert Husun於一九四七年所寫的*Pythagoras*，並由Shawqi Dawud Tamraz翻成英文。關於畢達哥拉斯的文章出自二〇一三年秋季號的貝魯特雜誌*Al-Duha*。查士丁尼的詔書

引用自John Malalas的*Chronicles*, 18:46,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Jeffreys, Michael Jeffreys, and Roger Scott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6)。「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麼關係？」是基督教辯士特土良(Tertullian)的反問句，參見*De Prescription Hereticorum*, chapter 7。

更多「精誠兄弟社」的詳細內容，請見Godefroid de Callataij的*Ikhwan al-Safa'* (Oneworld, 2005)。 *Epistles of the Brethren of Purity*的完整版由Nader el-Bizri主編，並於二〇〇八年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伊本·泰米葉的教令是泰米葉教令集的第三十五號，由Ibn Qasim and Ibn Muhammad主編(Matabi' al-Riyad, 1961 - 67) ，原文網址為 <http://archive.org/stream/mfsiaitmmfsiaitm/mfsiaitm35#page/n159/mode/2up>。本章提到的納吉拉·阿布·伊宰丁(Najla Abu Izzeddin)的著作是*The Druzes* (Brill, 1984)。

欲認識新柏拉圖主義，最好的觀點可參見Plotinus' s *Enneads*, available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tephen MacKenna (John Dillon, 1991)。檢視早期穆斯林採納與調整新柏拉圖主義方式的書籍，包括*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abic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Ian Richard的*Netton Muslim Neoplatonists*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以及Gutas特別有幫助的*Greek Thought, Arabic Culture*一書。Farhad Daftary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Ismaili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對德魯茲崛起的伊斯瑪儀派脈絡有更詳細說明。Paul E. Walker的*Caliph of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Press, 2010), 是哈基姆·比·阿瑪安拉 (al-Hakim bi Amr Allah) 的傳記。

維基解密發布的美國電報請參見

https://www.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BEIRUT972_a.html。

Earl of Carnarvon的*Recollections of the Druses of the Lebanon* (John Murray, 1860), 有他參觀穆赫塔拉, 以及對德魯茲信仰推測的描述。Haskett Smith的“Druses of Syria and Their Relation to Freemasonry”一文, 可以在一八九一年版的*Ars Quatuor Coronatorum*中讀到。我的共濟會歷史知識參考自John Hamill and R. A. Gilbert主編的*Freemasonry: A Celebration of the Craft* (Angus Books, 1993)。菲力普·希提對共濟會的評論出自他的*Origins of the Druze People*。

二〇一三年七月的攻擊事件, 參見*Daily Star*, July 23, 2013。薩珐·阿拉穆丁 (Safa Alamuddin) 的看法, 請見*Weekly Standard*, May 19, 2014。

以色列沒收德魯茲土地的細節, 來自Mordechai Nisan的“The Druze in Israel: Questions of Identity, Citizenship, and Patriotism,” *Middle East Journal* 64, no. 4 (Autumn 2010)。Chapter 10 of “On Loving God” by St. Bernard of Clairvaux有線上版, 請見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website, www.ccel.org。

第五章 撒馬利亞人：失落的以色列民族

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一年的那三年，我以英國外交官的身分住在耶路撒冷，期間曾兩度訪問撒馬利亞人，但本章介紹的逾越節獻祭發生在二〇一二年。我想要感謝撒馬利亞社群以及班尼·澤達卡的配合與協助，還有他們在倫敦的代表費莉絲蒂·戴馮夏爾。

關於撒馬利亞人的大眾書籍包括Nathan Schur的*History of the Samaritans* (Peter Lang, 1989)，以及Robert T. Anderson與Terry Giles的*The Keepe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Samaritans*, by (Hendrickson, 2002)。Alan David Crown、Reinhard Pummer與Abraham Tal所著的*A Companion to Samaritan Studies* (Mohr Siebeck, 1993)，也是很好的參考作品。

耶穌在雅各伯的井的遭遇，參見〈約翰福音〉(John) 4: 9節。Tudor Parfitt的*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大致說明了關於失落十支派傳奇及其對中古歐洲影響。《聖經》〈列王紀〉的引用出自17: 24節。巴比倫版的《塔木德》的引文出自馬赫龍·M·史密斯教授(Professor Mahlon H. Smith)的翻譯，見<http://virtualreligion.net/iho/samaria.html>。

耶穌時代撒馬利亞人口估計取自Alan David Crown的*The Samaritans* (Mohr, 1989)，其中第二〇一頁有希臘羅馬時代的撒馬利亞人口粗估。耶穌避開撒馬利亞城鎮的指示，出自〈馬太福音〉(Matthew) 10: 5節，他自己第一次造訪出自〈路加福音〉(Luke) 9: 51節；控訴他是撒馬利亞人的內容出自〈約翰福音〉8: 48節；撒馬利亞皈依者出自〈使徒行傳〉(Acts) 8: 14節。

皮亞琴察的聖安東尼的評論出自John Wilkinson的*Jerusalem Pilgrims Before the Crusades* (Aris and Phillips, 2002)。Joel

Kramer的*Maimonides* (Doubleday, 2010)是聖人對伊斯蘭看法的參考文獻。內森·舒爾(Nathan Schur)對阿拉伯征服初步影響的評估,參見其作品*History of the Samaritans*的第九十三頁。

約瑟夫·斯嘉利格的書信出自*An Account of the Samaritans; in a Letter to J... M....., Esq;* (R. Wilkin, ca. 1714)。本章另一段引用也出自此書。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the Rev. Joseph Wolff*一書在二〇一二年由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重新出版。Alvan Bond的*Memoir of the Rev. Pliny Fisk*在一八二八年由Crocker and Brewster出版。John Mills的*Three Months' Residence at Nablus*則是在一八六四年由John Murray出版。

撒馬利亞大祭司對以色列建國的看法,引自一九三〇年代在巴勒斯坦的英國官員Douglas V. Duff; 他同時也是一名多產的作家,曾將他的經驗寫於*Palestine Picture*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6)一書中。H·V·莫頓的評論出自他的著作*In the Steps of the Master* (Rich & Cowan, 1934)。舒爾的「大概是……最小一群人」的言論,出自其著作*History of the Samaritans*的第十一頁。

本章提到的一份二〇一〇年猶太人的基因研究報告,是由Gil Atzmon、Li Hao和其他許多人所完成,並且發表於*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86 (June 11, 2010)。外一份二〇〇四年的基因研究報告則由Peidong Shen、Tal Lavi和其他許多人所完成,並且發表於*Human Mutation* 24 (2004), 可線上閱讀 <http://evolutsioon.ut.ee/publications/Shen2004.pdf>。

宜札克·馬進 (Yitzhak Magen) 的撒馬利亞神廟挖掘計畫，請見 “Israel’ s Other Temple,” *Der Spiegel International*, April 2012。

關於撒馬利亞人的兩部以色列紀錄片為 *New Samaritans* (Journeyman Pictures, 2007) 和 *Lone Samaritan* (Heymann Brothers Films, 2010)。

雅各伯·艾什·薩拉比 (Jacob Esh Shalaby) 的生平，請見 E. T. Rogers 的 *Notices of the Modern Samaritans* (Sampson Low & Son, 1855)。

羅斯柴爾德男爵的特使對撒馬利亞—穆斯林關係的正面評價，引自舒爾的 *History of the Samaritans*, p. 194。

《海之歌》出自〈出埃及記〉 (Exodus) 15: 1 - 18節。

第六章 科普特人：信奉耶穌的古埃及人

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我住在埃及整整一年，此後也為撰寫本章二度回到埃及：一次是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次是二〇一二年五月。在最後一趟旅程期間，我在敏亞待了一個禮拜。

感謝康尼利士·赫斯曼博士和他的「阿拉伯—西方報告」 (Arab-West Report) 的介紹與資訊。這個慈善組織嘗試出版埃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暴力的客觀分析；它的網站是 www.arabwestreport.info。我也很感謝我在本章引述的受訪者：塔力克·阿瓦迪 (Tariq el-Awadi)、喬治·伊沙克 (George Ishak) 和尤瑟夫·希德霍姆 (Youssef Sidhom)。屈法達村的約尼斯神父連續幾天好心地帶我參

觀他的教區。其他人的姓名在文中並未透露，但並非是因為我不感激他們慷慨撥冗並分享看法。

Jill Kamil的*Christianity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Routledge, 2002)，以及Otto Meinardus的*Two Thousand Year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Press, 1999)，都對認識科普特人很有幫助。關於科普特與穆斯林的關係，我參考S. S. Hasan的*Christians Versus Muslims in Modern Egyp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本書作者的身分證明書名所點出的觀點是錯的，因為他是一名埃及穆斯林，對科普特人展現莫大而不盲目的同理心。此外還有一九九六年由Minority Rights International發表、Saad Eddin Ibrahim及其團隊所著的*The Copts of Egypt*；Kyriakos Mikhail的*Copts and Moslems* (Smith, Elder, 1911)；以及Samuel Tadros的*Motherland Lost*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3)。

旅行作家安東尼·薩丁(Anthony Sattin)也在埃及觀察了當地尚存的古老習俗，不過不太著重在科普特人身上，見其著作*In the Pharaoh's Shadow* (Eland, 2012)。Max Rodenbeck的*Cairo: The City Victorious* (Vintage, 2000)描寫自中世紀伊斯蘭建城後的精彩城市史。本章提及的歐西里斯信徒夫婦推薦我看James Breasted的*Dawn of Conscience* (Macmillan, 1976)，書中可看到早期埃及人靈性深厚的證據。此外，不止一個埃及人推薦我讀Winifred Blackman的*Fellahin of Upper Egypt* (Harrap, 1927)，書中提到仍被現代人沿用的古老習俗。

科普特人在埃及的人數頗具爭議。官方埃及人口普查指出，科普特人占一九二三年總人口的百分之八點三四，到一九八六年占百分之五點八七，二〇〇〇年則是百分之五點五。Cornelis Hulsman在 *Mélanges de l' Institut Dominicain d' Etudes Orientales à Caire 29* (2012) 為普查結果護航；許多科普特人對此數據有所懷疑，他們認為自己族群應該占總人口將近兩成。

庫迪的安格斯的禱文 (Litany of Angus the Culdee) 在西元七九九年，提到阿爾斯特迪瑟的埃及人。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請見 Middle East Journal 的編輯在二〇〇九年所發表的一篇網誌文章，<http://mideasti.blogspot.co.uk/2009/03/saint-patricks-day-special-patrick-and.html>。法勒魯姆的德米特里 (Demetrius of Phalerum) 在著作裡提到了七元音唱誦，見 *On Style*, chapter 71。科普特天主教徒的人數來自羅馬天主教單位「天主教近東福利協會」(CNEWA)，二〇一三年二月的估計人數為十六萬二千人。希羅多德對埃及人篤信宗教的評論，出自 *The Histories*，請見 de Sélincourt 譯本的第一百四十三頁。Shibley Telhami 在一篇於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發表於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論文 "Egypt's Identity Crisis"，總結埃及十年的意見調查，指出「埃及人認為自己是世上最虔誠信教的民族」。

吉爾伽美什的引言來自喬治的譯文（參見前述第一章的參考書目）。基督前二十四世紀的銘文請見山謬·墨瑟 (Samuel Mercer) 一九五二年的金字塔文本翻譯。

希臘史家普魯塔克在其著作 *Isis and Osiris* 的第四十三章告訴讀者，在他的時代，埃及人稱春分是「歐西里斯登月」 (translation

by Babbi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6)。阿肯那頓的讚美詩取自Cyril Aldred的*Akhenaten, King of Egypt* (Thames and Hudson, 1991)。阿敏·馬克蘭·埃貝德醫生寫過幾本談埃及宗教和文化的書籍，包括*Egypt at a Crossroads* (El Hadara, 2010)。就是他告訴我曾經有科普特人在他為病人開刀時唱輓歌。

“Prevalence of Female Genital Cutting Among Egyptian girls,” by Tag-Eldin and others, in the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April 2008* (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6/4/07-042093/en) 列出聯合國和其他組織進行的調查，證明在埃及殘割女性生殖器（FGM）相當普及。穆爾干·葛哈利（Murgan al-Gohary）呼籲摧毀人面獅身像和眾多金字塔，請見November 10, 2012, during an interview on Egypt’s Dream TV。

關於埃及前基督教時代宗教的研究，我讀的是Max Frankfurter的*Religion in Roman Egypt*，我從此書得知奧可斯林克斯象形文字的工會哀嘆其職業正在消亡。

約翰·凡斯萊布（Johann Vansleb）的旅程記載，請見他的作品*Nouvelle Relations d’un Voyage Fait en Egypte* (an Elibron Classics facsimile of Estienne Michallet’s 1677 Paris edition)。馬各里齊述說人面獅身像如何失去鼻子的故事，見其著作*Kitab al-Mawa’iz wa-al-I’tibar bi-Dhikr al-Khitat wa-al-Athar*；這也是他對阿布·法納修道院看法的參考文獻。威廉·布朗的部分請見*The Modern Traveller* (Cawthorn, 1800)。

關於埃及熱及其對埃及民族主義的影響，我大量參考Donald Malcolm Reid的*Whose Pharaohs? Archeology, Museums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我對塔哈塔維和伊斯梅爾的引述也出自此書。伊斯梅爾的任命一事，參見Iris Habib al Masri的*Story of the Copts* (Saint Anthony' s Coptic Monastery, 1982)。一九一九年的事件，我參考的是Tadros的*Motherland Lost*。

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伊斯蘭主義政黨的活動，參見S. S. Hasan的*Christians Versus Muslims*一書的第三章，以及Carrie Rosefsky Wickham的*The Muslim Brotherh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 Last Arab (Duckworth, 2005)一書由Sa' id Abu Rish所著。科普特人因納賽爾國有化失去百分之七十五的財產一事，參考Ibrahim等人所編的*The Copts of Egypt. Out of Egypt*, by Andre Aciman (Farrar Strauss Giroux, 1994)；本書生動地講述了養育Aciman這位猶太裔作者的多元埃及社會的消散。

卡梅爾·穆西斯 (Kamal Mougheeth) 對其求學時代的回憶，參見“M Is for Mosque,” by Yasmine Fathi, for Ahram Online, May 4, 2013。馬赫迪·阿克夫 (Mehdi Akef) 說出「管埃及去死」的訪問參見Rose al-Youssef on April 9, 2006 (as reported by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Egypt' s Muslim Brothers,” June 18, 2008)。百分之九十二的數據來自二〇一一年三至四月的蓋洛普民調：www.gallup.com/poll/157046/egypt-tahrir-transition.aspx#1。

敏亞暴動所帶來的傷亡，請見「埃及人權倡議」(Egyptian Initiative for Personal Rights, 我從該單位得到兩名死者的名字)的網站www.eipr.org/en/content/2013/08/25/1796。百分之六十五的暴力事件發生在敏亞一事，參見文章Soliman Shafiq in the February 15, 2014, issue of *Watani*, online at http://wataninet.com/watani_Article_Details.aspx?A=51783。敏亞的貧窮和失業統計數據，可見Al Monitor, “Egypt’s Minya Province Flashpoint for Muslim-Christian Violence,” 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04/egypt-sectarian-violence-minya-province.html#。二〇一一至一二年皮尤民調的數據，來自 “The World’s Muslims: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at www.pewforum.org/2013/04/30/the-worlds-muslims-religion-politics-society-interfaith-relations。

更多埃及課程大綱的內容，包括近年的改革，參見 “New Approaches in the Portrayal of Christianity in Egyptian Textbooks,” by Dr. Wolfram Reiss, Cairo, November 2006.

第七章 卡拉什人：谷地裡的異教徒

我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造訪卡拉什谷地。在那之前，我曾於二〇〇七到二〇〇九年待在阿富汗兩年，而且曾在二〇〇八年去過巴基斯坦的北部一帶。我下榻沙札打·希拉吉·穆克 (Shahzada Siraj ul-Mulk) 在契特拉經營的飯店，飯店名叫「興都庫什高地」

(Hindukush Heights)。我很謝謝他和他的太太佳薩拉，更感謝卡拉什族人，給我這麼溫暖的接待。我要點名感謝阿慎貝格和瓦濟爾。胡

米菈·努雷斯坦尼 (Humira Noorestani) 幫助我瞭解身為努里斯坦血統的阿富汗美國人是什麼感受，修正了人們以為她的族人都是又窮又狂熱的錯誤印象。

第一個段落裡的引用出自Peter Mayne的*The Narrow Smile* (Murray, 1955)。第三個段落談到亞歷山大大帝的部分出自Arrian的*Anabasis* in Martin Hammond's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馬可波羅所說的話，請見其著作*The Travels* (Penguin, 1958)，該譯本由Latham翻譯。

想知道「大博弈」的脈絡、亞歷山大·伯恩內斯之死的細節，或者只是想看一本好書，我推薦Peter Hopkirk的*The Great Game: 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 (John Murray, 2006)。伯恩內斯死亡的消息直到一八四二年二月才傳到英國，隨後有很多人刊載了悼念他的文章。由Major Hugh Pearse主編的*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Gardner*在一八九八年由William Blackwood & Sons出版。

英國傳教士E·唐寧斯 (E. Downes) 一八七三年出版*Kafiristan: An Account of the Country, Language, Religion and Customs of the Siah Posh Kafirs: Considering Especially Kafiristan as a Suitable Field for Missionary Labour* (W. E. Ball, 1873)。他在書中暗示喀菲爾斯坦有豐富的金礦和一種催情植物，或許是覺得有必要為此地不那麼靈性的一面打廣告。

麥克奈爾在喀菲爾斯坦的經歷日後被化為兩本書刊：一本是給一般大眾的、由W. W. McNair所著的*A Visit to Kafiristan* (Wm. Clowes & Sons, 1884)，另一本是給印度政府的“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s in Part of Eastern Afghanistan and in Kafiristan

in 1883” (Dehra Dun, 1885)。他在兩書問世不久後過世，他的傳記 *Memoir of W. W. McNair, the First European Explorer of Kafiristan* (Keymer, 1889) 由 J. E. Howard 所寫。英國人曾嘗試分類當地民族，其著作 *Dardistan and Kafiristan: In Three Parts*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85) 後來只完成兩部，獨缺喀菲爾斯坦的部分。

G. S. Robertson 的 *Kafirs of the Hindu Kush*，最早於一八九六年出版，後來在二〇〇一年由巴基斯坦出版商 Sang-e-Meel 再版重出。他給英國政府的機密報告，請參考 British Library under the title “Report on Journey to Kafiristan” (HMSO, 1894)。他的傳記 *The Unlikely Hero* (Spellmount, 2008) 由 Dorothy Anderson 所著，其中反駁了外界認為他應該更保護喀菲爾人才對的指控。阿布督·拉曼汗的回憶錄 *The Life of Abdur Rahman, Amir of Afghanistan*，在一九〇〇年由 John Murray 出版。

麥克諾騰爵士所說的「你的親戚們來了！」這句話，引自一八八四年麥克奈爾在皇家地理學會的演講，參見 Howard 的 *Memoir of W. W. McNair*。亞倫·班奈的引用出自他的劇作 *The History Boys* (1995)。二〇一四年的DNA調查 A Genetic Atlas of Human Admixture History，由 Garrett Hellenthal、George B. J. Busby 等人所完成，並發表於同年二月十四日出刊的《科學》 (*Science*) 雜誌上，其中數據的互動式地圖請參見

<http://admixturemap.paintmychromosomes.com>。

談論改宗後的努里斯坦人的書籍有 Max Klimburg 的 *The Kafirs of the Hindu Kush: Art and Society of the Waigal and Ashkun*

Kafirs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9); 艾瑞克·紐比在旅遊回憶錄中有稍微關注過努里斯坦，見*A Short Walk in the Hindu Kush* (Harper, 2010); 此外，派駐在喀布爾的三位外交官Nicholas Barrington、Joseph T. Kendrick與Reinhard Schlagintweit曾到訪過努里斯坦，並將其見聞寫在*A Passage to Nuristan: Exploring the Mysterious Afghan Hinterland* (I. B. Tauris, 2005)一書中。

Alberto與Augusto Cacopardo寫了一本叫做*Gates of Peristan* (IsIAO, 2001)的書，研究了喀菲爾斯坦、卡拉什人和吉爾吉特與罕薩一帶居民的習俗。雷金納德·紹姆貝格上校 (Colonel Reginald Schomberg) 對卡拉什人的評論出自*Kafirs and Glaciers: Travels in Chitral* (London, 1938)，此書現已絕版。吉卜林的*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可見於Wordsworth一九九四年的重印本。

M·S·杜蘭尼 (M. S. Durrani) 的卡拉什人專著*Kalash Kafirs - The Urgent Need to Save a Vanishing People*寫於一九八二年，但並未出版；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找到一本。

後記 在底特律

感謝怡蘭·蘭姆曼博士 (Dr. Elaine Rumman)、優席夫·巴拉卡特 (Yusif Barakat)、喬治·庫利 (George Khoury)、伊瑪目哈山·卡茲維尼 (Hassan al-Qazwini)、威森·布理季、米爾薩·依斯邁、阿布·什哈波和內布拉斯加州的雅茲迪族人。

伊拉克基督徒的資訊來自蘇哈·拉珊的*Christianity in Iraq* (Gracewing, 2005)，以及Dr. Christoph Baumer的*The Church of the East*。馬可波羅的故事見Morris Rossabi的*Voyager from Xanadu*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2)。 *Telling Our Story: The Arab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一書於二〇〇七年出版。對魯皮耶里著作的徵引，請見第一章的參考書目。

認識中東 6

被隱藏的眾神： 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智慧的旅程

Heirs to Forgotten Kingdoms :
Journeys into the Disappearing Religions of the Middle East

作者 / 傑拉德·羅素 (Gerard Russell)

翻譯 / 葉品岑

編輯 / 王家軒

助理編輯 / 柯雅云

協力編輯 / 王紫讓

校對 / 陳佩伶

插圖繪製 / 鍾語桐

封面設計 / 許晉維

企劃 / 蔡慧華

總編輯 / 富察

社長 / 郭重興

發行人兼 / 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版發行 / 八旗文化 /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 / 02-22181417

傳真 / 02-86671065

客服專線 / 0800-221029

信箱 / gusa0601@gmail.com

Facebook / facebook.com/gusapublishing

Blog / gusapublishing.blogspot.com

法律顧問 / 華洋法律事務所 / 蘇文生律師

初版一刷 / 2021年 (民110) 三月

ISBN / 9789865524487 (EPUB)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 in Taiwan)

HEIRS TO FORGOTTEN KINGDOMS

Copyright © 2014 by Gerard Russ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able of Contents

書封

目錄

各界推薦

推薦序 另眼看文明衝突，中東的少數宗教能教我們什麼？ 蔡

源林

年表

中東少數宗教簡介

前言

緒論

第一章 曼達安教：倖存的巴比倫人

第二章 雅茲迪教：孔雀天使的信徒

第三章 祆教：拜火之人

第四章 德魯茲派：永生之族

第五章 撒馬利亞人：失落的以色列民族

第六章 科普特人：信奉基督的古埃及人

第七章 卡拉什人：谷地裡的異教徒

後記 在底特律

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

版權頁